

中國  
民族解放運動史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

編者 華

崗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

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 自序

本書係由中國大革命史改編擴充而成，當然其中被刪削的地方亦不少。自大革命史刊行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九年的歲月。當時本來只是一種初稿，徒因一時無暇修正，而又恐稿件難於保存，乃交由春耕書局暫印數千部，以供給讀者的研究需要。原擬蒐集批評意見，再行修正問世。不料該書正在刊行，作者即被送進所謂特種休息室，從此與外界隔絕者達七年之久，於是修正該書的志願也就歸於泡影。而滬平兩地書商，未徵作者同意，竟將初稿本濫行翻版，其中錯誤脫落，更視原版爲甚。日譯本據說係根據翻印版，錯誤殆更難免。爲補救此項缺陷，惟有將該書重加訂正；但兩年來忙於抗戰實際工作，又簡直無暇及此。最近養病山中，始稍有整理時間，並索性加以改編擴充，使成爲一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這是因爲現在抗戰建國事業，需要參考吸收過去經驗教訓之處，已不限於大革命時期，故現在改編擴充的形式，或許對於讀者要有些用。我的計劃是將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作爲第一卷，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作爲第二卷，大革命以後直到現在抗戰作爲第三卷。這裡所刊行第一卷，第二卷與第三卷如無其他意外，亦將陸續刊行，惟病中精力有限，參考資料亦很不充分，如有錯誤或不妥，尚希讀者不吝指教，以便將來再版時訂正。

本書研究的範圍不是廣義的中國民族運動或種族革命，而是近百年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所以不但黃帝伐蚩尤與周對獯狁，漢對匈奴，東晉對五胡，北宋對女真的抗爭史跡，不在本書研究範圍之

內；即明末清初各地屢起屢仆的種族革命，亦應讓整個中國社會運動史去處理。本書的範圍只是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民族解放的史實給以忠實的記載和扼要的分析，指出這些運動的根源、特徵和教訓，以便對於當前抗戰建國大業有所借鏡和幫助。我所以從鴉片戰爭說起，也正如有些史家所說一樣：鴉片戰爭乃係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它劃定了近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界址，此後中國社會所有的一切動亂和變遷，都以鴉片戰爭爲出發點。鴉片戰爭不僅是中國開始被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衝擊，而且從此引起了中國社會內部重大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不僅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而且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至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所以本書從鴉片戰爭說起，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時，再過幾個月就是鴉片戰爭的百年紀念，我們回溯過去這一百用血與火所寫成的中國史，不禁會引起無限的憤怒和興奮。因爲在這一百年回溯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國際資本主義的群魔怎樣從中國吸吮着膏血來澎漲它們自身，怎樣驅使它們的鷹犬來搾取中國人民；而且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怎樣用自己的戰鬥力去反抗外寇及其代理人的吸血和絞榨，來爭取中國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並向我們提示了許多爭取解放自由的道路和方法。因此，我願乘此機會把我的一點研究心得供獻於國人，並願意把這本書作爲對於中國現代史百年紀念的一件微末的獻禮。

關於研究中國過去民族解放運動對於目前抗戰的意義，在緒論裡已經有所說明，這裡不再贅述，現在所應該聲明的，就是本書雖名爲民族解放運動史，但對於中國內部的社會解放運動也還是加以記載，這是因爲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根本是不能分離的。在中國現在條件之下，如果沒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固然談不上社會解放，可是歸根到底說起來，如果沒有社會解放的實現，也就不能最後消滅民族的壓迫。這一真理，已經有蘇聯活生生的歷史給我們證明。以中國來說，我們只要看鴉片戰爭以後的

歷史也就可以知道，一百年來我們民族的鬭爭的歷史，同時也就是一部階級鬭爭的歷史，一部克服階級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來爭取民族澈底解放的歷史。因爲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殘餘，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又轉而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不僅如此，帝國主義所以能够在中國取得這樣高的利潤，同時也還依據於中國工人階級生活的低下，勾結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做它的同盟者。所以非常明顯的是：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解放中國民族，國內社會關係之革命的改革，這些事都相互聯接着，成爲中國革命之整個的責任。自然，民族的壓迫，可以加速革命危機的成熟，加緊工農群衆的不滿，便利他們的動員，並且賦與革命的起義一種真正民族革命的基本的力量和特質。再者，民族的因素不僅能影響勞動階級與農民的運動，而且能影響其他階級的態度，在革命的過程中，改變其結合的形式，這就使民族統一戰線成爲可能與必要。然而無論如何，反帝運動遲早必然要推動廣大工農群衆去進行社會解放鬭爭，這正如工農的社會解放鬭爭不能不喚起全國人民去反對民族的壓迫一樣。這種民族革命鬭爭與社會解放運動互相影響與互相推動的事實，差不多充滿近百年的中國歷史。譬如辛亥革命，直接的原因是由反對滿清專制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國人民去進行反帝運動；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由反對二十一條件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中國人民去進行反對安福政府賣國賊，反對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成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又如五卅運動直接的原因，是由反帝國主義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中國人民去進行反對當時的北洋軍閥；再如民國十六年北伐開始是直接與北洋軍閥作戰，同時

在革命軍佔領的區域，就開始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發展的結果，後來直接收回租界，又成爲直接反帝的運動。這種例證可以說舉不勝舉，細心的讀者自不難舉一反三。因此，本書在民族解放運動史的名義下，同時也記載了中國社會解放的鬪爭史跡，應該是不足爲怪的。

最後，還有必須聲明的一點，即作者去年在武漢時，曾將本書提綱在抗戰常識研究班及兩個類似的訓練班，做過好幾次講演；事後並曾先後收到謝文耀、劉乃仁、彭菊似、曾亞男四位同學經過細心整理的記錄，各人的記錄雖有詳略的不同，但也都有他各人的優點；我現在的刊行稿，其中有些地方也就是採用他們的筆記，這是我應當感謝他們的。所可惜的，就是最近接到彭女士家屬來信，知道彭菊似與曾亞男兩君已於今春在戰區工作時犧牲。她們爲了爭取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兒女的一分子，也是催促我編著本書最積極的同志，可是她們現在已經不能再看到本書的刊行了。所以本書的出版，也可以說是對她們的小小的紀念。

民國二十八年雙十節華崗自序於重慶南泉

#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目錄

## 第一章

緒論

一—三二

## 第二章

鴉片戰爭

三三—六〇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鴉片戰爭的起因

三三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經過與平英團的起義

三九

第三節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與民族自衛運動的再起

四五

第四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五一

第五節

帝俄的侵入——中俄交涉

五八

第六節

鴉片戰爭的性質和教訓

六三

##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六九—一〇二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背景

六九

第二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中國農民戰爭

七三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勃興和戰爭……………七八

第四節 反革命的崛起和太平天國之衰亡……………八二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三合會暴動和捻黨叛亂……………八七

第六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九二

第七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九八

第四章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一〇三一—一〇六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侵略中國的新姿態……………一〇三

第二節 法國掠奪安南與中法戰爭……………一〇七

第三節 朝鮮獨立問題與中日甲午戰爭……………一一一

第四節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的教訓……………一一九

第五章 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一二七—一五八

第一節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一二七

第二節 維新變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一三四

第三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及其評價……………一三八

第四節 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特質……………一四二

第五節 八國聯軍之役與列強的衝突……………一四九

第六節 辛丑條約與拳亂事件之評價……………一五四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一五九—一九〇

第一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鬪爭……………一五九

第二節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辛亥革命前立憲與革命之爭……………一六六

第三節 興中會與同盟會的產生和活動……………一七一

第四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和意義……………一七六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結果和教訓……………一八二

第七章 五四運動……………一九一—二一六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一九一

第二節 五四運動的國內環境……………一九九

第三節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二〇五

第四節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教訓……………二一一

#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二卷目錄

## 第八章 民族解放的生力軍——現代

工人運動的發軔……………二一七—二三八

第一節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社會地位……………二一七

第二節 中國現代工人運動發展的趨勢和特點……………二二二

第三節 香港海員罷工的意義和影響……………二二五

第四節 京漢工人大罷工與『二七』流血……………二二九

第五節 中國工人階級與民族解放運動……………二三七

## 第九章 國民黨改組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二三九—二七〇

第一節 國民黨改組前夜及改組中的中國情勢……………二三九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之史的發展及其改組經過……………二四五

第三節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發展……………二五一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對於民族革命的主張和政策……………二五六

第五節 國共合作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趨勢……………二六二

**第十章 掀起中國大革命高潮的五卅運動……………二七一—三〇〇**

第一節 『五卅』前夜中國經濟危機與革命運動的發展……………二七一

第二節 『五卅』大屠殺及上海民衆之反抗運動……………二七九

第三節 『五卅』事變後中國各地之同情援助……………二九〇

第四節 『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二九六

**第十一章 從五卅運動到北伐……………三〇一—三三〇**

第一節 帝國主義的新政策和愛國運動的新發展……………三〇一

第二節 反奉戰爭、日本出兵與『三一八』慘案……………三〇六

第三節 反革命戰線的破裂與罷工及一般革命鬪爭的興起……………三一五

第四節 廣東的統一與北伐的準備……………三二四

**第十二章 北伐戰爭的勝利與**

**收回漢口九江租界……………三三一—三六〇**

第一節 北伐軍佔領長沙武漢的戰爭與民衆威力的表現……………三三一

第二節 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的新浪潮……………三三七

第三節 萬縣慘案與反英運動的開展……………三五五

第四節 「一三」慘案與漢口九江租界之收回……………三五五

### 第十三章

#### 上海起義與「四一二」慘變

……………三六一—三八五

第一節 第一、第二兩次起義的流產……………三六一

第二節 第三次起義的成功……………三六七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新陰謀與南京屠殺……………三七六

第四節 「四一二」政變的教訓……………三八一

### 第十四章

#### 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

……………三八六—四一七

第一節 兩個營壘與兩個中心……………三八六

第二節 土地革命的興起與馬夜事變……………三九〇

第三節 國共兩黨關係的演變及分裂……………三九八

第四節 南昌起義與八七會議……………四〇五

# 第十五章 廣州起義與中國民族解放

## 運動的新旗幟

四一八—四三四

第一節 武漢反動後中國民族力量的新結合

四一八

第二節 廣州起義的決定和準備

四二二

第三節 廣州起義的經過和失敗

四二五

第四節 廣州起義的意義及教訓

四三〇

# 第十六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

## 大革命的總結

四三五—四六五

第一節 中國大革命的根源和性質

四三五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中各種社會動力的作用及演變

四四四

第三節 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意義

四五二

第四節 中國大革命的歷史教訓

四五六

##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民族擁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位於亞洲東部的廣大地區，全國面積約有一千一百七十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國土之廣僅次於蘇聯。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面積爲可耕地，揚子江、黃河、珠江三大河流，由西向東橫貫其間，沿江河沃野平原爲中國最富之區域。物產之豐與礦產之富，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農產有五穀食糧，工業原料有棉、麻、烟草、絲、茶、植物油、木料、牲畜、家禽、皮毛、羽角等，礦藏則有煤油、煤、鐵、錫、鎢、鉛、鎳、金、銀、銅等，煤的蘊藏總數達九三〇〇〇〇〇噸，鐵的蘊藏總數在十萬萬噸以上。

中國文化是全世界人類與歷史上最古最古的文化，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其中有偉大的思想家、卓絕的軍事家及出色的發明家，有豐富的典籍文藝，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遠在紀元前兩千年間中國已有指南針的發明，而火藥的應用亦在歐人以前。二世紀時即有紙張的出現，七世紀時，已有刻版印刷的發明，到十一世紀更有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其他如華美精緻的金屬品、陶瓷器及光澤美觀經久的染料，亦爲中國自古著名的特產。中華民族是愛好勞動的民族，而勤苦耐勞，愛國熱忱與酷愛和平的精神，尤爲中華民族向來的特色。

可是雖有如此顯著的優點，而至今還是一個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中國的封建社會，延長了二千多年，其中雖然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暴動，但是因爲那時還沒有發生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沒有一個

新的階級來領導農民，所以農民暴動，還祇是被利用去改朝換代。朝代雖然換過不少，而地主階級的統治，還是繼續維持；封建關係，還是沒有打破。這種情形，在過去閉關自守時期，如果還能維持着自給自足的生活，那末，一到十九世紀時，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東方，中國便不免要暴露出自己經濟上的落後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落後性。由於這種落後，我們中國人受盡了外人的打擊。首先是英國人打了我們（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然後英國人和法國人一齊打了我們（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之役），然後甚至三島小日本——幾千年來受中國文化培養熏陶的日本，歷史上尊敬中國爲「天朝」的日本，也打了我們一頓（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從此以後，特別是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們中國人，大家都敢於欺侮我們中國人。因此，一九〇〇年的時候，西方和東方的大小帝國主義都聯合起來打我們中國人（即所謂八國聯軍之役）。在中國當時統治的腐朽的滿清及其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完全腐敗的軍隊，自然不能對於外國侵略者實行真正嚴重的抵抗；而滿清所實行的反中國和反人民的政策（即所謂「寧贈外寇，不與家奴」的政策），更助長了外國強盜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滿清在外寇威迫之下，簽訂了各種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賣身契約），中國支付了而且到現在還支付着大量的軍事賠款；根據這些條約，中國開關了一切最好的江海口岸，讓外國的商品、資本和軍艦自由的侵入；根據這些條約，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把最富藏的礦山都出租給外人成爲租借地。外國強盜們在中國整個活的肌體上實行分割，於是我們中國東西南北各方面的邊疆和藩屬都被割去了！外國強盜們把中國最好的地方搶去了，在那些地方開闢所謂外國租界，這些租界，無論在實際上，無論在「法律」上，都是國家內的國家。外國強盜們把中國一切經濟命



脈都搶握在自己手裡，他們在實際上監督着中國的財政稅收和進出口。在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藉口之下，這些強盜們在中國最心腹之地經常駐紮大批的海陸空軍。這樣一來，中國人民最痛恨的外國強盜們，在中國，像在它們自己家裡一樣來隨意支配；而我們中國人，在自己家裡反轉來由主人變成奴隸。於是中國由獨立國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但是我們不但是『偉大的善於夢想的中國人民』，而且還是『偉大的善於自求解除束縛的中國人民』。因此在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總是不折不撓地爲解除自己這種被壓迫的被屈辱的半殖民地的狀況而奮鬥。

同時，中國的生產力被最野蠻的君主政體和軍閥官僚制度束縛着。當時雖然在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是，在中國依舊統治着中世紀黑暗的滿清專制政體然後除了辛亥革命後很短的時期試行民主共和外，又統治着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制度。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盡了各種可能和難堪的義務，但是中國人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權。如此，經濟的落後，民族的壓迫和政治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一種非常貧弱的地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經常地挨餓受凍，每年有幾百萬人甚至幾千萬因所謂天災（水旱蟲災、傳染病等）而死亡，而流離失所。中國的統治階級經常不注意建設真正合乎國家需要的國防力，他們把國家的收入多半用在無益的消耗，和裝入個人的私囊；因此，不能建立強有力的國防軍隊去抵抗外寇的侵略，中國就變成了外國經常侵略和進攻的對象。也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異常迫切地找尋各種方法和道路，以便把貧弱的中國變成富強的中國，就是使中國變成人民無飢寒交迫之苦，力能過飽暖生活的國家，以及使中國變成有充足的國防力，能够打退一切外敵進攻和保護自己的每寸土地和每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國家。因此，在中國近百年史的篇幅上，充滿了中國人民爲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運動和鬭爭。

然而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中國民族的淪爲半殖民地，以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發展，都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自有其客觀發展之規律。本書的任務就是想根據歷史科學的基本法則，對於上述現象加以較有系統的研究，以期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研究上，能够得出一些應有的結論——其發展規律，其經驗教訓，以便有所助益於當前的抗戰建國事業。緒論的目的是要略略說明一下民族運動與民族革命的時代性，以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在總的世界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和意義，並說明一下本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作爲讀者在閱讀正文之前的一種準備。

本來，殖民地並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才出現的，當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已經有了殖民地。古代以奴隸制度爲基礎的羅馬，即曾經進行過殖民地政策。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初，殖民地也曾起過很大的作用。殖民地的劫奪，乃是資本原始蓄積的重要來源之一，先進國家奪取和擴充殖民地的鬭爭，是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分離的事實。同時，在西歐形成近代民族的過程，也是與西歐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民族獨立、民族建國運動的過程相符合的。在舊的封建社會內，舊的生產關係及舊的封建國家阻礙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乃產生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民族獨立及民族建國運動，這些運動之完成是經過許多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許多次民族戰爭的。

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前，英國會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封建國家。英國一六四〇至一六四九年資產階級大革命是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去推翻了英國封建國王、貴族、牧師、紳士們的政權，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曾由英國人民法官一百三十五人，公審當時英國國王查理士第一，由法官當衆宣布：「查理士第一爲專制者、叛國者、虐殺者，是本國善良人民之公敵，判處死刑。」真的，在法官宣布後，查理士第一送上

斷頭台了，並且宣佈了英國爲共和國。經過這次革命，並經過一六五二至一六五三年對荷蘭的戰爭，英國把荷蘭打敗了，英國民族統一、民族建國才得到了初步成功。然而，終因克倫威爾在一六五三年解散了英國國會，實行了軍事獨裁，並因後來英國國王又會復辟，英國共和民主政體又被推翻了，而進於反動時期。至一六八八年又發生了第二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所謂貴族革命，英國乃變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的國家，名義上雖然存在有國王，實際上一切政權都在資產階級國會所產生的政府手內。經過這兩次的政治革命，又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在英國很迅速地發展起來，後來發展成爲現在的英國帝國主義。英國本身也由一個進步的民主國家變爲現在帝國主義的擁有多數殖民地的多民族國家，而英國民族也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

法蘭西共和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法蘭西民族是怎樣統一起來的呢？這也經過了許多次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與反異族侵入的民族戰爭。在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前，法國在經濟上是一個農村經濟佔絕對優勢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會是農民，工業則以不滿十個工人的手工業佔優勢，而有十萬以上的城市，不過巴黎與里昂罷了。在政治上一切政權會經落在國王、貴族及僧侶等級手內，第三等級的平民完全沒有享受任何權利。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會是比較徹底的革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政府發表了有名的人權宣言，廢除了身分、等級等特權制度，推翻了國王、貴族、僧侶的舊政權，建立起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權。特別是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四年的雅各賓派的小資產階級專政，曾經毫不留情地打擊了摧毀了一切舊的封建勢力。在一七九三年一月，革命政府公審通敵（奧國）逃跑的國王路易第十六，當時在群眾高喊：『與其死十萬人，不如殺死路易一人；祖國

不能亡，所以路易不能不死』等要求下面，法國憲法會議終以多數通過了判處路易第十六的死刑。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震動了當時歐洲諸國，使得當時歐洲各國的反動封建君主膽寒心驚，奧普英俄瑞典等國會經共同訂立了所謂神聖同盟，武裝進攻法國革命。法國人民爲保護法國大革命，反對反革命的君主同盟而進行的戰爭，曾是革命的民族戰爭。但是，後來拿破崙建立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許多國家，法國民族戰爭又變爲帝國主義的戰爭。

如果沒有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果沒有摧毀法國封建國家及對外民族戰爭，法國民族是不能統一起來，而法國民主的民族國家也是建立不起來的。雖然，這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君主，但是，後來又經過兩次君主專制與兩次革命，始建立起近代法蘭西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却是建築在鎮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上面的。近代的法蘭西共和國雖然是實行一八七五年以來的民主憲法，然而，法國人民究竟還是處在資產階級壓迫剝削之下，法蘭西民族也由解放的民族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法蘭西共和國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宗主國，壓迫和剝削法屬非洲及安南等殖民地內被壓迫的民族。因此，我們說，法國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因爲『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德意志民族是怎樣獲得獨立的？德意志底統一怎樣恢復起來的呢？列寧說：『德意志底統一，在當時各階級力量對比關係中，可用兩種方法來實行：或者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並建立德國共和國的革命來實行；或者是用普魯士底鞏固，普魯士地主們在統一德國的領導權的那些皇朝戰爭來實行。』（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五四七頁，論培培爾一文。）

然而，因爲在十九世紀前半葉及中葉德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及組織上還是很薄弱，並因爲拉沙爾及拉沙爾派看得無產階級的民主的道路很少可能，而投降了俾士麥，結果，德意志底民主的革命統一

遭受了失敗，而德國民族及德意志國家是按俾士麥的道路，在普魯士君主制度領導下恢復了統一。在普魯士君主制度領導下的德國統一，是會經過三次對外的民族戰爭的。第一次是一八六四年德丹戰爭，普魯士聯合奧國而戰敗丹麥。第二次是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普魯士聯合俄法意，使奧國陷於孤立，而戰敗了奧國。第三次是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普魯士聯合俄奧，使英國中立，而戰敗了法國。馬克思認為：普法戰爭在德國歷史上是進步的戰爭，因為它是反對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專制，並且是恢復德意志底統一；但是，當德國軍隊逼近巴黎，已喪失了防禦的性質，馬克思則又反對德國向法國的侵略。

德意志民族及德意志國家雖然統一了，但是，德意志的人民並未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特別是當目前法西斯統治德國時，德國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都被剝奪了，德意志民族是最不自由的民族。

意大利民族是怎樣獲得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呢？是從反中世紀封建殘餘與反對法奧異族侵入的鬥爭中獲得的。在統一前，意大利會是一個散漫而不統一的封建國家，在當時意大利領域內會有幾個小獨立國及其他小附屬國。意大利內部封建勢力及異族法奧之侵入，阻礙了意大利民族及意大利民族國家之形成。先是拿破崙第一侵入意大利，為意大利的國王，後又是奧國梅特涅侵入意大利。經過反對奧法及羅馬教主的三次戰爭，始獲得了意大利國家底統一及民族獨立。第一次是一八三〇年在意大利燒炭黨領導下的民族運動，會企圖從奧國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但是被奧軍鎮壓下去了。第二次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在加里波的的領導下會進行了反對奧普的民族戰爭，會將奧軍驅逐出境，建立起羅馬共和國。但是，由於意大利內部不團結，這次民族運動也被奧法聯軍所鎮壓下去了。第三次

是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七年反對奧國的民族戰爭，意大利在這次戰爭中與法國聯盟，聯軍將奧國打敗了。因為對奧民族戰爭的勝利，意大利內部都統一於薩丁尼亞，而於一八六一年成立了第一次意大利國會於吐林。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民族國家得以初步形成。然而，當時在意大利之羅馬尚駐有拿破崙第三的軍隊。祇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失敗，拿破崙第三撤退羅馬駐兵，意大利始定都於羅馬。

在十九世紀意大利反對奧法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意大利獲得了勝利，意大利民族得以獨立，國家得以統一。然而，這次統一，與德國一樣，不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的民主統一，而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自上而下」的統一。因此，意大利底資產階級，在自己掌握政權以後，實行侵略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強奪非洲的殖民地，奴役別個弱小的民族，意大利民族也由解放的民族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意大利國家由民主的單一民族的國家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自從莫索里尼登台執政以後，取消了意大利人民用許多流血鬥爭所獲得來的民主自由，他把資產階級的民主的意大利變成了法西斯的專制的意大利，使意大利人民及意大利民族呻吟於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意大利的人民與民族除了推翻法西斯帶統治以外，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與自由。

總括起來說：在西歐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特別是從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時起，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止，這個時期是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恰恰又是民族運動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西歐這些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呢？列寧回答說：「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會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爲要使商品經濟完全勝利，就需要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語言一致的人民底領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語言底發展

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之統一及順利發展是真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周轉底最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廣泛地團集爲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與買主發生親切聯繫的條件。』（列寧選集第七卷，中文版，三五二頁。）西歐這些民族運動的性質顯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些運動的內容是消滅國內封建勢力，並且驅出異族的民族壓迫，而統一國內的市場，以造成在國內發展資本主義的順利條件；這些運動的形式，則表現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及反異族壓迫的民族暴動及民族戰爭上。

美國，在地理上說來，不在西歐而在北美。然而，美國民族及美國建國與西歐相同。這就是說，近代美國民族形成的過程與近代美國民族國家的建國過程也是相符合的。大家知道，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後，歐洲各國開始向南北美洲移民。在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年英法戰爭以前，英國在北美之殖民地，僅限於北美之東北部，而北美內部大部分爲法國的殖民地（所謂新法蘭西）。自該次英法戰爭後，法國失敗，法國大部分在北美殖民地被英國所佔領。

在美國獨立以前，北美爲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美的殖民地政策阻碍北美當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北美人民之反抗，產生北美獨立運動，要求脫離英國而獨立，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民族國家。北美利加民族的民族獨立及北美合衆國之建國，亦曾經過兩次對外民族解放戰爭及一次對內民主戰爭始行獲得。第一次北美獨立戰爭在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一七七五年四月在費拉特爾費亞第二次大陸會議上，北美宣佈對英戰爭，發行自己紙幣，開始組織革命軍隊，舉華盛頓爲革命軍的總司令。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北美獨立宣言，宣佈北美十三州脫離英國而獨立。當北美革命軍開始與

英作戰時，僅有一萬七千人，糧食、彈藥缺乏，革命軍士兵及長官多爲平民，缺乏軍事訓練與作戰經驗，革命軍被英國軍隊打得一個大敗，北美工商業中心城市紐約失陷，爲英國軍隊所佔領。當時，北美革命政府爲着反抗英國，曾派富蘭克林出使歐洲，尋求同盟國。當時法國因爲反對英國強奪其殖民地，並在歐洲與英爭霸，而利於減弱英國。因此先在暗中援助北美獨立，至一七七八年，公開與美訂立同盟條約，公開援助北美獨立戰爭。當時西班牙、荷蘭亦援助北美獨立。法荷西等組織義勇軍數千人赴北美，參加北美抗英獨立戰爭，其中有鼎鼎大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經過八年苦戰，英美互有勝敗，終因北美內部團結一致，不向英國妥協投降，英國政府無法，始於一七九三年三月訂立英美和平條約，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這次北美獨立戰爭，雖然有法荷西之援助，他們曾包含帝國主義之目的，然而，這次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真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列寧）

英國雖然在一七八三年承認了北美的獨立，然而究竟還未放棄自己底野心，仍然企圖把北美變爲自己底殖民地，取消北美之獨立，因而爆發了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的第二次英美戰爭。戰爭開始時，美軍佔優勢；但自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俄國失敗，英國在歐洲無後顧之憂，乃集中兵力，大舉攻美，英國海軍將美國各海口一律封鎖，美國京城華盛頓於一八一四年八月亦被英國攻下。然而，當時美國政府並不因京城失陷而向英國投降，仍然堅持繼續抗英民族解放戰爭。英國無可如何，乃於同年十二月與美國議和，仍然承認了北美的獨立。

北美在兩次對外民族解放戰爭中奠定了北美合衆國的基礎，然而，不到五十年又會爆發了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南北戰爭。這次戰爭乃是代表地主（黑奴主）利益的南方，不滿意代表工業資本



家利益的北方解放黑奴的政策，因而引起的。這次戰爭從歷史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北方會是進步的民主的，代表黑奴主利益的南方是反動的反民主的。這次戰爭的結果，南方失敗，北方勝利。從此以後，南北美在經濟上政治上等方面都統一起來，北美民族形成爲一個近代的先進民族，美國成爲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共和國，國基得以鞏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達到驚人的速度。然而到十九世紀末，美國也已變爲帝國主義的國家，藉口西班牙人殘酷壓迫古巴革命，於一八九八年派艦隊與西班牙開戰，不到四個月而克服了西班牙的海軍。西班牙割菲律賓羣島與美國，爲美國之殖民地，西班牙並承認古巴之獨立。從此，古巴在形式上雖然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了，可是實際上却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因爲美國及西班牙都是爲着爭奪殖民地而戰爭，並非爲着那一方面的民族解放而戰爭。從這次戰爭以後，美國由單一民族國家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多民族國家，北美利加民族由解放民族也變成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

如上所述，各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由單一民族的國家變爲擁有很多殖民地的多民族國家，由獨立解放的民族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許多原來獨立的國家却變爲不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許多原來獨立的民族却變爲不獨立的被壓迫民族的奴隸。這是一個現象的兩方面。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存在着而無民族壓迫，不去搶奪殖民地，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到了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列強佔殖民地尤其來得厲害。因爲資本的不斷集中而尋出路，生產力的擴大，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狀態中所起的消費限制，以及因此而必然發生的經濟衰疲和利潤降低的不斷威脅；這些原因，都迫得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向外擴張，尋求殖民地，以便開發起來，一方面當作資本輸出的市場，一方面也當作商品輸出的市場。同時，又可從土人手中提取來原

料運回本國，並以國家權力所及的各種強硬方法，迫使土人做工，而給以不够一飽的低微工資，以實現它們超利潤或高利潤率的目的。加以資本積聚和集中率，引起了強大的壟斷團體（卡特爾，新迭加，托辣斯）底形成，引起了由銀行併結而成的巨大企業的新形式。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融合，大地主之加入資本主義組織的整個系統內以及此種資本主義形式之獨佔性質，遂使工業資本時期變為財政資本時期。代封建壟斷與商業資本壟斷而起的工業資本時期之自由競爭，現在一變而為寡頭財政資本的壟斷了。但由自由競爭中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獨佔並沒有消滅自由競爭，而是駕乎它之上和依傍它而存在的。因此更招來了無數特別緊張，嚴重而深刻的矛盾，傾軋與衝突。對於這現象最初研究得最正確深刻的是列寧，他曾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又說：『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個定義，包含了最主要的現象：『一方面，因為財政資本就是少數壟斷式的大銀行跟工業家獨佔團體資本相結合的一種銀行資本；別方面，因為世界的分割，就是從毫無阻礙地擴大未被資本主義列強所佔領的地方的殖民地政策，轉變而為壟斷業已澈底分割的領土面積的殖民地政策。』

在這時期，一切從前還是『自由』的殖民地已被瓜分，為着重新分割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而發生的糾紛和衝突，乃漸次帶着武裝鬭爭的性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就是英法德等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分割世界市場與殖民地而進行的最露骨的劇烈的鬭爭。殖民地成了帝國主義的投資場所和原料的源泉，成為帝國主義的生命線。如此，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便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是所謂少數『文明』民族的營壘，這些民族握有財政資本，而對地球上最大多數的民族加以金融的統治及殖民地的壓迫；另一個是殖民地及附屬國家被壓迫及被剝削民族的營壘，這後一個營壘佔有

地球上人口的絕大多數，約有十二萬萬以上的人口。如此，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世界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內被壓迫民族要求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不能像第二國際考茨基、包威爾等機會主義者，把民族問題只限於注意歐洲幾個「文明」民族的問題，而忽視了亞非洲成萬萬的「不文明」人、有色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問題。「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壞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八十九頁。）

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解釋說：「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是兩件不同的東西。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看作一個東西，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那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在的本質，仍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斯大林著論民族問題三三二頁。）在一九二五年共產國際討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員舍米契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的實質看為農民問題，而把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看作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這是因為他輕視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而不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地民衆的、深刻地革命的性質。斯大林曾經堅決反對舍米契的這個觀點，斯大林說：「當然，斯拉夫族及克羅阿脫的資產階級與賽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在民族運動中也能起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民族運動之社會意義看作是各民族資產階級競爭的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看作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這也

是同樣毫無疑義的。現在民族問題已由地方的和國家內部的問題變爲世界的問題，變爲關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鬭爭的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殖民地及附屬國內民衆反抗統治民族底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及文化掠奪的鬭爭。在這一民族問題的提法之下，各種不同民族底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能有何種意義呢？這種意義當然不是決定勝負的，有時甚至不是主要的。很明顯的，這裡最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一個民族底資產階級在競爭中，把另一個民族底資產階級打敗或能打敗的問題。這裡的問題是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群衆，首先是農民群衆，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就引起他們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同上書，三六七至三六八頁。）這一個問題在我們中國更有重要的意義，因爲農民佔中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農民群衆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軍隊，同時因爲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所以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合理地解決土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乃是中國民族革命之整個的責任。這一個問題在目前抗日戰爭中，顯然是一個有深刻意義的問題。幾萬萬農民與一般勞苦大衆，既爲全民族的柱石，那末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就非切實改善民生，並用民權的方法把幾萬萬農民動員組織起來不可。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於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觀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中國也還有人抱着這種觀點去對待國內其他少數民族，這自

然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旨不相符合。列寧與斯大林更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它解釋爲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們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併吞政策辯護了。至於那些在表面上掛着『民族自決』或『民族自治』的招牌，實際上却是鞏固和加強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統治，則不管在口頭上或表面上說得多麼好聽，在客觀上却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民族運動。例如日本帝國主義爲着併吞中國，爲着分裂我中華民族的內部團結，提出『蒙古民族自治』及『建立蒙古國』的口號，其目的是在挑撥少數蒙古人來反對漢人，想利用蒙古民族內一部分民族敗類如德王者來加強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日寇利用蒙族中這些少數民族敗類，正像利用漢族中的民族敗類汪精衛之流一樣，無非是想達到它以華制華的目的，企圖把中華各民族不論是漢滿蒙回藏等，都變爲它的奴隸，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蒙古人的自決或自治。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權上的問題。第二國際會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宣言來鼓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有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例如上面提到過的那個南斯拉夫共產黨員舍米契），也居然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也就是說民族問題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些人會經暗中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鬭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然而『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

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末，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及附屬國，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列寧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打倒帝國主義。」（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九十一至九十二頁）

由此可知，革命者處理民族問題，不應從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出發，而應從歷史的具體形勢出發。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從形式的民主底觀點上去估量，而應該從反帝國主義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也就是說，不能把民族問題與國際環境分開，而必須與國際環境、世界的事變及革命的發展前途聯繫起來。特別是，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開始深入，俄國十月革命已取得勝利之後，我們解決某一個民族問題時，在決定對於某一個民族運動的態度及立場時，更不能不把這個問題與當前的國際環境，整個世界事變及革命發展的前途聯繫起來。

以下，我們再把最近幾十年來世界革命發展的總趨勢，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在這總趨勢中所處的地位和關係，加以簡明的記述。

上面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時期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底時期。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及

其所開展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證明是世界經濟增進的生產力與國家限制間深刻矛盾底直接結果，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內腹已成熟着社會主義底物質前提；它們證明資本主義的外殼已成爲人類繼續發展底不能容忍的枷鎖，歷史已把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羈絆提到日程上了。從資本主義勢力底中心到殖民地最偏僻的角落，帝國主義把各國無產階級廣大群衆都屈服在財政資本全權統治底獨裁下。帝國主義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暴露着與加深着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矛盾，極度增加被剝削人民底壓迫，驅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鬭爭尖銳化。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戰爭極深刻地動搖着整個統治制度，而必然地引向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帝國主義把全世界繫在財政資本底鎖鏈上，以饑餓與鐵血把各國無產階級、各民族與種族威迫在它的羈絆下，無限制加厲對於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與奴役。因而帝國主義把奪取政權的任務直接提供無產階級，促使工人們不分國界、民族、文化、語言、種族、性別與職業底界限與區別逐漸自覺地團結成各國無產階級底統一的國際軍隊。同時，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不絕地增高，這矛盾的壓力主要是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身上，於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便不能不產生它的反面結果，這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出現，農民的貧困化，革命知識分子的發生，民族的覺醒，解放運動的興起。於是與財政資本強有力的聯合勢力相對抗的，終於有兩個革命的主力結合起來，即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與爲外國資本所奴役的殖民地民衆。這就是表示「資本主義征服殖民地，可是殖民地也給資本主義之崩潰以一個有力的反擊。」

這樣，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而且也就是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時代。帝國主義愈加緊的壓迫與奴役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也愈是高漲，而成爲帝國主義國家崩潰的一個原動力。馬克思很早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一文中就會說過：「一個探求支配人類運動原理的深

玄的想像家，慣於把兩端相接的法則，稱爲支配自然界秘奧的原則。在他看來，「兩極相遇」這句名言，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真理。這一個原理，哲學家用之，可以執簡馭繁，如同天文家用克普勒爾的法則或牛頓的偉大的發現（引力法則）一樣。兩極相遇，是否是那樣一個普遍的法則，姑勿深論，而此法則之顯明的表現，是可以在中國革命必將影響於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看得出來的。』『可以大膽地預先斷定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制度底那裝滿着炸藥的地雷上，並引起早已成熟了的總危機底爆發。這總危機，當它傳播到英國國境以外去的時候，就會直接在歐洲大陸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這將是一幅多麼奇妙的圖畫呀！中國引起西方的震動，而同時西方列強却在英法美軍艦幫助之下，將在上海、南京以及運河口等處規定所謂秩序。』後來馬克思的繼承人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一九二〇年）上，亦曾明白指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對於世界革命有絕大的意義。當時列寧不僅指出民族問題祇有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正當解決，西方各國革命亦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才有勝利的可能。並更進一步指明：現在各國帝國主義正集中力量進行反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鬭爭，我們有着全世界先進工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援助，亦必然能够勝利地打退敵人的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會以後各種事實的發展，便馬克思與列寧這種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預見，都得到了輝煌的證實。而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會以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也確實有許多新的發展。一方面，從殖民地是帝國主義剝削所必需的對象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經比以前更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經常目標；他方面，許多主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經濟上和在整個社會結構上，都已經起了不少的變動，最主要的就是工業的成份已經加增的發展，無產階級跟着長大，農業的危機



也更加劇烈。再則，國際形勢亦已起了巨大的變動：帝國主義的戰線，在它最弱的據點上——在沙皇的俄國——被突破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政體，十月革命打倒了資產階級；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大戰時及在戰爭初停的數年，處境亦都非常困難，革命暴動前仆後繼。如一九一八年芬蘭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的「搶米暴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和德國的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使資產階級暫時喪失了政權；一九一九年四月德國巴伐利亞亦豎起了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工人佔領工廠；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暴動；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的暴動；一九二三年秋德國的革命危機等。其中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不但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生產手段，第一次在一個絕大的國家中建立了而且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蘇維埃的這個新的國家型式，因而開始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動搖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統治。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便打破了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鎖鏈，使一個龐大國家中的各被壓迫民族一概擺脫了這種壓迫。沙皇俄羅斯向來被稱為「各民族的牢獄」，而現在被革命鐵拳摧毀了。向來被賤視的民族，被看作奴隸的民族，從此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高昇至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感動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因此，十月革命不僅開始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而且還展開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新時代。加以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因為得着改良主義者的扶持，暫時渡過國內直接革命恐慌，於是英美法日等國的殖民地政策，又加濃了強盜式的侵略性。這必然更要引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壓迫民衆有力的反抗，推動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高漲。最顯著的如一九一九年三月高麗的叛亂，同年的中國五四反帝運動，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民族資產階

級革命一九二五年四月摩洛哥的暴動，同年八月敘利亞的暴動，荷屬印度的起義，印度的革命醞釀。各國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動行爲，差不多都遇到大力的反抗。英國進攻阿富汗竟被擊退，法國帝國主義的大兵竟因不倒敘利亞的抗鬥，里夫民族的游擊隊與法國、西班牙具有最新式武器的常備軍竟能相持兩年之久，美國鎮壓尼加拉瓜民族之反抗亦達一年以上，數萬萬印度工人與農民的革命浪潮，時刻威脅着要搗毀世界帝國主義的城堡——大不列顛的統治，一切這些情形，都證明一九二三年以後，資本主義列強雖獲部分與暫時的穩定，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雖暫時退潮，但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却如海裂山崩的起來，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更可說是這種含有極大世界意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代表。中國大革命實是世界革命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不但對於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有極大的啓發推進作用，不但震動了全部的亞洲大陸，而且成爲搖撼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主要原素之一。雖因國共兩黨之分家，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破裂，使這次革命受到暫時的失敗，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但是這個革命確實給了帝國主義一個相當大的打擊，給整個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人民一個很大的刺激。

斯大林說：「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可以使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加緊壓迫工人階級，但是它已經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前的那一種「穩定」「平衡」狀態了。現在西歐各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活命的東西——殖民地，已都紛紛地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就以這一點就可知道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平衡已再沒有恢復的希望了。今天奧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焰，明天英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後天法國和德國又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後來，中國、馬來群島和印度等也都爆發革命起來了。歐洲和殖民地是什麼東西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四周。歐洲資本主義中心已經不安靜起來，在它的四周還更其不

安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號斯大林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革命的興起，乃係預告世界帝國主義的滅亡。當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歐洲各宗主國內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大巨流曾經流遍全世界，這就是通常所稱爲戰後第一個戰爭與革命的周期。

自從一九二九年美國開始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接着轉變爲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戰後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在經濟上終結了。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錯綜結合起來，並因此而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了。日形高漲的經濟恐慌，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和附屬國加緊壓榨，因爲這些國家是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的主要市場。在這方面帝國主義者所採用的方法，就是更加降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生產品底價格，首先是降低原料底價格，其次是降低糧食底價格，此外還實行商品傾銷政策，以及用強迫手段來減低半殖民地國家底關稅率（例如在中國自一九三三年夏季起，根據日本帝國主義底直接要求，對於日本的紡織品及其他商品，減低了關稅率；一九三五年根據美國帝國主義底要求，對於美國布疋等的關稅率，在巴西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在古巴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六十等等）。因此，帝國主義強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出口商業大獲其利，而這些國家本來就是苟延殘喘的民族工業却日益衰頹。同時，他們竭力勾結並利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最反動的勢力，以便使自己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侵略易於實行和更加深入。不僅如此，帝國主義還公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略，來侵佔半殖民地國家底領土和威脅他們的生存，想把自己所受恐慌的損失來取償於防衛薄弱的國家。最顯明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武裝佔據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侵佔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這樣就使許多半殖民地人民底民族生存權，直接受到威脅，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革命力量底增長。加以受到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偉大歷史勝利的影響，更推

動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人民起來做救亡求生的鬭爭，如中國救亡運動的發展，抗日戰爭的發動（東北義勇軍的奮起，上海一二八抗戰及長城抗戰等），並匯合生長成爲後來的全面抗戰；阿比西尼亞武裝抵抗意大利的進攻，安南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起義，南美中美各國解放運動強有力的開展，首先就是古巴的革命鬭爭，智利艦隊中的武裝發動，巴西的民族革命運動，荷蘭艦隊在南洋群島的起義，印度工農運動底高漲，菲律賓群島農民底武裝鬭爭，高麗罷工運動底增長（如元山罷工），波斯煤油工人底群眾罷工，阿拉伯各國人民武裝鬭爭浪潮底增長，一萬萬黑種人中間革命鬭爭底開展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反帝運動又多半與千百萬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不可分離地聯繫着，這樣就使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帶着更濃厚更深廣的社會性質。

這些革命還在繼續進展，而新的事件又接着發生。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資本主義世界又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上次危機到一九三三年末轉爲停滯，工業又開始稍許活躍和稍許高漲，然而這個活躍和高漲並不是那種會有在新的更高基礎上發生的工業繁榮接踵而至的活躍和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工業，甚至還沒有能夠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它到一九三七年中期祇不過達到這個水平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六。於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未及治好不久以前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創傷，就又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了。這種情形，就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其加強。因此之故，帝國主義列強想取償於他國，首先是防衛薄弱的半殖民地國家與其他小國來彌補其因國內經濟危機而受到的損失的企圖，也就日益加強起來了。特別是日德意法西斯侵略國，因爲利用着各民主國家不願實力制裁，尤其是英國張伯倫政策的幫忙，而且乘着民衆尙未團結起來，乘着他們尙未統一起來抵抗法西斯的時候，便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急向半殖民地與其他防衛薄弱的小國進攻。在一九三五年，

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並吞併了它。一九三六年夏季，德國和意大利組織了對西班牙的軍事干涉；同時，德國佔據了西班牙的北部及西屬摩洛哥，而意大利則佔據了西班牙的南部及巴利列群島。一九三七年，日本在佔領東北四省之後，又侵入華北，佔據了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一九三八年初，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一九三八年秋天，又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區。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日本佔領了廣州和武漢，在一九三九年初又佔領了海南島。接着德國佔據了全部捷克和米美爾，意大利佔領了阿爾巴尼亞。一直到最近由於德國佔領但澤所引起的德波英法戰爭，於是，早已開始了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過去階段的片面性，便將為戰爭的全面性所代替。

自然，法西斯侵略國家的這種橫行霸道，決不會不受到懲罰。隨着法西斯主義在國際舞台上轉為進攻，於是反法西斯反侵略運動也日益增長，日益擴大，日益具有更大的國際性質。在德國進攻波蘭的戰爭中，由於波蘭統治實行黑暗反動政治，壓迫少數民族與一切進步勢力，將自己民族命運寄託於英法反動派之手，並盲目仇視蘇聯，以致像波蘭這樣一個有三千萬人民，有三十個師團正規軍，有一千架飛機，有相當發展的工業基礎的國家，在外力進攻下，不到一個月便完全崩潰滅亡；而蘇聯却以紅軍實力去幫助了西境烏克蘭與西俄羅斯人民的解放（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同時在短期內完成，為歷史上開一新紀元），並阻止了德國法西斯的東進打擊了張伯倫、達拉第策動反蘇聯戰爭的陰謀。在民族革命戰爭方面，則阿比西尼亞游擊戰爭尚在繼續發展，捷克人民已開始起義，印度罷工運動正在擴大中，國民大會亦公開發表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揭露英國為自由與民主而戰之欺騙，堅持民族解放，實施民主政治，這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有了進一步的覺醒，在這次戰爭中不能再像第一次大戰時只處於被動被利用的地位，應該主動的積極的去奮鬥努力

，爭取並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來求得自己民族的解放，掙脫自己的奴隸地位，以推動整個人類歷史車輪前進，幫助全人類的解放。而西班牙與中國的雄偉鬪爭則更在事實上已表明了具有深刻的意義。曼努斯基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國際形勢與反法西斯運動時曾特別說到這一點，他說：『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對於外國強盜侵略進行武裝抵抗，當以西班牙人民與中國人民最爲英勇。從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偉大勝利以後，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歐洲革命運動以後，這種鬪爭是各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事變。這個鬪爭（指西班牙與中國的抗戰）底意義是很巨大的。它牽制着侵略者底力量，它阻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繼續擴大，它使國際無產階級易於進行反對其剝削者的鬪爭，它給世界各國反法西斯運動以幫助。』堅持兩年以上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戰爭，是戰爭形式中頗爲特殊的一種。西班牙人民的戰爭，是他們反對財政資本的法西斯蒂，爲了民主，自由，和平的政治底繼續和發展，因此，它是進步的，革命的，正義的戰爭。同時由於這一戰爭不僅是反對國內法西斯以佛郎哥爲首的叛亂，而且直接反對德意法西斯強盜侵略的進攻，因此，它帶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又成爲國際和平陣線鬪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策動叛軍的叛變時，曾指望獲得輕易而迅速的勝利。他們想在西班牙可以來重演一九二二年圍攻羅馬的滑稽劇。他們想：這將也如西班牙歷史上數見不鮮的軍事陰謀一樣，以爲在一個晚間就可由爬上法西斯獨裁者寶座的將軍取得勝利而結束這個冒險。然而西班牙人民以自己的英勇的鬪爭表明出：使法西斯主義能够輕易勝利的時期，已成過去。在西班牙的武裝干涉，使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耗費了將近十萬萬美金，消耗了大量軍用品，損失了巨量的人力以及自己軍隊中的許多久經訓練的幹部。武裝薄弱的，被那些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出賣的西班牙人民，爲了自己的獨立，爲了整個先進和進步人類底事業而進行實力懸殊的英勇

鬭爭，將近三年。它進行這個鬭爭來反對兩個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德意底軍事干涉，以及反對世界反動勢力底暗中干涉。這世界反動勢力，在歐洲是假借『不干涉政策』，這個虛偽口號，在美洲是假借『孤立主義』，這個虛偽口號，來實行對於西班牙共和國的封鎖的。在這個時期，西班牙共和國克服了一些不可思議的困難。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軍隊的，在敵人砲火下，它創造了人民軍隊；這個軍隊，在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如在馬德里城郊，在瓜特拉哈拉附近，在哈蘭姆一帶，在哀勃羅河上諸戰役中這樣光榮的篇幅。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指揮幹部的，在鬭爭過程中，鍊成了幾千個鐵般的指揮員和光榮的政治委員。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軍事工業的，它在鬭爭進程中把軍事工業建立起來了，老年和青年，西班牙的母親和少女，都以其全副精力貢獻於這個神聖事業。

西班牙人民底鬭爭差不多在三年內，成了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這個鬭爭到處都引起千百萬勞動人民的稱頌讚美和世界反動勢力的陰毒仇恨。西班牙人民以身作則，來號召所有其他各國人民去反抗法西斯挑戰禍首，促進了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裡和平自由勢力底團結。在西班牙共和國周圍，造成了差不多包括全世界各國的廣大的群眾的同情運動。這個運動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進行募捐，舉行群眾大會的遊行示威，建立西班牙後援委員會起，一直到舉行政治罷工和組織自願軍為止。在拉丁美洲諸國，舉行着空前偉大的遊行示威，在遙遠的印度進行着同情西班牙的全民日。對西班牙人民的同情運動，還普及到法西斯國家中去。在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進行秘密募捐，印刷成千份的傳單，夜間在牆壁上面寫着反法西斯的標語，在軍事工廠裡怠工事件，兵士們拒絕開拔去打西班牙共和國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同情運動，在全世界各國都轉變為勞動者反對本國內部法西斯的鬭爭。

將近三年的鬭爭，指示出西班牙人民有着多麼偉大的力量。在軍事上，現在他們是暫時失敗了，這是不容諱言的。但是鬭爭並未結束，西班牙人民並未被敵人所征服。今日的壓迫者是絕不能長期的唱着勝利之歌的。歷史可以證明，以前每次反動勢力的暫時的勝利，都馬上引起人民力量的產生，直到打敗反動爲止。對查加運動的血腥和野蠻的壓迫之後，情形是怎樣呢？反動的不祥烏鴉會叫着：罪惡已把民衆的革命運動完全克服了，但是四月十四日的勝利，指出了民衆並未被征服。一九三四年也是如此。在一九三三年選舉中得到了勝利的反動者，以爲它可以穩固的據有政權，可是勞動群衆的行動，蔓延到幾乎全西班牙的總罷工，尤其是阿斯杜里亞的武裝起義，表示出人民是仍然在站立着，堅決的自衛着，不讓反動勢力把他們束縛起來。就是經過『兩個黑暗年頭』的野蠻恐怖，經過屠殺與搶劫，仍然不能把工農群衆鎮壓得就範，二月六日（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又一度證明了反動的勝利只是暫時的。這樣的事實已經幾度的重演過了，它向我們證實佛朗哥的勝利也將只是暫時的東西，西班牙人民仍在鬭爭着，在抵抗着。一個從來不願作奴隸的民族，而現在却生活在這種可怕的條件下，他們怎願放下武器呢？鬭爭是在繼續着，佛朗哥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在西班牙發生的大事件，沒有一件是反動的逆行勢力所能解決的。法西斯主義連人民初步需要都無法滿足，它不能給人民以麵包和工作，它不能保證和平，不能給人民以自由。相反的，今天的西班牙是一個充滿着罪惡的國家，它是在德意特務機關無恥的統治之下。上千萬的優秀男女不經過法庭審判而秘密的被暗殺，在牢獄和集中營裡被囚閉着幾十萬愛國者，他們被法西斯任意判處死刑，長期的徒刑和罰作苦工，法西斯主義企圖把一切愛國者、自由主義者、同情自由與獨立的人們淹死在血泊裡面，對巴斯克和加泰隆人民的高尙愛國心是以生死的仇恨去迫害着。他們原有的教育被破壞了，民族慣用的語文被禁止了，佛朗哥和侵略者



這種暴虐野蠻的行動，其目的不消說是企圖把西班牙變成德意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在這種條件之下，人民能够忍受嗎？不！人民是不能忍受的。他們以鬭爭去反對法西斯主義，並且繼續鬭爭一直到獲得勝利爲止。「西班牙人民的事業是一切進步和先進人類的事業」，（斯大林）而且帶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它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的借鏡和學習，正因爲如此，所以這裡才用了較多的篇幅來記載它。

中國人民爲自己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同時也爲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抗戰，也已經進行了兩年以上。這次抗日戰爭不僅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史上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這個戰爭尤其有更大的意義，就是因爲中國人民進行這個戰爭，是反對在遠東扮演全世界反動勢力憲兵作用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民族對外戰爭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這些都是在中國對外戰爭的歷史上幾次較大的戰爭。但是在這些戰爭中都因爲當時中國的政府沒有抗戰的準備，沒有堅持抗戰的決心而遭受了失敗；同時，這些戰爭也都還是局部的對外戰爭，沒有成爲全國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其具體內容與歷史教訓，在本書以後各章中均將有所論列。正是因爲在這些戰爭中暴露了中國的懦弱無能，守舊腐敗，更加增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輕視侮辱，增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貪慾無饜。現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遠遠的超過了過去中國的一切對外戰爭的記錄，這一次抗戰是全國的大規模的對外的解放戰爭。這次中國抗戰所處的環境與過去中國歷史上一切民族戰爭不同，與歐美各國歷史上的民族解放戰爭也不相同。這裡最基本的特點，就是這次中國抗戰，是以自衛戰爭反對侵略戰爭。

站在戰爭的一方面——戰爭的發動者是日本帝國主義。它所進行的戰爭是野蠻的侵略戰爭，非正

義的戰爭，其目的是在滅亡整個中國，奴役整個中國民族。日寇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一貫繼續，其目的在把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國家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完全殖民地，把中國人民變爲日本的奴隸和牛馬。它不僅破壞我們的主權，屠殺我們的同胞，搶奪我們的土地和資源，而且摧殘我們的文化，轟炸我們不設防的城市，強姦我們的婦女，抽吸我們同胞的血液。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無論男女老幼都不免要受災難。同時，它所進行的戰爭也違反着日本人民的利益，破壞遠東與世界的和平。其目的是在獨霸東亞，建立它的所謂『東亞新秩序』，排斥列強在遠東的權益。故日寇不僅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民族公敵，並且是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公敵；而且必然要遭受日本人民的反對，世界進步與愛好和平人士的譴責與制裁。

站在戰爭的另一方面——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中國政府軍隊和全國人民。我們所進行的抗戰是自衛的解放戰爭，非侵略的、正義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不受外寇的侵略和奴役，是在搶救遠東與世界的和平。我們所進行的抗戰是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於日本人民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只有在這次抗日戰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才能把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國家，變爲獨立的統一的國家；把中國由半封建的、不民主的國家，變爲近代的真正民主的新式共和國。就是說，把中華民國變成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正因現在中國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被壓迫民族的自衛解放戰爭，所以必然能够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世界先進人類與真正愛好和平人士的援助。同時，在這個戰爭中提出『保衛祖國』的口號，也決不是欺騙的口號，而是正義的革命的口號。

中國抗日戰爭的第二個基本特點，就是以弱國反對強國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是

遠東一個帝國主義的強國，具有比較發展的工業和軍事技術，經過長期的準備，並在中國保持有侵略的據點和佈置有間諜網。但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比較起來，日本又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國，是一個人少兵少、財政困難、資源貧弱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工業發展很低和軍事技術的落後。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土地之廣僅次於蘇聯，人口之多為世界第一，資源豐富，人多兵多。從這一個特點中，我們就可看到中國有着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力量和必要條件，然而要求得速勝是不可能的。中國抗日戰爭必然是艱苦的持久戰。在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與叛變（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諸逆之通敵賣國，不過是已經公開暴露出來的現象），暫時的局部的妥協等不利情況，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

最後，從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上來說，中日戰爭還有以下的特點：（1）中日戰爭的爆發是與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開始的資本主義新的經濟危機同時進行。如果說，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能夠從上次經濟危機的打擊之下恢復過來，就已遇到了新的經濟危機；那末日寇則因早已把自己的國民經濟放到戰時經濟的軌道上去，並且爲了這樣而消耗了它的現金準備和原料儲藏，所以更不可避免要引導到貧困飢餓，以至於破產的邊緣。加以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正在破壞廣大的中國市場，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減少銷路，因而使新的經濟危機更其加深，同時也就加深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矛盾。首先是日美、日英之間的矛盾；（2）中日戰爭的爆發不是在普通的時候，而是在新的世界大戰已經開始的時候，但是新的戰爭的特點，正像斯大林所說：『還沒有成爲全世界的戰爭』，『帶着片面的奇特性』，戰爭是由侵略國開始的，損害非侵略國的利益，首先是英美法的利益，而英美法却逐

步退讓，一再向侵略國妥協，讓日本佔領外國資本在華的中心——上海，讓日本佔領英國在華南的勢力範圍——廣州，讓日本佔領遠東航線的要路——海南島，讓日本包圍和轟擊香港，讓日本佔領斯巴特萊群島，讓日本封鎖天津和漢口的英法租界。這樣就無異於放任侵略，縱容戰爭，使戰爭擴大起來變爲全世界的戰爭，結果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使它們自身遭到嚴重的失敗；（3）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在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不僅以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爲對象，而且也以歐洲的一些弱小的獨立國家爲對象，因此在這些國家不能不重新發生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戰爭，爲獨立自由的正義戰爭；而且隨着法西斯主義之在個別國家中和在國際舞台上轉爲進攻，於是反法西斯運動也日益增長，日益擴大，日益具有更大的國際性質，這樣也就幫助着中國的反對日本法西斯的解放戰爭；（4）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在蘇聯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並且正在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在勝利了的社會主義與寄生的腐化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更其加深了。蘇聯是向上前進着，向無產階級社會的高峯，向共產主義前進着；而資本主義世界則往下降落着，向經濟危機，向反動，向戰爭方面降落着。因此，蘇聯力量的強大成爲世界和平的柱石，成爲世界無產階級解放的燈塔，成爲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推進機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更加高度增長着。兩年來的抗戰事實已充分證明，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最可靠最能共患難的朋友，它對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同情和援助，隨着中國抗戰開展而日益增長。

中日戰爭的這些特點，說明中國抗戰是處在一種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的環境之中。這種環境說明中國抗戰有着戰勝日寇的內部的和外部的有利條件，同時也說明在抗戰中難免要遇到許多嚴重的困難；特別是由於中國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不只全副武裝，而且是奸險狡猾，它善於分散中國民

族的力量，它善於利用中國內部的一切弱點和鬭爭來實現它掠奪中國的目的，因此困難的因素也就特別複雜。要戰勝這許多困難，要戰勝這樣奸險狡猾的敵人，當然需要我們的長期奮鬥，尤需要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這正如列寧所說：

「反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不僅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要保證這種戰爭之勝利，當然要有：或者是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的居民之共同努力（例如我們引作例證的印度國內和中國國內數萬萬居民之共同努力），或者是國際形勢中種種條件之特別順利的配合（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其本身勢力之削弱，因其彼此進行戰爭，因其彼此對抗等等，而無法實行干涉）；或者是某一個強大國家裡無產階級同時舉行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最後舉出的一個情況，從無產階級之勝利的觀點上看來，乃是最合希望和最有利的情況）。」

中國抗戰兩年餘的結果，雖然還沒有達到列寧所希望的程度，即國際援助還不够强大有力，日本國內還沒有直接革命的爆發；特別是中國自己力量生長的不够，還沒有普遍地把中國偉大的潛力發揮出來；政治進步的不够，有時候還表示停滯或部分的逆流的現象；團結的不够堅固和充實，甚至煮豆與燃箕之痛，鬩牆當禦侮之時。影響所及，不僅動搖學國同胞對抗戰勝利的信念，而且降低國際輿論對中華民族的同情。而兵役舞弊，法幣跌價等困難增加，尤使一部分人士發生抗戰有心勝敵乏術之感。凡此種種，均足證明中國全民族共同努力還不够，因此還沒有能够渡過抗戰中艱苦困難的時期。但是我們在抗戰烈火中，舊的阻礙進步和分裂國家的屏障正在破壞着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爲一個統一力量的過程的民族自強的新生命是在生長着；而敵人方面，則困難日益增加，特別是兵力的不足，

財政的困難，國際地位的孤立，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所以我們現在雖還沒有渡過艱苦困難的時期，但抗戰前途確已日益呈現出勝利的遠景；如果我們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愈堅強，則抗戰勝利的目的也就愈加和我們相接近。同時我們現在抗戰中，不僅有了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與新的抗日政策，而且還有將近一百年來民族解放運動的傳統經驗；在近百年中，一部中國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充滿民族解放鬪爭的歷史，發揚我們民族在解放運動上的光榮歷史傳統，繼承過去許多先烈的英勇鬪爭精神，警戒並避免一些歷史的錯誤和缺點，實為完成抗戰建國大業基本條件之一。

近百年來中國的發展，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說來，是侵略運動與反侵略運動的矛盾的發展。在這發展過程中，反侵略運動將克服侵略運動，使中國由被侵略被奴役狀態飛躍到獨立自由狀態。我中國民族，現正處於這飛躍的大時代。這飛躍的大時代，以這次的革命戰爭為總的關鍵。而在這次戰爭的目前的第二階段，又是一個轉敗為勝的大飛躍。這個大飛躍的時期是相當長久的，我們的任務異常艱苦，必須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配合客觀的國內外的有利情勢，以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中途妥協的危險；力求全國團結加強，反對各種分裂陰謀；力求全國向前進步，反對一切反動倒退現象；多方增長力量，切實準備反攻，以期把日寇打到鴨綠江邊，爭得最後勝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來實現這個大飛躍。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 第二章 鴉片戰爭

###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鴉片戰爭的起因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資本主義一天天的發達，它們想打開中國門戶的要求就一天天迫切。資本主義的生產特點，是在使用機器，機器具有大生產的能力，於是國內市場就決不足以滿足資本家的慾望，而必須努力爭取外國市場來補償。而且資本主義一發達，即刻就形成和資本家對立的勞動者。這勞動者在資本家無情的剝削之下一天天貧窮起來，而損失原有的購買力，使國內市場縮小，使資本家更有爭取國外市場的必要。不但如此，資本主義生產一定要走入資本集中的過程。這一方面擴大了社會上的生產力，一方面却減少了社會上的購買力（或稱消費力），而使爭取國外市場的必要更其迫切。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乃成爲歐美列強必得而甘心的一塊市場。在中國方面，當時主要的還是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即以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爲其經濟活動的主體。這樣的社會，對於上述那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自然不能了解，即不能了解歐美各國的要求來中國開闢市場是一種不可抗禦的力量，當然也不能了解應當如何來迎接這一個新勢力，才能不使自己的社會受到侵害。同時，農業經濟的社會，本來就帶着很强的排外性，因爲外來的力量一定要破壞它的自給自足的安閑生活。加以那互相競敵，爭取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間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採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大的助力，乃是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或將左袒那當中國人民被征服於韃虜的上半年紀間在大多

數華人中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採行排外政策。基於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註一）

有人說，中國與外國通商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例如在漢朝時中國即曾與羅馬通商，中國的出口商品是絲織品，而羅馬的出口商品是珠玉和香料。南北朝時，中國繼續與羅馬通商，出口品是絲、鐵、毛皮，進口品是玻璃製品、棉織品、刺繡品、藥品、染料、金器、寶石。七世紀中葉阿拉伯人經由蘇門答臘、爪哇航行至廣州、泉州、杭州，帶來香料、樟腦、紫檀、藥品與唐朝通商。到元代和明代中葉，中阿貿易關係依然繼續着，當時泉州是世界的大商港。明代中葉以後，歐洲商人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吉利人，也陸續到中國來通商。爲什麼在那時中國可以採用自由通商政策，到後來却要閉關自守？這是因爲過去中外貿易的兩方都是封建國家，交換的東西都是奢侈品居多，商品交換不會影響到社會經濟基礎；但到了十九世紀就一切都不同了，貿易的兩方一是工業國一是農業國，交換的商品一是工業品一是農業品，交換的關係已衝破了中國自然經濟的屏障了，中國政府爲要保存自己封建經濟的基礎，便積極採取鎖國政策。所以乾隆皇帝對於英國再三派遣使節來要求自由通商的回答，便說：『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了。不過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十分發達的時候，海外市場的找求，還不十分迫切。雖屢次要求和中國通商，屢次遭受了中國的拒絕，它們還可以在旁的地方得到滿足。而到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深閉固拒就不爲它們所容許，最後的辦法，勢必至於訴諸武力。是於滿清政府的鎖國政策終於抵抗不住外洋

（註一）馬克思：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資本主義的澎湃怒潮，成爲歐美列強掠奪中國的起點的鴉片戰爭，終於爆發起來了。

當時歐美資本主義雖然以輸出商品爲主，尙未達到今日以資本輸出爲主的財政資本的階段；然而商品生產也已膨脹到要求掠奪和競爭殖民地與市場的廣大範圍。而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在這時期便自然成了東方諸國最主要的掠奪者。原來在產業革命以前，英國在海外的商業資本就已大爲活躍，自十六世紀以來，英國的海外貿易便逐漸沿着征服農業諸民族的路線發展着。當時英國商業的競爭者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等，爲要組織對落後民族的掠奪，英國在海外設立了許多獨佔的貿易公司。這些公司是以販賣東方諸國的商品與黑奴及銷售英國工業製造品爲主要活動目的，其中最佔勢力而成爲侵略東方諸國之大本營的，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該公司先後戰勝了荷蘭與法國的東印度公司，併吞了印度，並且取得了對華的貿易獨佔權。最初英國商人是以販運中國茶葉爲主要的獨佔貿易。例如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十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在廈門設立代理公司，經營茶市，以後茶市中心移到廣州，而印度鴉片的輸入中國亦自此發達起來。蓋英人以屢次遣使求中國和它通商不能如願，就改變方針，不惜使用違背人道的鴉片來向中國人誘惑，以圖打破中國堅固的海禁。事實上，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已取得了印度的鴉片專賣權，以中國年銷鴉片甚多，就在印度大種鴉片，就近輸入中國，每年吸去現銀不少。由於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英國勢力便大大地伸入中國。

鴉片本來在唐代就已由阿拉伯輸入中國，鴉片兩字卽是阿拉伯語「*Aspid*」的傳訛，所以又稱「阿芙蓉」。然初僅充藥劑之用，輸入數量亦不多，每年不過二百箱左右。但其後由印度輸入的鴉片遂與年俱增，吸者亦漸多；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輸入達四千餘箱，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竟

達一萬八千七百六十餘箱，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增至二萬七千餘箱。（註二）這種鴉片輸入驚人的激增乃是由於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對華貿易的獨佔權，獎勵鴉片的對華輸入。一八三四年英政府雖然取消了該公司的獨佔權，而英商反得由此自由輸運鴉片於中國。據道光間鴻臚寺卿黃爵滋的奏疏，在鴉片戰爭的前夜，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鴉片輸入閩、浙、魯、天津共數千萬兩，廣東海口共三千餘萬兩。又據外人統計，（註三）一八二一年至二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九、七〇八箱，消耗價值達八、七二五、六〇〇元；一八二八年至三五年的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達二一、八八五箱，消耗價值爲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一八三五年至三九年的四年間，每年平均輸入三五、四四五箱。此外還有一個統計，（註四）就是在戰爭前夕（一八三六至三七年間），輸入印烟爲二一、五〇五箱，價值一四、四五〇、一九三元。如果我們就鴉片在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全額中所佔的比例來說，則很明顯的看見鴉片輸入的激增是至足驚人的！例如在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製造品的輸入中國價值爲八、〇三四、六〇六元，鴉片爲六、四〇六、〇〇〇元；到了一八三四年，製造品價值，幾減少一半，即四、八二〇、四五三元，而鴉片價值幾增至一倍，即達二一、六一八、七一六元了。

（註二）見稻葉岩吉著近代支那史三百五十至五十一頁。又夷氛紀聞（惜陰堂主人鈔，載人文雜誌一卷一號）云：「印度之孟阿臘，孟買，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吸者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兩。」

（註三）H. B. M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Vol. 2, P. 21

（註四）*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303.

(註五)鴉片輸入的激增，主要的結果，就是使國內的紋銀外溢，銀價暴騰。道光初年，中國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一八三八年紋銀每兩易制錢竟達一千六百有零(原易錢七八百)。平民的生活自然受到惡劣的影響，並且由此加強了商人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小手工業者的榨取，這就是外國資本主義最初給予中國國民經濟的禮物。

鴉片在由藥物變成民間的嗜好品以後，便流毒全國。當時清政府一方面受着國內輿論的壓迫，一方面感覺到鴉片的輸入激增，致使國內紋銀外溢，造成嚴重的財政危機。至道光十六年，每年竟漏銀至三千萬兩，於是內地銀荒日甚，朝臣交論其害，禁令屢頒。然而禁者自禁，而販者自販，吸者自吸，加以「奸商作弊，官吏受賄，販吸轉熾」，這是一切封建官僚機關的通病，毋怪其然的。馬克思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一文裡會很深切的說到這一點：「一八三三年以後，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它所得到的回答，是對於它的法度與以更強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還關聯到鴉片秘密運輸的賄賂公行，將中國南方各省國家官吏的風紀完全爲其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國的父親一樣，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對於各該縣邑的維持親長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唯一的父權的威力和道德紀綱，都逐漸爲以默許鴉片秘輸自飽私囊的官吏的腐敗所蝕毀了。此種情形，會多見於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鴉片遂適如其分以獲得了制馭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乃已喪失其所自有的主權了。這好像歷史在它把中國全民族從其遺傳的愚昧中拯救出來以前，先使它們沉醉一回似的」。

(註五)見湯象龍著：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載社會科學雜誌一卷三號)。

當時最早奏疏鴉片的禍害的是黃中模（道光二年），然他只是要嚴禁漏銀，認為鴉片只須加以限制。其後許乃濟亦奏疏論及鴉片（道光十六年），但他與其說是禁烟論者，毋寧說是提倡鴉片者，因為他主張國內種煙，以塞漏卮。這個奏議受到了禁烟派的嚴厲的批評，如袁玉麟、朱嶸、許球、朱成烈等都是反對許氏最力的。同時黃爵滋亦上疏嚴禁鴉片，並主張用死刑來懲治鴉片的吸食者。疏上，有旨中外大臣議，而兩湖總督林則徐覆奏之言，最為痛切：「如烟不禁，則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練之兵」；並條陳禁烟辦法，但他不贊成黃氏的死刑懲治說，而主張從多方面來禁絕鴉片。宣宗大為感動，即召則徐來京，面議方略。同年十一月，則徐拜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並節制廣東水師，實行禁烟政策。則徐至粵，先捕殺與英商勾結的華商數名示威，令英商限三日內將所有鴉片全部交出。事先林則徐有諭帖通知英商說：「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回稟，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英人不聽，乃派兵包圍英領館，並用杯葛（Boycott）辦法絕英領蔬食及婢僕（那時英國領事是義律 *George Elliot*）。英人不得已，繳出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金六百餘萬元。則徐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旋奉旨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銷燬於虎門海岸。這是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的事，所以後來就把這一天定為禁烟紀念日。英人自義律以下，都快快離開廣州，赴澳門。廣州城外原有外國商船二百八十餘艘，至是留者僅二十餘艘。林則徐補授兩廣總督，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清政府亦決心禁烟，定條律嚴懲販烟、種烟、吸煙者。林則徐又佈告各國：「以後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有「夾帶鴉片，船貨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結」。各國畏中政府強硬，皆願具結。惟義律抗不遵從。則徐又用杯葛辦法對付，迫令英人離澳門，義律不得已，率同英船

，避居尖沙嘴（香港對岸）的貨船中，轉託葡人說項，聲明須除去「人卽正法」四字，始能具結，則徐不許。義律知道此時要強迫中國通商，已非用武力不可。乃詭稱：「中國官員侮辱英領及英國臣民，一般英商受暴力壓迫而蒙損害，非出兵不足以使中國政府賠償損害」（後來英國有議員質問對華開戰的理由，英陸軍大臣約翰·拉沙爾卽據此以答），電請英政府出兵。英國會經過一番爭論後，卒以多數（只多九票）通過對華宣戰案，並下令封鎖粵海口。可見鴉片戰爭正像馬克思所說：「乃英國海盜政策之繼續」，並不像許多帝國主義的歷史學家及我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說那樣，是什麼林則徐禁烟政策所激起（普通的歷史書都抱這種觀點，商務所出大學叢書中國近代史的著者陳恭祿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實實在在是英國強盜見中國政府禁烟堅決，且甚有成效，竭力想破壞中國政府的禁烟政策，用一切方法向中國挑戰。實際上，它們在宣戰之前，卽會藉故製造事件，作爲向中國開戰之藉口。例如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國水手酗酒滋事於九龍之尖沙村，殺死中國人林維喜；同年九月四日英領義律帶船至九龍口岸，開槍射擊中國人，中國兵死六人，受傷者六人，強購食物而去。同年十一月二日義律與英兵艦長斯密斯駛往虎門，欲攻虎門在途中川鼻島，與中國水師提督關天培兵船相遇，發生武裝衝突，互有死傷。從這些事實看來，英國強盜欲向中國開戰，強迫與中國做鴉片貿易，以毒害中國人民，並謀擴張其在遠東的非法權益，實甚明顯。

##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經過與平英國的起義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二月英政府下令動員印度及好望角屯兵一萬五千餘人，大炮五十四尊，軍艦十六艘，武裝汽艦四隻及運輸船二十七隻。以義律統率陸軍，以伯麥（Barnard）統帥海軍向廣

東進攻。夷氛紀聞記載此事云：「九日晦，義律率其呢囉等貨船三，突攻我師船，參將頓恩砲擊之。」那時林則徐防守甚嚴，「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又繕修戰備，日夜使人刺探西事。自虎門至橫當山互以鐵鍊木筏，增購西洋砲二百餘門，列置兩岸。更備戰船火舟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英軍「見無隙可乘，遂駛船三十一艘赴浙」。（註六）赴浙之船經福建，「駛五船突攻廈門：……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砲台累沙爲壘，率兵駐守，砲兵擊英夷火藥船，沉兵船一，風起，夷（英）船揚帆去」。（註七）其餘的二十六艘駛至定海，定海無備，總兵張朝貴倉卒應戰，英軍遂陷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戰死，張朝貴逃走。英軍更圍攻寧波，時兩江總督伊里布巡視浙江，乃募集鄉勇防守，英軍女軍官被俘，傳聞即是英皇的第三公主。英軍復進窺錢塘，乍浦亦將陷，寧波受封鎖。後知此地非要害，乃移兵向渤海，進白河，直逼天津，清廷大震。英人乃向直督琦善提出和議六條件：（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涉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夾帶鴉片株連居留英商，（六）廢除華人經手洋商經費。從這裡，完全可以看出英人出兵，其目的是要打開中國的門戶，好發展它們的資本主義，並非簡單地是爲英商出氣。當時的朝臣疆吏，懾於英軍的猛銳，都抱怨林則徐輕舉惹禍，只求那如狼似虎的英軍早早離開畿輔，那裡還敢抗戰。乃一面罷斥林則徐以謝英人，令琦善爲兩廣總督，一面命伊里布在浙江先與英軍議和。英人見有議和希望，即撤兵回澳門。

琦善至廣東，盡反則徐所爲，撤水師，散壯丁，廢一切守備，並允償英人鴉片七百萬兩。英人見

（註六）（註七）均見夷氛記聞。

琦善怯懦，要求愈苛，於原提六條之外，復要求割讓香港。琦善稍有難色，英人即率艦攻虎門，陷其砲台，琦善大懼，允於烟價外開放廣州，割讓香港，而以歸還兩砲台及定海爲交換條件，十二月二十八日遂議定草約。不料此時清廷見英艦退出白河，又覺議和終究是失策了，及聞虎門被攻，更是憤怒，忽又主戰，琦善據職查辦，詔以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揚芳等爲參贊大臣，馳赴廣東，欲一舉覆英軍。這樣和戰無定，而且和既和得卑怯可笑，戰又戰得暴躁無策，當然是非吃虧不可的了。英軍聞清廷宣戰，續攻虎門。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遂陷橫當，虎門諸砲台，提督關天培戰死，清軍喪軍器無算。及參贊揚芳率軍至，而印度陸軍司令臥烏古又率援軍長驅直入，盡佔珠江要塞。四月朔奕山命水軍襲英船，既而又圍領館，皆不克，且誤傷美人。英軍乘勢進攻，清水師幾全軍覆沒。揚芳束手，厥後屢戰屢敗，英軍進擊廣州，總兵鄧永福戰死，城西北之天字砲台，及北山頂之四方砲台，盡爲英奪。奕山倉皇失措，不知所爲，將棄城而遁，又恐爲英軍所執，乃決計乞和，使廣州知府余寶純出城議款，遂訂休戰條約，主要的爲償英軍費六百萬兩，將軍隊及外省援軍退屯城外六十里地，以香港之割讓爲未決問題，英軍退出虎門。

約成，奕山大索民財以爲賠款，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撥付四百萬元，由廣州商行認擔二百萬元。這樣，官吏既乘機苛斂敲索，英兵又橫行淫掠，便激起了廣州民衆的憤怒。一八四一年六月十日因英兵在三元里村劫掠姦淫，民衆大憤，樹平英國旗幟，鳴鑼集衆，「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英兵）共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集愈衆，增至數萬。」（註八）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中

（註八）見王廷蘭致曾望顏論英夷犯粵書（轉引自太平天國革命）。

不得出，移書告急於廣州知府余寶純，寶純往解圍，挾義律出。賠款既交，英軍退去，大船有在沙灘擱淺的，民衆遂聚議預備縱火燬船，奪回賠款。廣州知府又出示曉諭民衆，不得妄動，解英人之圍。然佛山義勇民軍仍紛起攻擊佔據龜岡砲台的英兵，殺死英兵數十，南海、番禺民衆亦自動集合，晝夜操練，以防英兵再侵。這是中國民衆最初的自發的反侵略與民族自衛運動，同時亦可由此看出統治階級是如何的懼怕民衆運動而甘願作外寇的奴隸。當時余寶純一面向臥烏古行九叩首禮，一面竭力壓迫民衆運動。滿清政府並追論則徐開釁之罪，遣戍伊犁。

但是英軍雖退出虎門，却藉口上年天津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未得清政府正式承諾，不肯罷兵，議復移兵北上，以武力要挾。一面又從印度續調戰艦來粵，與義律會兵，六月同發，會颶風起，英艦受損。兩廣總督竟信有神佑，並奏入朝。這時英政府還不以義律所獲得條件爲滿足。撤義律職，而以璞鼎查（Pottinger）代之。於是英國對華的侵略戰爭又繼續發生。璞鼎查先至香港整理商務，佈置防務，然後與臥烏古、伯麥會師。七月九日實行第二次北犯，先後佔領廈門、定海、寧波、鎮海。是役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皆戰死。清廷忍無可忍，乃詔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贊爲參贊，進軍浙江。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駐師福建。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防禦。一八四二年一月奕經分兵三路圖復寧波、上海：（1）奕經以兵三千，駐紹興之東關，文蔚以二千屯慈谿城北之長溪嶺，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以兵二千屯城西之天寶山，以圖鎮海；（2）提督段永福以兵四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以二千駐奉化，圖寧波；（3）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雇漁舟渡岱山，以故總兵鄭國鴻子鼎臣統水勇主攻，圖定海。約日同時進兵，分遣鄉勇伏城中爲內應。惜定海形勢隔絕，佈置不易，鄭鼎臣先期渡海襲擊，無功而還。段永福亦被炮擊，死傷過半。



攻鎮海之劉天保軍，以內應不力，不戰而退。朱桂戰死，天寶山軍潰。文蔚即夜遁蕭山，突經亦退走杭州，浙東恢復之師遂告失敗。

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軍備不敵，沒有發動全民抗戰；同時亦是由於當時政府裡面妥協投降勢力的牽制。浙東未敗之先，浙江巡撫劉韻珂已力主和議，清政府見浙東恢復之師失敗，亦遂發生動搖，乃命伊里布赴浙主和議，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以待。英軍見浙東有備，不便深入，便改變策略，轉攻長江，以斷南北交通。四月八日英軍大舉撲攻乍浦，次日即陷城。五月初英艦達吳淞口，守兵不戰而退，更攻上海，江南提督陳化龍血戰死之，寶山、上海相繼陷落。時英軍新加援兵，聲勢更大，遂溯江而上，先後拔福山、江陰、圖山諸要隘，進取鎮江，守將海齡自殺，提督劉元孝退走，於是英軍勢如破竹，直逼南京。自瓜州至儀徵之鹽船佔船，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鹽商饋銀五十萬兩免禍。清廷知無力抵禦，乃派耆英、伊里布、牛鑑往南京與英使璞鼎查議和。於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締結中英修好條約十三條，這就是有名的奴役中國的南京條約，或稱江寧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由清政府納賠款二千一百萬與英政府，先交六百萬，餘限四年內分期繳清，其軍隊俟第一年清款時即行撤退，惟舟山鼓浪嶼二處，須償金全清五口開放之後，始行撤退。

(二) 香港全島，永遠割讓於英國。

(三) 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爲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並許英國人民帶眷居住及自由來往。

(四) 五口應納進出口貨稅款，均宜秉公議定稅則，由部頒示，以便英商按照交納。英商貨物，

自某港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偏運內地，不得加重課稅。

(五) 以後兩國往來公文，用平等式。

(六) 釋放各地英國俘虜與罪犯，凡戰役中爲英國服務之華人，一律免罪。

八月清政府交付第一次賠款六百萬兩於英後，英軍遂退出南京、鎮江、上海，駐屯舟山，璞鼎查以功任香港總督。清廷命伊里布至廣東，與英使交換批准條約，並議互市章程。至道光二十六年，賠款全數交清，商埠皆已開放，惟廣州開放之事，延期二年。港督以『舟山列島永不割讓與他國』爲條件，耆英許之（時伊里布已卒），於是先訂舟山永不割讓與他國之約，然後撤舟山，鼓浪嶼之屯兵，這就算是鴉片戰爭的結局。

由於滿清政府及其軍隊的腐敗不堪，鴉片戰爭是慘敗了，然而這戰爭還是表現了中國民族的抵抗力。一般的滿清軍隊固然腐敗，可是英軍除了在廣州遇到軍隊和民衆之頑強的抵抗外，當英軍進攻上海與鎮江的時候，中國守軍亦都表示了英勇的抵抗，江南提督陳化龍與鎮江守將海齡均曾血戰以身殉國。事後很久，恩格斯對鎮江抗戰的故事會這樣描寫過：『那裡的中國軍隊，總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們都勇敢拼死地應戰，直至全軍覆沒爲止。在應戰之前，他們好像早已料到戰鬥的結局，而將自己的妻子兒女殺死或淹死……清軍副都統，看見戰鬥已遭失敗，遂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在這次戰鬥中，英軍損失了一百八十人。』（註九）在戰爭中，廣東民衆平英團數萬人的組織及各地民衆自衛運動的再接再厲，尤爲當時中華民族不可滅亡的明證。當時中國沒有變成第二印度，並

（註九）見恩格斯所作英人對華新侵略，載馬恩論中國。

不是偶然的。

### 第三節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與民族自衛運動的再起

英國既然打開了中國閉關的局面，於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就隨之俱來。南京條約公佈後，法美兩國均實行趁火打劫，謬言在這次戰爭中，法美屢次居間調停，應享利益均沾的權利。因此跟着南京條約而來，又有中美條約與中法條約，其主要精神都是要挾中國在對它們有利的條件之下和它們通商。同時這兩條約又確定了法美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所以鴉片戰爭實是歐美資本主義掠奪中國的開端，這一掠奪由英國開始，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接踵效尤。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顯然受着很大的打擊。英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藉着特權的取得，使它們的侵略成爲合法化，它們可以將侵略的觸角自由地伸展到中國許多地方了。因爲：

第一，南京條約開關了五個大商埠，而且取消了在廣州、香港的中國商行對外貿易的專利制度，這是使外國資產階級可以任意擴大其在華的貿易的。因爲在此以前，外國商品在廣州市場的出賣，其價格是爲中國商人組合規定的。南京條約既然取消了此等組合，這就使得他們可以在五個大市場自由出賣商品——按照他們自己規定的價格出賣商品。這樣，當然將中國抵抗外國貿易的城堡完全轟碎了。

第二，南京條約使英國奪取了對中國侵略的門戶——香港。這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對於英國的侵略中國都有莫大的意義。因爲英國可以經營這個島爲對華貿易的根據地，同時使英國的統治擴大到了中國的南部，而與英屬印度相呼應着。

第三，南京條約打破了中國關稅對於外貨的限制，英國商品進出品課稅，在「秉公議定稅則」的

名義之下，可以無限制地輸入中國及從中國取得廉價的原料。而且英國的貨物一經在香港按例納稅後，即可在中國內地橫行無阻，不受關卡的阻礙。這種協定稅則在以後的關稅協定中更加具體化起來了，即：貿易品輸出均從價值百抽五，通商口岸與內地市場間的貿易品，納內地子口稅後，即不能再課他稅，於是外國資產階級可以在中國實行不等價的交換，隨意從中國各地吸取農民勞動者的血汗了。

第四，南京條約及以後所訂的中法、中美諸條約，給予外國商人在中國設立居留地的自由——在以前，外國商人必須經過中國商行的中介，始能與中國官廳接洽，尋覓居住地帶——並且承認了外國商人的領事裁判權，外國領事可以直接要求中國官廳保護他們的利益。此外外國商船在中國內河有航行權，軍艦亦可駛入中國內河，這些都是足以使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深入的。

雖然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為核心）所限制，南京條約後英國對華貿易，沒有像它們所奢望的那樣迅速擴大。而且由於鴉片貿易對華輸入之增多，中國白銀外溢，致使中國缺乏現金購買其他普通的工業商品，因而，合法的普通商業貿易一時不能迅速增長，加以當開闢新市場的時候，它們祇求大量輸出商品，並不精確估計到消費者底實際需要和購買能力，以致新市場上商品過於充斥，而「貿易的驟增，接着就是貿易的驟減。」（馬克思）以此，「一八四二年的條約，不會擴大美國和英國的對華輸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業危機。」然而無論如何，鴉片戰爭後英國對華貿易比之過去總是增長的。這裡，大宗的進口當然還是鴉片，在南京條約簽訂後數年，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約值三千萬元以上，英國政府在鴉片壟斷貿易上所得到的利益，竟佔國家總收入六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棉織品之類輸入的增長，當然遠比鴉片為少，然而比之鴉片戰爭

以前，也無疑是在增長着。在一八一三年英國的棉織品還沒有輸入中國，到了一八二八年才有二十萬元的輸入，到一八三八年即鴉片戰爭的前兩年祇增加到七十九萬元，但在鴉片戰爭後一八四四年便激增到五百五十九萬元。可見鴉片戰爭確實擴大了列強對華的侵略網，它們常以劫掠奴役等方法取得的財寶，使之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於是中國市場的開闢便成了促進它們貿易與航業成長的溫室，成了它們資本累積的强有力的槓桿。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的要素時，曾提及鴉片戰爭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剝滅，被奴隸化，被埋於鑛坑內部；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為商業的黑人獵場這等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累積的主要原素。緊隨此等過程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台而展開的商業戰。那種商業戰是以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叛亂開始，在英國反雅各賓黨戰爭中取得廣大的範圍，並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向前進展着。」（註十）

但是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却不祇這些，還引起了許多更重大的變化，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使中國白銀外溢，這樣，中國原來的封建經濟開始崩潰，而民族資本的原始蓄積却又無從開闢，這就阻礙了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此在我國便開始了兩條道路的鬭爭：或是由獨立的封建滿清帝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以至變為完全殖民地的國家；或是由封建的國家過渡到近代資產階級的獨立的民主國家。這一鬭爭，雖然在當時統治階級的主觀意識上，還未被清楚認識出來，然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在客觀上已經開始了。

（註十）見資本論第一卷，讀書出版社出版，郭王中譯本，六百四十一頁。

第二，在鴉片戰爭前，我國主要是一個封建社會，內部階級矛盾主要是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鴉片戰爭以後，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仍佔主要地位，然而，已開始產生大批的買辦階級，爲後來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同時，因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也開始產生在外國企業內做工的工人，爲後來民族產業無產階級的前身。在國內各民族的關係上，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在戰前滿族爲統治的壓迫民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爲被統治的被壓迫民族，滿族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爲主要的矛盾，在戰後這仍爲主要的矛盾；但是，除了這個內部的民族矛盾與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外，開始發生了國內各民族和國內各階級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民族的外部矛盾。這後一種矛盾在當時還不佔主要的地位，然而，自鴉片戰爭以後，這種矛盾便逐漸增長起來。

第三，在政治上也開始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因滿清政府對外戰爭的失敗，使滿清皇統的權威掃地無靈，統治發生動搖。另一方面，因爲英國在南京條約中得到了許多利益，開始與封建的滿清勢力相勾結，直接幫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這裡顯明的表示：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不是起了和起着進步的革命的作用，而是援助了和援助着舊的封建勢力，並與之勾結，共同反對革命和進步的力量。這當然不是說滿清政府與英國沒有矛盾，這種矛盾，會有的，滿清政府並會企圖用戰爭去抵抗英國的侵入；然而，終究是不澈底的，不堅決的，沒有抗戰到底，中途向英國妥協屈服了。這也就是說，在鴉片戰爭中已看出：在謀中國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問題上，已開始了兩條路線的鬭爭：就是一條是對外妥協的，不堅決的，即滿清政府走的道路；另一條是民衆的堅決抗戰道路。不過在鴉片戰爭時，人民反英的直接行動，主要只表現於廣東的平英團，以及在戰後不久所發生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這兩條路線的鬭爭在當時還不甚明顯，然而，確實已經開始了。

第四，在我國文化思想上也開始起了變化。一方面開始打破過去的閉關自守的舊的封建思想，開始打破過去自高自大的狹隘的孤獨思想，新的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主要是用傳教的方式開始滲入到中國來了，並因英國之侵入，打破了兩百多年的和平生活，開始了第一次的民族覺醒，這是積極的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却由自高自大的思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怕洋人」的民族失敗主義的思想，也開始發生了。在戰爭中竟有民族的敗類分子，變為公開的漢奸。而在南京條約中竟公開規定了對於通英的漢奸分子，中國政府不得追究，是為喪失民族道德之始。

總之，鴉片戰爭是我國現代史的開端，對於我國內外關係的變化和影響，是一個很大的關鍵，為着研究目前我國現狀和嚴重國難之由來，不能不自鴉片戰爭始。同時，我們從上面分析中也已經可以明白看到，鴉片戰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國際關係的變動，也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它有消極的方面，也有積極的方面。在當時，這許多影響裡面最直接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英國取得了鴉片戰爭的勝利，便加緊掠奪中國。它利用大工業與商業來壓倒中國土著的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及家庭工業，而中國農村由於外國商品的侵入，與由此而加强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活躍，便更加劇其破壞與衰落的地步。同時由於英國強盜對中國政府的苛索（鉅大的賠款等），又更加緊了統治階級對於平民的剝削。馬克思說：「中國在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產生的貴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於本地製造品的破壞的影響，公共行政的腐敗情形，產生了兩件事情：舊稅益加繁重，新稅又見增設」，這樣當然使中國國民經濟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在客觀上不能不喚起民族的覺醒。廣東平英團的反英運動雖在當局高壓之下，依然繼續活動。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廣東闢為商港，於是到中國來發洋財的英人也就一天天增多。一

方肆意劫掠，一方爲生存自衛，於是粵民與英人衝突之事便日有發生。至一八四二年多反英輿情益趨激昂，民衆不約而集者萬餘人，並實行圍攻英國領事館，要求英人退出廣州城，當時因官府彈壓，雖未達到目的，但此後民衆力量益趨強大，官府也就轉而利用並結合民衆力量，竟暫時達到了『英人不得入城』的目的，薛福成在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中對於這一事件曾有所記載，他說：『寧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城市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詬病之，合辭赴大府（即今日之請願），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矣。是時著英總督兩廣，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拒之慮啓釁；密告英人粵人驚悍，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踐約。既而鹿邑徐廣縉爲總督，漢陽葉名琛爲巡撫，英人以兵輪闖入粵河，申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英酋方謀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不復言入城事』。（註十一）

廣州民衆更請阻英人通商，於是巡撫徐廣縉與英人更定粵東商約，而以『英人不得入城』之語載諸約中，英領文翰亦終於簽約。事聞，清廷封廣縉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清政府以爲是廣縉交涉之功，殊不知這正是當時有廣東民氣足爲政府外交後盾的緣故。

廣東民衆反英運動的激昂決不是偶然的。廣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最早的地方，英人在平時假手於洋商、官吏，對廣東民衆施行無饜的榨取，在戰時又肆行殘酷的淫掠與屠殺。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英人挾戰勝的餘威，更加緊其對中國的侵略，這時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廣州次第開放爲商埠

（註十一）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一文，見庸齋文集。



英國派遣領事於各港，管理商務，對於中國人民常施欺壓。廣東民衆得風氣之先，身受外國強盜各種欺凌壓榨，並憤恨清政府的怯懦昏庸，媚洋欺民，所以就自發地揭竿而起。這次如火如荼的民族自衛鬪爭乃是鴉片戰爭後反英運動（平英團等）的繼續與擴大。雖然這種民族自衛運動在當時還只是初期的自發的，還沒有得到正確的領導，因此也還沒有能够提出真正民族解放的綱領；但是它的力量也竟衝破了官府的壓迫和約束，於是官府亦不得不利用羣衆的反英情緒來暫時和緩英人的進攻，而英國侵華的勢力因爲受到中國民衆的反抗，亦會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馬克思說：「在一八四〇年英國砲火之下，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靈，強迫了這天朝上國與俗野的世界相接觸。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國保存的原狀，那個孤立，必須依賴英國的媒介來一個強制的終結。分解必定隨之而起，這與謹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論何時，一與空氣相接，立即分解，一樣是確然的。現在呢，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的革命怎樣的遲早將其反響及於英國，經由英國而及於歐洲，這問題是難解決的。」（註十二）

（註十二）見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 第四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英法聯軍之役爲鴉片戰爭之續，故西洋史家常稱之爲第二次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締結後，英人屢欲入廣州城，爲廣東民衆所拒，英領事復憤粵督葉名琛之傲慢自負，思有以報復之。是時適值洪秀全起義，東南半壁盡皆響應。清廷忙於調兵籌餉，政令廢弛，鴉片貿易復盛，禁令早等虛設。當時廣東

農民與貧民已不斷地發生叛亂與暴動，如三點會就是一種民間的秘密結社，曾一度圍攻廣州，按察使沈棟輝督官紳練兵力戰，始得免。葉名琛下令各州、縣嚴治『匪類』，『有通匪者許吏民格殺勿論』，於是到處發生仇殺的事件，前後死者十餘萬人，悍民皆從匪不敢歸，一部分竄擾廣西、江西，一部分遁居沿海群島，英人以火輪圍而降之，想利用這批無出路的遊民來與中國官府爲仇。但因鑒於粵民的强悍，又以師出無名，不敢輕舉，惟日夜練兵，準備再戰。那時中國一般奸商常倚仗英人保護來做鴉片生意，常借英國旗與護照，出入各港，以圖減稅，而免留難，與英人狼狽爲奸。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九月有中國船亞羅（Arrow）號自廈門來廣東，桅張英旗，上載英人二，華人十三，適值水師千總梁國定巡河，見亞羅船入，知爲奸商藉英旗掩護者，遂登艇大索，拔其旗投甲板上，執華人十三，拘繫入省。巴夏禮（H. S. Parker，當時英國駐廣東領事）聞訊，認爲機會已到，卽向清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送還捕虜，並對毀旗事道歉。名琛遣一微員送被捕十三人於領事船，巴夏禮認爲不滿意，是時英人意在入城通商，巴夏禮因與港督包林（Bowring）密謀，欲乘機推翻前約，請求入城，乃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履行具狀謝罪條件，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名琛置之不理，也不爲戰備。於是港督遣駐港英船開入珠江，攻黃埔，燬虎門砲台，砲擊廣州，名琛逃，城遂陷。然英軍以兵數甚少，雖得廣州不易佔領，加以粵民仇英甚烈，屢起暴動，以擾英軍。會印度亦起抗英運動，須兵助鎮壓，遂退出。廣東反英民衆見英兵退，便施行報復，暴動蔓延全城，火燒英美法商館及十三洋行，這時英兵亦在城外縱火焚燒沿濠居民數千家。

英政府得知粵變消息，首相巴墨斯登（Palmerston）極力主戰，一八五七年二月巴氏向國會歷舉中國於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七年侮辱外人的事件凡十八端，提議增軍費援助遠東英軍。下議院頗反對

，巴氏乃下令解散國會，召集新國會，結果決議對中國備戰，先遣使向中國政府要求改訂條約，賠償損失，否則即訴諸武力解決。英政府並以合縱之利慫恿法美俄諸國聯軍會攻中國，美俄因與英衝突，未允。法國正值軍國主義的拿破崙第三執政，鑒於鴉片戰爭中英國獲利甚巨，頗願與英國聯合。恰巧這時有法國教士乍伯倫 (Chapdelaine) 在廣西被殺，法國遂引爲口實，與英國聯軍。於是英以額爾金 (Elgin) 爲全權大使，法以葛羅爲全權大使，先後率海軍抵香港。致最後通牒於名琛，限四十八小時內獻城投降。名琛迷信乩語，既不答覆，亦不爲備。聯軍乃於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進攻廣州，左右勸他速定對策，名琛答稱『過十五日彼必自退』，不許水師應戰。因名琛信父志託乩語，謂『過十五日可以無事』，而廣州卒於十四日再陷。廣州既陷，葉名琛被俘去，英人挾至香港，其後（一八五八年）又挾至印度之加爾加答，一八五九年病死。時人爲之歌曰：『不戰不和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詞雖諷刺，然對於清室官吏的昏庸腐敗，尙未能形容於萬一。聯軍陷城後搜括督署財貨及藩庫銀二十萬兩，將軍督撫與各司道都避居佛山鎮，城中空無人，從此廣州便被英法軍佔領了三年之久。聯軍既得廣州，即乘勢迫清政府改訂約章。俄美亦趁火打劫，要求增改通商條件，四國公使會聯名致書大學士裕誠，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達。清廷答以（大學士本職參贊內政，向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由邊臣議之。英法美三國事，已委黃宗漢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會議；俄事委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時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已集上海，得覆書謂無誠意，乃決議北上。英法俄美四國軍艦二十餘艘，於三月初雲集白河口。投書直督譚廷襄，仍請轉達清廷，急派全權議和，廷襄奏聞，詔戶部侍郎崇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款，英法謂無全權資格，拒絕不見，惟俄美二使略與周旋而已。大沽口原有砲台，爲天津門戶，外有積沙一道，船舶至此，往

往擱淺不能行。當四國投書時，廷襄遣武弁駕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英法聯軍遂常以小汽船及舢板探水，中國以時方議款，不之禁，亦不設備。四月八日（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突以小輪數十艘闖入大沽口。砲台遂陷，清廷大懼。急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防敵深入；一面即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媾和全權大臣。英使持所擬新約五十六款，法使持所擬新約四十二款，要求照約簽字，桂、花據情入奏，清廷雖覺過苛，然以戰守皆無備，即無談判照所擬條款簽字，是爲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中英天津條約：

- (一) 南京條約繼續有效；
  - (二) 兩國得互派公使駐京都；
  - (三) 中國官府須優待基督教徒，英人得入內地遊歷；
  - (四) 增開牛莊、廣州、台灣、潮州、瓊州五處及鎮江、九江、漢口爲商埠；
  - (五) 在華英人不受中國法律制裁；
  - (六) 減輕英貨入口稅；
  - (七) 賠償四百萬兩。
- 中法天津條約：
- (一) 兩國得互派公使駐京都；
  - (二) 增開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江寧爲商埠；
  - (三) 得派領事駐各商埠，商人得自由租地建屋，並得派兵船泊內地遊弋各商埠；

(四) 中國官府須厚待天主教徒，法人得往內地遊歷；

(五) 中國官吏不得過問法人犯法事件；

(六) 法貨依最惠國待遇納入口稅；

(七) 賠款二百萬兩。

約既定，桂、花兩全權復和兩江總督何桂清同赴上海，會英法代表訂通商約章十條，這就是所謂協定稅則。其重要內容爲：(一) 進出口貨物不能免稅者，均納值百抽五之正稅；(二) 洋貨除正稅外納值百抽二·五的子口稅，即可運銷內地無阻；(三) 鴉片進口以洋藥之名課稅，每百斤納稅三十兩。這樣，不但中國稅則由人協定，且定稅則不分貨物品類，甚至連鴉片也索性當做正式進口貨了！中國國民經濟從此將受到怎樣的損害，實在是不堪想像的。

天津條約是南京條約的繼續和擴大，因爲第一，它們創立了列強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中國司法從此完全喪失自主權；第二，它們更擴大了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門路，增加通商口岸，就是這種擴大的具體表現；第三，它們容許列強藉宗教的宣傳來擴大商品的銷路，因爲傳教士可以藉傳教深入中國內地，充當最優良的經濟視察員，偵察外國商品的銷路，等到獲得中國的信徒時，外國資本家就又在本地得到它的中國代理人了；第四，它們創立了中國對外的協定稅則，從此時起，外國資本主義衝倒了中國限制國際貿易的壁壘，中國完全喪失了關稅自主權。自英法藉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取得了侵略中國的特權以後，其他列強亦都先後援例要求利益均沾，這樣，中國便逐漸由獨立國淪爲列強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了。

天津條約簽字後，規定次年在北京批准換約。英法軍艦方退出白河，駛抵上海，又強行探測長江水道。那時正是太平天國席捲長江流域的時候。英國正欲藉此撲滅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所以會上溯

至漢口停駐多日，測量形勢而回上海。當四國軍艦離津返滬時，粵東佛山鎮的民衆又起反英運動，而且形勢甚爲洶湧，他們實行武裝自衛，並出示懸賞購巴夏禮首級，可見當時廣東民衆怨恨巴夏禮之深。英人甚感恐慌，乃要求和議大臣桂良解散廣東民團，撤粵督黃宗漢職，這顯然是干涉中國內政，桂良也都一一答應照辦。但是滿清政府對於天津條約却實在有些不願實行，而且以爲洋人敢於如此跋扈，皆由於中國武備不足。於是僧格林沁到天津，一面彈劾直督譚廷襄，一面即佈置防禦工事，於白河兩岸築堡壘，建砲台，河中置堅固三柵，橫斷河道，以爲防禦敵人入寇之計。列強對於這種情形當然也不會不知道，所以當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二月，英以卜魯斯（Baird）爲公使，法以布爾布隆（Bourboulon）爲公使，至中國換約時，英政府即訓令卜魯斯：「中國政府原忌外國公使至北京，如遇任何妨碍，須不顧一切，完全達到北京換約的目的。」同時電令東洋海軍艦隊長阿布以軍艦伴送卜魯斯至白河。英法二國公使抵白河，阿布堅欲大沽守將撤除白河武備，故公使進口，直督請其由北塘登岸，卜魯斯不肯，阿布且指揮艦隊攻砲台，破三柵。不料攻至第二柵後，兩岸砲發，彈如雨下，聯軍將卒被擊，英艦隊長傷足，法艦隊長亦負傷，上陸兵士則多沒於陷阱，共死亡四百五十左右，砲艦沉沒四艘，後得美國艦隊之助，始得脫險。聯軍在白河失敗的消息傳到倫敦、巴黎，一部分進步輿論多謂非批准條約後，英法兵艦實無航行白河之權，卜魯斯、阿布輕舉妄動，至被擊潰，實咎由自取。然英法政府仍極力主戰，因又增兵調將，英以額爾金爲全權公使，克隆特（Grant）爲海陸兩軍總督，率兵一萬八千東來；法以葛羅爲全權公使，蒙達朋（Mordant）爲海陸兩軍總督，率兵七千二百東來。一時空氣緊張，中外商人均驚惶相告。聯軍到上海，首探舟山列島虛實，至定海灣，見毫無兵備，心乃大定。急回上海整戰備，向渤海進發。懲前敗，不由大沽進軍，派士官偵探北塘防

禦，至則河口堡壘無一守兵，聯軍遂由此全部上陸。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僅此一口，已用費百餘萬兩。忽有人建議應該讓敵人登陸以便襲擊它，僧格林沁狂於前次之捷，竟輕信撤防，致有此大錯。聯軍既登陸，先攻陷塘沽，繼又取大沽南北岸各砲台。壁壘已撤，白河成坦途，聯軍軍艦逕抵天津。英軍據左岸，法軍據右岸，城市遍翻英法旗。清政府見事至此，又祇得遣使求和。巴夏禮要求增開天津爲商埠，增償英法軍費八百萬兩，並准英法兩使各帶隨員入京換約。清廷未接受，英法聯軍即於七月二十一日大舉北侵，其間巴夏禮雖爲僧格林沁設計誘擒，解送北京，拘於刑部獄，然英法聯軍仍於八月七日攻陷張家灣，進佔通州。僧格林沁、端麟軍皆大敗。清帝見北京難守，決意北狩熱河，時正值太平軍攻破江北大營，南軍不能北上馳援。英法聯軍遂陷北京，巴夏禮釋出，更縱人焚燒圓明園以洩憤，盡劫金器以去，兩國平分戰利品。俄公使伊格拉地也夫出任調停，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九月親王奕沂與英法議和，先付英法卹銀五十萬兩，訂立和約，是爲北京條約。其主要內容：（一）天津條約繼續有效，（二）增開天津爲商埠；（三）割九龍半島爲英領地；（四）賠款增至八百萬兩，俟總督付清後，英法始撤兵。九月十一日奕沂與英使換約，十二日與法使換約，清廷完全屈服，英法聯軍始氣高趾揚地退出北京。

當英法聯軍之役發生的時候，馬克思正在倫敦，對於英國政府的侵略陰謀探悉甚詳，曾一連寫了四篇論文，於一八五九年九月十月間陸續寄往紐約每日論壇發表，題爲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在論文中指出英國政府對於這兩次侵略戰爭應負完全責任，正因爲新的對華戰爭是英國政府的預定計劃，所以滿清政府雖在天津條約中多方讓步，亦並不能鞏固和平，而使戰爭必然重起，事變的進程，完全證實了這個觀點。馬克思根據當時歐洲大陸的郵電傳來的消息，就會指出：『中國政府當時並不反對外交

使節前往北京，可是反對英國軍艦護送公使由白河西進，中國政府曾請卜魯斯由陸路入京，無須用兵力護送。中國人民因爲清清楚楚地記得不久以前砲擊廣州的事件，所以認爲這種兵力是實行侵略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與法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侵入太晤士河的權利嗎？所以英國這樣解釋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是極其奇怪的。在上一次對華戰爭發生時，英人曾有一個發明，說砲擊中國的一個城市，這不是與中國本身作戰，而祇是與中國一個省份發生地方性的衝突。前種解釋與後種發明是同樣奇怪的。據英人自己的記載，英人曾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進攻北京，就是說統率威武十足的艦隊由白河西進，那末華人抵抗英人底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是有理的。華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祇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然而當英國公使自己破壞條約受到教訓時，英國政府機關報每日電訊却大肆咆哮起來，極力鼓吹『大不列顛應該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並應於奪取北京之後永遠佔據廣州』，並且露出極頂兇暴的侵略者面目，公然說：『我們（英國）應該鞭打每一個穿蟒袍而敢於侮辱我國國徽的官吏，應該把這些抗英的華人都當作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底桅桿上，應該教訓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爲華人底主人翁。』馬克思又指出英法聯軍之役有兩個特點，就是：（一）這次衝突帶有『全國的』性質，而不是『地方的』性質；第二，在開始的時候，華人對於歐洲的武力獲得『很大的勝利』。雖然這種『勝利』後來又終於被英法大砲所轟碎，然而仍有中國民族自衛戰爭的意義。

### 第五節 帝俄的侵入——中俄交涉

俄國與中國接壤，與中國發生關係很早，惟在外交上發生正式的關係，則自尼布楚條約始。俄皇



在明萬曆年間即注意於西比利亞的經營，崇禎時更進窺黑龍江。至清順治初年，侵佔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諸地，自此以後，就屢與中國兵起衝突，當時俄羅斯尚未發達產業資本主義，整個的國民經濟是建築在農奴制度上。雖一方向西方波羅的海區諸民族施行無饜的榨取，尋求通西方的門戶；一方企圖向東方發展，侵入滿洲邊境，這些活動後來都成爲俄國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的重要關鍵。但封建國家究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堅強性，它那時在軍事上，技術和戰鬥力都不見得比中國怎樣優越，所以一六五〇年（清順治八年）時，俄國築城於雅克薩河口，俄軍竟爲清軍擊退。三年後俄將史特巴羅又引兵下黑龍江，更爲清軍所破。又四年俄軍再侵邊疆，復敗於清軍，史特巴羅戰死。俄皇見武力不敵，乃以請互市爲名，兩度遣使臣朝貢於中國，實際是要窺探中國的虛實。清政府素以天朝自居，見俄使來朝，更傲慢自大，清帝致俄皇書皆自稱『朕』。（註十三）一六七四年（康熙十四年），俄又遣使來北京要求與清政府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復爲清廷所拒。俄人乃積極經營雅克薩，仍圖以武力侵入黑龍江。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廷在黑龍江亦大修軍備，次年清政府有征俄之舉，在愛琿附近將俄軍擊敗，俘其全軍。二年後清水陸軍又大破俄軍於雅克薩城。適俄皇有內亂，無力東顧，急欲與中國議和。一六八八年中俄兩國遂以荷蘭使臣的介紹，會議於尼布楚。中國大臣索額圖以康熙二十七年出發，與俄國全權公使費約多羅於一六八八年八月會於尼布楚，清聖祖命都統郎坦

（註十三）清帝會貽書俄皇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通中國，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納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即使爾使資去，以明朕柔遠之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世恩寵』。

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並進，以爲外交後盾。俄欲以黑龍江爲國界，中國欲以貝加爾湖沿外興安嶺爲國界。經兩次會議，中國稍讓步，以額爾古納河與外興安嶺爲國界，俄使初仍堅拒，後見中國兵力強盛，卒從中國之意，訂尼布楚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三）拆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雜物，聽遷往俄境；（四）兩國獵戶人等不許擅越國界；（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六）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

尼布楚條約訂立之後，清政府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爲守備兵。自是，中俄國界既明，東北邊境之紛議遂定，兩國相安無事者垂六十餘年。一六九三年由俄國請求，中國又與訂北京通商條約，規定俄國商隊三年至北京一次，每隊限二百人，駐留八十日，貿易免稅。康熙末，俄遣使至北京，請改商約，未得要領而返。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俄女皇加德琳一世再遣使臣來中國，要求如前，且請會議蒙古、西比亞國界。清政府乃遣使與俄使薩瓦會議於布拉河，訂立恰克圖條約（或稱布拉條約）。主要內容如下：（一）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齊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二）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三）以烏得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此約訂後，中俄邊界暫無糾紛。恰克圖變成漠北一重要貿易市場，中俄貿易日盛。但中間會因細故停止貿易，恰克圖市場封閉了三次。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兩國復增訂新約，是爲恰克圖新約。

沙皇俄國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比其他國家遲些。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在俄國境內，工廠還是很少的。貴族地主的農奴制經濟佔最主要地位。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不能真正發展起

來。一八六一年廢止農奴法之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才開始比較迅速的發展。（註十四）這必然促進俄國向國外發展的活動。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開始分割在中國的勢力，又大刺激起俄國資本主義向中國的侵略。俄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於是乘機加入與列強的競爭。這種競爭是以雙管齊下的形勢表示出來的，即一方面藉着商業活動與外交活動，乘英法等向中國侵略時，要求與英法美平分春色；一方面藉着地理的接近，向着中國東北邊境進行領土的侵略，並取得通達太平洋的出路。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皇授權於穆拉維夫（Muraviev），任命他爲東西比利亞總督，使經營遠東。穆氏主張佔領黑龍江口及海岸附近，利用黑龍江的航路以開發西比利亞，那時俄人早已私移外興安嶺界碑，並暗在黑龍江北岸佔守，據爲殖民地。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俄皇續派業維爾斯基（Nevelsky）率軍艦來東方，與穆氏合力經營。一八四九五月穆氏由伊爾庫次克出發，過鄂霍次克海至堪察加半島觀察地勢，因定彼得帕夫羅夫斯克（Petropavlovsk）爲俄國的東方軍港，而業維爾斯基更探測黑龍江口，過庫頁島向北航行，發現庫頁島是一個脫離大陸的大島，證明以前地理學家認庫頁島爲半島之說不確。因得知船行至此便可由韃靼海直接到達黑龍江口，不必經過長期凍冰的鄂霍次克海，爲之喜出望外。即與穆氏商量，於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上溯黑龍江，佔領下游之地，建尼古拉維斯克（Nikolayevsk，——即廟街）於黑龍江南岸，而將彼得帕夫羅夫斯克的軍隊移至新軍港。穆拉維夫又編成一萬餘人的哥薩克軍隊，佔領庫頁島，經營黑龍江口一帶地方。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俄國正在與英法土耳其爲爭巴爾幹半島的霸權而發生戰爭，即是有名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註十四）詳見列寧所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爲着要保護俄國在東方的商業及抵抗英法的擾害，穆拉維夫主張由黑龍江運兵往江口佈置防務，同時奪取中國的領土，當時中國內部正是清軍與太平軍決鬪的時期，加之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清廷無暇北顧。是年俄軍即由黑龍江輪集江口，並沿途測量地勢。等到軍隊輸送完畢，穆拉維夫即要求中國劃界。清廷命黑龍江將軍奕山與穆拉維夫會議於愛琿，穆氏預擬條約六款，要求以黑龍江與烏蘇里河爲兩國國境，江南歸中國，江北歸俄。奕山據尼布楚條約拒之，會議遂決裂。一八五六年俄政府任命海軍少將普查清爲全權大使，自黑龍江航行至天津，要求定界，清政府婉却之。一八五七年俄政府乘英法聯軍之役派公使布恬庭 (Pertham) 與英法美三國公使聯名致書清政府，請派全權大臣到上海會議各國善後事宜，清廷藉口俄事交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俄公使不得要領，惟靜候英法聯軍的動靜。一八五八年穆拉維夫屯兵萬餘於黑龍江口，迫奕山答覆定界事件。清廷既屈於實力，又未能事先預防，乃命奕山與穆氏會議，約遂定，是爲愛琿條約。約凡三條，大要是：(一) 黑龍江以北全爲俄國領地，但原住精奇里江的滿人，仍可永居原地，歸中國保護；(二) 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爲中俄共管地；(三) 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只准中俄兩國船舶通航及兩國人民貿易。

愛琿條約根本推翻了以前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的平等原則，中國喪失了領土百數十萬里，斷送了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的航權。於是俄國資本主義得伸其觸角於東方，找着了通太平洋最便利的出路。俄國在北滿的資本主義經營，就是從此時起打下基礎的。

愛琿條約既使中國失地無算，不旋踵間，又有天津條約之訂立。蓋當英法聯軍軍艦抵津與清臣議和時，俄使布恬庭亦同時抵津。等到英法的天津條約締結後，布恬庭亦援例另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條，主要的是：(一) 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逕行清軍機

大臣或特派大學士，往來照會平等；（二）除兩國陸路於原定邊境通商外，會議決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設商埠，准俄國一律照辦；（三）俄國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再派兵船在各口岸停泊，以資維護，自此俄國就成爲中國的最惠國了。

二年後（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陷北京，恭親王不敢當和局，俄使伊格那地也夫乘機出任調人，以身保恭親王勸其出主和議。和議既成，俄人遂藉口要報酬。是年十二月中俄遂訂北京條約。重要條款爲：（一）兩國沿烏蘇里江、松阿、察河、興凱湖、白含湖、呼布圖河、及圖們江爲界，以東屬俄，以西屬中國；（二）新疆未勘定之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定界爲標。自雍正五年所定沙濱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境爲界；（三）恰克圖與北京間由俄貿易，並許俄國在庫倫設領事一人；（四）開新疆之喀什噶爾爲商埠；（五）俄國在中國通商地域可以設立領事。北京條約締結後，俄人遂於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建阿穆爾州、沿海州更經營海參崴以爲軍港——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這樣，俄國不但在經濟上取得了與中國通商的出路，在軍事上亦足以控制東方了，這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史上乃是佔着異常重要的地位的。

## 第六節

### 鴉片戰爭的性質和教訓

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本主義正在向上發展，積極尋找銷售商品的市場與爭奪殖民地。中國領土的廣大，人口的衆多，天然物產的豐富，就成爲西歐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好對象。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

就開始輸出商品至中國銷售，積極要求與中國通商。可是，當時滿清政府，却處處拒絕與外國通商，固執其閉關自守的政策。這種閉關自守的政策，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國的封建經濟結構對於大工業生產品的頑抗；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推動這個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大部分中國人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或大約在這個時期內所有過的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馬克思）但是，外國資本主義，就以槍炮來粉碎中國的鎖國政策，打開中國的萬里長城了，首先就是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

這一戰爭的性質，在英國方面是帝國主義性的侵略戰爭，亦即是非正義的戰爭。這裡任何藉口都不能為英國強盜辯護。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記載英國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時，曾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英人爲要辯護砲擊廣州的野蠻舉動，而究竟加中國政府以什麼罪名呢？他們說中國政府破壞一八四三年善後條約第九條，該條約說，留居香港的英國兵艦和商船上的中國犯人，中國官廳不得逮捕，而中國官吏却不經英國領事同意，在航行珠江的亞羅船上逮捕了中國海盜。因此就發生了亞羅船是不是英國輪船的問題。據德爾比（英國議員）說，亞羅船是中國人建造的，是中國人依法沒收的，是賣給中國人的，是中國人所買的，船上水手是中國人，船是中國人所有的。這隻中國商船到底怎樣會變成了英國商船呢？他們說因爲他們在香港購買了英商通航證或航行執照。這種證書的法律根據就是一八五五年三月香港地方官廳所頒佈的命令，可是這個命令不但破壞了中英間的現有條約，而且還取消英國法權的本身；因此它是不發生效力的。但就是依照這個無效的文件，亞羅船也不得藉它來辯護，因爲亞羅船不合該文件所規定的條件，而且它的執照已滿了期。這一點，連包林爵士自己都承認了。可是，有人說，亞羅船是不是英國船，這都沒有關係，但船上豎的是英國旗子，而這

面旗子却受了侮辱。第一，要是真的豎了旗子，那是豎得不合法的；第二，究竟是否豎了旗子，這還是問題。關於這一點，英國方面所說的與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互有出入，然而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有葡萄牙八十三號船上掌帆和水手經過領事所寄出的供詞可以證明。如此，法律理由既無根據，國家體面問題也不能成立。」（註十五）如果我們再借用德爾比的話，那末當時的英國侵略者真是所謂「朝相思，暮相思，夜裡醒來也相思，他們祇要進得廣州城，獲得巨大利益，則任何犧牲不爲大，任何流血不足惜」。所以馬克思又說，英國這種侵略行爲，「實際上是大規模的海盜搶劫」。並且更憤慨地說：「這段歷史自始至終只能令人厭惡。」然而許多帝國主義的歷史學家及我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却都認爲：英國當時對華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戰爭，而是進行了進步的戰爭。他們所舉出的理由和根據，大都以爲：滿清朝廷是反動的封建政府，執行了閉關自守的政策，反對與外人自由通商，而英國正是要求自由通商，鴉片戰爭正打破了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或者認爲：列寧會說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的產物，而英國進行鴉片戰爭的時候，却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因此，當時英國對華戰爭也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甚至像日本佐野袈裟美這樣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學家，也說：「鴉片戰爭不外是英國以開拓工業商品市場爲目的的戰爭，決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註十六）但是，我們如果能够更深刻地觀察問題，那就不難證明上述理由都是不能存立的。

（註十五）見馬恩論中國五十至五十二頁。

（註十六）見佐野袈裟美所著中國歷史教程中譯本，二百九十七頁。

因爲鴉片戰爭時中英所爭論的問題，並非一般的商業貿易自由問題，而是禁止或准許鴉片貿易的問題，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十八世紀當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之間的鬭爭所具有的性質，和外國商人與中國海關之間的一般爭執所具有的性質相同，而從十九世紀初葉起，這個鬭爭就具有完全特別的性質。』（註十七）這特別性質的主要內容就是英國強迫賣鴉片到中國，以毒害中國人民，而中國政府則表示反對。能够說英國強賣鴉片是合理，而中國政府反對鴉片反而不合正義嗎？顯然是不能的。當時滿清政府雖是反動的封建政府，但是它們曾起來反對英國的毒害中國政策，它們所進行的反對英國侵華戰爭，在客觀上減弱了當時侵略者英國的統治力量，因此，當時滿清政府所進行的自衛戰爭也正是合乎正義的戰爭。這正如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略俄的戰爭，俄國皇帝雖然是反動的，但是，當他爲保衛俄國不受法國的奴役，把拿破崙從莫斯科驅逐出去，仍不失爲正義的保衛俄國的戰爭。又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沒有民主主義的思想，他是一個封建國王，但是，他所進行的反對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也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一樣。

況且滿清政府及其軍隊雖然腐敗反動，然而在戰爭中還是表現了中國民族的抵抗力。在戰爭中，廣東民衆平英團數萬人的組織及各地民衆自衛運動的再接再起，都可作爲當時中國人民有反抗外寇侵略的要求和力量。可惜受着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這種豐厚的民族潛力還沒有能够充分發揚。然而鴉片戰爭及戰後，廣東民衆反英運動的興起，還是給了外寇以重創。南京條約雖已訂立，但英人仍不得進入廣州，因爲民衆仍是積極地而且狂熱地參加民族自衛的鬭爭。一八五六年英國藉口亞羅船事件，

（註十七）見馬恩論中國五十八頁。



攻陷廣州，但終因廣東民衆之反英鬪爭壓迫，旋又退出廣州。當時這種民族自衛鬪爭，大都是採用那種原始的行動。這種原始的行動，正像恩格斯所說：『我們最好是不要像英國的貴族報紙那樣去斥責華人可怕的殘暴行動，而應承認這是爭取自己生存的鬪爭，也是謀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對於奮起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不應根據通常進行戰爭的公認法則的觀點，或者根據某種抽象的標準在估計，而應根據這個奮起的人民已達到的那種文明程度的觀點及對於侵略者的實際打擊去估計。』（註十八）問題已經這樣明白，中國所進行的是民族自衛戰爭，而英國當時所進行的戰爭，已經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侵略戰爭，如果當時英國所進行的不是侵略戰爭，那末中國當時所進行的民族自衛的鬪爭，豈不成了無的放矢嗎？

至於說列寧會說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產物，而英國進行鴉片戰爭的時候，却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因此就認為當時英國對華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這也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列寧只說過大體上帝國主義是成熟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即係指的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最高的最後的階段，並沒有說帝國主義是完全等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才一齊成熟的。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即已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初步；自然，那時候的英國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的完全成熟了的帝國主義，有着質上的不同，然而絕不能因此就說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還沒有變成帝國主義。列寧會說：『在英國有首要作用的是它那種殖民地的佔有』，而當時英國以掠奪形式來開拓市場，使中國殖民地化的行爲，正是帝國主義

的行爲，因此，鴉片戰爭也正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戰爭，佐野袈婆美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機械的觀點。好像列寧在寫帝國主義論的時候，就已預料到會發生這種錯誤一樣，所以他在說到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的時候，會特別指明這一點：「怎樣從數量轉變為質量，怎樣從成熟的資本主義變為帝國主義。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裡面的一切界線，當然是有條件的，並且是活動的。所以爭論帝國主義之完全成立究竟在何年何代，那就愚不可及了」。（註十九）

確定了鴉片戰爭的性質，我們可以再來研究一下鴉片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及其對於目前中國抗戰的教訓，鴉片戰爭不是兩個階段的戰爭，也不是三個階段的戰爭，而是一個階段。這個戰爭自始至終只是英國方面的戰略進攻，中國方面之戰略防禦，以至失敗，被迫而訂城下之盟。中國方面既未能在當時集中兵力，進行戰略的反攻，以戰勝英國；也未能堅持反英的長期民族解放戰爭，經過相持階段，然後實行戰略的反攻。這種情形是由當時的特種歷史條件與主觀能力優劣所決定的。由於當時英國是一個強國，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弱國，由於英國主觀能力強些，我國指揮戰爭的主觀能力差些。加以當時中國政府沒有抗戰決心，政治上的黑暗，不敢動員全民抗戰，以及缺乏正確的外交政策等，所以不免於失敗。現在我們的抗戰和一百年前的歷史條件與國際條件都已大不相同，然而爲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仍應牢記着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不要重複過去歷史上的錯誤。

（註十九）見列寧選集，第八卷，解放社版，一百二十三頁。

###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背景

鴉片戰爭後的第八年，發生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一運動，很明白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資本主義列強自十八世紀以來，藉着通商將其勢力逐漸由都市而伸入農村。特別是在鴉片戰爭後，英法美諸國取得了侵略中國的種種便利與工具，如開闢商埠，協定稅則等，因此也就更容易佔領中國的市場。在最初列強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棉花鴉片爲大宗，這表明那時歐洲資本主義尙未十分發達，還沒有大量的機製工業品流入東方市場。但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英法美等國對中國的輸出品日益增多者，爲棉布、五金與金屬品，這樣就使中國的手工業漸次爲歐美的機器工業所壓倒。資本主義列強不僅自己伸展其血手來侵略中國，還利用中國的「洋商」來幫助它們的商業經營。例如在鴉片戰爭的前夜，廣州就有十三商行的設立，這種洋商就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起源。加以外貨輸入的日益增加，中國紋銀的大量外溢，其結果就是國內的銀價高漲，物價騰貴。同時，鉅大的戰敗賠款實際是由剝削民衆來負擔，外國資本家和中國高利貸者更乘機放出高利貸來盤剝貧民，中國民衆本已負擔不了那樣大的賠款，現在又要受到這種高利貸盤剝，自然更要弄得民不聊生了！特別是南方沿海諸省——如兩廣、福建等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最烈，太平天國運動發源於兩廣和這實有很大的關係。不但如此，自鴉片戰爭英國以武力掠奪中國以後，推進了中國各地的民族自衛運動，如平

英國的反英鬭爭，就是這種運動最顯著的實例。這種偉大的反對外寇的民族自衛運動刺戟了中國民衆的政治覺醒，使他們認識非推翻昏庸腐敗喪權辱國的滿清政府，建立一個新的革命的政府，是不足以抵抗列強的侵略的。這時候，在中國整個政治與經濟生活中顯然已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方面是滿清政府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逐漸走向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反動統治的趨勢；另一方面，就是廣大的民衆在外國資本主義與滿清統治的壓迫剝削下，開展着廣大的反對滿清統治，同時也就是反對外族侵略的群衆運動。

然而太平天國革命的產生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根源。自滿族入主中國以後，在中國原已形成了一種雙重的封建剝削關係。一方面農民大衆被地主階級以租役等方式榨取得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廣大的漢族民衆受着忍無可忍的軍事的政治的壓迫，使全國充滿了憤懣不平之氣。因此繼續不斷的農民暴動曾經不止一次地動搖了清室的統治。當時國內的商業資本已大爲活躍，但它不會促進中國生產方法的轉變，正是相反，全國的商業資產階級都和土地的剝削關係結了不解之緣，地主豪紳、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在農村構成了剝削貧農、中農與手工業者的三位一體。斯大林對於中國社會的這一特點，會有很深刻的分析，他說：『在榨取農民膏血這一點上，商業資本的存在，並不讓於一切封建代表。這種原始蓄積形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與封建統治及地主統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方法』。這只要看在撲滅太平天國的反革命戰爭中，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與地主及資本主義列強聯成一氣也就知道了。當時商業資本既因陳腐的生產關係之桎梏，不能轉化爲產業資本，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於是大量的財富積累了供官僚富豪的揮霍享樂以外，一部分轉化爲高利貸資本（如典當業的發達），更擴大對於城市貧民與農民的榨取；

一部分流入海外，使中國資本家在南洋群島等地佔着相當的優勢；還有一部分則投入土地中，形成巨大的土地集中運動。而由於官僚制度的發達，使這種土地集中過程更日益膨脹迅速起來。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它自入關後即以圈爲標幟（圈地）直接搶奪漢族土地，將所搶奪的土地一部分歸自己直接管轄，稱爲皇室莊田。一部分分給皇族王公，是爲宗室莊田（或稱封地）。另一部分分給滿洲軍隊（滿洲八旗），謂之旗地。此外尚有所謂駐防莊田、屯田、官田、寺廟地等。顯然的，貴族、官僚、商業資本家與高利貸者在當時也都成了事實上的地主，兼併土地極爲流行。這樣，就使廣大的農民日益走入喪失土地或無地化的過程中。例如當時湖南巡撫楊錫紱奏書中就曾說到這一層：「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註一）地主與統治階級就利用土地的壟斷來剝削農民。農民向地主貴族租口耕種，須以收穫的半數或半數以上繳納地主，以額外禮物孝敬地主。當地主家中有事或農忙時，佃戶須替地主進行無償勞動。而統治階級更實行徭役制度，當戰爭或皇室需要時，徵調無數農民進行無償的強迫勞動，因此而死亡的農戶往往以千萬計。如此，農民是在啼飢號寒的苦境中，在殘酷的剝削下喘息着。而由吸取農民勤勞大眾的血汗而致富的地主、官僚、高利貸者、商業資本家則「積銀如邱」「揮金似土」，窮奢極慾，頤指氣使。農民若有不滿，則壓迫隨之。當時地主階級在農村擁有種種壓榨農民的工具和機關，他們有供其驅使的武裝，有監禁農民的牢獄，並且與官府相勾結，將農民的自由剝奪得乾乾淨淨。種種殘酷的屠殺壓制情形，比之於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無不及。於是日益貧困化的農民大眾

於喪失土地之外，又呻吟於地主豪紳的刀口鞭撻之下。於是他們的實生活，使他們要痛恨貧富的不均，起來要求財產的再分配，要求廢止財產的私有。

在另一方面，我們還不要忘記了當時滿族對於漢民的壓迫亦是誘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直接原因之一。滿清政府爲着要鎮壓漢人的反抗，曾經施行極殘酷而又廣大的屠戮，所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不過是傳聞至今的兩個較大的流血慘劇。其實，有清一代，類似這樣大規模的虐殺正不知有多少。清帝的寶座就是用漢人殷紅的腥血染成的。不僅如此，滿清政府在征服漢族之後，奪取了廣大的農民的土地，以豢養它的爪牙，組織了雄厚的彈壓漢人反抗的武裝勢力，即所謂滿洲八旗軍，分駐於通都重鎮，以控制全中國。此外尚有蒙古八旗，漢人八旗與綠營之編制，約六十六萬人，分駐於各地關隘。所有這些軍隊的給養與軍備，無不取給於榨取農民的租稅。而軍隊紀律則腐敗不堪，隨處掠奪百姓。據說調赴廣州之軍隊，「沿途劫奪，捶撻貧民」，鮮有例外。（註二）統治階級傾全力於虐殺與對民衆的殘酷榨取，更使國防空虛，外寇易於侵入，造成外患頻仍與水旱疫癘等災害易於流行，常將千百萬農民捲入於飢饉、流亡、貧困與死亡中，至少亦陷於半飢餓的狀態中。這樣，要想消滅他們的民族仇恨與階級仇恨，不要他們起來革命，當然是萬不可能的了。

歸結起來，我們可以知道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在於滿清的專制政治與殘酷的封建剝削聯結起來，使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做了犧牲，抑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更在日益破壞中國的國民經濟，激起了中國民族解放的鬪爭，所有這些成因匯合起來，就釀成了

（註二）見王鈞宰金壺浪墨第三，引羊城日報語。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代橫掃全國的農民革命戰爭。這一農民戰爭不僅是一個反滿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有很濃厚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這一戰爭是在鴉片戰爭後，在那首先和西洋資本主義接觸的南方爆發起來的。而經過英法聯軍之役清朝可恥的喪權辱國，這個運動就更加磅礴和瀾漫。在一八五八年，恩格斯這樣寫過：「一些動搖不定的亞洲帝國，一個一個地變成歐人營業精神的犧牲品。我們這裡可看到這樣的一個亞洲帝國，這個帝國，已極其腐化，它未必能够在什麼地方約束本國民眾或抵抗外國的侵入。」（註三）是的，中國人民經過歐人的打擊，已在開始覺悟腐化不堪的滿洲朝廷不能成爲自己民族的保衛者，他們已開始覺悟自救更生的必要，太平天國運動，就是用原始形式表現出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自救更生運動。

## 第二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中國農民戰爭

滿清政府入關時，曾用殘暴的手段屠殺反抗滿清統治的漢族，以鞏固其異族統治。但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壓迫下，中國農民反對滿清和地主的鬭爭，遠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興起，並發展成爲連綿不斷的農民戰爭，這些農民戰爭，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先驅。

這些農民戰爭較早的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的臨清事件。那年山東兗州貧民數千舉行起義，攻陷壽張、堂邑、陽穀各縣，圍攻臨清，領導者爲王倫。到一七八一年甘肅回民在馬明心的領導下企圖起義，結果領導者爲統治階級捕之下獄。於是回民群起圍攻蘭州劫獄，與滿清軍隊血戰數日，未

（註三）見恩格斯所作俄國在遠東之成功。

得勝，馬明心被害。一七八三年甘肅回民以「爲馬明心復仇」相號召，又起義於通渭之石峯堡。越五年又有台灣之變。是年台灣之林爽文領導黎民起義於鳳山，攻陷彰化、諸羅、淡水等縣，曾與統治階級搏戰數次。一七九五年湘黔邊之苗民因反對統治階級之強佔土地亦奮起鬪爭，陷乾州，攻保靖、秀山、松桃、銅仁等地，前後與滿清軍隊抗戰十餘年。這些起義後來都被滿清政府鎮壓下去了，可是繼之而起的，就是一七九三年至一八〇二年北方五省著名的白蓮教暴動。

白蓮教本是元末漢族志士假借佛教迷信以驅逐胡元爲宗旨的一種秘密結社，創立者爲樂城的韓山童等。元滅後，其勢漸衰。但當明朝的官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加劇的時候，白蓮教的聲勢又浩大起來。如蘄州王森，山東徐鴻儒等都曾聚衆揭竿起事，雖然被統治階級鎮壓下去，但它在民間的潛勢力極大，受其影響與參加其組織的農民、貧民，多至二三百萬人。等到滿清入主中原，白蓮教更在「反清復明」的旗幟之下暗中進行反對滿清政府的民族獨立運動，一時附從者極衆。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河南教首劉松以謀亂被捕，遣戍甘肅。白蓮教遂以劉松之徒劉之協、宋之清等爲領袖，而擁一王姓童子，僞稱明裔朱姓，以號召群衆，倡言滿清劫運將至，密謀起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事發，教徒多被捕殺，惟劉之協漏網，清廷下令窮索。鄂豫皖三省官府乃輾轉搜究，一般貪官污吏更乘機敲榨搜括，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在荊宜治理教案，被株連者達數千人，於是燃起了廣大的農民群眾反滿的怒火。恰巧此時清室大興征苗之師，調兵轉餉，牽動七省，農民的血汗被敲吸殆盡。浩大的白蓮教暴動遂在「官逼民反」的口號之下一發而不可復遏了。當各省官府窮索劉之協時，荊宜等地教徒就揭竿而起，未及數月，暴動的群眾在各地沒收地主、官僚、旗人、富豪的財產，對於反對暴動的富豪官吏都加以殺戮。於是七省的地主豪紳與商業資產階級組織了雄厚的武裝——所謂「鄉勇」等的



助滿清軍隊來征剿。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川楚的暴動始剿平，二年後陝甘的殘餘鬪爭亦被撲滅。自起事起至滅亡爲止，白蓮教的戰爭前後凡歷八年之久。經過了四十餘年後，遂有太平天國之興起。

當白蓮教的暴動行將消滅的時候，在東南沿海諸省又有海寇之亂，所謂海寇都是由當時受地主、官僚、商人剝削壓迫得無出路的農民和城市失業貧民轉變而來的。先是安南王阮光平（乾隆末）以兵力經營得國，因財政困難，乃招集沿海亡命之徒，命劫近海船舶佐國用。最初海盜的活動範圍是在粵海，以後漸侵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等名。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海盜集艇百餘艘進犯台州失敗，其後安南易主，杜絕海盜入境，海盜驟失憑依，乃以閩海爲根據地，劫掠商船。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海盜蔡牽兩股犯浙境，復爲清軍所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清將李長庚與蔡牽戰於粵海黑水洋中，長庚戰死。但蔡牽所率的海寇亦敗走安南。次年三月蔡牽與廣東海盜朱潰部聯合，在浙海游弋。朱潰死，弟溼代領其衆，旋降於清軍，蔡牽勢益孤。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年）蔡牽爲清軍擊敗，死之。餘衆悉降，閩海遂平。後來粵海張保股海盜萬餘亦爲清政府招撫，粵海亦平。海寇之亂，無疑的亦是十九世紀東南諸省貧苦民衆的鬪爭，只是沒有固定的政治目標和堅強的領導幹部，所以不能轉變爲革命戰爭。

自白蓮教暴動與海寇叛亂相繼撲滅以後，清室以爲從此可以安然無事的加緊對民衆的掠奪了，誰料不久又有天理教的暴動爆發。天理教原是白蓮教的支派，其流布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洋、白易諸名。八卦教群眾尤多，旋改名爲天理教，遍布於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而以李文成、文清等爲領袖，附從群眾達數萬，以貧農、手工業者居多。其目的與白蓮教一樣，都是要反對滿清與地主

富豪，而建立漢族的農民政府。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天理教領袖李文成被捕下獄，暴動遂因以誘發起來，參加群眾三四千人，攻破了滑縣縣城，將文成奪出牢獄，並殺死滑縣知縣強克捷全家。同時文清在京師發動暴動，旋失敗，文清爲清政府所捕殺。但李文成一部的暴動，却在直隸、山東、河南擴大起來，與清政府及地主富豪聯合的武裝勢力會實行過許多英勇的鬪爭，亦因力量不敵卒被消滅，暴動領袖李文成並因而殉難。暴動失敗的時候，統治階級照例來一次大屠殺大流血的恐怖：『除教匪殲除外，良民被戮者二萬餘人』，（註四）這筆血債留待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償還了。

除了上述的三大農民暴動外，寫在太平天國革命史的前面者，還有許多零碎的地方的鬪爭和暴動。如嘉慶十八年陝西三才峽的箱工（統治階級稱爲『箱賊』）暴動，江西胡秉輝之亂，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八月河南教民的暴動，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山西趙城的教民暴動，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湖南武岡教民的暴動，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貴州謝法真的暴動，湖北崇陽的農民暴動，湖南萊陽的農民暴動等，都是貧農及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反官僚、地主、富豪的鬪爭，此等鬪爭由於不能彼此匯合起來，而缺乏中心的政治領導，都相繼爲官府、豪紳、地主鎮壓下去了。

上述各種農民戰爭雖然此起彼伏的綿延了五六十年，雖然戰爭的區域普及至南方與北方各省，可是結果都失敗了。這是因爲它們主觀上包含着各種弱點，諸如各個起義隊伍中本身極其渙散，而各個起義隊伍間又毫無聯繫，更沒有統一的指揮。因爲『農民的散漫，很使他們共同的合作發生困難』，同時又無明確的政治綱領，所謂『反清復明』僅是一種籠統的鬪爭目標，而沒有明確的具體的能動員

群衆參加鬪爭的行動綱領。這些弱點都是由於當時中國沒有先進的階級與革命的政黨領導的關係。也正因存在着這些弱點，就使滿清統治階級易於用各個擊破的策略來撲滅起義。此外，上述農民戰爭還帶着一種共同的特性，即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與原始暴動形式的特性。不論是白蓮教或是天理教，都以迷信去團聚群衆，暴動後群衆很多發展成爲一種搶掠的行爲，並盡其破壞之能事以洩憤，這是當時社會歷史條件與農民落後意識的反映。有時候『這種情形與其說是鬪爭，不如說是拼命和報仇的表現』；然而這種『原始的騷動也已經表顯了一些覺悟性底激發，他們已經不復堅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之堅固而不可動搖，他們已開始感覺得（不說他們已經開始明瞭）必須要共同起來反抗，他們已經拒絕向統治者作奴隸式的服從了』。（列寧）失敗原因除主觀弱點外，在客觀上還是由於滿清政府的殘酷的鎮壓。當時統治階級除調動正規軍隊外，更組織豪紳地主的武裝（鄉勇）協剿農民的暴動，用殘酷的屠殺對付起義農民，所謂『不問首從都立斬』，就是他們對付革命民衆的律例。然而屠殺是不能解決農民戰爭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因此接踵而來的就是更廣泛的強有力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

這裡，當然不能把這次太平天國起義和上述各種農民戰爭一樣看待。問題是中國已不是簡單閉關自守的中國了。海禁已開放，中國農民的敵人，已不限於舊的剝削者，而且有新來的民族敵人。這新來的民族敵人既然挾着鴉片、聖經、商品以俱來，既然用砲艦政策打開了中國的門戶，開闢了中國的市場；就必然要把中國捲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因而中國社會也就不用醞釀着新的變動。在這時候，農民戰爭就不僅演着反封建反滿清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作用，而必然被賦與着民族自救更生的意義。這裡，我們正可以看到中國過去歷史，幾乎每二百年一週緊接着農業大饑荒（在太平天國革命發動以後，即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全中國人也正爆發着大災荒）所形成的政治大恐慌——農民大起義，

在這時候，也正以更新穎的內容和形態再顯現出來。

###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勃興和戰爭

和中外歷史上許多農民暴動總是帶着濃厚的宗教氣味一樣，太平天國的興起亦是假託於宗教：「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洪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事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後以傳教遊廣西，居鵬化山」。(註五)洪秀全於一八一二年生於廣東花縣，家貧而幼失父母，曾身親農牧，因不滿當時社會，遂有志革命。見上帝會(又名三點會)可以號召群眾，遂與馮雲山同往加入。後被推爲教主，便把基督教解釋成爲他自己的宗教。以耶和華爲天父，基督爲其長子，自稱爲耶和華的次子，並吸取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主張一切人類都應平等，後來太平天國所倡的宗教公產主義，就是導源於此。這時和秀全、雲山共同圖謀革命的，有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等，依附群眾也日益增多，上帝會在廣西就佔着很大的勢力。當時南方諸省的破產農民與失業游民正在各地發生騷動，其勢洶洶，如慶雲的張家福股，柳州的山豬羊股，武寧的劉宮方股，象州的區振組股，潯州的謝紅殿股，都是其中最有力量的。清兵到處剿討，疲於奔命，上帝會就乘機活動。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官府捕洪秀全甚急，一八五〇年復因鵬運山(桂平屬)燒炭工人(上帝會群眾)反抗官府勒索，遂直接引起金田村的起義。楊秀清、石達開、秦日綱等亦皆起兵會金田。革命的怒潮使反動的清軍無法攻剿，而清軍內部復因衝突起分裂，這給革命以絕好的發展機會。洪秀全率衆由金田陷貴

(註五)見國史第十一冊。

縣，楊秀清領兵萬餘攻鬱林，轉陷北流，興業諸城，殺官吏數十人，聲勢大振。一八五一年二月洪秀全率衆打敗清軍向榮之部，東出大黃江（桂平東北），自稱太平軍。後又折回，復擊敗清軍於平南，乃東出佔永安州（今蒙山縣）。革命的新政權——太平天國就於此時開始建立起來，在中國遂開始有兩個政權的對立。秀全自稱天王，而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晃等亦都任丞相軍師等職。

清政府見太平軍聲勢擴大，知不可輕侮，乃調集軍隊數萬實行圍剿。太平軍因此時尚不利與清軍作陣地決戰，即於太平元年二月衝出重圍，北趨陽朔，大破清軍，逕趨桂陽，清將烏蘭泰戰死。但洪大全亦於此時被擒送北京，以不屈被磔死，大全從容就義，這是太平天國幹部爲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太平軍進逼桂林，出興安陷全州，入湖南境，進攻長沙未克，馮雲山陣亡，太平軍損失了一個戰鬥的領袖。於是太平軍在戰略上不能不改攻道州，連陷江華、永明，而以柳州、茶陵爲根據地。蕭朝貴率李開芳、林鳳翔攻長沙，不久秀全亦率全軍會攻長沙，三月不能陷城。清將向榮、賽尙阿自外線圍攻甚急，蕭朝貴中砲死，軍糧幾盡。太平軍乃造浮橋渡江退師，轉陷益陽，得民船千餘艘，攻破岳州。清軍在革命威勢壓迫之下，望風披靡，且多不願戰，於是湖北的重鎮漢陽、武昌亦相繼攻下，這時一方面摧毀了反革命的重要堡壘，一方面擴大了革命在群眾中的影響，加入戰鬥的群眾多至五十萬，滿奴奴謂五十萬男婦盡是俘虜，這簡直是將太平軍神話化了。武漢既陷，清廷大震，於是清軍雲集，群以太平軍爲攻擊之目的。太平軍未及組織武漢的革命民衆，即棄武昌東下。沿途發出奉天誅妖檄，諭救世人檄文，奉天討胡檄文，以號召群眾。那時候，農民和市民中高漲的騷動性，使太平軍的宣傳任務得以順利進行，故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太平，不久遂進逼江寧，連營二十四座，水陸號百萬，

日夜攻城。江寧商業資產階級協助清軍抗拒太平軍，但不數日南京終爲太平軍所攻破，時值一八五三年一月。計自金田起義到攻陷南京的差不多只化了三年的工夫。

太平天國於是建首都於南京，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參看下面第五節）在軍事上則繼續遣兵北伐，分兩路出師：第一路爲林鳳翔、李開芳所統率，先後攻陷鎮江、瓜州、揚州，即留曾立昌部據守揚州，林李自己則率北伐軍於三月由臨淮進逼滁州，四月陷鳳陽，入河南取歸德。五月攻開封不下，北渡黃河攻進懷德，爲清軍納爾經額部所敗，喪大將吉文元。林鳳翔部轉戰入山西，陷平陽府，由平陽入直隸，攻陷深州，距京師只有六百里。既而爲清將勝保擊退，林李乃改襲天津，不到半年工夫，攻陷大小城池二十六個。鳳翔攻天津失敗，退據靜海，更分兵屯駐獨流、楊柳青等處，以爲犄角之勢。時值大雪，南兵不習寒，耳鼻凍裂，又因軍糧不足，不幸爲清軍僧格林沁部擊敗，鳳翔遭擒殺。當鳳翔敗退連鎮時，命李開芳率馬步隊萬餘攻佔高唐州。及鳳翔死，清軍僧格林沁與勝保兩部遂夾攻李開芳。開芳退走馮官屯，僧格林沁決黃河水淹其軍，開芳亦終壯烈被害。於是黃河以北的太平軍全被反革命撲滅，這是太平天國受到的第一次大打擊。

林李北伐師出發後，太平天國更分遣胡以晃等西攻皖贛，以爭長江上游。以晃與賴漢英等率師由江蘇入安徽，下桐城，破集賢關，安慶旋亦重入太平軍手。於是晃分兵江南進逼南昌，圍攻十日不能克，乃由湖口攻陷九江，侵入湖北省境，水陸並進，陷黃州、漢陽，江西除南昌一帶外，南北都爲太平天國的暴動與戰爭所瀰漫。是時太平軍秦日綱部更由安徽的桐城進逼廬州，胡以晃復率軍會攻，與清軍大戰，清軍健將安徽巡撫江忠源戰死，廬州遂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陷落。而湖北的黃州亦有大戰，太平軍大破清軍，鄂督吳文鎬死於亂軍之中。次年二月太平軍陷德安，六

月復破武昌。武昌縮轂江漢要衝，太平軍凡三克之，韋志俊無役不在，軍中遂有「韋國宗三打湖北」之稱，以功加右軍主將。於是太平軍的勢力，又復屹立楚中，湖北諸重要州縣都相繼陷落，這是太平軍最盛的時期。那時太平軍的勁將如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等，都匯集在贛皖間，江西外江而內湖，湘軍孤懸其間，太平軍乘舢舨乘夜往襲，火燒數十百艘，曾國藩所率水師一敗塗地，國藩無面目見人，欲自殺，羅澤南止之得免。

當太平軍攻佔南京時，清政府賴以和太平軍抗戰的革命武裝勢力，就是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所謂江南大營是由向榮統率的。向榮軍是長於太平軍作戰的，當太平軍出永安州時，向榮由廣西追蹤到武昌，受清廷命爲欽差大臣，等到太平軍攻陷了南京，向榮復率師尾追。但當向榮率軍抵江寧時，而太平天國已定都十日了。向軍乃在東孝陵衛紮營，是爲江南大營。而同時琦善亦受命爲欽差大臣，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直達揚州，當時揚州已爲林鳳翔所陷。琦善遂與內閣學士勝保、提督陳金綬分營揚州城外，是爲江北大營。這樣革命軍就與反革命嚴陣對峙着，太平軍雖兩面受攻，而往來衝突自如。因清軍遇到太平軍，多不願作戰，而清軍的腐敗亦遠不能當新興的太平革命軍的鋒銳。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太平軍爲着要剪除心腹之患，先遣兵攻下揚州（第二次攻克），遂陷江北大營。太平軍李秀成部戰勝了清軍吉爾杭阿部，乃分兵兩路，由李秀成、陳玉成統率，進攻江南大營。同時石達開又率軍與李秀成會攻清軍，江南大營亦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陷，其後清軍張國祿部雖恢復瓜州、鎮江，進軍秣陵關，復立江南大營，卒爲太平軍再陷，太平軍遂由丹陽攻下常州、蘇州、松江以至浙江嘉興，各地民衆影響者甚衆，東南的革命聲勢遂愈益浩大起來，而天京無圍師者二年。

但這時偏安享樂的太平觀念也就發展起來，太平天國領袖也日趨墮落腐化了！他們奮鬥的意志已經逐漸消沉，而「爲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對於自己所頒行的法令政策也沒有切實執行，開始走向「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在領袖間則「往日倚爲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註六）於是太平天國就發生內訌，爆發楊韋之變。緣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洪秀全即深居簡出，軍政事宜均取決於楊秀清，於是秀清大權在手，威壓全朝，引起秀全之猜疑。一八五六年七月，秀全與韋昌輝合謀，殺害秀清及其全家與徒衆。石達開在安慶聞訊逃歸，責昌輝殘殺過甚，昌輝又欲謀殺石達開，事洩，達開乘夜出走，昌輝乃殺達開全家。達開至安慶，召兵靖難，師次寧國，秀全大恐，乃殺昌輝以謝達開。達開至京後，秀全對達開又起猜疑之心，乃用其兄以挾制達開，達開被迫，遂逃出南京，別圖發展。至是太平天國已露崩潰之象，後起的李秀成、陳玉成，雖則忠勇無雙，雄才大略，不斷地戰勝過敵人，企圖挽救太平天國的命運，然而竟歸無效了。

#### 第四節 反革命的崛起與太平天國之衰亡

太平天國的勃興不獨使得反動的滿清政府惶急無措，所有的地主、豪紳、商人資產階級乃至於資本主義列強亦都因此震駭起來。太平天國的革命在土地政策、經濟政策乃至社會政策上給予一切反對的集團勢力以絕大的打擊，並且隨着革命浪潮的發展，更促進了廣大的貧農與城市手工業者、貧民對



於革命政權的激烈要求，此等要求都逐漸部分的反映到太平天國的政策上來。同時千百萬的革命群眾在各地已自發地起來和他們的壓迫者、剝削者作殊死戰，這使得一切的貴族，官僚，地主，紳士、商人由絕大的恐慌中，要求對革命群眾及其政權，組織一強有力的反攻，於是以地主階級爲中心的反革命運動就在尖銳的鬭爭中出現了，其中以湘軍淮軍爲主力。在此以前，新寧的舉人江忠源已經有了一種反太平天國的武裝組織，是由團練——地主富農的武裝——發展而成的，當時號稱『楚勇』。其後江忠源被太平軍擊斃，楚勇因而瓦解，而湘鄉羅澤南、王鑫等繼辦團練，湘撫張亮基另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曾國藩即以這些湘勇爲基礎，成立湘軍於長沙。曾國藩不獨組織了陸上的湘勇，而且創立了水師，在衡州、湘潭設立了兩個造船廠，製造砲船，結果造成了大小戰艦二百四十艘，水陸軍共有萬餘人。陸軍由塔齊布、羅澤南率領，水師由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統率，統名之曰湘軍。湘軍最初在長江湘境與太平軍作戰，水陸皆不利，但不久即轉敗爲勝。先後克復了湘潭、岳州，水陸會師金口。不久又恢復了漢陽、武昌。至一八五八年四月湘軍佔領九江，兩湖與江西遂入湘軍之手。這時太平軍在長江下游雖仍着着勝利，但總的形勢已被迫而爲退守的局面了。

反太平天國的反動武裝的主力除湘軍，尚有淮軍，其主要人物爲李鴻章。早在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李鴻章即曾與呂賢基奉旨回籍辦團練。後來皖北的太平軍勢力發展，呂賢基戰死於舒城，這團練才一蹶不振。其後太平軍在江浙大爲發展，江蘇的紳士來安慶請援師，曾國藩遂又奏遣李鴻章募淮軍赴上海，於是淮軍在外國資本主義援助之下，就成爲東南一支反太平天國最有力的軍隊，而與上游的湘軍彼此呼應，夾攻太平軍。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同時也威脅着列強，於是英法美等國在天津條約締結後，便與滿清政

府合作，共同進攻革命了。當太平軍進攻淞滬一帶時，蘇淞道尹吳煦以厚餉募勇數千，以美人華德（*Wai*）統率，名曰「常勝軍」，又名「洋槍隊」。華德死後，美人白齊文（*Brigade*）代之，最後由英人戈登（*Gordon*）統率。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率淮軍抵上海時，更擴大洋槍隊的組織，而與英法聯軍合起來，共同防守淞滬。自是洋槍隊常參加江浙一帶的戰爭，常破太平軍。如一八六二年上海外國聯軍五千五百人，以大砲四十尊進攻嘉定，就是列強幫助清軍最得力的戰役。後來李鴻章恢復蘇淞，亦完全得力於「常勝軍」。

太平軍自楊韋難作，達開遠行，國力已凋。而頻年鑿兵，清軍胡林翼、李續賓崛起於上游，和春、張國樑再振於蘇省，其勢遂益岌岌。然危而復安者又七八年，則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實支持之。二人皆廣西藤縣人，起小卒封王，縱橫盪決大江南北，清軍畏之如虎。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三月和春、張國樑進逼南京，江南大營勢復振。是年四月，李續賓克九江，八月會國荃克吉安，太平軍在江西之勢力又墮。時湘軍作戰計劃：陸軍渡江，先皖北而後江南，水師先安徽而後南京。而以圖皖之事，屬之李續賓。自五月至十月，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進取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兩方血戰，殺傷相當。而秀成、玉成等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湘軍後路，續賓敗死，而太平軍之勢力一振。自江南大營再振後，南京復被圍。秀成乃與李世賢、陳玉成、黃文金、楊輔清、劉宮芳等百餘上將會於桐城縣東甬之樞陽鎮，商討攻守方略，決定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樑餉道，使其分兵來攻，再返師出其不意擊之。秀成既破揚州、六合，防堵浦口，遂以咸豐十年二月，出寧國，趨廣德，倍道搗杭州，由清波門穴地道，三日破之，巡撫羅遵殿自縊死。國樑使張玉良統援浙軍至，見城上偏插秀成旗幟不敢近，駐離城四十里之塘棲鎮。秀成遂全師撤回，檄諸鎮分撲圍城師，國樑不能禦，退守

丹陽，追兵踵至，國樑拒戰，馬蹶死亂流中，和春亦嘔血死。江南圍師三百餘營，悉夷爲平地，連下常州、蘇州，而太平軍之勢力又一振。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時反太平天國的運動在長江上游已大爲活躍，而資本主義列強亦開始援助清軍的反攻。時曾國藩總督兩江，自赴祁門督師，而以圍攻安慶之責，委之國荃。一八六〇年十月，陳玉成督十萬衆來援，國荃擊走之。多隆阿又敗之於桐城西南之掛車河，鮑超再敗之於安慶北境之集賢關，玉成驍將劉瑄林被擒，精銳損失殆盡。一八六一年八月，國荃以地雷破安慶，守將葉芸來以下戰死者一萬六千人。玉成全軍焚死，乃退走廬州，又爲多隆阿所敗，因此時太平軍東西兩方軍事的連鎖已被截斷，陳玉成卒壯烈被殺。

這時太平軍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勢力異常猖獗。所謂「曾國荃有直搗南京之師，李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彭玉麟楊岳斌有肅清長江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超有進攻學國之師，張運蘭有防剿徽州之師，左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而李左曾三路尤爲得力」。(註七)咸豐末年，英人戈登率常勝軍三千(有英法美軍官)馳赴太倉，截斷太平軍的聯絡。太倉陷，常勝軍與程學啟軍合圍崑山，駐蘇州太平軍往援，大敗。而是時南京又爲湘軍所圍，蘇州處於孤立地位。一八六四年四月戈登助李鴻章軍在常州擊破李秀成軍。常州陷，李秀成部向南京退却。在浙江方面，則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六月，左宗棠進軍衢州，時太平軍李世賢在金華，值南京被圍急，秀全飛召世賢回援。世賢請擊退衢州之敵乃往，七月宗棠進軍龍游，曾國藩又從廣西增調蔣益澧軍往助，世賢遣兵赴援助退。宗棠築長濠以僵龍游，而令益

遭攻湯溪，二年正月下之。於是沿浙水而下，攻富陽久不克，乃求法國總兵德克牌率洋槍隊助戰，陷之，遂逼杭州。是時清軍程學啓部調至浙境，佔領嘉興，與攻杭清軍呼應。杭州遂爲清軍攻陷，清軍入城後，卽大肆屠殺。

這時南京的外翼屏障，如武昌、九江、安慶、杭州、蘇、常等皆不守，其勢遂孤。李秀成見蘇浙一失，卽知不能持久，曾勸秀全『親征鄂贛，據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江浙以利餉源』，不聽。南京被圍日久，城中糧絕，軍民皆疲困不能耐，秀全知大勢已去，乃仰藥死。死之前，秀全預言日後必有繼太平天國而爲同胞爭自由者。於是太子福瑱嗣位，秀成輔國。時湘軍已佔領南京城外雨花台，旋佔江東橋的堡壘。一八六四年一月會國荃陷鍾山，湘軍遂得下瞰南京城。清軍在山下以巨炮轟擊南京城，又在城根掘地道，實火藥而轟之，城崩，清軍潮湧而入，南京陷。秀成挾福瑱出，於是太平天國的政權沒落。秀成未及逃出，亦被清軍所捕殺。受刑前，秀成曾親書供詞數萬言，敘述太平天國起義原委甚詳，歷十日而竣。因內容對清廷及會李輩大不利，故被會國藩所刪改。南京居民聞秀成死，追悼者達萬戶，且曾相率罷市，李秀成之得民衆愛戴，於此可見。侍王世賢奉幼主福瑨至廣德，轉奔湖州，倚黃文金軍。後文金戰死，餘軍爲左宗棠擊破。福瑨至徽州，清軍掩至，敗太平軍李榮發部，榮發遭擒殺。福瑨乃輾轉至福建之延平府，殘兵僅二千，卒爲清席寶田軍所獲，被殺於江西。

太平軍的另一支康王汪海洋部自杭州陷後，突圍走安徽，入江西，侵入閩邊。旋又敗入粵之嘉應州，一八六五年爲清廷消滅。太平軍李世賢部，一八六五年敗入福建，據漳州後亦爲清軍撲滅。在北方尚有陳德才、賴汝光兩軍，陳德才舊屬翼王石達開部，太平十一年得才聯合捻黨，入陝西武關。進逼長安，戰不利。後又轉入河南，圍南陽，復敗於清軍，乃解圍入洛陽。復入陝西，明年破興安。爲

興安地主武裝所擊敗，乃攻破漢中府而據之。太平十三年得才率軍救天京，至英霍，聞天京已陷。乃欲取道江西入浙江救幼主，復爲清軍挫敗於麻城。得才欲回軍漢中，途中爲變軍所殺。賴汝光舊屬陳玉成部，曾出潼關，在漢中與陳得才軍合。得才既被殺，汝光率軍入汴，尙有兵數十萬，大敗清軍僧格林沁，旣而天京被圍急，汝光率軍南下馳救，中途聞天京陷，遂入山東，與捻黨聯合，轉戰於濟、青、汴、海之間。後爲清軍所破，汝光被擒殺。

在西部還有翼王石達開一部，最後亦須敘述其起滅。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內訌時（卽楊韋之變）出南京，別樹一幟，由安徽率衆數十萬人入江西，趨吉安，與會國藩軍鏖戰甚烈。旋率兵入浙，迭陷各城。圍衢州不克，解圍入福建，後又入江西魏贛州。太平八年（一八五九年）達開入湖南，侵黔邊。復向廣西渡紅河而入貴州，所至苗人紛起響應，自是轉戰於湖南、貴州、廣西之間。太平十一年（一八六二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貴州，有衆十餘萬人，清軍尾追之，達開由普安入雲南境。十月復入四川，爲清駱秉章所敗，復入滇。十二年（一八六三年）二月達開遣騎軍入漢中，破興安，以牽制清軍。繼又輾轉自滇入川，中旗（石軍分爲前中右三旗）在寧遠被圍，達開自率前旗援之。爲川軍及土司所圍，途窮食盡，至大渡河，達開卒被擒殺，軍潰。時在太平十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卽南京陷落的頭一年。至南京陷落時，太平天國已遭受決定的失敗。至此，十五年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竟被血葬了。

###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三合會暴動和捻黨叛亂

清代農民的鬪爭與暴動在道咸之間甚爲普遍，各地零星的自發鬪爭漸漸有匯合爲全國的革命高潮

之形勢。太平天國不過是這無數的浪花中的一個巨濤。當太平天國的革命戰爭震盪全國的時候，許多地方已不絕爆發農民與城市貧民反抗官府地主的叛亂，其中比較佔勢力且與太平天國相呼應的鬪爭組織，在東南有三合會 在北方有捻黨。

太平軍佔領南京後，資本主義列強不僅幫助滿清、地主、商人進攻革命，而且利用各種機會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如擴張租界權力，攫奪關稅管理權與司法權等。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三合會的支派乙首黨（清室呼爲紅巾賊）首領劉麗川（粵人）陳阿連（閩人）謀襲上海城。事發，官府捕三合會領袖八人。三合會人大憤，集合萬餘人攻入上海縣署，殺知縣，蘇淞道尹吳健章受英美保護，逃入租界。乙首黨人既佔上海縣城，又連破松江的川沙廳、青浦、南匯及太倉、嘉定、寶山諸縣。上海既陷，清軍迭次圍攻，不能得手，乃請求英法美諸國援助，始破乙首黨人於陳家木橋。十二月二十日水陸並進，法軍同時助攻，暴動群眾抗戰甚烈，更分兵謀襲清軍營壘，清法聯軍大敗，死亡甚衆。後來乙首黨人卒因糧盡援絕，在清法聯軍猛烈的炮火壓迫之下，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咸豐五年元旦）退出上海，領袖劉麗川亦被擒殺，這一插話式的英勇的貧民暴動遂告失敗了。乙首黨佔領上海縣城時，外人與滿清政府均極惶恐。各國在滬商人表面宣言居留地中立，實際則使海軍陸戰隊登陸助戰，同時並組織所謂萬國義勇隊，以保護外僑生命財產爲名，實際上是借此擴大列強對於華人的統治權。不如此，當乙首黨奪取上海時，清室官吏多被殺或逃亡，於是各國領事乘機攫得管理上海的行政權。而且這時管理關稅無人，各國領事乃協議舉英人瓦得（Wade）及其他各國二人，暫司其事。亂平後，中國官府竟使外人繼續管理上海及其他各地稅關，由是開外人管理中國稅關之端。英美法各國領事又乘乙首黨之亂操裁判之權，以後遂沿爲定例，列強且公然設立會審公堂，受理及審判居留地中

國人被告的一切民刑案件，規定除原被兩造均爲華人的民事外，凡民刑各案件，都須由外國官員陪審。至一八六九年訂立上海洋涇浜會審章程後，即租界內純粹華人案件，不問民刑，亦由各國領事輪流會審了，於是會審公廨漸次變成了上海的最高法院。

捻黨起源於清康熙時，據說最初是農民行儺逐疫，捻紙燃脂爲龍戲，謂之拜捻。以後就聚捻成隊，報仇嚇財，遂呼爲捻子。或謂皖東人呼一聚爲一捻，捻者即組織黨徒之謂。這很顯然是當時農民被地主、官府殘酷的剝削，逼迫爲亂，所謂捻隊只是借迷信的習慣所結成的一種團聚群衆的組織。起初這種組織僅以掠奪富豪，對剝削壓迫者施行一種報復爲目的，以後漸具有政治的意識。自嘉慶至道光，加入捻黨的群衆日益增加，山東的兗、沂、曹，河南的南、汝、光、歸，江蘇的徐淮，直隸的大名，安徽的廬、鳳、穎壽等地，皆爲捻黨活動的區域，於是引起統治階級的注意。嘉慶中，河南巡撫琦奏定豫捻結夥三人以上，比照回民例加等科罪。而山東亦規定結捻結幅（幅亦是與捻同類的秘密結社）之案，依照人數多寡，定罪名輕重。後來安徽亦仿行此法，凡帶有武裝的會衆，皆斬首，僅結捻劫掠者，或絞或流，清廷更下令各地嚴拿。可是殘酷的壓迫反是助燃群衆反抗的怒火，捻黨的活動更因此日益蔓延，各地拒捕抵抗官府的暴動層出不窮，於是捻黨叛亂遂在北方如火燎原了。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已在廣西起事，豫皖捻黨就乘機活動，南陽、壽州都有捻黨的踪跡。咸豐三年太平天國攻陷安慶，奪取南京，並由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等率軍北伐，捻黨益形活動，到處發動武裝暴動響應太平軍。其重要領袖有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龔瞎子等，而張樂刑實爲群衆中的黨魁。是時清政府慮捻黨與太平軍合流，命周天爵駐徐益堵剿，不久又以給事中袁甲三代之，駐潁亳，前總督牛鑾駐陳州，更以河南巡撫莫桂爲軍事上的總指揮者，負責攻剿。當

時李兆受一支在霍邱起事，掠商、固光州，與安徽的捻黨響應。咸豐四年，莫桂遺兵捕兆受不得，兆受率數千人圍攻商城。安徽巡撫福濟久攻廬州不克，命團練樂圩寨防守，但不久李兆受即聯絡太平軍攻陷六安、霍邱，圍壽州，陷正陽，自光固，息商至商南三千里，都在捻黨勢力之下。

咸豐七年冬，捻黨游擊騎隊已抵開州，東明入直隸境。咸豐八年捻黨圍攻臨淮，勝保往援，李兆受投降。但捻黨攻入山東境，游擊河南，陷周家口，聲勢益趨浩大。次年竟大破清軍於舞陽、鳳陽，臨淮時得時失。咸豐十年捻黨更攻入清江，河南捻黨則趨鞏固洛陽，陝西、山西爲之震動。是年秋僧格林沁移師山東討捻，連失利。捻黨又由曹州趨鄆城，攻泰安，圍青州，而河南省二十餘縣爲捻所佔，有一支捻軍且侵入畿輔。九月叛變的團練長苗沛霖（原爲勝保招降，至此復叛）攻陷壽州，執巡撫翁同書，受太平天國封爲平北王。同治元年二月苗沛霖與太平軍、捻黨會攻潁州，爲湘軍擊退，不久廬州亦爲清軍恢復，於是皖北的捻黨勢稍挫。而河南捻黨已入商州，與太平軍聯絡，連陷鎮安、孝義，並入陝西之渭南、華州，後爲勝保、多隆阿擊走，退走河南，由宛郡趨襄陽，連陷隨州、應山、東山。同時山東宋景詩（原投降清軍）復叛，與張錫珠合，於是直東一帶的捻亂又熾。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克捻黨的大本營雒河集，擒殺捻黨領袖張樂刑、姜台凌等。樂刑之子張總愚領殘部與陳大濬合。是時捻黨的活動以豫鄂爲最烈，張總愚率軍犯南陽、襄陽，同治三年河南捻黨進攻隨山、應山，僧格林沁抵禦甚力，但大將舒保爲捻軍伏兵所殺。

這時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爲清軍攻陷，侵入陝境的太平軍（如陳德才、賴汝光等部）回軍南援，至漢中，乃與捻黨合。捻黨與太平軍的聯軍在鄂豫間遂分兩大支進攻，一支是陳德才，自麻城攻羅田，一支是賴汝光與張總愚的一部攻黃安，同時河南的捻黨任柱、牛老洪、李九等復與總愚部聯合。



。同治四年捻黨侵至黃河邊，轉入山東境，當時如曹州、定陶、荷澤、鄆城、鉅野等地皆爲捻黨暴動所瀰漫，直隸邊境亦有捻黨踪跡，以前被鎮壓下去的農民暴動至此又死灰復燃了。捻軍佔領了曲阜，又東南走滕嶧，逼近了贛榆、青口，頗有大軍南下之勢。清廷乃詔曾國藩、李鴻章備淮揚防務，捻軍又退走山東，黃河北均爲捻黨出沒之地。捻軍採取游擊戰術，不與官軍正式接戰，僧格林沁軍追捻於曹州，捻佯敗渡河，結亂兵數十萬以待，僧軍追至，伏軍齊出，將僧軍重重包圍，僧格林沁突圍而出，在森林中爲捻衆所殺。是時捻黨游擊於豫魯鄂皖蘇之間，總愚有衆三四萬，任柱、陳大溥、賴汝光、牛老洪亦有馬步兵六七萬，後來任賴等軍與總愚會合，不久又分爲二支，賴汝光走魯山，張總愚走唐縣。未幾賴汝光進犯信陽，湖北又爆發巨大的兵變，響應捻軍，黃岡、黃安、黃陂、孝感諸地都變成捻黨的游擊區。

同治五年捻黨在河南大敗清軍，與清軍轉戰於山東間，運河、黃河防守皆報警。於是曾國藩奏請以李鴻章駐徐州，兼指揮山東剿捻事，以曾國荃駐南陽，兼顧河南，國藩則自駐周家口扼其中，兼顧皖豫，又請飭直隸、山東砲船巡黃河，屏蔽畿輔。是年九月，捻黨分爲東西二支，西捻入陝西，以張總愚爲首；東捻出入於河南、湖北、山東、江蘇，以任柱、賴汝光爲首。而東捻又分爲二部：一部由任柱統率，向北進；一部由賴汝光統率，向東南走，及爲劉銘傳所敗，復合軍走沛縣，走曹縣，復走信陽，陷雲夢、應城，攻德安。同治六年東捻屯戶隆河，敗清軍劉銘傳，後鮑超往援，始將捻軍擊敗，捻復走河南，其另一支隊則犯麻城，游擊於蘄水、廣濟、黃梅之間，游騎達宿松，在鄂東大敗湘軍。入山東支隊則游擊濟寧、泰安間，復走淄川、長山、章邱，將由齊河渡黃河北上，阻於水，乃折而東南，走濰縣。任柱股被劉銘傳所追，奔贛榆爲其部下所殺，捻黨又損失一重要領袖，及賴汝光死，東

捻遂被消滅。西捻入陝西後，大敗陝軍，西安戒嚴，曾國藩檄劉松山往援，捻繼續北進，犯西安，在霸橋以馬隊大破清軍，清軍三十營皆潰，西捻遂圍省城，清廷乃詔以左宗棠督軍討西捻。同治五年三月劉松山大破西捻於西安，張總愚遂與暴動的回民合，勢甚熾。後由壺口入山西。七年捻軍侵入直隸，復由直南入豫北，轉趨山東，沿運河而抵天津，保定。後在沙河爲清軍所敗，捻軍遂被圍於徒駭河、黃河、運河之間，糧食又盡，軍疲不能戰，張總愚爲清兵窮追，投水死。其子張葵兒爲清軍擒殺，從子張正江走南鎮，亦被追獲。清軍俘老捻四千餘人，餘捻爲善慶、溫德克勒西所平。

捻黨叛亂維持了十六年，蔓延十省之多，乃是當時中國農民戰爭一大支流。它與太平天國不同的地方，就是太平天國的參加分子，除了極廣大的貧農與城市貧民而外，還有許多破產的手工業工人和知識分子，而捻黨則是以貧農及流氓無產階級爲主幹的；太平天國會較固定的政權之建立，並且佔領了許多重要的工商業城市，而捻黨在作戰上多採取游擊戰略，飄忽不定，不能有較長久的政權，以指導暴動及執行新的革命綱領，且未長久佔領過重要城市；太平天國會發動了廣大的土地革命，摧毀了一部分封建勢力所依附的剝削基礎，而捻黨叛亂在這一方面所進行的鬭爭是比較不深入的。正因爲有這些弱點，以及其他的原因，尤其是太平天國沒落後，捻黨陷於孤立地位，反革命階級則可結集（湘淮合軍）及抽調重要的武力進攻捻黨，於是在一般的革命浪潮低落之下，捻黨也就不能支持了。

## 第六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國是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戰爭。雖然領導人物爲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秦日

綱等)，且有富農分子（如石達開、胡以晃等）與商人（如韋昌輝等）的參加領導，然而參加這一革命運動的基本群眾却爲農民。李秀成供狀會說：『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告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也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窮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後來太平軍進入長江流域等地，參加太平軍的廣大群眾，還是因天災人禍而凍餓流離的農民。有一個記載當時安徽的情形文件說：『皖省賊匪（反動勢力稱太平軍爲賊匪）因年荒糧盡，裏脅飢民數十萬，由黃梅……等處間道上竄。』（註八）太平天國之所以能够支持十五年，也就是廣大農民不斷的參加鬪爭。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主要的也就是農民要求的反映。

太平天國是反對滿族壓迫，爭取漢族獨立解放的民族性的農民戰爭，這在奉天討胡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慨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民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爲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均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狐騷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令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令中國之男兒而脅

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偽造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餘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受制於十萬之衆，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從這一檄文中以及太平軍的行動中，都說明了由於當時外國勢力的侵入，更促成了中國人民對於反抗滿族壓迫的覺醒，而新的更大的民族危機的到來，像上面已提到的，也使中國人民覺醒到需要首先推翻滿清的壓迫，以謀民族的自救。這樣，就使這一農民戰爭塗上了濃厚的民族的色彩，正由於太平天國帶上了濃厚的民族色彩，就使這種運動更爲廣泛。

太平天國運動既是一個反封建勢力的革命鬭爭，在這個新的政權確立以後，自然要興起許多適應廣大的被壓迫群眾的要求之制度與政策。太平天國的鬭爭愈是擴大，群眾的要求反映到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上的也就愈豐富。成爲此等要求的中心問題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知道一切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都以解決土地問題剷除封建勢力爲首要的目標。因爲封建的生產關係主要的就是依存於土地的佔有關係上，不推翻地主對於土地的獨佔，是根本說不上民主革命的。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中國的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同時已指出許多農民由於喪失土地，而日趨於貧困化，這正是釀成太平天國

運動主要的原因。太平天國雖然以打倒滿清政府恢復漢族人的自由和獨立爲主要口號，但成爲革命運動骨幹的貧農群眾，主要地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而事實上，不廢除封建的土地關係，是無法推翻建築在這種土地佔有關係上的滿清政權的。自太平天國成立以後，爲貧農手工業者所組織成的太平軍便極力地破壞舊的土地關係——如焚燬地契借據等。這種土地革命運動，特別在太平軍佔領武漢和南京以後更是擴大着。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即頒布了一種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舊的土地私有關係，而以新的土地制度來代替。這種新制度的要點如下：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處。務使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能暖。」

天朝田畝制度又將土地分爲九等，即由上上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穀一千二百斤者），上中田（出一千一百斤者），上下田（出一千斤者）；中上田（出九百斤者），中中田（出八百斤者），中下田（出七百斤者），……一直到下下田（出四百斤者）。上上田當上中田一畝一分，當上下田一畝二分，當中上田一畝三分五，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當上下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當下下田三畝。這種依據土地的質量來劃分土地的數量之辦法，主要地是用於分配土地之上的。太平天國是按勞動人口的多寡來分配土地的：十六歲以上的國民都有受全份土地的資格，十五歲以下則減半分。例如十六歲以上分給上上田一畝，十五歲以下就只能分得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給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就只能分得下下田一畝五分。這種分配土地的制度正是土地革命的具體政綱。太平天國不僅主張沒收地主的地產，並且對於豪紳地主所佔有的寺廟田產亦規定爲國家所

有。

這種廢除土地私有制度的政策是與當時太平天國的宗教的農業公社理想相聯繫的，例如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又這樣規定着：『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藝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這雖然是一種農村集產生活的幻想，然而這種幻想正是當時農民群衆痛恨貧富不均的反映。

太平天國假託宗教而起義，所以在它定都南京後，教堂的建立與宗教宣傳的擴大，成爲與軍事發展同樣重要的任務。例如發行新遺詔聖書（即新約中的福音）、三字經（以宗教詞句編成的）、幼學詩以擴大宣傳。太平軍所到之處：『每二十五家，須設一教堂，各家兒童每日須到教堂讀聖書，禮拜日則人民均須祈禱。』又『太平軍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習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何處聽講道理。』這不外是要使宗教與農民生活發生聯繫，以擴大太平天國革命在民間的影響，鞏固人民對於新的政權之信仰，並訓練兵士和民衆，以統一其革命步調。

在軍事組織上，太平軍是以軍爲作戰單位的，每一軍領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軍帥統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各分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一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戰鬪員是由民間派出的，行徵兵制，凡三四口以上的家庭各出一人爲兵。所以軍隊的組織就是由『家』集成的，即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如設軍以後，人家添多，則每添多五家，即另設一卒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以上類推。太平天國的全部軍事組織系統，可以說是相當建立在軍民合一之原則上的。

太平天國的外交政策，在開始時，在某種程度上，曾和外國保持了友好的關係，准許外人自由通商。太平天國會通告各國：「彼此通商，理所應然。將來事定，只有洋煙（鴉片）再勿來吾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又「方秀全之定都南京也，英美各國，以太平規制，頗能尊重自由平等，深表贊同。皆願遣使通好，儼然以新中國目之。秀全亦遣其弟干王洪仁玕使美優答。法蘭西初雖以太平軍採用基督新教，與彼國所信仰者不同，及至南京，見太平天國之秩序與訓練爲之一驚，亦願保守局外中立。此可見太平建國之初，足以得外人之同情也。」（註九）加以列強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與滿清政府發生衝突，這樣就使外國最初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態度。一直到天津條約締結後，列強爲着保持、實現與擴大其從滿清政府手中取得的各種利益與特權，而且鑒於太平天國勢力的勝利發展，結果會破壞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的特權，於是他們便與滿清政府聯成一氣，來向太平天國進攻了。

在一般社會政策上，則太平天國主張：「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爲口食。」後者類於現在的所謂計口授糧的辦法，前者則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雛形。在財政政策上則太平天國所實施的辦法，係一面依舊徵收錢糧，一面則實行徵募與打土豪，但對「民間則絲毫無擾。」據說：「太平軍由長沙陷武漢，軍衆糧缺，間亦劫掠，美其名曰收入。然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每以攫取得之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註十）此外，太平天國確立了男女平等，禁止買賣婚姻，禁止蓄婢納妾

（註九）見羅元鯤編中國近百年史卷上八十九頁。

（註十）見太平天國野史。

，禁止纏足，廢除奴隸制度，廢除黑暗的刑法制度，禁絕鴉片等，都是進步意識的表現。

太平天國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說明太平天國不簡單是和過去一樣的農民戰爭，而正是近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農民戰爭。在太平天國的政策中帶有不少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特別是平分土地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太平天國人物主觀上是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但客觀上却正是要求民族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這一思想裡面包含着沒收地主土地，肅清封建勢力的內容，因而有可能在客觀上替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掃清道路。太平天國的這些進步的政策與制度，特別是土地政策，因為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以及缺乏執行土地政策的堅強決心，使土地政策一般說來還沒有實行，以致各地還是『照依舊規，投誠捐糧。』（註十一）但它與過去的原始的農民戰爭有許多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在地域上普及到中國各主要區域，不僅因為運動本身吸收了最廣大的群眾來參加；而還在於它有比較明確的主張，它有較嚴密的組織和各種較進步的政策，也就是說它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這種不同，是由於太平天國所處時代的不同所致。

### 第七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支持了十五年之久（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蔓延了十七省，而結果是失敗了，其原因可分客觀的與主觀的兩方面來說：

客觀的原因，主要的是在革命擴大和深入之後，商業資產階級起來幫助地主貴族，一致起來反攻

（註十一）見青岩遇寇錄。



革命，形成一條巨大的地主、商人、富農、紳士、官僚、貴族和滿清政府及資本主義列強的反革命戰線。太平軍初起時，對於滿清軍隊作戰，簡直有如摧枯拉朽，橫掃長江，攻取南京，滿清軍隊幾無招架之力。後因得到地主、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與資本主義列強的援助，才逐漸增加了反革命戰線的力量，組織戰略的反攻以擊敗太平軍。如以江忠源爲首領的楚軍，以曾國藩爲首領的湘軍，以李鴻章爲首領的淮軍，就是撲滅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武力。至於列強的援助，則正如矢野仁一氏在近代支那史中所說：「江蘇的恢復，英美人很有功；同樣，英法人於浙江的恢復也很有功。」（註十

二）

在主觀方面，則主要的原因是有沒有中心的堅強的領導階級，這是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所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在轉化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同時也在孕育着資本主義的種子，但當時還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組織與形成一個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太平天國。而農民則在基本上還是落後的，保守的，散漫的，無組織的。農民要取得勝利，要在資產階級（如在過去的法國）或無產階級（如在俄國）領導下才有可能。農民要取得徹底解放，則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達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就使太平天國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和政黨領導而走。到失敗。從這一失敗的基本原因出發，也就使太平天國產生出其他許多的錯誤。第二，因爲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和政黨的領導，所以太平天國就沒有能够去團結匯合統一當時所有的農民運動。當時中國各地的農民鬪爭到處風起雲湧，特別是北方捻子的鬪爭和南方三合會運動的發展，太平天國都不能

（註十二）轉引自佐野袈裟美中國歷史教程。

進一步地去結合這些運動，以增強革命的力量，以摧毀反動統治，反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甚至三合會在上海暴動佔領縣城時，其領袖劉麗川曾派代表至南京要求與太平天國合作，亦被拒絕，這更是太平天國一個絕大的失策。第三，在戰略上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去摧毀敵人的最後堡壘——北京，沒有乘敵人慘敗之際，迅速殲滅敵人（當時僅僅派出一部分兵力去北伐，結果遭受失敗，反而保守南京，使敵人能夠從容整理與組織反革命力量對革命施行反攻。同時又犯了分散兵力、疲勞兵力的錯誤，使自己常處於被動的地位。特別是後半期的戰爭，太平軍多半採取被動的防禦戰，造成東援西救南奔北走的戰局，常處於不利條件之下。應該退却時，又不曾組織適當的退却。例如最後南京被困，「聲處籠中，以待食絕」時，洪秀全仍不肯採納李秀成「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的建議，結果死守南京，為敵人撲滅。第四，沒有能夠更明確地去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深入群眾的鬭爭，特別是土地鬭爭；沒有認真建立強固而有力的政權，創立許多更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而形成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結果雖然佔領了許多通都大邑，却不能鞏固起來，造成隨得隨失的現象，形成流動式的活動。第五，太平天國領導者內部不團結，互相猜疑，互相殘殺。沒有能夠以領導者內部的團結形成整個革命運動領導的核心。在定都南京後，便日益脫離群眾，逐漸失去原來的面目，不能繼續為群眾利益奮鬥的共同目標下，緊密團結起來；反而為聲色貨利所迷，走向墮落腐化，一直發展到自相殘殺。而石達開的率師西行（大部是太平軍的精銳），更影響到太平軍的失敗。

總之，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正如這一革命的發生一樣，絕對不是偶然的。當時下層民衆的痛苦，統治階級的腐敗，群眾鬭爭情緒的高漲，正是利於革命發展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上述的客觀環境的困難與革命領導幹部之主觀的弱點和錯誤，就使革命浪潮漸次由高漲而趨於低落，最後以至於

失敗。然而太平天國革命雖不幸失敗，但它在中國革命史上還是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它的意義對於我們今天依然是存在的，絕不能因為太平天國的失敗而過分斥責它，並磨滅其光榮的意義。當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太平天國革命曾經表示了很大的關切，並說過一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話：「我們要提起一件事情，即剛巧全世界似乎都處在沉靜狀態的時候，中國和桌子却開始跳舞起來鼓勵大家了。」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這一篇有名的文章裡面，馬克思又說：「在中國，起義連綿不斷，已有十年之久，而且現在已匯合成爲一種強有力的革命，不管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不管這些起義帶有何種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而起義爆發底本身，毫無疑義地是由英國的大炮引起的。」在另一個地方，馬克思對於這一點說得更具體，他認爲：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因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時國家制度之震動，銀子外溢，因外貨輸入而引起的經濟平衡性之破壞以及其他等等。結果，鴉片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這是很矛盾的。」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國際概況中又說道：「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指太平天國當時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相差，像中國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之相差一樣罷，可是有一件事情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的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到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底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裡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註十三）

（註十三）見馬恩論中國二百零六至零七頁。

事實上，太平天國就正是創造這中華共和國的先聲，他們已開始在寫着：「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太平天國先烈所流的血，却在開始渲染着中國歷史的新篇幅。

## 第四章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

###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侵略中國的新姿態

太平天國——這個偉大的農民民族革命軍的失敗，列強利用中國的弱點，侵略中國就更變本加厲起來了。當時滿清政府也進一步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前面表示讓步、屈服與投降，特別在列強幫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中，使滿清統治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形成更密切的關係，各國就利用滿清政府來實施進一步向中國的掠奪。同時由於當時中國國家內在的脆弱和矛盾，也使滿清政府無法團結內部鞏固國力。前章已經說過，滿清統治階級所實行的民族政策，是以壓迫奴役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為特徵的。太平天國與捻黨的起義不但燃起了漢族被壓迫民衆反抗滿清的怒火，住居在中國境內的回民亦受到了這種反清鬭爭的影響，他們時常在準備着和清政府作流血的鬭爭。而且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與捻黨的革命與叛亂的時候，受着屠戮之慘的，不光是有無數的漢民，即與漢民雜居的回民亦不能倖免。加以漢滿的地主、豪紳、貴族時常和官府相勾結，對回民壓迫敲榨，無所不用其極。那時的回民和現今的漂泊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猶太人一樣，受到的歧視與欺凌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於是便又激起回民暴動的爆發。這種回民暴動在當時曾經蔓延到很大的範圍，而且如像雲南的回民暴動還會吸收了苗民（亦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來參加，武裝鬭爭的劇烈則竟至迫近雲南省城，陝、甘、新疆的回民暴動亦會與清廷相持十餘年之久。這些回民暴動因爲不能與漢族貧民農民取得密切的聯繫，加以暴

動的領袖多不健全，容易與敵人妥協或動搖，因此終於被滿清政府所撲滅，然而滿清政權內在的脆弱和矛盾，却亦因此充分暴露，這也就更容易招致外患的侵入。

這時候資本主義列強已逐漸向獨佔階段發展，它們相互間的衝突也比以前劇烈起來，侵略也就更為強暴，它們都不以爭得市場為滿足，而想進一步來獨佔所得的市場。所以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對於中國侵略的新姿態，首先就是割據中國的邊疆，使中國的藩籬全部喪失，使中國原有的藩屬淪為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首先是日本吞併琉球，琉球原是中國的藩屬，中英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在東方的貿易日益發達，琉球亦開始與歐美各國通商，並先後與美法荷締結通商條約。及至明治維新後，日本既迅速發展着資本主義，遂伸其觸角於鄰邦，而琉球即首當其衝。適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有琉球船載六十餘人，遇颶風，漂至台灣，為台灣生番劫殺數十人，僅剩十二人，由台灣地方官護送歸國，日本知機會已到，遂一面封琉球王為藩王，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將琉球與美法荷所訂商約，改為日本與各國的商約，一面決定向台灣發兵，征討生番，藉名為琉球人雪仇，實乘機侵略台灣。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二月日本使副島種臣至天津與直督交換前年中日修好通商條約，四月種臣至北京，向總理衙門提出台番殺害琉民事件，質問台灣是否隸中國版圖？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答以琉球係清國屬邦，琉民被害，毋煩日本。台番為化外之民，其劫殺行為與中國政府無干。種臣遂向本國政府報告台灣生番不隸中國統治。日本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發兵征台灣，台番諸社次第為日本暴力壓服，先後降日。日軍即在台灣之龜山建築營寨，為永久佔領之計。當日本興兵征台時，清政府詰責日本「生番係中國版圖之地，何故不照會即遣兵」，並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由閩省發兵一萬人往援台番，向日本要求撤兵。日本不應，兩國國交日益危急，既而以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締結中

日條約：（一）日本征台爲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爲不是；（二）由中國給琉球難民卹金十萬兩，賠償日本建築費四十萬兩；（三）約束台灣生番此後不得加害航民。自此約締後，日本遂從中國攫奪了琉球，在琉球經營不遺餘力，並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廢琉球王，設沖繩縣。

當中日爲了台灣事件發生嚴重交涉時，中英亦因雲南事件而有烟台之約。自中英條約締結後，英國對中國的貿易逐年增加。但英國在沿海一帶的各埠商業，尙不能滿足其侵略中國的慾望，更欲從緬甸伸其勢力於中國內地，開闢陸上的通商路。乃遣測量隊至雲南測地，至雲南騰越，書記官瑪加里及隨從數人爲當地土人所殺。英人以爲雲貴總督岑毓英所主使，事報於北京，英公使威妥瑪向總理衙門要求大賠償及速行處分。清政府飭湖廣總督李瀚章赴雲南調查，英公使亦派隨員三人同行。是年末，查明瑪加里之死狀，捕土人兇犯十餘人處死刑，並處官吏數名革職留任。而英公使竟不滿足，強請清政府嚴懲不加保護的地方官，並賠償英人損失。清政府不理，英使遂往烟台，命艦隊進逼直隸灣，施行恫嚇。昏庸無能的清政府深恐引起第三次中英戰爭，遂派李鴻章爲全權委員，與英使在烟台會議，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締結中英條約，是爲烟台條約（又名芝罘條約）。其要點如下：（一）中政府賠償卹款及用費銀二十萬兩；（二）派大使往英國謝罪；（三）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爲通商口岸，並許設立英國領事駐紮處，在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起卸貨物；（四）雲南邊境通商事宜，由英國特派員與雲南巡撫會同商訂之；（五）因兩國法律不同，各口岸審判事件，祇依被告人爲何國人，即由何國官吏審判。此外又有專款一條，規定英擬派員由中國京師啓行，徧歷甘肅、青海一帶，或由四川等處入西藏抵印度，探訪路程，中國應發護照，並知會沿途地方官吏保護，這就成爲日後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張本。

帝俄由西比利亞略取滿洲的情形，在第二章中已有所敘述。現在它看到英日勢力的擴張，也積極由中央亞細亞侵入新疆。適當時回亂在新疆擴大，俄國遂於一八七一年以維持邊境治安爲名，發軍佔領伊犁，並乘勢欲奪烏魯木齊，爲清軍在綏來擊退。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平定回亂，清政府遂於光緒四年派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赴俄交涉歸還伊犁。崇厚昏庸，毫無外交知識，以爲只要收回伊犁就得了，不顧其他，竟與俄締約十八條，主要的有：（一）俄歸伊犁，由中國償銀五百萬盧布；（二）伊犁既歸還中國，應將可西河以西，及麗山以南之地，以至底克斯河盡讓於俄；（三）除喀什噶爾及庫倫兩地已照前約由俄設立領事外，俄國得再於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庫車各地設立領事；（四）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俄商貨物往來，概行免稅；（五）凡俄商販運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通過同州、西安、漢中各路；其將中國貨物運往俄國，亦經此路。這樣，中國雖可收回伊犁，但是伊犁附近各要地却反因此送給帝俄了，這是何等可笑的外交。難怪當時朝野大加反對，一時如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洗馬張之洞等都先後交章論劾，尤以之洞反對最烈，甚至主處崇厚死刑。當時分主戰與主和兩派，如張之洞等即主戰者，郭嵩燾即主和者。清廷詔褫崇厚職，並定斬罪。俄國聞訊大怒，各國亦不以爲然。清廷不得已，將崇厚免死，仍行監禁，俄國派艦隊向黃海進發，清廷命直隸總督嚴守天津海防，中俄戰爭在此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後改派會紀澤爲使俄欽差大臣，經過幾番交涉，始於一八八一年與俄改締新伊犁條約：（一）中國賠償俄國代守伊犁之軍政費九百萬盧布；（二）中俄二國之境界，從別珍島山，沿霍爾果斯河過伊犁河，南至烏宗島山；（三）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規定齋桑湖之國境，尙有不妥，應自奎洞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劃一直線爲中俄國界；（四）俄國除照舊約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



外，並得在嘉峪關、吐魯番兩城設立領事；（五）兩國人民，在中國貿易等事，苟生事端，由領事官及地方官會同審辦。這新伊犁條約比前此崇厚所訂，雖較勝一籌，但中國亦已吃虧不少。同時在伊犁問題上還反映了英俄兩國的衝突，當曾紀澤澤抵俄時，俄外務大臣吉爾斯曾說：「英國在張家口通商，不但貴國（中國）商民受累，即我（俄國）恰克圖商情亦日見消滅，實因英美商南洋茶貨，由西海侵入，以至我兩國陸商受累。必使陸路之暢行，方敵南洋水路之勢，願兩國彼此明定互惠章程，庶我兩國商業不致爲水路所奪。」又說：「回疆之亂，哈什噶雅爾庫伯克自立爲國，常要求我國（俄）承認，我國仍視爲中國之叛亂者，而英國則由北印度相通，認爲獨立國，欲將中國茶貨由此路行於西域，實與我國情形有礙。」所以伊犁條約之締結不但使俄國對中國獲得勝利，而且使俄國得到和英國競爭的武器，以後英俄在遠東的矛盾和鬭爭，就是由此加深和擴大的。

## 第二節 法國掠奪安南與中法戰爭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對於中國的這種新侵略，除上節所述以外，還有法國對安南的掠奪，所不同的，就是這一掠奪竟然引起了中國的武裝抵抗。

安南是中國古史上的交趾，由秦到唐，都爲中國藩國。法國之侵略安南，還在十八世紀末，法人假傳教爲名，陰構成安南內亂，嘗助舊阮以滅新阮。及舊阮握政，法人見不能鑿所慾，乃以武力征安南，先後結西貢條約與順化條約，安南遂儼然成爲法之保護國。西貢條約既結，法國政府命駐華法公使以條約全文通告總理衙門，雖經清政提出抗議數次，而法國竟不顧，着着實行西貢條約並於一八八〇年在安南之河內、海防、順化、廣南設立守兵，且派遣測量隊分赴各地測量。安南政府至是恐懼，覺

悟西貢條約不利於安南，有排法親華傾向。一面遣使至北京，仍請爲中國保護國，一面暗助黑旗黨人進行驅逐法人。一八八三年黑旗黨人與法軍宣戰，法軍統領黎威爾戰死。消息傳達巴黎後，法議會遂通過對越宣戰案，命西貢司令官波耶急赴東京，指揮陸軍。五月法國大軍抵河內，中國政府主戰主和之說不一，結果僅僅派少數兵援助黑旗兵，不敢公然對法宣戰。其後清政府得雲貴總督岑毓英報告，知東京法兵不多，乃命李鴻章督辦越南事務，兼節制兩廣雲貴四省軍務，有對法備戰意。然不久主和之說又忽佔優勢，於是法國便完全掠奪了安南的主權。清政府聞訊大憤，命會紀澤與法外相交涉，竟不得要領。然清政府除任命了一批將官而外，並不敢正式宣戰。而法國却從容布置一切，準備宰割安南。到後來法軍再度進攻，始有巡撫徐延旭總督岑毓英之參戰。

一八八三年安南發生政變，排法黨廢王，而另立阮福昊爲王，是爲建福王。建福王不承認順化條約，下令逐法人。法政府接報，遂要求議會增軍費援助安南法軍。法軍續與安南黑旗兵及清軍戰，先後陷山西、北寧、大原與興化鎮，於是紅江下游一帶都爲法軍所佔。是時李鴻章力主和議，清廷以爲所謀甚穩，令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使在天津締結預定媾和草約五款，主要的爲：（一）法國不侵犯中國之邊境；（二）中國承認法安前後互締一切條約，中國在北安南之駐軍撤歸本國；（三）中國許南境一帶通商。這無異是承認了法國在安南所行的掠奪與侵佔之合法，安南已全爲法國所有了。這當然要引起主戰派的反對，於是交章論劾李鴻章者數十起，但條約是已經簽訂了，現在所爭者爲中國軍隊撤退的時間問題，李鴻章謂以三個月爲期，而法國則堅持三星期撤軍之說。安南法軍欲實行三星期撤軍之約，先佔宣光府，次即進軍諒山，駐諒山的中國軍隊尚未接得撤軍命令，不肯退，遂與法軍衝突，中法戰爭就以此爲導火線爆發了。

法政府得諒山衝突消息，憤中國之不能履約，要求清政府賠償軍費一千萬鎊。命駐華法使與中國全權委員會國荃在上海迭開談判，不得要領。於是法政府訓令駐華公使巴特納佔領中國一要地以威脅之。法艦遂於一八八四年六月定砲擊福州佔領台灣之計略，七月法軍率艦三艘至台灣，砲擊基隆港，清軍迎擊之。法軍大敗，因開艦返上海。法公使接基隆事件之報，即向總理衙門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賠償金三百二十萬鎊，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即認爲國交破裂，同時並宣言拒絕列國調停。清政府呢，却只發出一希望列國秉公調停的乞憐宣言，亦不積極備戰。而法政府未接到中國的答覆，即電命駐華公使下旗回國，又通知中國駐法公使退去巴黎。六月法軍率艦艇十餘艘停泊閩江口，準備進攻福州。中國數萬兵士在它這種橫蠻示威下，無不切齒憤恨，欲拚死一戰。而清政府可恥的不抵抗主義依然持之如故，閩浙總督何璟向各艦隊各砲台發令：『祇准防禦，不准進擊。』李鴻章致欽差大臣張佩綸總督何璟的電報，亦復如是。在清廷之意，以爲這樣可以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然而帝國主義却不和你客氣，一見要挾不遂，即分海陸兩路來犯。海軍由孤拔率領，於一八八四年六月進攻台北，劉銘傳擊却之。七月蘭入馬江，擊沉楊武等軍艦七艘，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砲台。參將高騰雲、管駕陳英、學生王漣、守備許壽山等皆戰死，船政大臣何璋、會辦海疆欽差大臣張佩綸等則畏死潛逃。佩綸素以敢諫聞，尤好言兵事，至是身敗名裂，爲天下笑。十二月法艦來攻浙江鎮海海口，爲提督歐陽利見所却，孤拔受傷，不久即死。明年法艦駛揚子江口，封鎖寧波，擊破鎮海砲台。而在台灣方面的法軍又大舉進攻，佔領基隆之堡壘與淡水河上之要地，不久復佔據澎湖島。法人羨基隆煤礦之富，要求清政府割基隆以和，被拒。陸軍由納克列耳率領，於一八八四年冬即在越邊與清軍發生接觸，明年一月，法軍大舉攻諒山，蘇元春、潘鼎新等力戰不能守。法軍進攻鎮南關，楊玉科中砲死

，驍將奪裕明奮死爲玉科復仇，亦中傷敗退。時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年七十，老於家，以國難復起率兵防邊，屯鎮南關，法人來攻，子材與總兵王孝祺部大破之，時法人前後受逼，子材與蘇元春、王德榜諸軍，乘勝窮追，斬獲無算，斃法軍官數十，長驅二百餘里，克復諒山。這時岑毓英軍亦大破法軍於臨洮，克廣威、承洋二府，逼興化府，安南民衆紛起響應。馮軍正待繼續進攻，忽接朝廷停戰撤兵之旨，將士無不憤極流淚。蓋法國正當普法戰後，元氣未復，此次敗挫，人心動搖，內外交責，增兵籌餉之案，又爲國會所否決，此時已暗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及駐京英使巴夏禮出面調停，清廷亦厭戰，見法國求和卽表示接受，派李鴻章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與法使巴特納成立天津和約，其要項如下：

(一) 中國承認安南爲法國保護國；

(二) 中國擇勞開以上，諒山以北二處爲通商口岸；

(三) 法軍由基隆澎湖撤退；

(四) 中國於南方諸省修築鐵道，聘用法人；

(五) 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協定通商稅則。

這明明是中國軍隊打了勝仗，却讓法國佔了便宜。清室的昏憤固然曠世罕見，而法帝國主義的毒辣却亦足可和英日美相媲美了。一八八七年五月清政府又與法國締結中越界務專約五款與商務續約十款。從此，安南成了法帝國主義合法的殖民地，廣西之龍州，雲南之蒙自與蠻耗，陸續開爲通商口岸。在商務續約中並進一步規定：(一) 輸入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三徵收，輸出稅減十分之四徵收；(二) 解鴉片貿易之禁；(三) 異日中國南境與西南境與他國締結通商條約時，法國得享受爲他國獲得之一切利益，從此法國對於中國的侵略亦就深入堂奧了。

當法帝國主義積極掠奪安南和中國發生戰爭時，英帝國主義亦在努力經略緬甸，法國從中國的藩屬中攫取了安南，英國亦照樣攫取了緬甸。緬甸爲印度支那半島的一個小國，在安南之西，亦爲中國藩屬。一八八一年間緬甸發生政變，有排英運動，英印總督發兵赴仰光，要求緬王答覆賠償謝罪事，緬兵發砲擊之。英人大怒，全軍上陸激戰，遂佔仰光及附近城市，緬兵敗走上緬甸。是時緬甸又發生政變，新王卽位，遂向英人請和，是年九月結和約於仰光，割擺古州爲英國領土，自此南緬全爲英領。英國佔了南緬甸以後，經營不遺餘力，遂引起了英法帝國主義的衝突。當時英法二國在印度支那互爭雄長，法政府欲扶植法國在緬勢力，於一八八二年遣使來緬，其目的是想在馬來半島克刺峽開鑿運河，事爲英國所阻。一八八四年緬王與法結攻守同盟秘約，法國代緬王維持王位，緬王以湄公河以東之領土割讓於法。明年法政府竟將該約公布，英政府大駭，遂決併吞緬甸。適緬王與緬甸商業會社發生爭議，英印總督達華林出任調停，緬王不應。達華林遂致哀的美敦書於緬王，限時答覆是否受英國保護，緬王七一波爲消極之答覆，達華林乃宣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英軍攻緬，盡佔緬甸諸要地，緬王向仰光退，後被禁於印度之麻打拉薩。英政府以布速達加德駐緬，監督緬甸官吏。一八八六年一月英國遂併上緬甸，二月合併上下緬甸，五月以緬甸劃爲英屬印度之一部，緬甸遂完全淪爲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同時，一八八七年葡萄牙割據澳門。一八九〇年，英國又吞併中國之藩屬哲孟雄。

### 第三節 朝鮮獨立問題與中日甲午戰爭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加緊對中國侵略的過程中，接着中法戰爭之後，又有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戰爭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是英法資本主義膨脹的必然結果一樣。

。甲午戰爭前數十年，日本也和中國一樣，受着不平等條約的壓迫，關稅沒有自主權，並有治外法權的束縛，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不僅積極侵略中國，同時也向日本染指，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終敵不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的侵入，結果就引起了日本民族的覺醒，於一八六八年實行明治維新，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後，新的機械產業在日本亦漸次發展了，股份公司與銀行資本亦迅速地興起來了。可是，明治維新並不是澈底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地主與資產階級共同自上而下的一種改革。以此，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便產生了如下的特點：（一）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封建勢力不但沒有剷除，而且還相當有力。特別是鄉村農民受地主階級封建的剝削，極爲貧困，以致國內市場非常狹小。（二）日本工業的發展偏重於輕工業，重工業還很落後，而且日本國內缺乏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所必要的資源，所以日本迫切需要國外原料的出產地與國外市場，特別要求殖民地。（三）日本資本主義很快地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這是一種封建的軍事的帝國主義，特別富於侵略性。中國和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而且日本資本主義的萌芽，係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及至它將次成熟的時候，全世界的市場，差不多已經宰割分配無餘，只有中國這塊肥大的禁嚮，雖然已在英法俄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包圍掠奪之中，但尚有容納更廣大的商品之餘地，所以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個進攻目標就是中國，並且進攻的手段亦更爲猛烈。既得琉球，又想謀取朝鮮，因朝鮮土地肥沃，所產米、麥、荳、棉，都甚豐盈，正是日本所迫需，且朝鮮地勢險要，可築軍港，更是日本欲得而甘心。「新興的日本很切望使朝鮮脫離了他國的支配和干涉，使它和日本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把它拿來做大陸政策的基點」。但朝鮮自立國以來，即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在歷史上，在血統上，在文化上都未曾和中國脫離過宗屬關係。日本要攫取朝鮮，除了和中國開戰外，很少有其他辦法，甲午一役就是日本製造得來以奪取朝

鮮的。

中日戰爭的焦點爲朝鮮獨立問題，蓋日本須使朝鮮先脫離中韓宗屬關係，方能進一步佔爲己有。鴉片戰爭後，太平洋風雲變色，日本首先維新，中國則依然老大，朝鮮有志之士相率東傾，冀有以自拔。日本乃利用此機，培植韓國內部親日勢力；於是朝鮮內部形成兩大派：一爲維新黨，亦名日本黨；一爲守舊黨，亦名中國黨，兩相傾軋，積不相容。中國此時，既不能允許朝鮮民族自決，助其獨立解放，復不能刷新內政以領導藩屬，堅決排除日本之干涉朝鮮內政。只一味頑守故舊，壓制屬國不使進取，對日本在朝鮮之製造內亂，非惟不給以辭嚴義正的詰責，反採取日本同樣方法與之爭在韓優勢，這在客觀上恰好幫助日本製造韓國之內亂。朝鮮新舊兩派既成對立之勢，日本乃百端煽惑，使用各種卑鄙手段，掀起韓國政潮，一以糜爛韓國，顯示韓人在中國保護之下毫無出路；二以製造種種口實，使自已可以藉此侵入。先是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明治八年）日本測量朝鮮沿海及中國牛莊等處之軍艦，在朝鮮江華灣爲炮台守兵炮擊，日軍艦應戰奪其砲台，並遣黑田清龍、井上馨爲正副使，率軍赴韓問罪。朝鮮畏其強，遂於次年遣大臣申樞、副官尹滋承，與訂江華條約，其要項如下：（一）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平等之權；（二）朝鮮除釜山外，加開沿海二處爲通商口岸（後開元山津、仁川兩處）；（三）朝鮮沿海，任日本人自由測量。這個條約的目的，很顯然的是要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隸屬關係，而移於日本的支配之下。從此朝鮮日本黨逐漸得勢，建立新政府，日本人被聘爲朝鮮軍教練官者甚衆。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兵士暴動，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以閔族爲中心之政府），亂兵殺日本軍官，襲擊日本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等走免，被害者四人，是爲壬午之亂。日本政府見機會到來，又遣使問罪，並提出要求三件，交涉不得要領。時清廷已發兵赴朝鮮，鎮壓暴

動，捕變亂主使人大院君及其黨羽。於是經清政府的斡旋，日韓在濟物浦訂約，即懲兇、賠款、謝罪及日本派軍駐於韓京護衛日本使館等。從此日本得派兵駐朝鮮，其勢力更不可侮。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維新黨之金玉均、朴泳孝等勾結日使縱火刺殺舊黨首領閔泳翔等，日軍馳赴宮庭應變，一時舊黨諸廷臣多被殺，金、朴等入內閣主政。是時中國全權委員袁世凱亦率兵討亂，擊退新黨及日軍，新黨內閣瓦解，舊黨得重握政權。日本政府遣使至朝鮮，要索郵費及軍費，修書謝罪，朝鮮政府一一照條履行。一八八五年日本政府復遣伊藤博文來中國，商議中日共同保護朝鮮辦法，與李鴻章締結天津條約，要款如下：（一）中日兩國駐朝鮮軍隊盡數撤退；（二）朝鮮練兵，中日皆可派員教練；（三）將來中日兩國，如派兵往朝鮮，須互相照會。此約一締，朝鮮遂變成中日二國的共同保護國，而予日本以攫奪朝鮮的良機。厥後，東學黨起，終結中韓宗屬關係的中日戰爭就因此而爆發。加之，我們知道，一八九一年是日本自己紡造的棉紗開始向外輸出之年，從這時起，日本自然要極力向海外尋求棉製品的市場，而首先就要向近水樓台的朝鮮和中國開刀了。

東學黨是朝鮮人民因國政腐敗，民生苦痛，起來鋤擊貪污，反對秕政的。一八九四年東學黨在羅道古阜縣起事，擊敗官軍，陷全州，韓京大震，朝鮮政府乞援於中國，清政府發兵助朝鮮官軍剿討。當出兵時，且依照天津條約照會日本。日本見有機可乘，亦派重兵至朝鮮，一方助其創亂，一方更派大批浪人混入。後東學事平，中國政府照會日本公使中日兩國同時撤兵。日本政府不應，並提出對韓協同改革案，且更以兵力迫朝鮮京城。日公使大島又面謁韓王，詰問韓王是否承認中國對朝鮮之藩屬關係，日本勸告朝鮮的改革案韓政府是否實行，朝鮮王室不能答，中國駐韓全權袁世凱令韓政府取消大島改革案，並堅持日本撤兵案。這時與中日韓有關係的各國，如俄英美諸國都出而調停或干涉，俄國且對



日提出嚴重質問，日本政府答以「若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協同改革朝鮮之內政，或中國承認由日本獨力擔任對朝鮮的改革案之施行，而不加以妨害，則贊成撤兵。」自然，日本這個提案，並非真的爲朝鮮改革政治着想，因明知中國不能同意此案，故意用此爲中日戰爭之開端。不久日本即用強迫手段威脅朝鮮政府，向朝鮮政府提出照會，宣稱中國既不同意共同改革韓政，日本決獨力進行。又稱日本將自行架設京城、釜山間的軍用電信，朝鮮政府應速爲日本建設兵營，速令撤退駐牙山的中國軍隊，廢棄一切中韓條約，限朝鮮政府在二十日內答覆，接着又以兵力威脅之，日本於六月間向朝鮮王宮進發。朝鮮政府不得已，遂依大島要求，將中韓歷年所訂一切條約全部廢除，又託日軍驅逐中國駐牙山軍隊。日本軍隊在豐島擊沉中國軍艦，中日甲午戰爭遂由此啓幕。

當日本陸海軍並進時，中國援軍亦由大沽向牙山進發。日方一面下令向牙山攻擊，一面命艦隊游擊於黃海方面及豐島方面。中國軍艦爲日本擊沉，中日海陸軍在牙山之成觀發生激戰，清軍敗績。清政府乃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下宣戰詔勅，日本亦於同日宣戰，英美諸國皆宣告中立。七月二十日日本又強迫朝鮮政府締結日韓新約與日韓攻守同盟條約。是年六月清政府更遣大軍由大連灣向北韓進發，七月達平壤，築壘守之，日軍實行包圍平壤清軍之策，分三路進攻。八月平壤城破，清軍死傷二千人，乃退鴨綠江西岸九連、鳳凰一帶。同時在黃海上中日海軍亦發生激戰，日本海軍處處對清軍佔優勢，因爲中國軍艦的噸數、速力與砲的命中都遠不及日軍，而海軍士卒平日復少訓練，臨戰時異常慌亂。結果中國軍艦有四隻被擊沉，死傷士兵千餘人，提督丁汝昌受重傷。於是中國的北洋艦隊不敢復出，日本奪取了黃海的制海權，在奉天南部黃海西岸，日軍可以自由進出。

日本佔領平壤後，更增軍進攻，一軍由義州渡鴨綠江，一軍親大連、旅順，由山縣有朋和大山岩

分頭統率，長驅直進。清軍則由宋慶、劉盛休和依克唐阿統率，合之平壤敗歸各軍，尙有七十一營，然皆節節退讓，九連城、鳳凰城、岫岩州、全州等皆不守。至是奉天南都悉爲日軍佔領，全州既陷，日軍續攻大連，不戰而克。十月二十四日日軍又攻陷旅順，入城後，屠殺中國平民四日，婦孺死者甚衆，於是東方第一要塞變爲日本海軍的根據地。旅順陷後，中國海軍北洋艦隊殘部潛伏威海衛不出。日軍由榮城灣登陸，先後佔領諸要塞及砲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軍進窺威海衛，守兵早遁，日軍唾手而佔據之。未幾，日軍又由威海衛北岸開炮轟擊劉公島，島內陸兵潰亂，不能戰，提督丁汝昌自殺。清軍對日軍投降，自是北洋海軍完全覆滅，渤海南北港口，皆爲日軍所佔。遼東方面的清軍亦爲日軍所逼，潰退甚衆。是時湖南巡撫吳大澂率湘軍抵牛莊，軍心爲之一振，大軍於二月間攻擊海城之敵。日軍見牛莊防疎，分兩路夾攻牛莊，清軍被圍，牛莊遂陷。日軍續攻營口、田莊台，悉陷之，不久兩國在北方遂入於休戰狀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本更欲消滅中國的南洋水師，奪取台灣與澎湖島。後果另編一艦隊向澎湖進發，砲台爲日軍艦破壞殆盡，於是澎湖全島亦全爲日軍佔領。

當日軍攻陷旅順時，李鴻章請各國出爲調停。英國以各國擔保朝鮮獨立與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條件，勸日本停戰，爲日本政府所拒。清政府復遣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G. Deiring）爲媾和使，攜照會往日本議和，復遭日本政府拒絕。於是有美國的出任調停，美國政府在當時恐戰爭的延長，妨礙商務，兼欲示惠中國，乘機提高自己在中國的地位，如英法聯軍之役時俄國之所爲。首先命駐日美公使向日本外務省表示調停之意，日本示意須中國直接向日本乞和。清廷得訊，即派侍郎張蔭桓及湘署撫邵友謙赴日本廣島議和，日政府以張邵資望太淺，無專決之權，拒不納，張邵不得已返國。清廷乃改派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鴻章子經芳爲參贊，以一八九五年二月東渡。日本則以首相伊藤博

文，外相陸奧宗光爲議和大臣，兩方全權會議於馬關。日方最初提出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爲休戰條件，談判不得要領。適有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者刺李鴻章於出會議所回旅邸之歸途，重傷左頰，事聞中外，各國輿論交相詰責，日政府懼列強非難，一方優禮李全權，一方允許無條件停戰，於三月三日成立中日兩國休戰條約。然後日本方面提出媾和條約案，李鴻章提出修正案，兩方屢經磋商，始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成立馬關條約，其要款如下：

- (一) 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廢除朝貢；
- (二) 割遼東半島（由鴨綠江至鳳凰城、漢城及營口爲止）台灣全島及澎湖群島於日本；
- (三)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 (四)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立領事於各商埠；
- (五) 爲擔保本條約實行，日本暫以軍隊佔領威海衛，軍費由中國支付。

同年六月間中日又續訂中日通商航船章程二十九條，規定准許日本汽船在宜昌至重慶，上海至蘇州、杭州各航路自由通行；日人得向中國內地自由購買及輸入各種貨物，租棧存貨，並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費；日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所用各種機器僅納進口稅即得裝運各地，所製各貨亦只照輸入貨納稅。同時在這個條約中，日本又取得了對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與其他列強在中國同等的權利。

馬關條約確立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的支配權，使朝鮮亦如安南、緬甸之成爲英法殖民地一樣，變成了日本獨佔的殖民地。而且使日本取得了對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與其他列強在中國同等的權利，以及在南滿的軍事、經濟根據地，雖然以後經俄法德之干涉，歸還了遼東與中國，然大連、旅順諸要

港都爲日本所得，這就爲日本帝國主義日後侵略滿蒙開闢了門戶。至於奪取台灣、澎湖，亦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在中國南面建立海軍根據地。不但如此，馬關條約及通商章程既規定日人在中國境內有從事製造業之權利，即等於給了日本資本家以投資中國之法律的根據，此後外國就可以在中國開工廠，以雄厚的資本作後盾，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來直接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了。日本利用這種權利，遂實現並加強了對於中國的侵略計劃，而由此更推進了日本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又是日本資本主義更向前擴展的造因。馬關和局之成，英國實居間介紹，美人依違其間，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表不滿。法忌其索台灣，俄則怒其據遼東，尤引爲大害，必欲阻之。（註一）德雖爲後起之國，亦欲乘機干預東方，爲將來擴展計。故三國抗議，於四月一日，同時提出。而俄人卽作最後準備，命在遼東之海陸全軍，準備待命出發。當時日人以軍隊悉在國外，又新戰勝中國，攫得許多意外權利，須有相當時間消化，不願

（註一）俄國自與中國結黑龍江條約以後，就積極經營西比利亞，謀於太平洋尋覓一條自由通路。而海參崴長期結冰，在軍事上頗易爲日本海軍所制。若遼東爲日本獨佔，則俄國向極東發展的計劃，不免化爲泡影。所以當馬關條約締結後，俄國政府聞遼東半島已割爲日有，大起惶恐。是年（一八九五年）四月間開海陸軍委員會，決定聯絡法國軍力制服日本。那時法國正與俄國爲同盟國（用以對抗德意奧三角同盟者），且欲在遼東投資，不喜日本的獨佔，所以與俄國聯成一氣。詳見李鼎聲編中國近代史一百八十一頁。

立刻與俄開戰。伊藤即往廣島，開御前會議。最後決定依從三國之請，退還遼東半島於中國。又恐中國乘此不批准馬關條約，乃主張對三國讓步，對中國則毫不放鬆。且同時以好意向英法俄諸國，聲明其意旨。然各國皆從本國利益上着眼，（註二）不肯爲日人援助。俄人且拒絕要求，嚴整軍備以待。日人不得已，乃照會俄國『日本除保留金州外，其餘遼東半島，概依俄國意見，放棄其佔有權，但日本得向中國索取其相當報償』云。俄人以日本此項照會，等於不肯交還遼東半島，不允其請，日本乃又照會，謂『日本悉依三國政府友誼上之忠告，願將遼東半島佔有權永久拋棄。』於是中國政府加給銀三千萬兩，時中日換約全權大臣，已至烟台，遂如期換約，而中日甲午戰爭乃告結束。

#### 第四節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的教訓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利用中國的弱點，更進一步侵略中國，且都不以爭奪市場爲滿足，而想獨佔所得的市場，割據中國的邊疆，如日本吞併琉球，朝鮮，俄佔伊犁，英併緬甸，法奪安南是。其中法日兩國因見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利甚巨，也就製造事端，實行侵華戰爭，因此而有中法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的發生。這時滿清政府已十分腐敗無能，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祇想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反動統治，已根本無所謂對抗外寇之國策，雖有廣大兵士之英勇抵抗，政府也不願加以組織支持，甚至

（註二）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佔據遼東，並不是替中國打不平，而是爲了它們自己的利益，這正如後來美國以開放門戶政策干涉日本對華的獨佔，是爲了要擴展它們自己在中國的利益與特權一樣。

打了勝仗，也還是讓外人佔去便宜，如中法戰爭之結果即其顯例。這種情況就是當時稍有見識之官吏也公認不諱，如中法戰爭喪權辱國之後，曾紀澤即曾說過是『始誤於柔，繼誤於忍，終誤於讓』之可悲結果。事實也確是如此，當法軍已佔領紅江下游，而李鴻章尙力主和議；等到法軍已率艦艇十餘艘停泊閩江口，準備進攻福州，中國數萬兵士在帝國主義橫蠻示威下，無不切齒憤恨，欲拼死一戰，而清政府可恥的不抵抗政策依然如故，命各砲台只准防禦，不准進擊。』後來馮子材、王孝祺大敗法軍，竟忽然接到清廷停戰撤兵之旨，將士無不憤極流淚。甚至打了勝仗之後，而李鴻章與法國所訂媾和條約，依然是喪權辱國，這簡直是古今中外罕有的昏憤。而且馮子材、王孝祺諸軍之勝績，證明中國雖弱，猶可自衛。如果政府有堅定的禦侮國策，則以當時之士氣，實大有振奮自強之可能。且當時法國正值普法戰後，元氣未復，故一聞敗挫，人心動搖，內外交責，增兵籌餉之案，又爲國會所否決，這只要看它暗中懇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及駐京英使巴夏禮趕快出來調停，就可知其色厲內荏之一斑。其實當時法國用意，亦無非是知難而退，想不到清廷竟這樣昏憤，打了勝仗反而讓它佔去這樣大的便宜。當時李鴻章輩如稍有謀國之誠，無論如何訂一個平等的媾和條約總是做得到的。在當時形勢，如果能够訂一個平等條約，也就可以制止一下外寇侵略之念，對中國開闢一個振奮自強的機會，然而這一點生機也被他們斷送了！在清廷之意，以爲這樣謙和禮讓，一定可以得到外人的贊美，然而事後法國竟宣言此次戰爭係『出於法國之膺懲，討伐野蠻國使悟文明國之價值，是文明國之責任所宜然』，這與今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口吻，簡直如出一轍，這本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廬山真面目，沒有什麼奇怪。所可憐的，就是本想以犧牲國脈去邀寵外人的清廷，而結果還是逃不了『野蠻國』的雅號。一個不能自衛和自救的民族和國家，一個對於自己人民肆意壓迫而對外寇侵

略則表示俯首貼耳，憑擺佈的政府，必定要遭受人們的輕視和鄙棄，並且必然不會得到歷史的寬恕，這是千古不滅的真理，也是中法戰爭的最大教訓。

正因爲滿清政府採取了這樣不能饒恕的錯誤政策，所以更招致了外人的輕視，不但不能發揮而且反而壓殺了自強自衛自救的民族潛力，所以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便遭受了慘敗。在這次戰爭中，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國防軍事的空虛落後，可以說已充分敗露出來。加以滿清政府根本沒有一個堅定的禦侮國策，在中日戰爭形勢緊急時，滿清政府內部也就更陷於混亂，翁同龢等極力主戰，而李鴻章則企圖以妥協政策來求得中日間衝突的緩和。統治階級表現猶移不決，對於戰爭毫無準備。甚至袁世凱報告日本決戰電請海陸軍增援時，而李鴻章却置之不問。以致戰爭開始時，中國方面表現措手不及，處處陷於被動地位，這在基本政策上已決定了中國方面的失敗。其次，在軍事上沒有集中優勢的兵力與日本決戰，形成陸續增派隊伍作戰的形勢，以致當北方的隊伍已遭慘敗時，而湖南、四川等地隊伍才開始趕赴前線，結果就不能挽回戰爭失敗的形勢。此外，在軍事指揮上也極不統一，形成各自爲戰的局面，給予日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第三，是沒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政府軍隊不僅與人民隔離，而且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人民；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就在朝鮮也是如此。如平壤爲朝鮮北方重鎮，清軍一萬七千人齊集於此。「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衛汝貴之軍尤甚，朝民大失望」。(註三)當時滿清政府及其軍隊這樣腐敗，當時這種沒有準備的、局部的、片面的抗戰，其結果當然就只能失敗。

(註三) 見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

甲午戰後，一時輿論的呵斥，集中於李鴻章。然而後來的史家，却頗有替李鴻章開脫的，他們以爲當時中國的海陸軍本不堪和日本一戰，如果清廷能早聽李鴻章的話，用外交方式來解決朝鮮問題，則中日不致開戰，縱失朝鮮，還不致於割台灣，更不致於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實這些話都是迷惑於歷史的現象，不會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國際形勢去作進一步的觀察，所以成了不合實際的空論。

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工業日趨發達，原料的取給與製造品的推銷，漸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在甲午以前，日本幾次派遣使臣來華，要求准許立約通商，幾經挫折，後雖達到通商目的，但沒有能夠和所謂列強者享受同樣利益。而日本資本主義的擴張，却已非通商所能滿足，便直接採用進兵台灣，併吞琉球，藉此以伸張國勢，並試探中國。那時候，中國的海陸軍雖有能力援助琉球、台灣，然而集南北洋艦隊以固海防，還可防止日本的進攻。假使清廷的大臣們懂得大勢，認清日本的弱點，利用日本與列強在華利害上的衝突，以廢止中日修好條約及通商章程，作對日的經濟制裁，不僅琉球國可不變爲沖繩縣，後來朝鮮的問題也不會很快的就發生了。無如當時清廷的大臣們所認識的日本，還是二十四史中的『倭奴國』；李鴻章是號稱『懂洋務』者，並且他知道『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一八八五年李致總署書），然而他滿腦子裝的是縱橫閩閩的中國祖傳外交方法，最初欲聯日本爲外援，主張『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一八七〇年致總署函），及琉球事起，則又主張『與其多讓於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日而又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得借俄以懾日』（一八七五年奏章），這便是日本人到現在還引爲口實的所謂『以夷制夷』政策。既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味想從聯甲拒乙，借丙懾丁的縱橫策略中去求苟安，這種外交方



式，如何能解決當時的朝鮮問題？所以清廷即使聽從李鴻章的話，除了無條件的讓日本滅亡朝鮮之外，中日戰爭還是不能避免的。中日戰爭既然不能避免，而李鴻章却除一味主張和平解決以外，不預作萬一宣戰後的適當措置之建議，甚至日本已經對中國宣戰，而李鴻章還是遲疑寡斷，仍自恃其懂洋務，妄想倖魚英俄出而調處，以此坐誤找機，遂使日本得達其所欲，一朝敗屢，至今爲梗。所以凡稍稍懂得一點近代史者，斷不應再替李鴻章辯護的。而且李鴻章的錯誤還不只在於他迷信外交，而更在於他到應該運用外交的時候，却又不肯運用。假使李鴻章能洞燭當時國際情勢，看出日本的弱點，先撤退朝鮮駐兵，一方調集兵艦，游弋渤海內外，修築砲台，厲兵秣馬，以作戰備，一方宣佈與日本絕交，則日本也就很難大舉進攻中國，所謂列強者，在利害關係上正希望清廷能把日本的勢力趕出中國去，當不至助日攻我，如此堅持下去，日本不堪經濟上之壓迫，自會向我要求重修舊好，那時主客易勢，說不定朝鮮事件會得到較適當的解決，然而李鴻章却又不肯運用這種有利條件。尤其是當李鴻章自日本携馬關條約回天津時，咸認其損失較諸前比南京、天津、北京諸約爲尤多，故輿論大譁，交詆鴻章，奏疏凡百十數上，甚至有請將鴻章父子拿辦治罪，欲將和局推翻者。同時爲了割讓台灣問題，引起台人大憤，主事邱逢甲等建議自主，公舉唐景崧爲大總統，圖謀台灣獨立。而俄法德三國又起而干涉，要求日本還我遼東，那時候清廷儘可不批准換約，以待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李鴻章反派伍廷芳迎駐津日領事來大沽，密令其速電東京，催促清廷換約。同時王子春已向法國交涉，願把台灣質押給法國，法國且已許價若干萬萬佛郎，允以台灣土地歸法，而海關仍歸我，質押若干年，任我贖還。李鴻章得到了這個消息，急電伊藤博文，竟匆匆於午夜在烟台換約，不僅斷送許多中國權利，而且斷送了台灣民族的生存。可見李鴻章只計自身利害，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加他以『漢奸』的頭銜，實在是並

不冤枉的。

然而甲午戰爭所以慘遭失敗，却不簡單由於李鴻章等一般大臣的誤國或禍國，還有更根本的經濟政治因素在。在經濟因素上，甲午戰爭前，日本的產業已到了「大產業的階段」，而中國却還在「工廠手工業時代」，這無異「在社會經濟的發展水準上，日本比中國走了一大步」。這反映到軍事技術上也就要發生質的差異，例如當時中國「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兩艘，爲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遲速懸殊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倭人心計諳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見李鴻章奏章）而日本當時海軍則馬力、速度、艦齡、速射砲數、水電發射管等，均較中國爲優。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以爲政治的因素還比經濟的因素更來得重要。我們要知道，「沒有富有朝氣的政府，也就不會有鞏固的國防。不根本改革政治，休想談抵禦外侮，更休想談振興工業」。當時「慈禧太后以建築頤和園故，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因之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全」，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況滿清政府完全建築在反動的剝削基礎上，它們對內則恣意壓迫，對外寇則妥協投降。它們根本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和領土，那裡還敢動員和組織真正的力量去抵禦外侮。所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兵艦、兵器、兵力都不及敵人之故，然而戰爭的勝負，初不限於兵器優越及兵力的強大，歷史上以弱勝強，儘多先例。問題是在有無抵禦外侮的政策，能否改革政治去動員和組織禦侮的力量，以及在軍事上有無正確的計劃和指揮等。如果這些

都能得到正面的解決，則劣勢可以逐漸改變成優勢，弱國也可以戰勝強國。當時滿清統治者對於這些根本問題都不能作正面的解決，加以李鴻章輩之誤國，結果當然只有一敗塗地。

中日戰爭充分表示了滿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雖然說明了滿清政府的無能，可是還是沒有澈底的暴露。中日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海軍覆滅，陸軍敗北，以往的軍事建設都宣告破產，偌大的中國爲小小的日本所征服。這樣就在全世界前面指明：中國完全是一個腐敗無能的國家，各帝國主義因此都看穿了中國的實質，因此便毫無忌憚的向中國肆行侵略了。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到處強迫中國承認各種條約，強迫中國租借土地，把中國劃分爲各國的「勢力範圍」。（詳下章）這樣，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便在實際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因爲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機會，而且朝鮮的佔領，正被它拿去做了推行大陸政策的基點。以後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它又打败了俄國，以及在第一次大戰中日本的投機取利，使日本帝國主義更加擴展反動，以至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生存解放的最大敵人。正因爲甲午戰爭的敵人仍是今天中國的敵人，所以我們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來檢討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也就有格外深切的意義。雖然四十五年後的今日，跟甲午戰爭的歷史條件與國際條件已經大不相同：那時候滿清政府是腐敗無能，而現在已經有了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與新的抗日政策；那時候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以平等待我的民族，而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做我們的隣邦；那時候滿清軍隊很快即被覆滅，而現在我們已經支持兩年又三月之久，却愈戰愈強。所以現在如果有人拿甲午戰爭爲例，以爲中國武器兵力都不如日本，就不能戰勝日寇，而發什麼「抗戰必亡」或「再戰必亡」或「戰則兩傷」「和則兩存」的謬論者，那便是汪逆精衛一派的漢奸理論。然而反對漢奸理論不能妨害我們接受正

確的歷史教訓，而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現在的抗日戰爭，雖然已經有了勝利的把握，然而真正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大目的，那就無疑還要走許多曲折不平的路程，還需要經過無數艱難困苦的奮鬥。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已經明白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就必須團結自己內部的力量，澈底改革政治，執行獨立自主的抗敵政策。不根本改革政治，休想談甚麼外侮，更休想爭取最後勝利。正確的認識歷史教訓，應該使我們警惕到，我們不能安於目前的現狀。所以怎樣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中途妥協危險；怎樣力求全國團結加強，反對各種分裂陰謀；怎樣力求全國向前進步，反對一切反動倒退現象，以達戰勝日寇建設新中國之目的，應該是檢討甲午戰爭失敗教訓的實際課題。

## 第五章 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

### 第一節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

中日戰爭後，正是十九世紀的末葉，資本主義發展已經進到帝國主義，即從自由競爭轉到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其侵略情形，較之以前大異其趣。蓋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時期，對外侵略的主要手段爲貨物輸出，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則其侵略手段已由輸出商品到輸出資本；在前一時期，它們所急急找求的是能銷售大批貨物的市場，到後一時期，則所找求的是能夠消納大量資本的投資地。前者的侵略還帶有自由競爭的意味，後者的侵略則利於獨佔。因此，它們相互間的衝突更比以前劇烈，侵略也就更爲毒辣，他們都不以爭得市場爲滿足，要進一步來獨佔所得的市場，換句話說，他們所要求的已不止是市場而是殖民地。以對中國侵略的具體事實講來，他們不只要打開中國的閉關政策，讓他們來銷貨，且要更進一步，把所得部分放在自己管理之下。中國市場固然廣大，物產固然豐富，但已經數十年來被歐美列強所掠奪，如今又新添加日本強盜，自然使列強中更增多一個角逐分子。加以壟斷原料與投資地比以以前僅僅爭市場的時候，必然引起更多的糾葛，因爲爭奪市場與割地佔據還不十分密接相關，而壟斷原料與投資地却至少要有勢力範圍。因此列強對於在中國權利之擴張，比以前更爲迫切，他們侵略的方式也就更進到列強爭相以武裝力量與外交陰謀，各自佔據勢力範圍，實行公開的掠奪，而這種新方式就如上章所說，是利用中國新敗之餘來進行的。

自馬關條約締結後，中國須籌一筆鉅大的賠款償付日本，贖回威海衛，更兼要整頓軍事，而清廷國庫空虛，於是不得不出於借外債之一途了。沙俄便是首先借款於中國的債權人之一。不過那時沙俄政府自己還要向法國借債來建築鐵路，編練軍隊，沒有餘錢貸與中國，於是與法國組織法俄銀行團，借給中國四萬萬法郎，利息四分，而由俄國政府擔保，這樣一來，中國便成爲俄國的債務人。英國因爲不願俄國獨嘗禁鬱之味，因此曾用盡種種方法來阻止，然而沒有發生效力。在遼東半島退還中國後，俄國本欲向中國索重償，事前俄公使喀西尼與李鴻章已有成約。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禮，清政府派李鴻章赴俄致賀。李抵俄京後，俄國朝野對李行包圍政策。因於是年三月在莫斯科締結中俄密約其要款如下：（一）中俄二國如遇日本侵犯，不論被侵犯者爲誰，中俄二國應在軍事上與軍需上互相援助；（二）中國允於黑龍江、吉林地方建築鐵路以達海參崴，其事由中國交華俄銀行辦理。其實當時世界所喧傳的中俄密約尙不止此。然由此可見俄國的目的在拉攏中國對日結攻守同盟，同時可使西比利亞不必迂繞西比利亞東部，即可以橫貫黑吉二省直達全滿，以遂其侵略滿洲之慾望。滿清政府卒批准此約，設立華俄銀行，於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勢力深入東三省內部了。是年八月中俄復結華俄道勝銀行契約，規定該銀行的業務爲：領收中國境內稅款，代還中國政府募集公債之利息，及敷設中國境內的鐵道等項，接着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又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清鐵路（即中東鐵路）會社條約，規定築造由俄赤塔接續南烏蘇里之鐵路，築造事務概委任華俄道勝銀行，並且規定東清鐵路會社有運送俄國海陸軍通過國境之權，俄國經該鐵路至俄國境內之一切貨物概免釐稅，而經過此路由華輸俄或由俄輸華的貨物照海關稅則所定之稅額減稅三分之一，及由俄派護路警察等。一八九七年俄國藉口德國佔領膠州灣（見後），命西比利亞艦隊駛入旅順口，又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及由哈爾

濱至旅順的鐵路建築權，因之引起了英國的忌妒，曾勸告俄國將旅大開作商埠，俄國拒絕之。一八九八年駐北京俄公使巴布巴夫與李鴻章結旅順、大連租借條約九條，要款如下：（一）中國將旅順、大連灣二處及其附近一帶之地租借與俄國，以二十五年為期，期滿得續商租借之；（二）旅順口作為俄國海軍港，大連灣開為商埠；（三）俄國得在大連、旅順建築砲台；（四）自哈爾濱至旅大之鐵路，與自牛莊至鴨綠江之鐵路由俄國築造。俄國侵略東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東方覓取自由通海路與不凍軍港，現在完全達到目的了。同年八月俄政府更以遼東租借地改建關東省，置總督治之，以旅順為首府，俄國遂得在遼東建立直接的統治權。這樣，遼東半島雖然從日本帝國主義血口裡嘔了出來，現在又給俄國帝國主義吞下大腹中去了。不僅如此，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後，有興築京漢鐵路的計劃，但興築費共需五千萬兩，本國僅籌得一千三百萬兩，餘三千餘萬兩，不能不向外商籌借。一八九七年四月清政府命盛宣懷與比國公司訂約，規定自保定至漢口的鐵路建築費，由華俄道勝銀行出資，而該銀行即得承辦該鐵路之權。於是江北大幹線之鐵路建築權歸於俄國。同年山西省商務局倡修正太鐵路，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六百八十萬兩，限二十五年償還，並規定如到期不能償還本息，則該鐵路由銀行代管。是時英國見俄國已攫取了京漢路與正太路的鐵路權，深恐俄國的勢力侵及揚子江流域。所以急與清政府結關外鐵路借款條約，英國借款二百三十萬鎊於中國為修山海關至新民屯與牛莊的鐵路，而以關外鐵路為抵押。英國的目的是要截斷俄國滿洲鐵路與京漢、正太兩路的連絡，阻礙俄國在中國北方數省的橫行。俄公使聞訊大憤，強迫清政府解除關外鐵路借款契約，結果英俄成立了一妥協案，即規定揚子江流域為英國的鐵路建築範圍，長城以北為俄國的鐵路建築範圍，彼此不得侵犯。這就是一八九九年有名的英俄協定，從此，滿洲與新疆、外蒙都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了。

英國則以香港爲根據地，在中國南方、中部積極擴充它的勢力範圍。中法戰爭後，英國會與法國交涉，締結英法協約，規定得與法國同享川滇之權利。及中俄密約成立，英國起了絕大的惶恐，遂更加緊其對中國的侵略。在一八九七年中英果成立新協約，規定中國開騰越、思茅、梧州、三水、甘州等爲通商口岸，又許滇越鐵路相聯絡。一八九八年二月英公使瑪德納藉口俄艦佔據旅順，亦向清政府攫得下列權利，即：（一）揚子江沿岸各省之土地不得租借與他國；（二）開放內河；（三）二年後開長沙爲通商口岸；（四）中國稅務司永久聘用英人。同年二月中英更結租借威海衛條約，規定威海衛租借與英國，租借期限一如俄國之租借旅順，爲二十五年，於是在北方，英國對抗俄國的計劃，由於威海衛之租借，得到部分的成功。同時，當中國支付第二期對日賠款的時候，英國爲與上次俄法借款競爭起見，也趕卽由英國的匯豐銀行和德國的華德銀行聯合借了一千六百萬鎊給中國。這次英德借款於一八九六年簽字，規定以中國海關的收入做擔保品。接着一八九九年又成立第二次英德借款，數額同樣是一千六百萬鎊。一八九八年四月中法談判成功，清政府承認租借廣州灣於法國，英國又如法泡製要求租借九龍，以「抵制法國危害中國及侵犯英國利益」。六月間李鴻章遂與英使瑪德納締結九龍租借條約，規定：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四十餘島及大鵬、深圳二灣租借與英國，租借年限爲九十九年，歸英國管轄。由於威海衛與九龍的租借，英國在軍事上遂得北與俄國南與法國抗衡，英國在中國建立了兩個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中國方面的霸權便屬於英國。然而英國並不取得了兩個海軍根據地爲滿足，同年五月間福公司與山西商務局締結山西採鑛附設鐵路條約，規定：由福公司借銀一千萬兩於商務局開採煤鑛，六十年間採鑛全權歸福公司，由是英國更取得了山西的採鑛權與鐵路敷設權。及一八九九年英俄條約成立，規定長城以北爲俄國勢力範圍，長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這個範



國據英政府自己表示，包括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浙江十省。

德國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向中國侵略比其他國家爲遲。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間山東曹州府鉅野縣發生游民暴動，其中分子多爲山東巡撫李秉衡解散的遊勇。暴動群眾殺死了德國兩個教士。這時德國教會已脫離法國天主教會的勢力而獨立，直接受德政府的御用。所以當曹州教案一起，消息傳到柏林，德政府遂下令派軍艦四艘赴膠州灣，青島砲台守兵退走，德海軍遂佔領之，次日又佔據膠州府城。駐北京德公使向總理衙門交涉，要求六項，主要的有：（一）巡撫李秉衡革職；（二）賠償德國教堂建築費及損失六萬九千兩；（三）以中德兩國資本設立德華公司，築造山東鐵路，並開採鐵道附近鑛山；（四）賠償德國辦理此案之費用數百萬兩。正在談判修正中，德國派來第二批軍艦又抵膠州灣，德公使復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清政府不得已，重與德國訂膠州租借條約，主要的爲：（一）將膠州灣水面與內外群島租借於德國，期限爲九十九年；（二）德國得在租借區域內建築砲台及行使主權；（三）中國准德國在山東築造自膠州灣至濟南之鐵路，德商有開採鐵路附近三十里以內地鑛產之權，於是山東便成爲德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了。

自中法戰爭後，法國在中國的勢力日益發展，在國際間大有舉足輕重之勢。中經中日甲午戰爭，法國與俄國勾結，以壓制日本，這固然是由於法國聯俄制德的政策有以使然，可是法國欲藉此取得新鮮的禁鬱，却是不能否認的。所以法國在對日干涉運動及以後對中國的借款中雖然做了俄國的尾巴，但法國在干涉日本歸還遼東的三國中，是向中國索得報償最早的。當中日戰爭時，法公使已向清政府要求續訂中法境界及陸路通商專約這個條約在中日和約換約後，就已實現了。結果法國領土擴張至湄公河上游東岸之地，江洪河畔都成爲法國領土，且開思茅、河口爲新貿易場，並取得了雲南、兩廣的

鑛山開採權與雲南鐵路建築權，然這在法國還不能認爲中國所給與的干涉還遼之報償。法國一面派遣工商業團體調查兩廣、雲、貴，一面奪取福州的航政權。當英法協約成立後，法國在南方所得的利益爲英國搶去了一大部分，法政府乃轉求報償於中國。一八九七年三月法公使向清政府要求兩項：即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及延長龍州鐵路，開採兩廣、雲南鑛山，修築滇、安間通商道路。清政府大體上均予承認，於是法國在南方的利益範圍算是更進一步確定了。可是到了一八九八年列強對中國正先後作分割運動，如英國之獨佔長江，德國之租借膠州灣，俄國之租借旅順口，都不免使法國垂涎欲滴，於是法政府如法泡製，亦向清政府租得廣州灣，並規定法國得在租借區域有爲軍事上設備之權，在租借期限（九十九年）內全屬法國管轄，於是法國在南方的勢力範圍劃定，足與英國抗衡了。

日本戰勝了中國後，居然也加入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爭奪集團，以強國自居了。我們知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本來是南北並進的，攫取琉球、台灣、澎湖，就是掠奪南方的政策；侵略朝鮮、南滿，就是向北方進展的運動。但在北方日本遇着了強敵俄國，除非擊倒俄國，日本是莫想前進的，這就是日後日俄戰爭爆發的基因。但在此時日本還正待休養整頓，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不敢和任何強國輕易啓釁，所以只得先經營南方。一八九八年日本伊藤博文第三次組閣，訓令駐北京矢野公使以福建省與台灣相接爲詞，向總理衙門要求發表聲明：福建省及沿海一帶永不割讓租借與他國，總理衙門備文承認之，於是福建成爲日本的初期勢力範圍。日後日本戰敗俄國，又攫取了南滿爲勢力範圍。以後驅逐青島的德國勢力，更將山東劃作它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都成爲日後日本強盜大規模進攻中國的重要據點。

意大利在中國的勢力遠不及英法日諸國，然意國對中國的貿易亦不小。當各國紛紛伸手中國劃定

勢力範圍時，意大利政府亦欲援均勢原則，在中國海面覓得一海軍根據地。一八九九年意國政府一面派軍艦向中國進發，一面訓令駐北京意公使向清政府要求租借三門灣（在福建與舟山群島之間）爲意國海軍根據地。但這首先侵犯了英國和日本的利益，因爲英國已劃定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日本已劃定福建爲勢力範圍，而三門灣適介於浙江與福建之間。所以當意公使以強硬態度脅迫總理衙門締約時，因爲有英國從中作梗，總理衙門的態度也強硬起來了，甚至對於意國提出的哀的美敦書置諸不理，意國竟無可如何，因爲意大利在那時尙未躋立強國之林。

上述各國這樣的在中國爭劃勢力範圍，卽所謂均勢主義之實行。這裡所爭的都是築路、開採等投資權與關稅上的財政權，無一不扼我血管，制我命脈；而且不得中國之同意，它們自己卽互訂協約，何者歸誰，事後再使中國割押，勢同瓜分，中國主權實已掃地。唯時美國，獨未向中國要求勢力範圍，而提出開放中國門戶之宣言（一八九九年由美國國務卿海伊向關係中國之英德俄法日意等六國提出）：

（一）各國在中國所獲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相干涉；

（二）各國範圍內之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稅率賦課，其賦課關稅由中國政府徵收；

（三）各國範圍內之各港，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課本國入港船舶以上之入港稅，各國範圍內之各鐵道對於他國貨物，不課本國貨物以上之運貨費。

交涉結果，英國首先贊成，其餘諸國贊成覆書亦先後遞到，海伊更將門戶開放政策之旨通告各國政府。美國所以要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並非表示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而是因爲美國資本主義發展較後，未能及早參加群盜之分贓，來遲了一步，祇得運用另一種妙策，提出門戶開放原則，以便可

得在群盜既已劃定的勢力範圍內徐圖插足罷了。一般近視者認爲『美國是以超然第三者之地位，謀世界公共之和平』，門戶開放政策『可以救出中國於瓜分場中』。其實，所謂門戶開放，不過是共管中國的另一名詞而已。

## 第二節 維新變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

甲午戰爭後，各帝國主義的猛烈侵略與勢力範圍的劃分，使中國政治經濟都起了基本的變化。這時期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它們不僅要求中國爲商品和原料市場，並要求中國成爲它們的資本市場。它們所輸出的資本，或以高利貸形式，附加殘酷的條件，來支配中國的財政金融；或者投資於鐵路，造成各國的勢力範圍；或者投資於鑛山，握住了中國工業的咽喉；或者開始到中國來設立工廠，以備同中國民族工業爭市場。其結果就使基於農業和手工業的中國國民經濟受到絕大的破壞，加強了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全國殖民地化的基礎。然而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入却也助長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給了中國新企業的建立以某種程度的刺激，使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漸次反映到社會政治方面來。但是由於中國封建勢力對於社會變革的頑抗性，以及『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的倚靠，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結構的統治階層——封建地主、商業與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進攻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到處企圖着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搾取形式（尤其在鄉村中），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註一）使資產階級性的澈底改革，終於不能成功地實現。雖然帝國

〔註一〕見國際六次大會決議。

義在中國各地劃定了勢力範圍，擴大了對華的貿易與投資，使中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與商業亦開始有些發展；可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一面勾結滿清朝廷，一面在每一勢力範圍內又與當地封建勢力相結合，維持當地封建統治，並經過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加強對中國勞苦群眾的剝削，因而沒有形成一個强有力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準備一個比較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資產階級的革新思想與要求，只是由比較進步和覺醒的官僚與知識分子表現出來，這就是當時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產生的由來與根據。

清政府自甲午戰爭後，已充分暴露其腐敗無能，然這一戰爭却一方面刺激了進步官僚的覺醒思想，使他們漸次知道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之意義；另一方面却刺激了國內一般民衆反對滿清政府的情緒與運動，這便造成了日後推倒滿清政府的革命之基礎。這裡先說刺激了進步官僚的覺醒思想一方面，他們一向過着單調生活，如今海禁打開了，『天朝』以外，還有更文明、更強盛、更進步的外洋；一向妄自尊大，以爲我們是天下第一的東方文明，與今日『鋼鐵世界』『汽機世界』一拚之後，人人都感覺到萬事都不如人：人家有鋼鐵，我們只有木器；人家有機械工業，我們只有農業和手工業；人家有電燈，我們只有火油燈；人家有汽船，我們只有帆船。於是一敗於鴉片中英戰爭，再敗於英法聯軍之役，現在又三敗於中日甲午戰爭。人們對於彼我的觀念，就有極大的變化了；過去的天朝觀念，也站不住了，至少要公認西洋物質文明的威力了。他們遇着這種種切身的經驗與教訓，使他們一向崇拜聖帝明王的舊觀念，便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其中更敏感一點的人，甚至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發生了變法的要求，如玉韜、薛福成、張之洞輩，還在甲午戰爭以前，就已感覺到在『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爲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設我此時不一變，安能埒

於歐洲諸大國」(註二)了。王韜又說：「故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爲功。變之道維何？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曰：練兵之法宜變也……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註三)薛福成不但主張變法，而且還提出了「鑛屯議」與「振百工說」等富國強兵的具體方案。對振興工業，在那時新政派中，他特別有見地，他以爲富強立國的大本，在於百工的振興，在振百工說裡他說道：「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爲禮，恃商爲用，則工實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則工又兼士之事」，可見薛福成很有想努力建立一個資本國家的意向。張之洞則偏重在學的面，會著有勸學篇來說明他的意見，在上海強學會序中，張之洞又指出中國的貧弱，在於缺少農工商學者，缺少軍事機械專家。當時這種變法維新的思想曾風靡一時，甚至那時像曾國藩、李鴻章等一班不惜投降外寇來腰斬民族解放運動的衛護名教之輩，也來隨聲附和。尤其是李鴻章且曾一時成爲新政運動的中心，正因爲有這些權臣的參加，所以新政派的維新變法，就不是少數文人逸士在舞文弄墨，而確實有了實際的行動。如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立製炮局；一八六四年南京設立金陵兵工廠；一八六五年在上海設立機器製造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一八七〇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機器製造局；一八七六年設四川機器廠；一八八〇年在天津設立水師學堂，在南北洋設立電報局；一八八二年金陵成立火藥局；一八九三年漢陽兵工廠成立。同時和這些軍事工業相追隨而發展起來的，有開平礦務局和漢冶萍公司的開辦，鐵路的開始敷設。並

(註二) 王韜變法中，轉引自晚清文選四〇一頁。

(註三) 王韜變法中，轉引自晚清文選四〇一至二頁。

且官辦或官商合辦的輕工業也在萌芽，如在上海之織布局、紡織新局、華盛紗廠；廣東之縲絲局、織布局，武漢之織布局、火柴廠等。此外在精神方面，如一八七一年曾李請選派聰穎幼童赴美習藝，一八七六年李鴻章奏請派軍官赴德習軍械技藝等，也都不外說明當時進步官僚已意識到軍備改良的必要。然而他們這些所謂新政派總不能跳出他們認識的界限，他們缺乏明確的歷史觀念，不能理解社會進化的根本法則。因此，他們所能了解的新政，只是表面的槍砲、實業，只是皮相的富國強兵，而不能允許剝削關係的變革和中國禮教成法的改動。張之洞的名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最足代表那時一般士大夫的變法心理。因此，上述的軍用工業與軍事學習，根本就沒有廣大的一般產業與強大的新社會生產力做基礎，同時又沒有和全部的政治改革與軍隊改組配合起來，所以收效甚微。正因為沒有政治上的改革，以致當時浩大的國庫支出仍多浪費於王室的奢侈淫樂上，自然也就不能儘量供給新軍備的建設，所以甲午戰爭的結果，仍是中國慘敗。這樣一來，當時中國的所謂變法維新，就正如偉大的中國民族革命戰士與文學巨匠魯迅先生所諷刺的一樣：『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結果，使一般具有接近於資產階級意識的新官僚覺悟到沒有新的良好政治做基礎，單靠皮相的軍事建設還是不足恃的，於是戊戌改革的軒然大波就此展開了。

先是，一八八八年上海已有廣學會的設立，以啓發中國文化，輸入泰西科學及圖謀中國之自強爲目的，這是中國科學文化的最早的啓蒙運動。其次是新官僚的強學會的組織，其主要分子爲文廷式、孫家鼐、張之洞等。一八九五年又有桂學會的組織，這是甲午戰爭失敗時出現的，其首創者爲康有爲及其弟子梁啓超等，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以改革政治爲目的，後來就成爲戊戌政變的策動力。這些

革新的小組織，經過報紙積極鼓吹革新運動，在全國發生極大的影響，引起各地紛紛組織各種改革團體，如桂林的聖學會，長沙的湘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集會學會與格致學會，陝西的陝學會，武昌的質學會，以及算學會，農務會，天足會，禁烟會等，都標榜着革新思想，與強學會相唱和。而桂學會就儼然成爲當時國內改革運動的中樞領導組織，其政治綱領亦隨之而日益具體化，及後遂有保國會的組織，其領袖亦爲康梁，戊戌變法運動就是在此組織之下開展起來的。

### 第三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及其評價

康有爲原名祖詒，是當時比較帶有資產階級意識的知識分子與官僚的代表，他和梁啓超、譚嗣同等既已有了相當力量的結合，復受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深感中國再不實行政治改革，實不足以救亡圖強。然而他們由於自己階級地位的局限性，又不願而且不敢採用澈底的革命方法，而只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法實行從上而下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富強起來。所以這些新官僚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並不是去發動與組織群眾，領導人民革命去推翻舊的統治。他們只想說服統治階級，找尋一個開明的皇帝，經過開明的皇帝來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來改造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基於這樣的一個立場，康有爲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就已開始提倡變法，他第一次以諸生伏闕上書批評中國的現狀，並提出補救的辦法。他在奏摺中反覆說明列強分割中國的危險，主張和日本維新一樣實行變法，並要求政府能够容納民衆意見，這個奏摺竟格不得上。至一八九五年康有爲又起草奏書，痛論改革救亡，集公車一千三百人簽名上書請變法，這就是所謂「公車上書」事件。當時康梁提出的主張，主要的是：一、扶助農業（務農）；二、發展手工業（勤工）；三、振興商業（惠商）；



四、賑濟貧民（恤窮）。具體的辦法就是：扶植商業組織，以抵抗外商的壓迫；取消釐金，興辦重工業，獎勵殖邊運動，建築國營鐵路，普及國民教育，改良科舉制度，取消買賣官爵，訓練新式官吏，注意人民健康與衛生）改良刑罰監獄，建造軍用鐵道與軍艦，給兵士以現代軍事教育等。這些主張都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綱，都是自由資產階級改革的主張。當時這些新官僚與知識分子認識了如果中國不急速進行變法，便將走上滅亡的道路，他們企圖以這種主張，來說服光緒皇帝。

康有為的七次上書都爲堂官所阻，不得上。然最後的一次奏書（陳膠州事件者）在京師已鈔傳殆遍，給事中高燾曾協辦大學士翁同龢等獨抗疏荐之。於是康梁這些維新的提議才得到了年輕的光緒皇帝的同意與接受。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年）四月，德宗（即光緒）乃下詔國中，斥責守舊派的空言誤國，主張變法。詔下，德宗又召見有爲，深以廷臣守舊阻碍變法爲憂。有爲主張不必廢官爵，讓他們尸位素餐，而將行政責任委諸有革新思想的小官吏。於是德宗任用新黨的人，一時如梁啓超、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都各賞以卿銜。當時贊成變法的有禮部尚書李端棻，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庶吉士熊希齡等。自四月至七月間德宗督責京外大臣實行新政的詔諭，凡數十下。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荐經濟特科人才，開辦京師大學堂及各種學堂，興辦銀行，設立鐵路礦務等局，廢祀典不載之寺廟，裁老弱無用之額兵等，所有這些，都是變法的具體政綱。

可是當德宗實行變法時，清廷守舊派的反動亦就隨之而起。他們忌妒新黨的得勢，唯恐自己的地位爲新黨取而代之，特別是滿族大臣恨新黨刺骨，而慈禧太后正是舊黨所擁護利用來壓服德宗與新黨的。所以當時朝廷儼然分爲兩黨：新黨以德宗爲中心，時人稱爲帝黨；舊黨以慈禧太后爲背景，時人稱

爲后黨。兩黨鬭爭甚烈，而滿清整個統治實際上都掌握在封建地主、貴族、官僚手中，因之光緒皇帝的這些變法主張的命令始終沒有實行。這時德宗明知舊黨勢力太大，兼有母后做舊黨的後援，自己又手無寸柄，因與有爲密謀。譚嗣同建議利用袁世凱，奪榮祿兵柄。譚嗣同並親見袁世凱加以鼓勵，使他殺榮祿並派兵圍頤和園以除慈禧太后。（註四）因爲世凱原來亦是表同情於變法的人，故德宗深信不疑，詔見世凱，特賞侍郎，責成專辦練兵。不料袁世凱同情民主原是假的，回天津後竟將新黨密謀告知榮祿。榮祿一面檄調聶士成軍駐天津，董福祥軍駐北京彰儀門，一面急馳入京告變。於是慈禧太后經過袁世凱對於維新黨的出賣，下詔幽禁德宗於北海之瀛台，捕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有爲之弟廣仁，殺之。時人稱爲六君子。康有爲、梁啓超則在禍變發生之前，已得德宗密詔逃走。於是反動勢力大張，凡以前附和及贊助新黨的官吏都或革或囚或流，如張蔭桓、徐致靖之下獄，李端棻之遣戍新疆，陳寶箴之革職。取消一切新政，恢復一切舊制。在反動勢力的鎮壓下，戊戌政變就只經過一百天而完全失敗了，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百日維新』。當譚嗣同被捕殺前，尙留下悲壯激昂的說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開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與他那『衝決網羅』的勇敢精神，完全是相符合的。

戊戌改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就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廣大的群眾鬭爭做基礎。當時雖然新官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贊助改革，可是人數很少，力量不大。整個滿清統治則掌握在反動勢力

（註四）譚嗣同見袁經過及對話，載在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見中國近百年史料初集四九三至五

手中，他們極力反對變法；康梁等所依靠的光緒皇帝既沒有掌握實權，稍爲有點兵力的袁世凱又是一個賣友的好雄，這樣當然經不起反動勢力的鎮壓。至於當時下層群眾的力量，又是這些維新派所看不見的，同時也是他們所害怕的。他們只祈望經過上層的統治來進行改革，至於如何去領導當時發展着的農民鬪爭，依靠群眾力量來實施改革，那更是康梁等所夢想不到的。當然，當時六君子慷慨就義英勇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不過他們的犧牲流血是離開群眾的，他們的赤血沒有和群眾聯結起來，這個沒有群眾力量做基礎的改革，只有走向失敗。

戊戌政變的失敗，證明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自上而下來改造中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非常狹窄的。戊戌政變的失敗，就是中國改良主義第一次嘗試的破產。同時也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取得勝利，辛亥革命就是戊戌政變的改良主義的否定。

如果以日本的明治維新來和戊戌變法相比較，那末後者所以失敗，前者所以成功，乃在於：第一，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够獲得成功，是因爲當時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依其歷史的條件，不像中國那樣的對於大工業商品的頑抗，是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已經較爲成熟，商品經濟已較普遍化，作爲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階梯的工廠手工業已經發展，在封建諸侯中產生了代表資本主義發展分子，依靠他們的力量，使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第二，在國際環境上說，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情形也不同，明治維新時，歐美資本主義還處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對於日本的染指還僅限於獲得在日本貿易的自由；同時，當時列強又爲俄國與英法土爲爭巴爾幹半島霸權的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四——一八五六）與美國南北戰爭（一八五六——一八六五年）所牽制，不能集中力量向日本侵略，使日本統治階級得乘機進行順利的改革。而且日本還從事侵略鄰近的弱小國家，表現了自己的實力，乘這

種威勢來脫出了由先進資本主義諸國所加與的壓迫。第三，日本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日本順利進行明治維新的一個附屬原因，日本是處於由西方至遠東航路的終點，也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後目標；當時列強正忙於侵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對於狹小貧寒的日本之侵略自然較爲放鬆，因而對於日本的維新也就沒有給予很大的阻碍。當然日本的這些有利條件，顯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因而戊戌政變也就不能如明治維新一樣獲得成功，而必然遭受失敗。

有人將戊戌政變比之於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這是因爲俄國十二月黨的政變是宮庭政變，而康梁的變法也正是如此。那時俄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農奴制度尚未取消。俄國當時一些留學生與急進軍官主張實行改革，組織十二月黨，企圖解放農奴，取消專制，結果是失敗了。康梁之主張變法與失敗原因也正與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相彷彿。宮庭政變失敗時，十二月黨分子的英勇犧牲也正如六君子的就義一樣。同時這兩種事變的失敗都說明：如果單單依靠幾個先進的英勇戰士來實施改革，那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但俄國與中國的政治社會條件究竟是不同的，因此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與戊戌政變也各有其特點。

誠然，戊戌政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上，也自有其進步的意義，這就是戊戌政變曾大大地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新覺醒，在客觀上幫助了革命運動的發展。雖則戊戌代表人物如康有爲等日益墮落到墳墓中去，但六君子的熱血却無論如何不是白流的。

#### 第四節 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特質

從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以來，國內便斷續發生了許多次的民族自衛自救運動，如鴉片戰爭後廣

東平英國的反英運動及太平天國時期上海乙首黨與外國強盜的英勇抗戰，便都是南方貧民與農民反抗外寇侵略之最原始的表现。戊戌政變前後，廣大的農民鬪爭在黃河流域，特別是山東、山西、直隸等省普遍的開展起來，農民的鬪爭騷動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以後的義和團運動。這是北方農民、貧民自發的反帝鬪爭，它表现了北方被壓迫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痛憤，曝露了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的真相。

戊戌政變後，滿清政府更加腐敗昏黯，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亦更厲害起來。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〇年即義和團起事之前夜，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所開的商埠已達五十一處之多。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帝國主義商品輸入由五千一百萬兩增加到二萬六千四百萬餘兩；由出超二百萬餘兩倒轉來至入超六千九百萬餘兩，於是中國現銀幾全爲帝國主義所刮去，以致中國的金融完全破產。而且此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進到更高的形式，已經由爭奪市場收刮原料更進而向中國移殖資本。這裡最明顯的表现，便是搶奪鐵路建築權，以造成各國的勢力範圍，因爲鐵路對於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帝國主義支配了中國的鐵路，便以鐵路爲支配鐵路沿線一帶的政治經濟之中心。其他工業方面，當時帝國主義亦已開始在中國設辦，比如僅紡織一業，英國有怡和（設立於一八九五年），老公茂（設立年同上）；德國有瑞寶（即後英之東方，一八九五年設立）；日本有上海紡織有限公司第一廠（一八九六年設立），第二廠和第三廠（均設立於一八九六年）。這些紡織工廠當時規模雖還不甚宏大，然比起中國當時民族工業（如恒豐、三新等），始終是佔優勢。在礦業方面，帝國主義的勢力也是非常大的，許多重要礦山採辦權都歸他們掌握。在財政經濟方面，那時帝國主義者完全是獨霸形式，這正如列寧在論帝國主義一書所說：「金融資本已經真正把它

的金融網擴布到全世界了，在此場合，設置在殖民地的銀行及其支店，演着極重大的任務。那時中國的舊錢號已漸破產，新式銀行尙未有一家成立，而帝國主義銀行則已有麥加利（一八五三年設立）、匯豐（一八六五年設立）、有利（一八七五年創辦）、東方匯理（一八七五年設立）、橫濱、正金（一八八〇年設立）與台灣（一八九五年）等，對於國外的一切通商匯兌，固然完全由這些銀行包辦，即國內一切金融，尤其是商埠所在地，亦幾完全受他們的操縱。他們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又對滿清政府實行政治借款，從中取得重利。我們只看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四年之間，外國帝國主義者直接對滿清政府借款就有下列數目：

借款類別	起債期	債額	年利
匯豐銀借款	一八九四年	一、六三五、〇〇〇鎊	七分
匯豐金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麥加利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瑞記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俄法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鎊	四分
英德第一借款	一八九六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五分
英德第二借款	一八九八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分五厘

以上借款合計起來，爲四千九百四十五萬五千鎊，以每鎊值華幣十元計，則爲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五萬元，利息又從四分到七分，超過尋常利息二三倍，這種巨大借款與前面所說貿易入超及當時大批賠款，直接間接都要歸中國農民手工業小商人負擔，其中極大部分特別要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全國尤

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成正比發展。加以帝國主義又在中國取得許多政治特權，帝國主義更用領事裁判權等各種不平等條約，加緊壓迫蹂躪中國。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亦非常可怕，傳教已成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重要武器，我們只要看一看德國帝國主義者利用傳教侵略中國的一點事實就可明白：

『先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對於加特力教徒盡剝奪其政治上之權力，凡不服從政府命令者，皆嚴重處分之，因此當時教徒多逃往他國。後來有加特力教安察爾和富治南特美士於一八七九年至山東傳教，不久安察爾竟在山東南部取得牧師長，甚有勢力。適其時值德國探險家維斯曼烏爾夫之徒，稱揚傳教事業，於取得殖民地大有作用。俾斯麥聞之，於是即回復加特力教之權力適安察爾歸柏林，他又接見安察爾，厚加禮貌，與之約束，並說德國今後對於傳教事業，當加以熱心保護。結果因安察爾，德國竟取得青島膠州灣以及山東一切特權。』（註五）其實不獨德國爲然，其他英法意等帝國主義者無一不如此，我們現在另外引一個描寫法國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記載來看看：

『犧牲者的血是法國在中國侵略的種子。法國用教會和本地的教徒作挑撥的代理人，遭禍和犧牲是其政治上的收穫。英國商業的優勢之對於英國，猶之天主教徒的保護權對於法國一樣，因此他們地位的影響，對於中國人差不多相等。但是法國從宗教的材料較英國從商業的材料所得利益更多十倍。在法國政府羽翼之下，天主教已經成爲無上的威權。不顧本地的法律和習慣，宰制

異教鄰舍，超越所在國的法權，無論何時，教徒與非教徒有爭論，不管爭論的是非如何，牧師就立刻爲之袒護。牧師如果不能恐嚇地方官，強迫給權利與教徒時，他即自己作當事人，控告於法國領事。如此無法無天，是非的真意完全顛倒了。在列強方面，這樣的干預自必跟着而來，天主教徒由此亦更加橫蠻而腐敗。當法國教會官廳可以壓迫人民時，本地的教徒亦更變本加厲的恐嚇。

。『(註六)

義和團事變之前，各帝國主義利用傳教以宰割中國之事特別盛行，當時自西江、揚子江流域以至於山東、直隸、東三省各地差不多無日不發生教案。同時，滿清政府又正厲行反動政策，拼命媚外國結外人之歡心，以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佈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逼成義和團事件。

由此可知，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從中國割去一塊肥肉，以擴大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用武力鎮服中國的反帝鬭爭，以遂其自由侵略之願，而鞏固於帝國主義的暴力前的滿清政府又沒有能力反抗列強的侵略。正因爲如此，中國飽受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的人民才燃起仇恨帝國主義的憤火。造成這種憤火的根源，就是帝國主義的偵探——牧師Hawthorn自己也就覺得沒有方法可掩飾，他在對義和團暴動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書中說：

『許多「文明」人逐漸地進攻中國內地，中國的無數受禍者自己不明白受災害的原因，好像

(註六) 見英國牧師Hawthorn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書所引A. B. Colquhoun所著*Overl and t*

*China*一書中批評天主教的一段。



日本農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岸沉落所起的潮水之淹沒一樣。可是有許多人很知道在外國商業未進來擾亂舊秩序以前，在普通的年歲裡是能够吃够穿的。現在各方面都缺乏，覺得前途一天天地可怕，像這樣的經驗，在活動的方面，能怪中國人對新秩序（帝國主義侵略）感覺很深的，不滿意麼？

「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的大部分，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此處不能詳說。人們讀了輪船公司的廣告，棉紗貨商業在中國怎樣興盛，此種商業從廣東到牛莊，將來極可樂觀……但是沒有一人能讀到此種商業的發展，實大影響於中國生產棉花地面上之無數萬人民。這些人民以前靠着紡織十五寸寬的布來謀極低度的生活，一尺布須費兩天勞力，在市場上把布賣去，買進能够一家最低度的生活需要品，餘則再買些棉花來繼續紡織。但是現在呢？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了它的市場，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如此。……費力的紡紗工作沒有利益了，又沒有別的生產來代替它。」

Heaslip 先生這樣描寫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之後，使中國廣大農民手工業群衆窮困悲慘的情形，自然還是掛一漏萬的，實際的情形必然比他所描寫的還要可怕幾千百倍。特別是北方數省廣大農民及已失地失業的游民群衆，他們眼看着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霸道，教堂教徒氣焰薰天，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政府因仿辦洋槍洋砲而增加租稅，覺得自己的生活一天艱難一天，失業的一天天多起來，災荒一天天厲害起來（義和團事變之前，北方數省有很嚴重的災荒），而政府却無一點方法補救。所有這些情形，便是造成他們極深刻的憤火的來源，便是造成義和團運動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的憤懣過於深刻，而且又是農民之原始暴動，所以事變情

勢非常嚴重。據說當山東、直隸各處農民投入義和團及天津、直隸附近的義和團進北京之時，簡直瘋狂的一樣，人數非常廣大。據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派來鎮壓暴動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他那本拳亂筆記中說：「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註七）

義和團是由義和拳得名的。義和拳一名梅花拳，金鐘罩，始於清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與白蓮教的遺黨有關係，在它的歷史上就帶有反抗外族壓迫之特性。最初它的口號是「反清復明」，清政府亦下令嚴禁，犯者處死刑，然民間私相傳授拳術仍繼續不絕。光緒間，義和拳彌漫於山東之清平、館陶、冠縣等地。甲午戰後，一方面因為中國備受壓迫，同時復因他們在山東鬧過幾次教案，便更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這種「滅洋」的主張博得了廣大民衆的同情，於是愈集愈衆，寢寢成爲一勢不可遏的反帝運動。義和團爲什麼拋棄他那「反清復明」的本來面目，一變而爲「扶清滅洋」的運動呢？爲什麼本來反對滿清的義和團反而與滿清政府結合起來呢？這裡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到了義和團運動時代，已經變了一個局面，最高統治者已經不是滿清政府，而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由於中國民族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便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當時，農民群衆最迫切的要求是反抗那帶痛苦給他們的「洋人」，所以義和團的組成分子雖然和過去白蓮教差不多，大多數是農民群衆，其次是手工業者，失業游民和少數知識分子，但是義和團組成分子的社會性質已經和白蓮教時代不同。這些義和團的群衆已經深深體驗到洋鬼子（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滋味，在他們眼中心中，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該殺的洋鬼子」。所以只要有人說「殺洋鬼子」，「我們可以

（註七）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中譯本一四四頁。

有方法殺洋鬼子」，「我們可以堵住洋鬼子的槍不能開放」，他們聽了，直狂跳起來，什麼都不管了，只一心一意「殺洋人去」！哪裡還管得什麼反清復明和受人利用呢？這就是義和團變反清復明運動爲扶清滅洋運動的根本原因。

同時，因爲那時的中國，已經開始成爲資本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一天天變本加厲，滿清政府已經沒有方法可以抵抗他們。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滿清政府一切對外國帝國主義都節節讓步屈服了，可是外國帝國主義仍對他們要挾備至。滿清政府固然害怕義和團，但是也恨外國人；而且他們覺得如果能够利用他們去反對洋人，便可轉移他們那反清復明的意志。政府中雖然有很多人（如直隸總督榮祿等）反對這種「危險的政策」，但是端莊、毓賢、剛毅、慈禧輩竟利用了義和團。尤其是山東巡撫毓賢因沂州教案被斥，恨洋人刺骨，乃欲利用義和團報復，並貽書朝貴，謂「拳匪皆爲義民，且有神術可用，今國勢日衰，民志不伸，若再殺拳民，不啻自翦其羽翼。」義和團得到滿清政府的同情與援助，聲勢更加大起來，以後居然進京圍攻公使館，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Kluckner）與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

### 第五節 八國聯軍之役與列強的衝突

這樣嚴重的事變，使帝國主義更有所藉口以進攻中國，並且組織了八國聯軍，調動大兵到北京、天津來剿滅他們認爲「破壞文明」的所謂「拳匪」，實際是企圖乘機來瓜分中國。聯軍由英俄德法美意奧日八國所組成，初各國軍艦已雲集大沽海口，凡四十七艘，聯名致書於守將羅榮光，限期交出砲台，榮光拒之，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榮光戰死，大沽陷。英提督西摩爾統各國兵入京，至楊村，被

阻折回。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下詔與各國宣戰，命各省招義和團助戰。聯軍則改由德人瓦德西爲統帥。時榮祿在天津迭次來電報捷，太后信以爲真，其實當時各國援軍已紛集，正在大規模攻擊天津，提督聶士成力戰死，六月十八日天津遂爲聯軍攻陷。天津敗報至京，朝廷紛亂已極。聯軍既據天津，屢得北京使館乞援之信，遂大舉分路進攻，清軍節節敗退，榮祿兵潰自殺，楊村乃失守。聯軍更進據通州，陷之，欽差大臣李秉衡自戕。這時義和團與清軍攻使館雖五十日之久，仍不得下。聯軍遂入京，擊敗甘軍董福祥兵。太后挈帝后狼狽逃出，至山西。復聞聯軍將入晉，復逃至陝西。北京戰局既開，東南各省之總督巡撫，均不與開戰計。山東爲這次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巡撫袁世凱，力主剿匪，部下武衛左軍之在直隸者，都召回本省，任「保護外人，剿討拳匪」之責；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騷，互相協議，各督一致以正式公文通知上海領事團，告以「無論北京成如何形勢，本省內之和平秩序與外國人條約上之權利保護不怠。」領事團欣然承認上述數省爲「中立地」。(一)於是東南各省民衆之以暴動來反抗帝國主義以與北方民衆響應者，終因封建軍閥總督「保護」帝國主義「不怠」，未能成爲一種運動。

聯軍入京，不消說首先是大肆殺掠。例如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承認：「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現在各國互以搶劫之事相推諉，但當時各國皆曾經澈底實行共同搶劫之事實，却始終存在」。(註八)瓦德西又描述各國搶劫的方法，至爲詳盡。中國這次損失最重大的，要算是大宗的文化古物。今日各國大圖書館、博物館都

〔註八〕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五十一頁。

充滿了中國大批的珍貴圖書與儀器，便都是庚子年從中國搶去的贓物。至於平民遭受劫掠的數目，那就更是不可數計了。聯軍不但肆意搶劫，而且姦淫殺戮，無所不爲。例如瓦德西自供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爲數必極重大無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對於此次戰事有罪之人，反受損失極微。又因搶劫所發生強姦婦女之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亦屬不少』。（註九）瓦德西供出了帝國主義軍隊的強盜行爲，說明了自命爲『文明國家』的帝國主義是怎樣對中國肆行殘暴的掠奪蹂躪。此外還有俄國駐北京的財政代表鮑何啓諾夫在一九〇〇年八月致俄國財政總長的電報說：『聯軍炸城之後，便佔據了皇宮，現在差不多沒有事了，但是中國人還非常反對，非常憤恨外兵。因爲軍隊壓迫中國人民，搶劫中立的無辜的民衆，並且搶掠得比拳黨更利害些。其中以日本人爲尤甚，他們自居爲北京的主人翁，分配步哨，佔領國庫，雖是其中的錢不多，而日本人完全收歸己有』。（註十）這就是所謂文明國所演的暴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最爲猙獰，今日日本法西斯軍閥在中國各淪陷區域所行的殘酷的劫掠與屠殺，不是更有甚於庚子年在北京的暴行嗎？這重重的血債是非用血來還不可的。

當聯軍攻入北京時，俄國帝國主義便乘機擴大了它在滿洲的侵略。一九〇〇年七月間海蘭泡俄兵假道齊齊哈爾至哈爾濱保護鐵路，黑龍江將軍壽山拒之，俄兵遂與琿瑯副都統鳳翔開戰，鳳翔陣亡。八月俄軍佔大北嶺，旋攻陷齊齊哈爾，壽山自殺。後來長春、遼陽都先後爲俄軍攻破，東三省遂全爲

（註九）同書五十五頁。

（註十）見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所引證。

俄軍佔領，俄帝國主義以十八萬重兵鎮之，更想進據關內外鐵道，衝入北京。這自然引起了其他帝國主義的畏忌，聯軍在英德勾結的局面之下，急派重兵據山海關，爲的是要遏止俄軍南下。英國自來就是與俄國勢不兩立的，至是兩國的衝突更尖銳化起來，幾至火拼。瓦德西對於這一點曾有很明晰的曝露：「余之行動，頗爲英俄兩國因互爭直隸勢力範圍而生之極端齟齬情形所厄。該兩國軍隊之緊張程度業已達到彼此相見以兵之可能」。(註十一)又說：「英俄兩國之衝突，已達極盛之點。兩國方面，尤其是英國，各皆增派軍隊赴津。英國艦隊已由揚子江口，駛往大沽」。(註十二)很顯然的，英俄是爲了分贖而起衝突。當時英國欲在中國取得更多的利益，劃定更大的勢力範圍，而俄國欲由東三省之佔取進而衝入關內以干涉分割英國之勢力及利益，這是英俄衝突的主要契機。德國在三角的對立關係中，雖與英德結成聯合戰線以抗俄，然英國之間亦有衝突，不能完全協調。瓦德西自己曾說：「現在余與俄國幸而脫離，但對於英國，一定還有許多難題在後」。可見帝國主義只能彼此利用，而絕不能誠意的合作。實際上，德國的策謀是要引起英俄兩國的衝突，好從中取利，所以在鐵路方面極力挑起英俄的仇視。不僅英俄因爭奪在華利益衝突甚烈，而且英法俄日以及美日與德國的衝突也都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以後日益尖銳化。瓦德西說：「英人與法人之間，亦不相和。」蓋英法在非洲的衝突至是已展開而爲分割中國的鬭爭。此外，日本看見俄國着着奪取滿洲，極其不安，因派大兵前赴朝鮮，這是俄國所引爲患的。例如俄國皇子恩加里切夫在對瓦德西的談話中，就對日本此舉表示不能容忍，

(註十一) 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一六九頁。

(註十二) 同書六五頁。

這就預伏了日後日俄戰爭的張本。至於美國則仍高唱門戶開放主義，一九〇〇年七月美國國務卿海伊（Hay）在致列國的通牒中，仍斤斤以此爲詞，要求「保護國際上及條約上給與各國的利益，防護在中國全土的貿易平等原則」。但美國當時已佔有菲列濱，而計劃向中國海面擴張特別勢力以與英法日諸國抗爭了。

當聯軍攻入北京時，事實上成立了一臨時的軍事獨裁政府，北京、天津已完全置於帝國主義的直轄統治之下，這個統治是建築在中國民衆的鮮血與骷髏之上的。起初帝國主義是想在一攻下北京之後，即直接瓜分中國的。而且德英就主張瓜分最烈，試看下引瓦德西供詞，即不難窺見其中消息：「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財政之衰竭，政象之紛亂而論，實爲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現在所欲問者，只是各國對此問題究取何種態度？俄國方面，因佔滿洲之故，在最近期間，當可心滿意足。假如現在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英國取得長江流域一部分，德國佔據山東，則中國方面實無力加以阻止。因此我們對此問題，必須十分注意，倘一旦列強對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協之望。」（註十三）又說：「甚望能將該省（指山東）大部分均置諸自己勢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國時我們應得之部分。」可是這種瓜分，在當時總算沒有實現，這就是因爲帝國主義列強相互衝突，關於這點又是瓦德西給了我們以確切的報告：「但余對於此事（即指瓜分中國之事——崗註），却認爲絕對不能實現。英國極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之據有山東，亦認爲危險萬分。各國方面對於英人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方面，更

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方面若能聽其獨佔滿洲，毫不加以阻撓，則該國對於他國之實行瓜分中國，當可袖手旁觀；蓋彼固深信，各國對於此事，彼此間必將發生無限糾葛故也。」（註十四）各帝國主義都爲了自己的利害打算，而不願別國在中國妨礙自己的利益與發展。美國之所以反對瓜分，亦就是因爲自己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不能從英法俄日德諸國的口裡嘔出一塊來分給它，在地理上它又距離中人最遠，不利與他國相較；反不如實行門戶開放，它有較多染指的機會，所以它不願意中國被瓜分。此外，當時各國革命政黨與進步報紙的斥責反對，亦是列強沒有實行瓜分中國的有力因素。

### 第六節 辛丑條約與拳亂事件之評價

慈禧及德宗等既抵宣化，乃下了一個罪己詔。後再到山西大同府，命慶親王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一切事宜，旋抵西安。聯軍代表力主先懲辦主持亂黨之人，然後開和議。德使亦稱德皇訓令，非交出四兇，不准停戰。所謂四兇，即指端王載漪、董福祥、莊親王載勛及剛毅。至是諭將載勛等革去爵職，剛毅、趙舒翹等交都察院吏部議處。優卹被殺德國公使克德林、日本書記官杉山彬。閏八月清帝再授奕劻爲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和議，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各國對於議和的態度主張不一，如俄國主張使臣既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亦贊成之；英德法奧則表示反對。這是因爲俄國已佔領滿洲，知各國不許其更進，不如先議和撤兵，既可阻各國之分割中國本部，又可減列強對於滿



洲佔領干涉之威脅。美國橫豎因為沒有勢力範圍、利益範圍之可言，和後反可恢復市場通商，瓜分中國對於美國是無利益可言的。英國是要干涉俄國之侵滿，並堅持取得長江流域，極力阻和議之進行；德國藉口公使被殺，欲奪取山東，並利用統帥的地位繼續進攻，取得更多的利益；法國亦欲伸展其勢力於北方，利於戰事擴大。如此，列強之間齟齬衝突，即無法再協同動作，而且義和團暴動已經被它們撲滅，滿清政府已表示低頭屈服，所以就在一九〇一年議和，訂立辛丑條約。從此，北方的國防，如大沽砲台等完全撤廢；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駐紮帝國主義的駐防軍；北京使館界變成了外國領土，東交民巷變成了中國太上政府的堡壘；英國取得海關監督權，中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即所謂庚子賠款。

悲壯熱烈的義和團暴動，結果是被葬送於血海中了！這一次事件，決不是什麼少數無知「拳匪」的胡鬧，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然他們被滿清政府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潰的一個伏流的波浪。後來一般中國社會，附和帝國主義「二毛子」「三毛子」的反宣傳，把義和團事件看成是「野蠻的排外」，自然是很大的錯誤。其實真正野蠻的倒不是義和團，而是帝國主義者自己。世界革命的偉大導師——列寧，當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發生時，曾在火星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之戰爭，充分暴露了沙皇及其他帝國主義的陰險。他說：

「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麼反抗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人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從何產生？主戰者（帝國主義者）倡言黃種仇恨白種，中國人嫉視歐洲文明。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惡歐人，可是究竟爲什麼要嫉惡歐洲人，中國人所嫉惡的又是哪一種歐洲人呢？中國人並不仇恨歐洲人民，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中國人所仇恨的乃是歐洲的（當時還應加上：日本

的——崗註）資本家和代表歐洲資本家的政府（當時日本政府也在內——崗註），他們矜誇西方的「文明」，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竊盜虐待此等貪慾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豈有不使中國人嫉惡的嗎？他們對中國開戰乃為掠奪權利，為要自由販賣鴉片權，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用基督教的面具藉以達到盜竊政策之實，這樣豈有不使中國人嫉惡的嗎？此種盜竊政策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固早已實行於中國，而今又有俄皇專制政府參加其中。他們不過沒有公開瓜分，而像暗中的偷兒一樣，他們搶掠中國好像偷兒竊屍體，但是如果這個假屍起來抗拒的時候，則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把樹林也燒了，屠殺沒有武裝的人民，同時却大聲疾呼去制服野蠻的中國人。

『中國的民衆所受到的痛苦是和俄國民衆所受到的痛苦一樣的。他們從亞細亞的專制政府一直到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作的罪惡感受到痛苦，這種專制政府是從飢餓的農民榨取租稅，以武力鎮壓一切自由解放的運動。』

列寧在這篇評論裡，把帝國主義侵略及分割中國的陰謀與罪惡以及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都給了很深刻的分析。列寧的論斷完全符合事實，當時各國帝國主義派來剿滅拳亂的八國聯軍，簡直在北京、天津大肆搶掠，這種搶掠的情形，甚至就是聯軍統帥瓦德西也無法加以否認，上節已經引證了一些，為使讀者留一更深刻的印象起見，現在再補引一段如下：

『從大沽至天津之間，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種不可描寫之荒蕪破碎，據我在津沽路上所見，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頹垣廢址，塘沽係五萬居民之地，已無華人足跡，從此地到北京之一段，我的參謀長 *Schwarz* 少將，曾兩次經過其地，據他報告，凡軍隊行經之地，但見其一片淒涼荒廢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燒搶之劫而大受破壞，失所流離之民，據估計約有三十萬人，但

實際上似或多於此數，散居於該段旁邊，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在現刻天氣良好之際（瓦德西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是九月二十九日——崗註），或者可苟延幾時，至於飢荒疫病之必先後繼至，實已毫無疑義。我相信此種無居無食之災民，必將使附近居戶，咸陷恐遭搶掠之不安狀態，或者此項災民竟自投身拳黨，我因此之故，遂以為如此行軍，則只能多多製造拳黨，且其製造之數，當遠較戰前剿殺之數為多也。」（註十五）

帝國主義強盜自己「製造拳黨」，同時又當他「匪徒」剿殺，這就是帝國主義口中的「文明」，同時也就是義和團事件的真相。有人說，假使這些「匪徒」不這樣胡鬧，八國聯軍既不會來，辛丑條約也不會訂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義和團是少數無知愚民做的事，外國人不應該將這種責任和罪名歸到全中國人身上，使全國人負擔這樣鉅大的賠款。這種意見完全是受了帝國主義宣傳而且是不顧事實的謬論，他們簡直連帝國主義創子手瓦德西都不如，因為連瓦德西都不敢否認「拳黨」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義和團事件，實際上就是當時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這種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自然，義和團運動本身包含着很多的錯誤和缺點，他們得不到別的進步階級做領導，於是就不可避免的被封建社會的迷信神權所支配。他們拒絕一切洋貨，拒絕並且反對一切科學文化，他們主張「國粹」，相信五行符咒；他們迷信拳術符咒可以抵抗鎗砲，他們盲目服從所謂「大師兄」「二師兄」，他們被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想所蒙蔽，結果竟被封建貴族所利用。然而無論如何，義和團運動究竟是一種群眾的運動，「凡屬群眾的運動，起初必然是混沌的，因為它總

（註十五）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二八至二九頁。

搖擺於許多矛盾之間，群眾思想往往是缺乏明顯性和凝結性的。」（恩格斯）義和團運動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而且是失業群眾的暴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還沒有一個先進的有組織有力量的階級做領導，因此不能不歸於失敗。義和團這一原始的農民暴動，雖然有他本身的弱點，雖然他被滿清政府所利用，打着「扶清滅洋」的尊皇口號，不免有保護舊制度的反動意味，雖然被國際帝國主義強盜——八國聯軍血葬了，可是仍不失為現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悲壯的一頁。

## 第六章 辛亥革命

### 第一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鬥爭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既獲得了許多特權，取得了對華投資的保障，便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在中國方面，可以說是已爲國際帝國主義者所征服，自辛丑條約締結之後，從前輕視外人的心理，而今已一變而爲畏懼外人的感覺了。因爲在聯軍入京以後，他們對於義和團的報復，固然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其是在辛丑條約裡面，直把中國束縛得周全緊密，絕不容有所迴旋。首都要地絕無屏障，則外國權力可以操縱自如；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則中國財政將長久受其桎梏。而且迫令清廷，曉諭全國各地，嚴禁一切「排外」事項，如果地方官奉行不力，卽革職永不敘用，更足使一般人爲之寒心，不肖者轉而媚外，相習成風，這就使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得以大膽進行。至於侵略方式，則前面業已說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之一就是輸出資本。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列強便更積極向中國投資。除了政治上的投資外，便是帝國主義者直接在中國設立工廠，並經過各種方式，奪取了中國各地重要的煤礦鐵礦，使之在外資支配之下（如英得開平煤礦，日得撫順煤礦，鞍山鐵礦等），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國建築鐵路。這是爲了控制每一勢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爲了便利於帝國主義輸入商品，輸出原料，運輸軍隊以鎮壓中國的反帝運動所必需的。

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築鐵路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帝國主義用自己的資本開辦，直接投資經營的，如

中東、膠濟、滇越鐵路等；另一種就是名義上由中國借外債建築，實際上權力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的，如滬杭甬、京漢、京奉鐵路等。中國借款建築鐵路的條件簡直是駭人聽聞的剝削，外國資本家根據鐵路條約，不僅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爲少。通常如借一萬元，實收僅九千元，但利息不按九千元計算，却按一萬元計算，借款當然要擔保的。此外建築鐵路的資本團還可取得代購建築鐵路材料的一切權利。這樣，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息，而且在購買材料中，又可以賺到不少的錢。同時，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仍落在外人手裡。雖然中國政府可以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切重要職權大部分都操縱在外國人手裡。此外還有更特別的，就是當中國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歸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路的財產來抵賬。僅僅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了付債的方法，用關稅的收入來擔保債款的付還。上述這種建築鐵路的國外借款，到辛亥革命時爲止，約達十五萬萬元。其中有許多鐵路借款移作他用，使鐵路沒有建築起來，這些負擔都加在中國民衆身上。

帝國主義不但經過鐵路來侵略中國，同時又依靠河道來發展航業，建立許多輪船公司，如英之怡和、太古，日本之日清、大連等。

至於辛丑條約後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開設的銀行，則更如雨後春筍。這樣，帝國主義就經過其資本雄厚的銀行來壟斷中國經濟命脈，因爲無論軍事的、政治的或實業的借款，帝國主義者都經過它們自己的銀行。並且組織銀行團，以聯合的金融勢力，來束縛中國的財政，進一步監督中國財政。

所有這些，都說明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者怎樣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然而

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爲爭奪中國而鬭爭，在辛丑條約後也不但沒有減輕，而且更趨於尖銳，蘇聯共產黨（波）歷史簡要讀本對於這一點有很精闢的分析，茲引一段如下：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帝國主義國家即開始加緊爲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權，爲瓜分中國而鬭爭。沙皇俄國也參加了這個鬭爭。在一九〇〇年，沙皇的軍隊聯合日本的、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軍隊，以空前殘暴手段，鎮壓了在中國的人民起義，而這個起義底鋒芒是反對外國人——帝國主義者的。還在這時以前，沙皇政府便強迫中國以遼東半島及旅順口砲台讓給俄國。俄國獲得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的權利，北滿方面的鐵路——中東路建築成功了，並爲保護該鐵路而把俄國軍隊開到北滿去。北滿被沙皇俄國用武力所佔領。沙皇政府底勢力逼近高麗了，俄國資產階級會製定在滿洲成立「黃色俄羅斯」的計劃。沙皇政府在遠東進行侵略中，碰到了另一個強盜——日本；日本這時已很快地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並同樣企圖在亞洲大陸施行侵略，首先是侵佔中國。日本也如沙皇俄國一樣企圖佔有高麗和滿洲，日本在當時就已夢想佔領庫頁島和遠東。英國害怕沙皇俄國在遠東之加強而暗中贊助日本。俄日戰爭逼近了！尋找新市場的大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地主階層推動沙皇政府去進行這個戰爭。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戰，而首先開始了戰爭。日本既在俄國設有良好的偵探機關，所以它知道，在這個戰爭中的敵人將是沒有準備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不經宣戰而忽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砲台，並使駐在旅順口的俄國海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俄日戰爭就是這樣開始了的。」（註一）

（註一）見該書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譯本六四至六五頁。

這裡，爲使讀者對於事變的發展，有更清晰的了解，對於當時滿洲問題與英日同盟及俄日戰爭對中國的影響，還應加以簡明的補充。

當義和團事變初起之時，俄國以保護滿洲鐵路爲口實，即派軍隊進迫滿洲。但爲免除各國疑忌起見，俄皇曾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對外宣言，一俟滿洲秩序恢復，俄國即行撤兵，斷無佔領滿洲之意。其後俄軍次第佔領滿洲全部，乃欲乘機與中國締結特別條約，以期收得滿洲的圓滿利益，然後撤兵一部。一九〇一年二月，倫敦外交界喧傳中俄之間，已有密約成立，其中規定，俄國駐滿軍隊，今後應留一部，且將滿洲門戶封鎖，置於俄國保護之下。此消息傳出後，各國輿論大譁，紛向中俄提出質問；其結果，中國以各國反對爲辭，拒絕批准，俄國以形勢不佳，亦只得聲明廢棄之。是年九月，辛丑條約成立，義和團事件告終。俄國以佔領滿洲，漸次失其口實，更急急於實際利益的取得，於是中俄第二次密約，又喧傳於是年十一月協商妥貼。此約內容，外間所傳各有不同，但其要點則爲：（一）俄國以兩年爲期，撤退滿洲軍隊；（二）今後中國軍隊，須用俄國將校訓練；（三）俄國將牛莊鐵路交還中國，而附以自後該鐵路不得受他國干涉，英日兩國軍隊不得由此鐵路輸送，將來中國若建造此鐵路之支線須先得俄國之同意等等條件。此消息傳出後，各國反對如前，擾攘多日，又以不得批准而罷。

以上中俄兩次密約，雖均未得成立，然而俄國對於滿洲的大慾，則已深予各國以不安，而以英日兩國爲尤甚。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對外發展的目標，首在朝鮮滿洲；一八九五年中日締結馬關條約，日本不僅截斷了中國與朝鮮的宗主關係，並從中國奪去了遼東，日本上下，爲之狂喜，而不料忽有俄國出面干涉退還之事。此中屈辱，日本豈能去懷？而且自從日本退還遼東以後，俄國自身對於滿洲的侵略，更加急進，並有據滿洲以爭朝鮮之勢。如一八九八年的租借旅大，一九〇〇年的進佔滿洲，都



是大刀闊斧的行動，日本於此，當然更難坐視，早準備在外交上與軍事上抵抗俄國，因此急要找一個同盟國以爲己助。而當時與俄國立於對抗地位的是英國，所以在拳亂事件中，日本卽有親英的傾向。在英國方面，則英俄勢力處處衝突，歷數世紀如此，爲人人所共知。現在俄國勢力，在滿洲的過渡膨脹，固與日本大不利，而同時亦足使英國在遠東的局面發生動搖，爲英國所忌；且當時俄國對西藏亦有所活動，更非英國所能容忍。於是一時英日兩國的對俄方針，遂不期然而然的趨於一致，一九〇二年一月乃有英日同盟之成立，結盟約如下：

(一) 兩締約國相互承認中韓之獨立，若因他國侵略行爲或因中韓兩國自起騷擾致妨碍締約國之利益時，兩締約國得執行必要手段；

(二) 兩締約國之一方若與他國交戰時，他一方須嚴守中立，並阻止第三國與敵國同盟；

(三) 若他國與敵國同盟與締約國之一方交戰時，則他一方卽當出兵援助；

(四) 兩締約國無論何方，若不與他一方協議，不得與第三國締結妨碍同盟國利益之條約。

此條約對於中國乃至對於國際，關係均極重要。第一條雖以承認中韓兩國獨立爲名，實則欲將中韓兩國，尤其是中國，置於英日兩國共同控制之下；而將其他各國，特別是俄國，排除於英日兩國利益所在地之外。第二條規定嚴守中立事項，則爲未來之俄日戰爭早作準備；日本於此，不僅確定英不助俄，且可利用英國的海上轄境，以妨碍俄國的海軍活動。第三條規定協同戰鬥事項，亦係爲未來之日俄戰爭預示限制，以防止將來各國或有助俄之事。綜觀全約，同盟關係甚爲密切，此實爲東方國家與西方帝國主義結對華同盟之第一次。同盟締結以後，英國固藉日本之力，得以舒其東顧之憂，而日本所獲得於此同盟者，則其利益尤爲重大。俄國爲抵制英日同盟起見，遂再度與法締約，並將範圍擴

張至遠東方面。

俄國爲緩和英日諸國的壓迫，於一九〇二年三月與清政府結滿洲撤兵條約，規定分三期撤兵：六個月內撤退盛京省至遼河的軍隊，再六個月撤退殘餘盛京省各段及吉林全省軍隊，又六個月撤退黑龍江全省全部軍隊，但中國須極力保證及實行與華俄銀行締結之條約，即是保證俄國在滿洲築路及採鑛、設警諸權。條約簽訂之後，俄國向各國發表了撤兵宣言。同年十月，爲第一期撤兵屆滿之期，俄政府果於前半月間將駐軍開始撤退，遼河以西，悉能如期撤盡。不料至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國之駐在滿洲的第二期應撤軍隊，不僅到期不撤，反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七條。其中要點，約有滿洲土地，中國不租借或割讓與他國；俄國撤兵之區，中國不得開作自由通商港；牛莊一切公務，應歸俄人管理；中國所設滿洲電線，俄國得使用之等項。此要求提出後，列強皆警告中國不得承認，而日本輿論尤爲激昂。俄國亦表示東三省斷不能無條約撤兵，即使因此與日本開戰，亦所不顧。同時俄國對於朝鮮，亦復進行壓迫，朝鮮拒絕俄國租借龍岩浦，則強於其地築砲台以懾之。因是種種，日俄關係乃日趨於惡劣。計自一九〇三年七月起至一九〇四年二月止，日俄之間，迭開談判，均以各執己見，不能求得妥協，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日本開御前會議，決議取自自由行動；五日，對俄斷絕國交；六日，日本艦隊出發攻擊旅順之俄艦，俄日戰爭即由此爆發。

俄日開戰以後，其戰爭所在地，除一部在朝鮮外，大部實在我之滿洲，以常理言，斷難忍受，但以彼時各國皆勸中國嚴守中立，而清廷亦以義和團事件剛了，無力從事戰爭，遂允以滿洲遼河以東爲日俄交戰地。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三日，清政府曾向俄日兩國發表中立宣言，以中國疆土供外國作戰，真是可恥可憐，達於極點了。

自一九〇四年二月俄日戰爭開始，以至一九〇五年五月日本海大海戰時止，歷時凡一年有餘。戰爭結果，俄國海陸俱敗，日本財政亦極困難，遂同時接受是年六月上旬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勸告，雙方停止戰鬪，派遣全權議和於美國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一九〇五年八月，日俄和約成立，全文共十五條。根據這次和約，除俄日同時撤去滿洲軍隊，俄國割讓庫頁島南部，日本在朝鮮確保優勢外，並由俄國將租自中國的旅順、大連以及長春、旅順間的鐵路完全讓渡於日本。於是旅順、大連、南滿鐵路等等，便如此輕易地從俄國移入日本之手。不僅如此，日本於戰勝俄國後，並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派遣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到北京與清政府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更擴張權利於代有俄國利益之外：一方面既強迫東三省開商埠十餘處，以爲日後日本向滿洲大移民的張本；同時又規定滿韓陸路通商之最惠待遇，以取得以俄國之無稅貿易及減稅貿易同等之特權；此外，並得繼續經營安奉鐵路，更貽滿洲以無窮之後患。

上述中日協約成立以後，日本對於南滿洲的侵略，便已有了條約的根據。一九〇六年六月，日本政府設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名義上以經營滿洲鐵路爲業務，實則爲日本侵略南滿洲經濟的大本營。同年八月，日本政府復設立所謂關東都督府，成爲日本以後進攻中國之策動機關。以後又發生撫順炭礦開採問題，間島主權問題，安奉鐵路等問題，因受日本之壓迫，全依日本之要求以解決，舉我國南滿洲之全境，盡歸日本所有，所有礦山，隨與俱盡，其心計之毒，手腕之辣，視沙皇政府蓋尤過之。

當俄日爭奪朝鮮、滿洲時，俄英亦在西藏競爭甚烈。俄日開戰，英軍乘機由印度侵入西藏，藏兵遠遁，英國遂進據拉薩。同年八月間西藏副王班禪額爾德尼與英人締結英藏媾和條約，於是西藏完全劃爲英國的勢力範圍。

第二節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辛亥革命前立憲與革命之爭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建築鐵路與開辦各種企業的結果，客觀上刺激了中國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資於工業，中國資本主義就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下面的統計可以作為一個實例：

紡織工業情形

廠名	地點	開設年代	資本額
申新第二廠	上海	一九〇七年	一〇〇（單位萬元）
大生二廠	崇明	一九〇七年	一二〇（單位萬元）
振新	無錫	一九〇六年	一〇〇（單位萬元）
大昌	太倉	一九〇六年	—
利用	江陰	一九〇五年	七二（單位萬元）
廣益	河南	一九〇九年	一五〇（單位萬元）
和豐第一廠	寧波	一九〇七年	九〇（單位萬元）
和豐第二廠	寧波	一九〇七年	六〇（單位萬元）
麵粉工業也有微弱的發展			
廠名	地點	開設年代	資本額
立大	上海	一九〇六年	二〇（單位萬元）
中大	上海	一九〇七年	二〇（單位萬元）

裕豐	上海	一九〇五年	二〇〇(單位萬兩)
大豐	清江浦	一九〇六年	一〇〇(單位萬元)
海豐	海州	一九〇五年	
裕隆	漢口	一九〇九年	
漢隆	漢口	一九〇六年	

其他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建立。如山東之中興煤礦公司開設於一九〇五年，資本八十萬兩；漢冶萍公司開設於一九〇八年，資本二千萬兩；揚子機器公司開辦於一九〇七年；雲南之錫務公司開辦於一九〇八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開辦於一九〇六年等。可見辛丑條約後，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已有一些發展，雖然這一發展還很脆弱。

然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就受到帝國主義的阻礙。這是因爲：第一，中國主要的經濟樞紐與生產條件爲帝國主義所操縱了，例如中國的關稅爲列強所掌握，祇是保護外國貿易在中國市場的繁興。中國的產業與商業反而受到國內的厘金的束縛，其他如外國商品在內地的免稅、內河航行權、鐵路建築權、採礦、伐林權之爲外國資本攫奪，都是有利於國際資本主義的；第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巨大生產力所生產的商品足以征服中國的市場，中國小規模的機械生產是不能與此等大的機械生產抗衡的；第三，外國資本家藉着不平等條約所賦與的一切特權在中國各地所作的鉅大投資，可以利用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與廉價的原料獲取高利潤，同時可以和它們本國的資本團與企業取得密切的聯絡，這是足以壓倒中國土著的資本的；第四，外國資本團可以假手於它的代理者——買辦與封建勢力佔奪中國的市場與原料，而縊殺中國土著的資本主義之發展。這樣，外國帝國主義在這一時期中不

僅取得了在中國各種特權，而且已經操縱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控制着中國整個的經濟，就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的獨立的向前發展。同時滿清的封建統治及其對於帝國主義的屈服，實際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絞殺中國幼稚的工業。這就說明當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已經發生衝突，生產力要向前發展，就非打破舊有的生產關係不可。這一衝突反映到政治鬭爭上來就是：帝國主義，滿清政府封建勢力極力要求現狀的維持，舊有生產關係的保證，以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工人、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新興知識分子，一部分新官僚、農民、手工業者則要求打破現狀，打破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舊有生產關係，也就是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這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發展，結果就引起了辛亥革命。

當時滿清政府完全成爲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工具，滿清政府擔負着巨大的外債和賠款，同時又須供給官僚機關的揮霍；這樣，滿清政府就不能不殘酷的榨取民衆以償付外債和賠款。實際上，滿清政府就成爲帝國主義在華的稅收機關了。滿清政府對於廣大民衆之無饜的榨取，使中國民衆的生活更形惡化，群衆的反抗也就不斷爆發。辛亥革命以前，群衆反抗苛捐雜稅的運動到處發生，特別在一九〇六年，這種運動差不多已遍及全國，計共數千百起，參加每一次運動的鄉民人數，往往從一千到十餘萬。廣西歸順縣數百餘村鄉民反對抽捐運動，河南葉縣萬餘人反對加稅，山東萊陽幾萬人因地丁而起的運動，就是明例。據河南葉縣鄉民所發的傳單，稱當時縣官在一年內已抽捐七次，這可見當時農民的痛苦了。當時滿清政府對於群衆的反抗一方面採取屠殺的手段來鎮壓，另一方面却也就產生了御用式的立憲運動，想用一套新的手法來維持其腐敗的、動搖的統治。

清政府雖然昏憤，但它却震駭於國內的革命運動與叛亂的進展，感覺自己的統治權隨時有被推翻

的危險。在壓伏了康梁的變法運動後，接着就是抗捐運動的開展。於是以前反對維新的，現在也都贊成立憲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俄日戰爭之後，一般士大夫以爲立憲可以圖強，於是駐法使臣孫寶琦首先奏請立憲；立憲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諸如梁啓超組織東京政聞社，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相號召，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上海一些紳士則組織立憲公會，在湖北有憲政籌備會的出現，在湖南有憲政分會的建立，在廣東有自治會的組織。當時力量較大的就是朱福詵、張謇等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在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下，這些新官僚士大夫會進行各種請願運動，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政治，以挽救當時的危局。清政府也想借用立憲的幌子來壓制革命，即派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旋以黨人吳越拋擲炸彈，徐紹二人受傷，改派尙其亨、李盛鐸前往。光緒三十二年八月載澤等回國，清廷宣示預備立憲，以九年爲期。一九〇七年各省設立諮議局，並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可是諮議局却僅僅以「遵諭旨採各省之輿論，指陳各省利害，籌劃地方治安」爲宗旨，當然說不上是民意的機關，而僅僅是一些新官僚的活動場所。此外，在宣統皇帝之下設立資政院，由欽選議員與諮議局議員各百名組織而成。因而資政院的所謂議員，實際大多數却是滿族的貴族官僚，當時大家稱之爲「皇族內閣」，實在是名符其實。至一九〇八年頒佈憲法大綱，主要內容爲（一）大清皇帝爲帝國主權所有者，不能侵犯；（二）清帝有立法、司法、召開解散國會、制定官制、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爵賞恩赦、發令施令諸權；（三）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出版、集會、財產、居住諸自由權，非依法不得逮捕監禁；（四）臣民有納稅、當兵及遵守法律的義務。這個欽定的憲法大綱祇是合法地保障了清室的統治權，奴隸般的人民雖然在名義上享有各種自由權，而立法、司法諸權都操諸皇帝手中，隨時可以「依法」來剝奪人民的自由。很顯

然的，這種欽定憲法大綱只能給滿清的統治權以保障而已，但就是這種立憲，滿清政府也儘量設法使之拖延。當時各省諮議局不斷聯名請願，要求速開國會，而清廷則以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相搪塞。由此可見清廷絲毫沒有決心抹納資產階級的改革政策，於是覺悟的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乃不得不傾向於革命運動，他們對於清室的改良開始幻滅了。

由於對欽定憲法的失望，改良主義的幻滅，於是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對立就逐漸明顯，兩種力量的鬭爭也就逐漸劇烈起來。一面是革命階級反對滿清政府的革命力量：首先是廣大的下層群眾，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貧民、游民。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小私有者日益破產，凍餓死亡，因而積極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他們經過哥老會的鬭爭與新軍的革命化和暴動而顯示着參加革命的堅決和英勇。其次，革命力量的另一種就是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和商人。中國資產階級爲着解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束縛，求得中國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而積極的參加與領導反對滿清政府的鬭爭；旅居國外的華僑資本家則企求將他們積累的資本投入國內的企業，可是當時的滿清政府不僅不能保護他們的投資與經營，而且協同帝國主義反來損害他們的投資與經營，因而華僑資本家同樣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此外，當時一部分士大夫新官僚因窺破滿清政府之無能與中國民族的危亡，亦走向同情與參加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的方向。這些就是辛亥革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在推翻滿清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統一戰線，在辛亥革命前不斷的與滿清政府作鬭爭。

另一方面，反革命的營壘就是滿清政府與擁護滿清政府的腐敗官僚、大地主、舊軍閥、大買辦。這些反革命階級，有的與滿清統治休戚相關，有的與帝國主義相互聯結，企圖維持其對民衆的榨取而積極擁護滿清統治，以各種方式來反對革命。至於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當時的革命運動，形式上雖然表示



中立，或有個別對清廷不滿，但一般的則實際上從各方面幫助與支持滿清的封建統治，因為滿清政府的統治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究竟是適合的。

### 第三節 興中會與同盟會的產生和活動

上節所述革命與反革命營壘的對立和鬭爭，就掀起了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領導革命運動的政黨的出現。這種政黨之成爲辛亥革命的實際領導者的就是革命同盟會，而同盟會乃由興中會演變發展而成，故在研究同盟會之前，應該先講一講興中會。興中會是在中日戰爭中一部分市民層和少數黨分子組織起來的，主要的領導人爲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成立於檀香山，最初沒有明確的政綱，且帶着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其成立宣言雖會籠統指出「辱國喪師，窮蹙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方今強隣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然而對於創立興中會的宗旨却又只說：「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爲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次年香港興中會所發宣言，亦只提出創立宗旨爲「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受列強侵凌，只是由於「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當然就沒有提出推翻滿清政府的必要，而只須向中堂大人上書，要求政府施行改革就可以。不過，雖然如此，興中會在那時却做了相當的活動，孫中山先生且會因此在倫敦蒙難，而且和那時康有爲等所組織的保國會儼然成爲對立的組織。後來，因爲滿清政府進一步的腐敗與喪權辱國，推動了他們新的覺醒，便明

確地由改良主義走向革命的方向。尤其是從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脫險再赴日本後，興中會與康有爲的保皇黨對抗甚烈；當時保皇黨的機關報是清議報，而興中會的機關報則爲中國報，兩方時起鬪爭。同時中山先生根據自己在國外考察的心得與活動的經驗，開始確定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中山先生自己會說他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接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者。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二）如此使救國的民族運動，變爲振興中華的民主運動之一部。他並認爲會黨是當時最可依賴的力量，隨後興中會即與光復會（以章太炎爲首領）、華興會（黃興爲首領）合併，組織革命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滿清），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除此綱領外，同盟會更在宣言中指出：「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這正如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所預料的一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由此可見，當時同盟會已具有進步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它要實現民族獨立、保障民權、解決土地問題，這正是要以新的革命政權代替舊的封建專制。滿清政府的封建專制是建基於當時

（註二）見孫文學說第八章。

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上的，此等封建剝削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平均地權這個口號的提出，正是在當時有着重要的意義的，雖然它並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就是說，以孫中山先生爲代表，中國人民現在是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民族的整個的使命了。這一使命雖由革命同盟會所提出，然而三民主義問題却是半殖民地化後的中國全國人民身上擔負着的普遍問題。從太平運動起，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就爲着這三大問題的解決而戰鬥起來了。然而在這以前，中國人民只是無意識地在放着這戰鬥的運動，並沒有明白地整個地意識到自己的全部使命，而現在却看清楚了自己的三個大目標，這是同盟會一個很大的歷史功績。所以列寧對辛亥革命的綱領，譽爲「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列寧說：「孫逸仙綱領底字裡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他絲毫沒有不問政治或者甚至於絲毫輕視政治的態度，甚至於完全沒有認爲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及立憲改革等同時並存。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群眾鬭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雖然它只達到問題的提出，沒有達到問題的解決，可是不管怎樣，同導會是市民層代表分子和當時工人農民及一部新士大夫推翻滿清統治的聯合戰線的革命組織，是領導辛亥革命的政黨，那是無疑的了。

辛亥革命前，中國同盟會根據中山先生所指示，由已往的教訓與實際鬭爭的經驗，覺悟到革命的勝利非有力量的依靠是不可能了。於是便在三合會特別是哥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活動，另一方面則積極在滿清的軍隊（所謂新軍）中進行工作。這種轉變顯然和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與勞苦民衆相隔離的改良行動，完全不同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推翻滿清政府，一方面是由於有廣泛的、反滿統一戰線，另一方面也就是由於有力量的依靠。列寧說得正好：「如果沒有民衆底偉大精神的和

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這種高漲，就需要和產生一種對勞苦民衆的狀況所表示的極懇切的同情與對他們壓迫者及剝削者所表示的極熱烈的仇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就是在這種需要中產生出來的，而聯合會黨的政策，正是這種需要的反映。

民族的獨立運動是辛亥革命勃發的一個契機。滿清政府對於漢族的壓迫早就激起了一部分民族獨立運動者的反抗。例如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後，活動於南方各地而舉行過多次暴動的三合會就是一種反抗清政府的秘密結社。他們最初活動的根據地是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因着官府嚴重的壓迫，大多數會衆逃到海外，海峽殖民地是三合會最佔勢力的地方。他們榜的綱領是「反清復明」，疾病相扶助，貧困相救濟，其中以貧民爲中堅。自是三合會的勢力自菲律賓以至暹羅、印度、澳洲、太平洋沿岸發展甚速。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三合會的領袖鄭士良與興中會領袖相約，於廣東之惠州舉行革命，從此三合會才爲人注意。與三合會同一性質的秘密會黨是哥老會，三合會是向海外發展，而哥老會則以長江流域爲活動的地帶。哥老會在乾隆年間就已成立了，後來被解散的湘勇投入會中的頗不少，其勢益大。哥老會在清末會陰謀舉行推翻滿清政府的大暴動，不幸被發覺，失敗，後來其領袖多與革命黨相結託。此等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支流甚多，三合會與哥老會不過是其中較著名的罷了。正是因爲他們的組織是以城市貧民與流氓無產階級爲中堅，因此就沒有很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並不希望在推翻滿清政府以後，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權，祇是具着一種朦朧的民族意識而已。然而他們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却積極參加了反對滿清政府的鬭爭；而同時，同盟會因爲得到哥老會的援助與合作，也大大擴張了自己的聲勢和力量。當黃興在長沙舉行暴動時，哥老會的領袖馬福益遇害，這促成了哥老

會與同盟會的結合。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同盟會策動的革命軍在湖南瀏陽起事，萍鄉的鑛工起而響應，哥老會參加者亦甚多，曾佔領了好些城鎮，不幸爲湘鄂聯軍所壓伏。此時在日本的革命同盟會亦因清政府的壓迫，將指導機關移到安南。不久乃有潮、惠、欽、廉之役，都得到了會黨的援助與響應。這些暴動既先後失敗，同盟會乃謀襲廣西、雲南，先後有鎮南關、河口之役，最初都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後來却失敗了。僅僅在兩年之間，革命黨在雲南、兩廣竟前後失敗六次。於是失敗的情緒支配着一部分青年，重新開始了個人恐怖運動，如汪精衛在北京謀刺攝政王，徐錫麟刺殺恩銘於安慶，熊成基謀刺載灃於哈爾濱，溫生才刺殺孚琦於廣州。這種暗殺運動和十九世紀俄國「民意」社和虛無黨人暗殺沙皇的情形相彷彿，並沒有給人民以絲毫的益處。用刺殺個別人物的手段，是不能推倒滿清政府，消滅專制制度的。而且其中有些分子如汪精衛之流，根本就說不上是革命者，而只是爲了一時的投機衝動，這有汪精衛一生的歷史可爲證明。抗戰以來，汪精衛之流所以公開成爲漢奸，充當日寇進攻中國的工具，更完全不是偶然的。

革命的進展究竟還要依靠群眾的鬪爭力量。當時在同盟會的推動下，不僅哥老會等積極參加反對滿清政府的鬪爭，而且革命的浪潮漸漸捲入兵士群眾中。他們大都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 and 游民，他們對於滿清的統治充滿仇恨，因而在辛亥革命前會不斷的譁變和起事，如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在革命同盟會的指導之下，舉行大暴動，爲官軍所平服，這是黃花崗之役的先聲。新軍失敗後，革命同盟會的影響反漸漸擴大，乃加緊活動，決定籌款大舉於廣州。當時謝良牧等曾在南洋華僑中籌得數萬盾爲革命費用，暴動的指揮機關設於香港，黃興爲總指揮。一面計劃準備軍事動作，一面派人運動新軍及防營，預備分路攻佔廣州各重要機關，與城外新軍會合。事洩，粵督張鳴岐下令嚴密戒備，到處搜

捕黨人。黃興乃與同志百餘人攻入總督署，清軍四面圍捕，死難者七十二人，黃興負傷逃香港。事後張鳴岐即大施恐怖，黨人及剪髮民衆被捕殺者甚衆。有人將殉難的七十二戰士葬於紅花崗，改紅花崗爲黃花崗，所以這次起義稱爲黃花崗之役。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了，但它却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個有力號砲。由於這次起義的震動國內外，才掀起了全國反滿清政府的革命浪潮。

#### 第四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和意義

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在中國興築鐵路，而滿清政府則出賣築路權利。這種行爲給了中國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資產階級又正企圖投資於交通工業，想自己來建築鐵路。因爲十九世紀末既然開始有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新興的資產階級亦漸將蓄積的資本投於國內的企業上，鐵路商辦正是當時工業資本開始活躍的一個起點。然而這點資本主義的萌芽，亦不能見容於帝國主義與滿清的專制主義。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載澤、盛宣懷等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款一千萬鎊，託名爲貸款築路。更因日本的欲得債權，復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圓。是年四月清政府乃宣佈鐵路政策：幹路均歸國有，支路准商民量力酌行，以前批准鐵路各案，一律撤消，如有抵抗，即照違制論。這種鐵路國有政策是新內閣成立後在御史石長信與郵傳大臣盛宣懷的建議之下所發佈的，名爲國有，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者所有。令既下，直隸的商人資產階級首先反對，他們堅持鐵路商辦已有成案，不得以一紙命令更改，因擬推代表赴京抗議。湘粵川漢各省士紳商民皆謂：「粵漢鐵路始由盛宣懷私售與美商合興公司，光緒二十八年各省人民爭之，慘澹經營，僅得收回集股商辦。今政府忽又宣佈國有政策，與民爭利，是不啻奪我生命財產，付諸外人」。於是聯合抗爭，形勢極爲緊張。清政府主張用武力壓服抗議者，各省議

員則以不到諮議局開會以爲抵制，許多地方發生罷市罷課。清政府起用端方爲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欲倚以籠絡兩省人士。當時川路公司並電請川省京官堅持反對國有及收回股本之主張，日本留學界甚至力主『路存與存，路亡與亡』之議，川人議以拒付租稅爲抗制。粵路公司亦召集股東大會，議決保持商辦之局，致電郵部力爭聯合湘鄂川三省同志堅持到底。旅美華僑且通電抗爭，措辭極烈，川鄂湘各省議員更聯合爭路，嚴劾宣懷罪狀，這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最初反對專制政府的大運動。並且當時築路工人亦爲爭路權而發生過暴動——如川漢路宜萬工人——運動是日益蔓延擴大了；但清政府竟不爲動，仍堅持原案，於是四川、廣東都有保路同志會的設立。清廷以川督王文鎮壓不力，且附和川民，以趙爾豐代人文。川人舉代表赴督署請願，爾豐拘代表十餘人，群眾擁入督署要求釋放，爲衛兵開槍擊斃四十餘人。爾豐更電京稱川人藉爭路爲名，希圖獨立，造成變動。事實上當時這一爭路運動也確實帶有比較廣泛的群眾性質，事後很久郭沫若先生曾在反正前後一書中對那次爭路群眾運動加以很生動的追寫，茲引一段如下：

「保路同志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准歸商辦」。這聽說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的。……由保路同志會發出來的命令，是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要供光緒皇帝的牌位。理由不消說是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准歸商辦又是在他在位的時候實現的。這個策略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保路同志會有的是錢，因爲有鐵路公司做背景。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如像日報，都陸續發行，還發行了無數的光緒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的黃紙印的，正

中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着「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兩個口號，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滑稽，然而它在當時的效力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貼在自己的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的禮拜。……這使運動帶着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群眾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集了起來。……鐵路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在成都所擬定的運動步驟，便照樣的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頃之間而運動便普遍於全省。……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已經派兵把守着的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槍打過來，可憐為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槍，他們也就開起槍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群眾。這樣，群眾便陷在槍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舖面裡面逃避。槍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踏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只是那死裡面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台也同時由軍警拆毀了。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成都市從那天起便開始罷市。對於成都附近的縣份，消息是很容易轉達的，各地的同志會便都暴動化了。對於遠方的縣份，當時的宣傳方法是利用的「水電報」。「水電報」這個名詞乃至這個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來的。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會起謄，速來救援，上面塗以桐油，就把這種信報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達的，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游的地方去了，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



十個傳百了；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時又仿造出無數的信板流下河去。在這時儘管當局者在怎樣的戒嚴，要檢查郵電，檢查出版物，然這遍地遍河的水電報，它怎樣也沒有方法來扣留了。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首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志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佔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繹的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惟無戰意，而且有的竟投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全無戰鬥的能力。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志軍又聞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能不屢電滿清的朝廷請援，甚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以緩和民意了。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騷動，各省的諮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配合這種鐵路商辦運動，在當時還有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雲南滇礦收回運動，江浙爭回滬紹航權運動，以及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運動。正是在這種全國民衆反對滿清的憤怒下，在滿清政府腐化動搖崩潰的情況下，在湘鄂粵川這種爭路運動的基礎上，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時湖北新軍早已運動成熟，革命恐慌使清政府下令嚴拿革命黨人，鄂督瑞徵聞革命黨有定期起事之風說，嚴密戒備，陸續捕獲黨人甚多，而不知防範的軍隊大半已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之下。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受革命黨策動的新軍一部分——工程營首先起義於武昌，攻楚望台，佔領軍械局，響應軍隊漸衆，乃會攻督署，瑞徵等棄城而遁。起事軍隊改稱民軍，擁協統黎元洪爲總指揮。遂改諮議局爲中華民國軍政府，以黎元洪爲鄂軍都督，湯化龍爲民政廳長。於是派兵佔領守藩庫、官錢局、財政處、度支公所等機關，武昌省城完全爲革命軍所佔。旋佔領漢陽、漢

口。軍政府宣佈保護外人生命財產，領事團認民軍爲交戰團體，表面宣告中立，這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幕。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九月初一日湖南黨人與新軍聯合，攻入長沙，佔領之。江西九江府新軍接着於九月初二日發動，南昌宣佈獨立。陝西新軍亦於九月初四日起事，佔領渭南、臨潼諸城，設大統領府，後改都督府。山西新軍譚變，攻入撫署，巡撫陸鍾琦被殺。雲南總督李經羲聞鄂變，繳新軍械以防變，蔡錫率所部起事，佔領省署。同時江蘇省上海、蘇州、鎮江、松江、揚州都先後宣佈獨立，爲革命黨人所佔。浙江紳商請巡撫增塏宣佈獨立，增不允。黨人遂圍攻撫署，擒增塏，復與旗營開戰，敗之，浙省乃獨立。廣東商民集議主張承認革命軍政府，粵民豎獨立旗幟，粵督張鳴岐禁止之。時各地革命黨人已紛紛起事，諮議局乃乘勢宣佈獨立，鳴岐逃。廣西革命黨人起事，商民迫巡撫沈秉堃宣佈獨立。福建諮議局聞武昌起義，要求總督松壽讓出政權，松壽不允，革命軍遂起與旗兵戰，旗兵敗退乞降，松壽自殺，大局遂定。此外如山東、四川、貴州、甘肅、新疆都先後獨立，不上一個月，革命軍已佔有十餘省，滿清政府的政權乃不得不瓦解。這次革命所以蔓延得這樣迅速，一面是由於廣大民衆對滿清政府的不滿與新軍之革命化，隨武昌起義而到處響應；同時也由於一部分官僚與各省商民、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同情與擁護，隨武昌起義而威逼各省各地統治者實行獨立，而當時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客觀上自然也有利於革命的發展。

然而就是這樣速成的辛亥革命也並不是沒有經過流血戰爭的，特別是武漢之役與南京之役，都經過相當劇烈的爭鬪。當武昌起義時，清政府聞訊大恐，急命陸軍大臣蔭昌統率大軍赴鄂，又令薩鎮冰統率海軍赴援，革命軍遂開始與清軍激戰。初民軍頗佔優勢，清廷再派援軍來鄂，戰事益劇。相持月餘，民軍敗，退守武昌，清軍佔領漢陽，這是武昌起義以來革命軍所受到的最大失敗。清軍佔據漢陽

後，據龜山以砲轟武昌城，及熈和令下，始停戰。當武漢民清兩軍激戰時，南京新軍亦起事，攻雨花台，不利，退駐鎮江，及援軍至，遂組織蘇浙滬聯軍，進攻南京，皖粵桂三省亦派兵會攻，敗清軍，攻入城。張勳及滿清官吏俱遁走，南京遂爲民軍所佔。旋又攻下浦口，以阻清軍南下之師。南京的戰爭決定了清政府的命運。清廷知大勢已去，乃有民清兩軍之和議。

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會企圖作最後的掙扎，挽救其已頻於崩潰的統治。一方面派軍向武漢民軍反攻，另一方面仍希望用讓步政策來緩和革命，於是頒布憲法十九條，對君權加以限制，並以袁世凱代奔動而爲內閣總理，以代理滿清政府維持封建統治，實行所謂君主立憲制。但此時革命大勢已成，獨立各省代表齊集上海舉行各省都督府聯合會議。會議後各代表至武漢，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民軍佔領南京，各代表乃回南京，於十一月初十日開臨時總統選舉會，到會代表十七省，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定國號爲中華民國。孫中山於民國元年元旦日赴南京就職，並發表就職宣言，大意謂：「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基礎，確立於大地，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接着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臨時政府因又製定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註三）

以上所述，即爲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期經過。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註三）臨時約法全文共七章五十二條，此處所引即該約法第一第二兩條條文。

命，由於這一革命的初步勝利，第一次在中國推翻了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專制皇帝政治制度，開闢了中國和亞洲民主共和國的新曙光。這對於中國後來歷史的發展，甚至對於世界一般文明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因為中國是擁有四萬萬數千萬人口的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在亞洲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國家。明白了這點，我們正可以進一步地認識：爲什麼亞洲新起的反動的堡壘——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辛亥革命後，會那樣起勁地幫助袁世凱來消滅革命，幫助他建立一切可能反動的統治。辛亥革命的第二個歷史意義，就是：在當時中國人民反帝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鬪爭中，首先推翻了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這在當時客觀歷史上，曾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帝國主義者爲維持其在華的統治，正是要維持這中國國內自己爲滿清所建立的『民族牢獄』的。所以，辛亥革命雖然並沒有真正完成它所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而且留下了許多不良的結果（見下節）。可是不能否認它也會有其成就的某一面，決不止是剪了幾條辮子，而確確實實是推翻了代表數千年來專制皇帝制度和代表國內牢獄的滿清朝廷。而辛亥革命在這點上之所以會那樣迅速地成功，就是因爲當時有很廣泛的反滿民族統一戰線，正因革命所聯合的階級範圍及革命直接間接的後備軍，都很廣泛，才使清廷陷於孤立。各帝國主義者雖希望維持滿清的統治，但在革命力量的脅迫下，表面上却不能不採取中立的態度，還沒有立即幫助反革命來進攻革命。這雖然祇是革命某一面的成功經驗，可是這種成功經驗也有其歷史的意義。

###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結果和教訓

辛亥革命雖然在表面上推翻了滿清政府，但封建勢力並未剷除，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的打

擊。在反革命尚保存有優勢力量的情形下，民軍方面就開始與反革命妥協了。這種妥協的表現，首先就是民清議和。在民軍佔領武漢、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民軍方面大多數的領導分子均以爲革命已經勝利，主張南北議和，以求得南北統一。爲着求得表面上的南北統一，求得清帝退位，孫中山先生向袁世凱提出五項保證和條件：第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凱轉知民國政府；第二，袁須宣佈政見，贊助共和；第三，孫中山接到清帝退位之通知後，即行辭職；第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第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暫奉行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這種條件和保證，在表面上好像是孫中山去說服袁世凱，實際上袁世凱是以「贊成共和」的誣詞，獲取了控制民國的實權。當時袁世凱看得很清楚，腐敗的滿清政府已經不能繼續維持其統治，南方的革命勢力正在蓬勃的發展，僅僅是靠武力來抵抗革命是異常危險的。漢陽雖然給反革命奪回來了，而南京却爲民軍所佔領，同時各省的獨立運動正有擴大而變爲革命的內戰的形勢，所以他極力主張與南方的革命黨人暫時妥協。當時南方的資產階級畢竟軟弱得可憐，既不能領導革命向前擴大，便祇有和封建勢力妥協，他們幻想着以妥協手段去籠絡反革命的領袖，結果當然祇有失望。

民軍與反革命妥協的另一表現，就是爲着取得清帝退位，不惜承認清帝退位的條件。其內容：（一）保存清帝尊號；（二）每年發給清室經費四百萬兩；（三）保護清帝及皇族原有財產及宗廟陵寢；（四）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這種對舊皇室的優容乃是各國革命所未有的，革命的新政權既已淹有全國，尙容許滿清政府與之對立，這真是一種可笑的矛盾現象。民軍方面的這種妥協的發展，結果使革命由勝利轉到失敗，日後乃有袁世凱的稱帝與張勳的復辟。

在民軍妥協行動下，臨時總統選舉會的結果，袁世凱當選爲總統，從此袁世凱便掌握了政府的

大權。袁世凱當選後，發生了國都的爭論。孫中山先生主張以南京爲國都，以爲這樣可以給北洋軍閥以束縛。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早已看到這一着，不肯南下，自入牢籠。南京參議院派代表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袁氏遲遲不肯行，並授意部下使在北京、天津製造兵變，袁氏乃藉口北方不靖，不能南下。參議院復議決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袁世凱乃於三月十日在北京就總統職，以唐紹儀爲內閣總理，政府又從南京遷回北京，這是北洋軍閥第一步的勝利。

袁世凱進攻革命的第二個步驟便是掌握政府中的全部權力，實行總統個人的獨裁。當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但在袁世凱的束縛與逼迫下終於辭職了，接着同盟會的閣員都相繼辭職。袁世凱乃提出陸徵祥代理，陸稱病不就，乃以袁黨趙秉鈞組閣。從此內閣成爲北洋軍閥的御用機關，袁世凱就遂行其反革命的獨裁了。袁世凱既實行反革命獨裁，即壓迫民黨不遺餘力，甚至暗殺革命黨的領袖，二年三月宋教仁在滬之被刺殺，即係袁世凱所指使。革命黨人聞之大憤，這是二次革命爆發的導因之一。

反革命進攻革命的第三個步驟，就是擴充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向革命大舉進攻。袁世凱當時最主要的依靠，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更藉日本之助，向五國銀行團（英法德日俄）借款（所謂善後借款）達二千五百萬鎊，以鹽稅爲擔保，爲添置軍械擴充軍隊之用，以進攻革命。同時積極剝奪革命黨人職權，於二年六月九日下令免國民黨三都督職（即江西的李烈鈞，廣東的胡漢民，安徽的柏文蔚），以遂行其反動統治。

在北洋軍閥對革命的着着進攻下，國民黨（當時同盟會已改爲國民黨）不能不於一九一三年在袁世凱之免國民黨三都督職命令發出後發動二次革命，這是革命黨在妥協完全失敗後，企圖挽救革命局勢的反攻。二次革命是以討袁相號召，出動的民軍均稱『討袁軍』。李烈鈞起兵湖口，黃興則進據南京

；安徽、福建、廣東、湖南亦相繼響應。討袁軍並遺冷遁扼守徐州，防北兵南下，陳其美在滬舉兵，圍攻製造局。袁世凱令段芝貴、馮國璋率軍南下討伐，自稱「國軍」。結果因南京革命軍內訌，徐州之軍退走。未幾，湖口爲北洋軍所佔，上海民軍亦不利；江西、安徽先後爲袁軍所平定，南京亦爲袁系之張勳軍佔領，龍濟光據有廣東，四川民軍亦失利，湖南、福建均先後撤消獨立。於是南軍瓦解，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乃得暫時穩定其統治。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乃向革命作最後的進攻，這就是修改約法與解散議會。袁世凱首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不久又下令停止國會開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各省省議會亦相繼被解散。另以北洋軍閥御用的政治會議代之。是時憲法會議在北京天壇舉行，憲法草案定於十月三十一日完成，是爲天壇憲法。袁世凱以所定憲法不合己意，通電各省軍民長官起而反對。末後更組織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制定新約法。袁氏即依據新約法的規定，廢除國務院，設立政事堂，至是名義上的內閣制亦宣告解體，而袁世凱事實上則成爲唯我獨尊的「皇帝總統」了。袁氏之由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獲得反革命統治權，就是以後袁世凱稱帝的基礎。

事變發展到了這裡，辛亥革命慘被壓碎已經是沒有問題了。因爲這一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推翻封建勢力和爭取民族獨立，客觀上是要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大道。然而北洋軍閥袁世凱代替了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以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不僅沒有被推翻，而且正像列寧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在他寫的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一文中所預見的一樣，外國帝國主義正與中國一切黑暗復古勢力聯合着來羈縻和壓迫中國，使開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道路的歷史要求又成了流產；而整個中國民衆且由於北洋軍閥的出賣，依然並進一步在帝國主義的奴役下，封建勢力

的榨取下，度着黑暗淒慘的生活。辛亥革命這樣的結果，誠所謂「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自然談不上是成功勝利的。現在應該探究的問題乃是：辛亥革命爲什麼竟會遭到這樣慘敗呢？爲什麼在袁世凱着着進攻的前面，領導這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竟不能作一有效的反攻以拯救革命呢？這裡當然不能光拿客觀的因素或者什麼「袁世凱出賣民主」來解釋，因爲袁世凱根本不是民主的擁護者，而且，「如果一個政黨底全部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人不可靠這種孤單的事實，它底勝算該是多麼渺茫可憐呀！」（恩格斯）所以真正的原因祇應該從社會的政治的基礎上去找，而不應該委之於某人可靠與否的孤單事實上，這種方法從歷史的觀點上說，尤其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革命的動力，固然包括着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與資產階級等複雜成份，然而就當時歷史行程說，無產階級的工人還只是新茁起的幼芽，自然還不足以領導革命；手工業者與農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根本就不大，而且歷史早已證明，農民也不能領導革命。所以在實質上，資產階級無疑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可是不幸的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那時也是很脆弱。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戊戌政變，但是前面已經說過，資產階級在戊戌政變時還只能提出改良的要求，而不敢提出革命的口號。即孫中山先生在當時亦只能向李鴻章上書（一八九四年），要求政治的改良，還沒有提出革命的口號。其後因爲種種事實的教訓，才有同盟會與革命運動的出現。可是不能否認，在辛亥革命時，中國資產階級在實質上也還很脆弱。有人說：「辛亥革命沒有堅實的民主要素，所以在實踐中失了主導的作用」，這當然是有見地的觀察。正因爲資產階級的脆弱，所以才表現了辛亥革命中民軍對反革命一連串妥協的事實。當時民軍雖會奪取了很多優勢，可是他們並沒有去謀澈底掃清數千年來腐敗的封建專制制度，而且相反地把革命政權讓給這種制度的萬惡代表者——縱滿



清而起的北洋軍閥袁世凱，讓他假借民國的名義，去做許多禍國殃民的勾當。結果，清帝退位以後，反動的封建勢力仍是在五色旗之下掩蓋着，革命也就不能被反革命的幽靈所摧殘所縊殺了。事後孫中山先生對此是極痛心的，而且屢次拿這個事實來警戒革命黨人和國民，如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即曾公開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指出這一妥協的錯誤，並謂「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爲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一個教訓。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和教訓，可以說是還沒有把廣大群眾真正動員起來。雖然同盟會的活動已經不像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那樣同群眾完全隔絕，而在哥老會中會進行不斷的工作，可是他們在哥老會中工作的目的是經過哥老會去進行新軍中的活動，以實現其軍事陰謀，而不是真正去改造哥老會的組織，去訓練教育哥老會的群眾使成爲革命的力量。正因爲辛亥革命是單純憑藉軍事力量的軍事投機，所以在組織群眾發動與領導廣大群眾到革命運動中來的任務是沒有做到。譬如當時廣大群眾的抗捐抗稅的運動與轟轟烈烈的爭路風潮，同盟會並沒有認真去組織與領導這一運動。我們知道：如果不去發動民衆，如果沒有真正群眾運動的高漲，要想保障革命的發展和勝利，乃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成立後，雖則中山先生曾呼籲過民生主義，呼籲過平均地權，但是他的許多同志對於改善群眾生活，發動群眾的問題則終究置諸腦後，並沒有想到去實行。恩格斯在研究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教訓時，曾經得到這樣的結論：「即令是在革命劇最初開演的時候，除非是依賴於民衆的和更進步的政黨之援助，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就不能牢守它底陣地去反對那已擊敗但未被摧毀的封建的和官僚的政黨。」（註四）在中國辛亥革命時，「更進步的政黨」自然還沒有產生，而民衆的力量又沒有廣大

（註四）見恩格斯所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中譯本五七至五八頁。

的去發動，這就使資產階級失去真正力量的依靠，所以雖然取得了政權也不能保持，以致當袁世凱向革命進攻時，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也就不能作一有效的反攻以拯救革命。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三個重要原因和教訓，就是在於當時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因爲當時以同盟會爲中心的統一戰線聯盟，僅僅是在推翻滿清政府的共同目標下形成的，並沒有更明確的革命政綱，各種力量的聯合也缺乏深刻的革命意識基礎；因此在滿清政府推翻後，這一聯盟跟着瓦解，革命力量隨之渙散。同盟會本是當時聯合戰線組織，可是滿清政府剛被推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就已經流行著一種分裂聯盟的口號，即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於是同盟會也就無形瓦解了。當時同盟會雖會發表團結同志宣言，謂「元兇未滅，如虎負隅，盟誓已寒，義士所不忍爲」。然而許多同盟分子却終脫退去組織其他政黨，反對革命的繼續。後來同盟會終於瓦解，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組織合併成爲國民黨，集合官僚政客爲一集團，喪失了革命的性質，而其黨員也就僅僅進行一些議會的活動。革命陣線這種分裂，以及當時革命黨人這種墮落腐化，恰好給予反革命的進攻以最大的便當。而當時反革命的代表——袁世凱也正是首先從分化革命營壘和腐化革命分子來着手，以進攻革命的。

最後，從民族解放的根本意義上來說，當時同盟會及其領袖還有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辛亥革命沒有執行反帝國主義的任務。我們知道：與中會與同盟會綱領雖則都同樣地表現了自己痛切當時列強的環伺，國勢的岌危，對於救亡圖存，大聲疾呼，但是他們都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具體主張，沒有明確將反帝當作一個鬭爭的任務。顯然的，當時與中會與同盟會的領導者，還只見到國內的韃虜統治，以爲只要推翻滿清韃虜的統治，改建民國，實行民主政治就可以自強。這樣狹隘的民族革命思想，

假使在沒有帝國主義束縛之前，還有可說。可是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事實上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解放的勝利之後，才能澈底的完成。不消說，這一點在當時同盟會的綱領中是十分含糊的。當時同盟會的領導者的心目中，還以為列強能够同情與援助中國革命。所以在辛亥革命前七年（一九〇五年）時，同盟會即會以軍政府名義發表「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的宣言，並對帝國主義保證：（一）所有中國前此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佔領區域內人民財產。這四條保證不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假使僅僅把它當作策略，用以孤立滿清，也許有幾分作用；然而當時同盟會却把它當作革命政綱看待，這就預先決定革命不能有澈底完成的希望。所以一到滿清被推翻的時候，他們便以為民族革命完成了，同盟會也解體了，再沒有料到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者，正在勾結中國反動的勢力，以圖消滅革命。民國二年袁世凱果然被帝國主義所利用，致發生洪憲稱帝與宋案及借款等等反動事件，結果辛亥革命也終於走上失敗的道路。從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當時同盟會的領導者，其革命目的只在反對滿族統治，他們把反滿的民族主義，看為整個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對的；可是他們沒有把反對帝國主義看為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同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獨立自由，也應該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而且還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忽視，影響到當時不能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與廣泛動員民衆，以致辛亥革命遭受失敗。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並不能完結中國的革命。反之，這種失敗的教訓，却會教育出更偉大的革命。恩格斯說得好：「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動的地方，必有一種社會爲要求背景，這種要

求爲陳舊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民普遍地強烈地感覺到，足以保證立即得到勝利，但一切用暴力壓迫它的企圖，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鎖爲止。『五四運動以後的歷次革命以至於現在的抗日戰爭，在歷史的意義上說，正是要完成辛亥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任務，並要求對較高級的革命任務，也能在抗戰勝利以後，求得一澈底的解決。』

## 第七章 五四運動

###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

一九一四年秋，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必然的產物。在帝國主義時代，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壟斷公司）和銀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活中，已具有決定的作用。財政資本已成爲資本主義各國裡的主人翁。財政資本要求新市場，要求侵佔新殖民地，要求新地盤以輸出資本，要求新的原料產地。

但是，遠在十九世紀末葉，整個地球領土就已爲資本主義各國所瓜分。而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和飛躍式的；那些從前是佔居第一位的國家，比較緩慢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其他那些從前是落後的國家，却迅速躍進，趕上和超過它們。這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勢力及軍事勢力的對比發生變更，再來重分世界的趨向出現了。再來重分世界的鬭爭，就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九一四年秋所開始的世界大戰，就是各帝國主義爲重分世界和搶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好久以前就爲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準備了的。這次戰爭的罪人，乃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特別起勁準備了這次戰爭的，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國，另一方面就是法國、英國以及依賴於它們的俄國。一九〇七年，產生了三國協約，或者說協約國，即英法俄三國的聯盟。而德國、奧匈帝國和意

大利則組成爲另一個帝國主義的聯盟，即普通所稱的同盟國。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意大利退出了這個聯盟，然後就加入了協約國。當時援助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德國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是力圖從英法手中奪取殖民地，從俄國手中奪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德國建築了巴格達鐵路，就威脅到英國在近東的統治，英國長懼德國海軍武裝的增長。沙皇俄國企圖瓜分土耳其，夢想侵佔由黑海到地中海的海峽（韃和海峽），奪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在自己的計劃中，還要奪取加里細亞，即奧匈帝國一部分。英國企圖用戰爭來擊破自己的危險競爭者——德國，因爲德國底商品在大戰前曾日甚一日地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底商品。此外，英國還企圖侵佔土耳其所屬之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並穩定自己在埃及的地位。法國資本家企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愛爾薩斯——勞倫，而後者是使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從法國手中奪取去的。由此可見，帝國主義大戰，是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這個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的掠奪戰爭，牽連到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因此，日本、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後來也被捲入這個戰爭，甚至中國後來也去「參加」了戰爭。這樣，這戰爭就成爲世界的戰爭。帝國主義大戰是資產階級深深隱瞞着本國人民而準備起來的。當大戰爆發時，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企圖證明，不是它進攻隣國，而是隣國進攻了它。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蔽戰爭底真正目的及其帝國主義掠奪的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宣稱：戰爭是爲保護自己祖國而進行的，正和現在帝國主義戰爭中英法德政府各自所宣稱的一樣。然而不管宣稱得怎樣好聽，而實際上，參戰國家的雙方的目的都是爲着掠奪別人的土地，奴役和掠奪殖民地，奪取投資場與原料資源。因此，這次戰爭不論參

戰的任何方面，都是一樣的非正義的侵略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

帝國主義的兩大基本集團既進入了互相間的拼死鬭爭，也就沒有時間，沒有力量，來繼續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這便減輕了中國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而使中國最後地走入資本主義的軌道。同樣，亦是由於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使中國覺醒起來，使中國加入到全世界的革命的洪流中去，列寧說過：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是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最後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醞釀在他們中間開始了……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五四運動就是大戰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鬭爭的第一個雄偉的巨浪，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偉大的民族覺醒的最初的爆發，亦就是中國捲入於世界革命運動總漩渦的開端。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給了革命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戰爭會是在各國人民生活中，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最偉大的轉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成功了。正像斯大林所說：

「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群眾鬭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的一個根本轉變，是他們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對於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影響亦正如斯大林所說：

「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裡，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無產階級覺醒底紀元，無產階級領導底紀元已經來到了。」（註一）

無疑的，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民族覺醒給了極大的推動，他使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鬭爭開始了一個新紀元——群眾的覺悟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鬭爭的新紀元。孫中山先生是首先感覺到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推動作用的，「當時中山先生在廣州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曾託華僑由美洲費重金致電祝賀列寧。」（註二）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最重大的影響之一就在它使中國人民的革命鬭爭的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使中國的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五四運動就是這個根本轉變的偉大的發端。

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歐列強雖因無力東顧，無形中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甚至對中國表示好意以便拉攏中國參加世界大戰；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却利用其接壤中國的特殊地位，利用西歐列強放鬆對中國侵略的時機大舉向中國侵略。所以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期，同時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吞併整個中國的企圖第一次曝露的時期；是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與加劇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歐洲帝國主義無暇與無力東顧的機會，猛烈地全線地展開它的對華侵略行動，企圖把中國

（註一）見斯大林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註二）見陳鈞著：論三民主義與中國問題五七頁。



變爲它的獨佔的殖民地。在這個全線展開的侵略中，日本帝國主義使用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軍事佔領和外交恫嚇，強迫簽訂亡國條約，財政的奴役，內戰的發動和挑起，企圖在「防共」的名義下實現滅亡中國等等。所有這些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愛用的慣技，在當時已經開始採用了，直到現在還在更加熟練的基礎上擴大地使用着。

當時具體的表現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名義，宣佈對德宣戰。派遣海軍封鎖膠州灣，陸軍則大舉進攻青島。當時中國政府要求共同出兵，爲日本所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青島與膠州灣後，更破壞作戰區之規定，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突在濰縣，佔據車站。十月三日，復迫中國軍隊退出鐵路附近地方，同月六日，日本大隊進達濟南，佔領了膠濟鐵路的全線及鐵路附近各礦產。事實上，山東半島已完全處於日本強盜的軍事佔領之下。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軍事佔領部分的中國領土爲滿足，而企圖實行淪中國爲它的殖民地。它以武士道所特有的無賴與蠻橫，反噬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的正當的合理的要求爲侮辱日本，突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所謂二十一條件，共分五號，其原文如左：

### 第一號

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三、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四、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改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需要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業工業等項生意。

四、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規定。

五、中國政府，應允下開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時；(乙)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六、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先向日本政府商量。

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候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二、中國政府，允將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

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於該公司有影響，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 第四號

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之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 第五號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辦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潮州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六、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理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國協議。

七、允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宣教之權。

這二十一條件是實實在在的亡國條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加於中華民族頭頸上的絞索。當日置益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亦知此種蠻橫要求，為中國民意及各國政府所不容，故力責袁政府嚴守秘密，從速解決，並聲明中國政府如果洩漏條件，日本政府必當更索賠償。同時日本更以援助袁世凱稱帝相誘惑，一面又派大批海陸軍隊，次第開抵我國福州、廈門、吳淞、大沽以及山東、奉天等地。

，以實行軍事的威脅，當時袁世凱雖有承認之意，但尚在遲疑之中；而英美兩國得到消息亦已提出質問，日本帝國主義恐遷延生變，復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七日向袁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令「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否則日本政府即將執行必要之手段。」袁世凱終於屈服於五月九日午前，命外交次長曹汝霖向日本公使館交付答覆書，除第五號中各項容日後協商外，其餘一概應允。於是日本向中國要求的二十一條，便居然達到目的了。

這個賣國條約的簽訂是中華民國的最大恥辱，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重大的威脅。日本猶恐這種生存的重大的威脅會引起中國民族的反抗，因此便竭力促使中國的分裂，使中國互相殘殺，使中國在內戰中削弱下去。於是在簽訂二十一條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竭力贊助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它深知：經過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人民決不會容忍帝制復活的，袁世凱稱帝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國的分裂和內戰。果然，袁世凱十二月十一日宣佈稱帝，兩星期後雲南便宣佈了討袁起義，展開了護國之役。以後的張勳復辟，南北戰爭及直皖不斷的戰爭，都可以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魔手。而且它永遠是站在中國的最黑暗反動的勢力方面的。爲着促進與延長中國的內戰，爲着財政的奴役中國，日本帝國主義者大批地供給了中國反動政府以借款，在一九一七——一八兩年間，日本政府供給了北京政府差不多將近五萬萬元的借款。（註三）

作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手段的最新一着的就是以共同「防共」的名義與中國簽訂軍事協定，而實

（註三）此項借款的名目、數目、債主及成立日期等詳情，可參看錢亦石著：中國外交史一

實際上用來滅亡中國。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五月間由中日雙方好幾個公文和協約，訂立了所謂共同防俄的中日軍事協定，在這個協定之中，日本取得了日本軍隊進駐吉林、黑龍江與外蒙古等地的自由，中國軍用地圖交給日本查閱；在中國軍隊中請日本軍官作教官等等。所謂「共同防共」原來早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二十年唱濫了的濫調，現在歡迎與日本共同防共反共的健將汪精衛之流，其實國也不過是安福系老賣國賊的小學生。

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帝國主義大戰的機會，展開了對中國的全線的侵略，他假參戰之名出兵佔領了山東半島，他用威脅利誘的方法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了亡國的二十一條，它以巨額的借款供給中國的最黑暗反動的力量，挑起了中國內部的分裂，製造了連綿不斷的內戰。二十一條如絞索一樣，緊扣了中華民族的頸項，而中日防共的軍事協定則如鎖鏈一樣，束縛了中華民族的手足。中華民族的命運已處在十分危急之中，這不能不引起中華民族熱血的兒女們的滿懷義憤與熱烈的反抗，這不能不使中華民族的廣大的群眾的民族覺醒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這不能不使中國的民衆反對帝國主義鬭爭的銳鋒首先指着處心積慮要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這樣，五四運動就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鬭爭的姿態出現了！這樣，五四運動就成了今天的神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先驅和序幕。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俄國十月革命，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的瘋狂侵略——這是五四運動前夜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最主要的標誌。

## 第二節 五四運動的國內環境

至於國內的環境，則最可注意的是五四運動前後這一時期是國內資本主義比較迅速地發展的時期

。據統計，這個時期中國紡織工業之發展如下表：

年 代	廠數	紗	錠	布	機
一九一五	二二二	五四四、〇一〇	二二五〇		
一九一九	二九	六五九、七二一	二六五〇		
一九二〇	三七	八五六、八九四	四五四〇		
一九二一	五一	一、二三八、九〇三	六六五〇		
一九二二	六四	一、五九三、〇三四	九八一七		

麵粉工業在歐戰中也開始發展。一九〇〇年中國只有二所麵粉工廠，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所了。在歐戰期間，中國會由麵粉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請看下表：

年 代	入 口 (擔)	出 口 (擔)	入 超	或	出 超
一九一二	三、二六一、五〇一	六三七、四八四	二、六二四、〇一七 (入超)		
一九一四	二、一六六、三一八	八七、〇〇〇	二、〇八〇、〇〇〇 (入超)		
一九一五	一五八、二三七	二一六、二二五	五七、九五二 (出超)		
一九一六	二二三、四六四	二八四、七四七	五六、二八三 (出超)		
一九一八	四、五五一	二、〇一一、九〇六	二、〇〇七、三五五 (出超)		
一九二〇	五一一、〇二一	三、九六〇、七七九	三、四四九、七五八 (出超)		

絲業方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的資本只有五萬元左右，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已達一百八十萬元左右。其他如火柴業、水泥業等等，於歐戰期間

也開始發展起來，例如火柴業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只有三萬元，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每年增加資本為七萬餘元。（註四）銀行業在歐戰中亦有發展，在滿清時僅有七行，一九二三年已達一百餘家了。這是這個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概的描述。

用什麼來解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在中國比較迅速地發展呢？它的原因在哪裡？原因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使西歐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減少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如列寧所說：「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是因為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他們的發展最終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軌道。」第二，不能不歸功於辛亥革命——這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整個周期的第一個浪潮。這一個浪潮雖然沒有消除當時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沒有消滅引起革命的客觀基礎，但是這個浪潮打擊了舊制度，推翻了滿清專制主義的統治，這樣，他便給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相當的領域。第三，就是「五九」「五四」這一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鬪爭——首先是抵貨運動亦便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這個發展仍然是片面的病態的，比較地有發展的還只是輕工業部門。為國家獨立生存所必需的國防基礎的重工業，則仍然停滯着，而且原有的一些可憐的企業，亦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染指所覬覦。就是在速度上說，即比較先進的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來說，仍然是非常可憐的。這裡的原因同樣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雖然一時地使歐洲帝國主義減輕對中國的侵略，但是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要根本地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祇有民族解放戰爭獲得勝利才能達

到；因此，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仍然受着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第二，辛亥革命雖然打擊了舊制度，但是沒有澈底打破它；雖然推倒了滿清專制，替生產力的發展多少開拓了一些領域，但是封建勢力還未被剷除，因此舊的生產關係依然嚴重地阻礙着它的發展；第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它與中國的黑暗反動勢力的結合，更加阻礙了生產力之發展。中國社會生產之多少重大的發展，也必得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鬭爭中才能獲得。由此可見：祇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澈底完成，才能開闢生產力向前有力發展的基礎。

在國內政治方面，則「五四」前後是一個內戰連綿的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統治，但是終以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袁世凱得到外國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便着着實行反動政策，建立獨裁制度，解散了國民黨，解散了各省省議會，停止了國會的開會等等。到一九一四——一五年，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贊助之下，企圖最終地顛覆共和制度，而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稱帝改號為「洪憲」。在稱帝之前，袁世凱曾經實行製造民意，製造輿論來讚助帝制，組織籌安會，出版報紙，鼓吹帝制，壓迫反對帝制的輿論，陰令各省黨羽響應所謂君主立憲制，以及組織公民團向袁氏御用的國民代表大會請願，然後再由參政院呈遞推戴書，袁氏更假惺惺作態，表示不敢承受，直到第二次呈遞推戴書才敢「登極」。袁世凱及其黨羽這樣費力偽造之後，似乎是為民所歸，一致推戴。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不容虛造的，亦不是任何摧殘壓迫所能屈服的。一手包辦的偽造輿論，其結果祇有使偽造者自己受其麻醉，得其應得的懲罰。充其量，也至多祇能欺騙一些政治上的色盲者，以為真的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如陳獨秀之流）。然而真理既不歸偽造者，也不屬於政治上的色盲者，而必然在進步勢力一方面。果然，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及以後轟轟烈烈的護國



之役，洪憲不及百日而亡。護國之役的成功，顯然指明：經過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和君主制度調和。指明了：任何偽造民意，任何壓迫民意，決不能援救反動派沒落的命運。

袁世凱死後，由黎元洪代攝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爲國務總理。至一九一七年爲對德宣戰問題，發生了黎段的衝突，因國會反對宣戰及要求罷免段祺瑞，段乃利用督軍團強迫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召張勳入京調處，張勳即迫黎解散了國會，並且實行政變，擁戴宣統復辟。但是經過討逆軍的十多天的戰鬥，復辟軍擊潰了，復辟運動亦撲滅了。

但是國會之解散，引起國民黨的反對，中山先生召集非常會議於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這樣形成了南北的對峙。在日本帝國主義援助下，北方的段祺瑞政府採取武力政策，爆發了南北戰爭，激戰於湖南。而這時候北洋軍閥內部已分裂爲皖直二系。直系以馮國璋爲首（馮死後，曹錕、吳佩孚繼之），皖系以段祺瑞爲首。前者依靠着英國帝國主義的奧援，後者以日本帝國主義爲其主人。互相爭奪，以後即接連發生了直皖戰爭與奉直戰爭。在南方亦發生了分裂，爆發着粵桂戰爭。這樣，中國是處在循環不息的內戰中了，這些戰爭之幕後的策動者爲外國帝國主義者，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時，也是軍閥間爭奪地盤擴張勢力的鬭爭。

由此可知，那時候，在經濟上，中國資本主義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政治上却處於黑暗與混戰的局面中，這裡就曝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着顯著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如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分析：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

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非投降帝國主義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卽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卽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卽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卽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試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後，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爲流氓，流爲盜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讓與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潮絕境乎？」

這裡，把『中等階級』寫得『尤爲困苦』，這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其實，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增長起來，同時，使得無產階級亦日益壯大。不過，那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已用大力在提倡國貨。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必然與舊制度，舊的政治統治發生劇烈的衝突。這一衝突當然不是什麼『護法立憲』與『聯省自治』所能解決，而必然要孕育成爲大革命的爆發，五四運動正是這一大革命爆發的前奏曲。

## 第三節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

在上述國際國內環境之下，五四運動的發生便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且前面所敘國際環境，還只說到俄國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促進作用，這當然是最基本的積極的作用；然而除此以外，當時德奧匈芬蘭等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印度、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以及朝鮮的暴動等，也都幫助推動了五四運動的來臨。同時，當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和平會議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世界各國前面提出了騙人的十四條，其十一條說『扶助弱小民族。』這種騙人的提議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中引起了一種幻想，這也給予五四運動的產生以相當影響。下面，我們即進而敘述五四運動本身的發展過程。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各帝國主義舉行巴黎和會，這一和會當然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當時中國政府亦想在和會中爭回一些權利，任命外交總長陸徵祥及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五人，爲全權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在和會中提出希望條件七項：（一）希望列強放棄在中國勢力範圍；（二）撤退各國駐華軍隊；（三）撤消各國在華的郵政電報；（四）取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時中國留歐學生，以和會關係中國甚大，特組織團體，推舉代表，探詢提案內容；而主張欲收回山東權利，非要求和會取消二十一條中日協約不可。於是五代表又作成請求和會取消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的陳述書，一並送交和會最高會議，陳述書中並請求歸還歐戰時在山東被日本奪去的各種權利。當然帝國主義是不會答應這些要求的，因爲答應這些要求，即無異提高中國的地位而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

略特別兇惡，同時它對於中國的佈置也就特別周密。在大戰正劇的時候，日本即和中國以及歐洲訂了許多條約，以爲先發制人之計；到大戰將了的時候，日本便又運動各國駐華公使，向中國提出參戰不力的警告，以損傷中國在協商方面的地位；而在巴黎和會的時候，日本更利用它在最高會議的地位，多方搗鬼，多方要挾，以牽制各國並打擊中國。各帝國主義一方爲了保持它們各自在華的特權利益，同時又被日本所劫持（事先英法政府爲了拉攏日本反對德國，曾和日本訂立密約承認日本攫取膠、澳），於是中國的希望條件便完全歸諸泡影。當時巴黎和會解決這一問題是異常滑稽的：帝國主義的強盜們說，二十一條不在和平會議的討論範圍以內；至於希望條件呢，則現在不是希望時期，將來再說。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一般提案，既被最高會議一筆勾消，今後所進行者，惟看討論山東問題如何。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是開演這一幕的日子，這天最高會議開會時，中國代表由顧維鈞、王正廷二人出席，提出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之德國權利，直接歸還中國之提案。提案提出後，中國代表曾有聳動視聽之發言；然而日本代表已早有佈置，中國代表發言之後，日本代表牧野，即起立宣稱：關於膠州灣之處置以及山東鐵路辦法，中日兩國早已訂有成約，根本不必提出討論。中國代表旋即聲稱：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中日協約，係被日本強迫所致，不能發生效力。可是日本代表說：一九一八年九月的山東善後協定，中國政府固有『欣然同意』之明文。因之中國在和會之地位，乃大趨於不利。同時日本對於國際方面，更大施其活動。英法意三國，因爲有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對日密約的關係，早已不能爲中國進一言；美國雖可不受拘束，但是它的所謂『扶助弱小民族』，根本就是騙人的話，所以也就不會替中國仗義執言；且日本又提出人種平等案，以爲要挾或交換之地。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中旬，意大利代表爲着阜姆問題未能貫徹，憤然離去巴黎；日本代表更

好乘機恫嚇，聲稱最高會議若不承認日本的山東權利繼承案，則日本亦祇有離去和會。帝國主義強盜恐怕分贖會議中途散夥，也就更加遷就日本，於是山東問題的解決乃全依日本意志。茲將當日協商各國對德和約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條，分別錄之如次：

第一百五十六條：『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中德協約，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之一切協約，所獲得一切權利特權，膠州之領土、鐵路、礦山、海底電線等，一概讓與日本。德國所有膠濟鐵路權，及其他支線權，及關於此項鐵路一切財產，讓與日本。自清島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電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無報酬讓與日本。』

第一百五十七條：『膠州灣內，德國國有動產、不動產，及關於該地直接間接之建築，及其他工事，無報酬讓與日本。』

第一百五十八條：『德國於和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將關於膠州之民治軍政財政司法一切簿籍契據公文書，讓渡於日本。同時期內，德國將關係前兩條所記權利特權之一切條約協約合同等，讓與日本。』

觀此三條規定，可知中國在巴黎和會中，對於山東問題，顯然是完全失敗。這一完全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大大的掀動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同時中國代表向北京政府電告經過情形，其中有『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們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等語。而北京政府在親日派勢力控制之下，又有不願屈辱，訓令代表簽字的消息，於是群情益趨憤激，五四運動就如火山一樣爆裂起來了。

中國民衆怒吼了，首先是中國留法學生起來反對巴黎和約的簽字，接着北京的學生也動員起來，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約」，「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等行動口號下，五月四日（民國八年），北京學生五千餘人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示威群眾首先以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交通總長），陸宗輿（幣制局總裁），章宗祥（註日公使）爲目標，示威洪流擁至趙家樓，火燒曹汝霖住宅，並痛毆章宗祥。當日反動政府立即派大批軍警鎮壓，拘捕學生多人，北大學生郭欣光等且因傷致死。於是引起北京學生的總罷課，宣言：外交緊急，國賊未除，日本逮捕中國學生，政府毫無辦法，今又逮捕屠殺愛國同胞，故罷課表示反抗。罷課後學生即組織講演團出發喚醒民衆，並查禁日貨，六月三日，學生因此被捕者又達千餘人。於是更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章陸，釋放被捕學生，並通電中外嚴令中國代表不得簽字和約。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繼起，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反動政府不僅在北京，同時在各地，亦對救國運動施行鎮壓：在南京，警察刺傷學生二十八人；在武漢，學生亦大批遭捕，並被軍警毆死一人；在福建，破殺學生爲數亦不少。這說明當時賣國政府，正努力替帝國主義者來鎮壓中國的救國運動。

然而親日派賣國政府對於學生及整個救國運動的屠殺和壓迫，並不能阻止五四反帝國主義的高漲，相反的，這個運動更加深入和擴展了。在全國民衆反帝國主義反親日派賣國賊的壓力之下，逼使當時反動的政府，不得不罷免曹章陸的職務，並答應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給了全世界一個大震動，這正是表現了五四運動之勝利的結果。

然而五四運動的收獲決不限於此。在五四以前，中國青年學生是很少組織的。在「五四」反帝國主義與反賣國賊的鬭爭中，覺悟到學生本身團結組織的必要，在北京「五四」爆發後兩天，就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領導着當時的北京學生救國運動。至六月，北京、天津、南京等處學生代表因情勢惡劣，集中上海，會商互相聯絡與援助等事，感到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之需要，乃通電全國各地學生聯合會，各派代表來滬舉行成立大會，並進行籌備工作，至六月十六日開成立大會，這樣全國學生聯合會便誕生了。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青年運動的開始。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封建思想的束縛，使知識分子的青年，首先感到這些壓迫束縛的痛苦和苦悶。他們爲西歐民主思想所感動，他們爲近代科學所驚醒。這樣就在中國民族自覺的發展中，青年學生成爲當時運動的發難者。從五四運動後，中國的青年運動蓬勃的發展着，帶給了中國社會以活潑生動的青春氣象。在歷次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中國的青年都成爲一部分活躍的力量。

不僅如此，五四運動又是一個強烈的反封建文化的運動，千古崇奉的封建的神聖——孔子竟被人起來推翻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啓蒙運動。在五四運動前已經開始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正是反映中國社會新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加強，而要求適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的新文化。五四運動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範圍擴大了，使五四運動以前一種純粹文化上的運動，變爲與群眾運動首先是與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相聯繫。五四以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爲五四運動準備了民族自覺運動發展的條件，而五四運動則給了新文化運動以群眾的基礎，這就是新文化運動能够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上起着這樣深刻的影響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內容，就是民主與科學的要求，這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條件。五四

新文化運動對舊的封建主義宣佈了戰爭，提倡發展科學運動，這表示了中國要向着現代的社會前進。

五四運動的一個主將——李大釗，他是五四運動時代一個典型的人物，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革命的偉人，他是一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是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倡導者，他是一個偉大革命的行動家，他對於舊的中國作了死刑的宣判，對於新的中國抱着無限的希望。他在民國五年就做了這樣的號召：『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讎讐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註五）這位澈底的民主主義者，這位革命的行動家，正是以他畢生的精力，為中國民族之解放，為中國人民之解放，為中國工人階級之解放而奮鬥。他始終忠於中國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工人階級的事業，因此而遭受了軍閥的殘殺。他的名字現在為每一個中國人民所記憶着。他的事業為革命的一代青年所承繼者。

五四運動的另一主將——魯迅，對於中國社會觀察的深刻，他對於舊社會批評的深刻，他對於革命運動的熱烈同情，他從不為舊勢力所屈服，他的文學創造，就是表示了他的一生的反抗的事業。魯迅如李大釗一樣，他們之所以成為近代的偉人，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在不斷的前進，他們並不為五四運動的階級基礎所局限。但同時又是一個一貫的最勇敢的民族戰士。從阿Q正傳裡就可以看出這位民族戰士的思想態度，他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熱愛，希望，和對他們的缺點的痛恨，是始終一貫的。『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這正是魯迅的偉大的地方。

（註五）見李大釗所作青春，載新青年二卷一號。



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了反對舊禮教的鬭爭，所謂『思想的解放』，這正是傳播近代科學思想的必要前提。五四時候痛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在吃人與禮教（註六）裡說：『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這很嚴厲的打擊了中國的舊禮教。

此外，五四新文化運動，又提出對中國文字的改革，用提倡白話文來代替文言，用活的文字來傳達活的人的意思；並且提倡文學革命，開闢了以後革命文學的新道路。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富有戰鬥性的一個啓蒙運動，他與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相連結。有些歷史家把五四運動當作一個單純的新文化運動去觀察，這是不能真正了解五四運動的，同樣也不能解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爲什麼會得到成功的。

#### 第四節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教訓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是很大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裡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凱的反動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幾乎一般社會都認革命是作亂，民黨是亂黨。而民黨自己呢，則右派宋教仁、黃興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協緩進，使袁世凱得以借帝國主義之資助鞏固反動勢力；在二次革命後，就已有許多民黨投降軍閥，受其收買；再則，這些右派於宋案發生之後還迷戀於所謂法律手續，和平解決；同時各地紳商階級爲保存自己的優越地位起見，竭力去結託革命後初興的軍事勢力以鎮壓所謂『土匪』——貧民的暴動，造成新的軍閥，並且鞏固軍閥的地方政權。這樣，所謂革命黨便不啻

（註六）見新青年六卷六號五七八頁。

與廣大民衆脫離關係，袁世凱等軍閥和士紳階級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騙一般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結果，反動勢力便完全戰勝了革命黨。

直到五四運動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終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所謂提倡國貨；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遠遠的可以聽到西歐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所以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實在是劃時代的運動：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集中它的主要鋒芒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親日派賣國賊。而且在運動中還自發的結成反日民族聯合戰線，參加運動的成份包括中國社會的一切抗日的階層。在這運動裡，我們切不可只看見學生，學生不過是運動的先鋒，當時上海有工人的罷工，上海、天津等處的商人也都以實力參加，這的確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裡各階級努力以行動干預政治，帶着群衆運動的第一次；而且取得了勝利的結果，打破了日寇第一次獨佔中國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

第二，這一運動的意義及其影響也是非常廣泛的：在政治方面，它演變成爲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面，它演變成爲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禮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鬭爭；在文學方面，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爲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我們民族解放鬭爭的歷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又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啓蒙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第三，五四運動時所發生的種種群衆的組織，如檢查日貨，抵制日貨等行動機關，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權。上海罷市的幾天內，革命的學生商人竟直接行使警權，尤其是工人的罷

工，也居然能以舊有行會的工人組織自行指揮。它不是軍事投機或軍事陰謀的行爲，而是一個廣大的革命的群眾運動。這種情形，顯而易見是辛亥革命以後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後，直到五四運動，中國的革命運動往往只是軍事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運動，或者只限於士紳階級的排外的愛國運動，沒有群眾的反抗，直接要求廢除對外條約，收回外國攘奪的領土的。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賣國親日的官僚和軍閥——安福系曹章陸等，以革命的群眾的直接行動襲擊這些反動派，別方面很明顯的提出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要求。於是便把辛亥革命以來反動派與「革命」派爭相「保護外人，尊重外人生命財產條約權利」而求帝國主義者之援助的局面改變了；換句話說，便是把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尊洋主義」的天經地義打破了，這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值得注意的又一點。

第四，這種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開始衝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雖然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正在發動，然而它無疑的把中國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就表明：跟着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某些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發展起來了。上海的工人——銅錫業機器工人、印刷工人、紡織工人、火車電車工人開始舉行罷工響應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出現，它走上中國政治鬭爭的舞台，這就預示着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將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後來二七罷工、五卅罷工和省港罷工中得到了證實。在五四運動中已有一部分急進的青年熱烈的同情社會主義運動，後來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階級增長的基礎上，爲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準備先決條件，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先聲。從此發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工會的組織，隨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產生，開始把社會主義的意識與工人的群眾運動相結合，這就把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五四運動要算是當時行將到來的中國大革命之序幕，啓發廣大人民的覺悟，

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功績。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在這運動發展中形成起來；同時，這運動也引導了業已陷於瓦解狀態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新生。而如果没有中共的產生和國民黨的改組新生，是不會有後來的大革命的。

至於五四運動對於目前抗戰的教訓，則從上面各方面的分析，亦可以指出其最著要的幾點如左：

第一，五四運動是工、商、學自發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這自發的民族統一戰線對於當時反對賣國賊和拒絕簽字於巴黎和約，以及打破了日寇第一次獨佔中國滅亡中國企圖的勝利，是起了決定的作用。這一勝利的歷史經驗對於現在的抗戰自然有莫大的意義，在抗戰的烈火中，全民族的團結正在加強着，中國民族統一的過程正在完成着。兩年餘來的抗戰完全證明中國只有團結才能抗戰，只有團結才能加強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處在日寇侵略的下面，除了全民族偉大的團結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而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挽救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和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保證。敵人所害怕的再沒有比中國民族團結更厲害的了，因此它們用盡一切方法攻擊和破壞中國的團結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是挑撥國共兩黨的合作，製造磨擦，進行反共的各種陰謀。它們正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許多弱點進行破壞中國的團結。它們知道要破壞中國的抗戰，首先必須破壞中國的團結；要破壞中國的團結，首先必須破壞國共的合作。因此五四運動所給予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發展民衆運動，這是戰勝日寇的基本條件。

第二，五四運動示威群衆反對的首要對象是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這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二十一條，反對袁世凱親日派賣國賊運動的繼續發展。正因為中國人民在五四運動中嚴厲的打擊了那些親日派賣國賊，才使中國代表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才使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獨佔中

國滅亡中國的計劃不得不歸於失敗。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順利的進行，是與反對內部的漢奸賣國賊不能分離的。不肅清內部的漢奸賣國賊，就不可能進行與帝國主義作勝利的鬭爭。當今天我們進行神聖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時，五四運動的這一教訓更值得我們學習。汪精衛賣國賊之流不但早已公開投降日寇，爲日寇策劃進攻轟炸中國的城市，策劃進攻中國的侵略戰爭；而且加緊反共宣傳和活動，以破壞和分裂國共兩黨的團結；並利用它們過去歷史關係，以破壞和分裂國民黨。不肅清這些親日派賣國賊妥協分子，就不能進行勝利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

第三，五四運動時代以及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運動，表現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民族解放中青年運動的統一和團結的精神。因此我們要發揚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就必須：（一）接受五四運動所表現的青年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活潑生動的青春氣象，把這種優良傳統發揮到抗戰中來，積極的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在抗戰中成爲一部分最活躍的力量；（二）接受五四運動所表現的青年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統一和團結的精神，把這種傳統發揮到抗戰中，經過各種的方式，使全國青年群眾都能不分黨派、信仰、階級、職業而統一團結起來。要繼續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首先應當把全國的青年組織起來，增長青年自身的力量，用各種形式，擴大舊有的組織，創立新的組織，發展各種適合於青年興趣的組織。現在大多數的青年沒有組織，不僅勞動青年沒有組織，就是知識青年的組織也是非常的不够。要達到青年運動的統一和團結，不把廣大的青年組織起來是沒有可能的。要繼承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必須要使各方面的青年工作者，對於自己的責任，對於自己的工作方法，都要有自覺的認識。要捐除成見，要發揮民主合作的精神，同時尤爲重要的是改變某些青年團體的工作方法，就是青年的工作應該是群眾工作的方法，而不是行政的工作方法，更不是特務的工作方法所能收效的。

第四，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文化運動與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相結合，當着文化運動把握到群眾的時候，它就變成了把社會推向前進的一種物質力量。現在我們來接受五四文化運動的教訓，就是要把抗戰中的文化運動與抗戰的群眾運動相結合，使抗戰的文化運動，更能在抗戰中盡更大的作用，幫助堅持抗戰，幫助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總起來說，五四運動是我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光榮的一頁，是我們民族自覺和反帝反封建運動底新發展，是我國近代青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底總發動。同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階級增長的基礎上，為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準備先決條件，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先聲。隨着就是二七罷工與大革命的發生，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也就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脫稿

## 第八章 民族解放的生力軍——現代中國工人運動

### 動的發軔

#### 第一節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社會地位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化。帝國主義者爲便利自己的剝奪計，始而建築鐵路、開闢航路及發達其他的交通工業以運輸商品；接着便用移植資本的方法，直接在中國開辦工廠，以更便利的來剝奪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於是西歐新式工業資本的勢力，衝破了中國閉關社會之政治經濟的範圍，逐漸由中國破產的農村中吸收許多喪失土地的農民到工廠中去做工，於是照着新式的資本主義技術而組織的大小企業中便逐漸聚集着很多失地失業的農民，逐漸形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加以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固然要極力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但究竟不免要刺激起中國民族工業的出現，逐漸傳播開新式工業的種子，形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因此從工廠生活的鍋爐裡鍛鍊出來的工人也就一天增多。『現代工人的無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照同一的比例發展——工人必須找得着工作，才能够生活，而同時也祇有他們的勞動力能够增多資本的時候，他們才能找得着工作。』這也就是說：工人推動資產階級向前發展，工人階級自己也發展起來。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則更有許多特殊的狀態，他們不但在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廠生活鍋爐中鍛鍊出來，而且

還直接從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生活鍋爐中壯大發展起來。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還只是最近幾十年間的事情；而且因為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困難，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也還很少。根據北京政府農商部自民國元年至九年的調查統計，總計全國織染工廠、化學工廠、機械及器具工廠、飲食物工廠及造紙、皮革、電氣、自來水等工廠所容工人數量有如下

表（註一）：

年次	工廠數	職工人數
民國元年	二〇、七四九	六六一、七八四
民國二年	二一、六八三	六三〇、八九〇
民國三年	二〇、三五一	六二四、五二四
民國四年	二〇、七四五	六四八、七二五
民國五年	一七、〇八八	五七五、五九二
民國六年	一五、七三六	五五五、五九二
民國七年	一四、三七四	四八八、六〇五
民國八年	一〇、五一五	四一〇、二七九
民國九年	一六、五二四	四一三、〇四〇

這個統計自然非常不可靠，不但帝國主義在華所設工廠中的工人不會統計進去，就是上列本國工廠的統計也非常不完全。據農商部自稱：有許多報告都不能代表全國，例如根據農商部同一處統計，

（註一）引自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



在民國九年僅是礦工工人一項就有五十九萬零八百八十五人，而猶稱報告不全，不足以代表全國，則事實上工人數量必遠較上表所載爲多，蓋可無疑。

另據工人旬報估計：（註二）中國機械工廠勞動者有一百四十六萬，普通勞動者人數則爲二百九十五萬。又據民國十六年時蘇兆徵的統計，中國產業工人爲數達二百七十五萬，城市手工業工人有一千二百萬人。上海是無產階級的中心，據民國十四年上海總工會統計：上海一埠有產業工人五十萬人，合計江蘇外縣共有一百萬人左右（因無錫、南通均爲產業區域）。此外，東三省產業工人合計有六十萬，武漢三鎮合計有四十萬，天津有三十萬，香港有二十五萬，廣州有十萬。這些統計雖然都說不上精確，但是如果我們約計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爲數達三百萬人左右，大概是符合事實的。

帝國主義之所以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原因，首先就是要利用中國賤價的勞動力。如果說西歐資產階級從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勞苦群眾血汗中，以獲得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去收買一部分本國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去緩和與分裂本國工人的鬭爭和團結，築下其改良主義欺騙的經濟基礎；那末，在半殖民地中國，則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對於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人，簡直是實行抽筋括髓的慘酷壓榨。它們經常把中國工人當成奴隸牛馬，加以任意鞭撻開除，在各方面進行超經濟的剝削，即利用中國半封建的剝削方法，加之於中國工人身上，以增加其額外利潤，其結果便造成中國工人的悲慘地位。同時又正因爲半殖民地的中國，外貨充斥市場，經濟命脈是操縱在帝國主義者手中，不僅壓抑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使中國民族工業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使中國民族工業不

（註二）日人西川喜一轉載於支那勞動者之現狀一書。

僅喪失了和外貨競爭的能力，而且要依靠加緊剝削工人來苟延殘喘。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也會採取民族解放政策，去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然而它多半是不堅決與不澈底的。它所依賴的補救方法，還是加重剝削自己的下層同胞——工人階級，「想在一條牛身上剝出兩層皮來」，（列寧）以達到它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目的。它們會花言巧語的對「工界同胞」說：「我們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大貧小貧之差，因此你們在我們中國廠裡，只應該努力增加生產，而不應做階級鬭爭」，這實際上就是要「工界同胞」束緊肚皮好讓他們這些東家老闆來加重剝削，而又不許反抗。中國又當着農村破產危機的時候，中國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破產的速度相差甚遠，農村過剩人口除當兵爲匪之外，尚不斷的遷入到城市中來，造成城市中之廣大的失業的勞動後備軍，資本家便以這種大量的失業群衆去恐嚇在業工人，假使工人發生什麼比較嚴重的經濟鬭爭，立刻便有失業的危險。所以不論在中國資本家的企業或外資興辦的工廠中的工人，總是工作時間特別長而工資却特別少，待遇也非常惡劣。在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聯合或分頭榨取下，使中國工人階級受着最慘酷的剝削，度着最黑暗最悲慘的生活。

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國家，恐怕很少像中國這樣延長的工作時間。歐美一般資本主義的國家，大多數都是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蘇聯工人則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以前，即已開始實行七小時工作制；中國工人每日做十四小時工作，則簡直司空見慣，並且還要早半點鐘站到工廠門外去候班，使着機器一刻不停，工人連預備、走路、吃飯、候班等等，一共必要十五六小時的工作。在礦山中，因爲工作條件特別惡劣，工作時間應該減少，歐美各國大都不超過八小時，蘇聯則祇做五小時半至六小時，而且連休息的時間在內。中國則非常奇怪，譬如唐山與山東磁博煤礦中，名義上是三班輪流，每班八小時，實際上工人因工資過低不能維持生活的緣故，往往不能不做連班，於是淨合工作十六小時。歐美各

國，星期日照例休息，星期六減少兩小時的工作，每週約合五十四至五十八小時，蘇聯每週約三十八至四十二小時，中國工人每週最低限度亦在七十小時以上，最通行的是八十四小時，間亦有一百零二小時者。歐美各國工人中，青工童工比較少，後來因為實行生產合理化，結果才逐漸加多，但工作時間比成年工人常要減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僱用青工童工作危險工作亦有相當限制；蘇聯青年工人係帶學習性質，大都半日工作，半日讀書，工作時間只有成年工人的二分之一，童工則已廢除。中國青工童工則與成年工人受同等剝削，工作時間一般都在十二小時以上，甚至有因資本家及工頭包頭等之加重苛待，而特別延長青工童工的工作時間，青工童工被僱作危險工作亦毫無限制，礦山中青工童工都很多，甚至如唐山、萍鄉、磁博等處礦山中，竟至僱用十五歲以下的童工，而且他們的工作時間都和成年工人一樣，常常在地獄不如的礦坑底下，繼續作十六小時的工作。女工在外國當生產前後都有長假，工資照發，蘇聯女工不獨有生產前後兩個月的休息，並有預備女工生產的特殊機關，供給生產女工以許多優待；中國女工則不但沒有這些優待，而且還要格外遭受許多非人的待遇。再則，中國人工資既少，有時尚須被廠主工頭用各種名目罰去，因此更不容易維持生活。至於勞動保險、失業保險、疾病救濟、工人子弟教育，在中國更是絕無僅有。但是中國幾百萬無產階級所受國內外資本家以及軍閥官僚壓榨凌辱的嚴重，却又是曠世無雙的，他們的經濟生活既極端痛苦，政治權利復被剝奪淨盡。中國工人階級要受到三重的壓榨——外國帝國主義的壓榨，中國資本家的壓榨，還要加上半封建勢力的壓榨。因此，忍痛受苦，形成了中國工人階級之空前黑暗的勞動條件，『物質的力量似乎具有精神的生命，而創造這些物質力量的人們，却降為飢寒交迫，甚至完全喪失了人的地位』，這幾句話如果拿來形容中國工人階級，無疑是很恰當的。同時這種情形也就無情的促使中國工人階級不得

不對這種非人地位表示反抗，使中國工人階級不僅要擔負社會解放，而且要擔負民族解放的偉大責任。

## 第二節 中國現代工人運動發展的趨勢和特點

中國現代工人運動的歷史是很短的，他們由『自在的階級』(Class in Being)進於『自爲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更只是『二七』流血以後的事情。在一九二三年『二七』事變以前，中國社會固然已經開始有罷工運動，例如一九二二年二月上海申報館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書中五十年來中國大事表裡『勞動潮流』一欄，就有以下之記載：

- 一八七六年 江西磁工因爭食白米，群眾罷工。
- 一九一三年 漢陽兵工廠工人因所得工資均用紙幣官票，紙幣跌價，群起罷工。
- 一九一五年 湖北乾成煤礦工人因延長工時不加工資，罷工。
- 一九一九年 上海工人罷工援助北京學生。
- 一九二〇年 開灤礦工一萬餘因要求加薪，罷工。
- 一九二一年 粵漢鐵路工人，因欠薪不發，罷工。
- 全 年 開平煤礦工人因與監督衝突，罷工。
- 全 年 粵漢鐵路小工，因要求改良待遇，罷工。
- 全 年 隴海鐵路機師因待遇不平，罷工。

上列記載中，一八七六年的江西磁工罷工，自然還說不上是現代產業無產階級的運動，一九一三年以後的罷工也還只是中國現代工人階級微弱的自發鬪爭的開始，而群眾的罷工還在俄國十月革命以

後。自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罷工與一九二三年「二七」罷工以後，才真正開始中國無產階級的群眾罷工運動；特別是「二七」罷工可以說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政治運動，香港海員罷工人數雖多，但其意義沒有「二七」那樣大。「二七」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群眾運動，而且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政治鬭爭。上海工人一九一九年的「六三運動」和香港海員罷工，雖然也帶政治性質，但一則處從屬地位，一則主要係經濟性質的要求，不如「二七」之明顯提出無產階級自己的集會結社罷工要求。中國無產階級自從「二七」以後，才明顯從「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爲的階級」，才明顯從自發的經濟的罷工進到自覺的政治鬭爭，才積極參加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革命的行伍。

中國無產階級一開始鬭爭，便是積極的政治的鬭爭，便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便在中國國內不斷的革命鬭爭的環境中。如果不是中國工人階級本身包含着相當多的弱點，那末工人運動的發展及其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一定還有更可觀的成績。這種弱點不僅表現在中國現代工人階級數量很少，階級年齡很青，而且表現在中國現代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是比較複雜。在帝國主義向中國積極侵略，農村破產情況之下，不斷地產生了龐大失業破產的手工業工人、農民、小資產者，他們不斷地流到無產者這一群中來，不斷地成爲中國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工人在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之後依然沒有脫離小農業或小商業的關係——工人往往經過宗法社會制度而和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家族有比較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小工業和手工業的工人：兄弟做工人，哥哥當佃農，叔叔開小鋪子，是很平常的事。於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也就利用這種宗法社會的舊習慣舊關係及工人的小資產階級性，以便利他們的剝奪，如包工制度、紅利制度、賞工制度等。這種利用落後的社會制度之情形，尤其是在於多量的雇用女工和童工，因爲她們鬭爭的經驗比較差。更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

薄弱，產業後備軍的過剩，使中外資本家可以隨意開除工人，形成中國無產階級的流動性。這些，就使中國無產階級內部存在着不少農民意識、行會觀念、流氓習氣等許多弱點，譬如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屬於青幫紅幫等類組織的，工廠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說了，這種現象尤以長江一帶爲甚。如果說中國無產階級因爲所受剝削的殘酷，比較不易接受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而這些弱點，却又是一種空隙，使中國統治階級得能利用來散播某些改良主義的蒙蔽。

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性，也使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雖然不大，而在質量上却產生了許多優點，這因爲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無產階級是在這個國度中生長起來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許多工廠，獲得了許多特權，並佔有優越的資本和技術，民族工業是受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排擠的，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比起民族工業的比重來要大得多，而在帝國主義企業中做工的，也完全是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人；因此，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富有半殖民地的民族特點；另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要比資產階級的力量來得大。其次，中國無產階級所受剝削特別厲害，生活特別痛苦，這就使其爭取解放的要求也格外迫切，因而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最容易團結起來，同壓迫者與剝削者鬪爭，且在鬪爭中特別表現勇敢堅決與激烈，比較不易接受改良主義的思想（自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存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因爲中國無產階級之半殖民地的民族特性，所以又使中國資產階級可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復次，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很有限的，它並不能鬪爭到底去開闢民族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道路，然而中國無產階級基於他自己所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等殘酷野蠻的壓迫和束縛，他是非常有利於驅逐帝國主義和肅清封建殘餘的，他是非常有利於使民族資本主義更快而無阻礙的向前發展的，中國無產階級也很有利於推倒帝



開始進行，即已作出兩次使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軍閥驚心動魄的運動——香港海員罷工與「二七」事件。現在先說香港海員罷工，在這次罷工之前，中國工人的經濟鬥爭已經日益開展起來，如一九二一年八月間長辛店工人開始進行加薪運動，十一月粵漢路工人因要求加薪而舉行罷工，同一時間隴海路工人舉行罷工，目的在於驅逐洋總管，十二月漢口人力車夫及香烟廠工人罷工，但是這一時期最大的鬭爭還是香港海員的罷工。

事情的發生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乃領導全體海員罷工，其主要領導人爲蘇兆徵，乃以後中國革命史著名領袖之一。前後加入罷工的海員有二萬多人，接着香港全市苦力運輸工人數萬人亦開始同情罷工。這一大罷工，堅持了八星期之久，結果得到了勝利，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在這次罷工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華人全體罷工時之民族的覺悟，可以看出英國帝國主義者在運輸停止時之恐慌和運輸工人之威力，可以看出英政府保護資本案（輪船公司）嚴厲的壓迫罷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員工會，勒令各行船館繳銷牌照，以武力來禁止海員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則代船公司招工，並拘捕同情於香港罷工之工人數名。雖然如此，而罷工依然取得了勝利。這一大罷工當時不僅得到了香港苦力工人和廣州工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北方鐵路工人的積極援助。京漢、京奉、隴海、正太、京綏等路工人，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的組織，舉行多次大會，發出許多通電和文告，並舉行募捐運動，匯款二千多元援助香港罷工海員，這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鬭爭，一開始便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爭取自己的利益的共同目標之下逐漸團結起來了。

關於這次香港海員罷工的意義，我們只要看下面所引伯恩斯（Ejnor Burns）在他所著英帝國主義



在中國 (British Empire in China) 一書中的一段話就可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中國工人大罷工，雖始於一九一九年夏季漢冶萍公司網廠，然首先當推廣東爲工人活動之中心。一九一九年罷工結果，工人得如其要求，增加工資。同年，廣州所成立之工會，凡二十六，其運動勢力，及於香港。一九二二年，第一次之總工會成立於廣州，相因而生之罷工事件，發生於各工業區域。在各罷工事件中，香港海員罷工，最爲重要。此次事件，相持至八星期之久；香港既爲英國所屬，且爲英國對華貿易中心，遂採用猛烈之處置以鎮壓罷工，而維持其貿易。」

「一九二二年香港殖民地報告有云：『海員罷工起自十一月三日迄於三月八日，其進行也，包括大多數之貿易在內，其影響於殖民地之商業甚巨。』」

「港政府禁止此六萬罷工工人離港，而大部分之罷工工人，必欲離港，英兵遂開槍射擊。然罷工工人堅不屈服，其結果，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當罷工時，港政府所撤消之香港海員工會之特權，亦得恢復。」

「自此次罷工以後，海員之組織，將中國舊式之行會制，根本推翻，而成爲一鬪爭之團體。影響所及，遂使中國之工人，成爲最有力奮鬥之分子。」

由此可知，這個鬪爭的歷史意義是很偉大的。因爲它不僅達到了加薪的目的，而且罷工的結果，居然把舊式的行會組織改變成爲鬪爭的團體。這個鬪爭本來就是一種民族鬪爭，它更明顯地指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國工人運動之民族的特點。中國工人運動是在民族解放鬪爭中發展起來的，而工人運動的發展，其刀鋒就更不可免地要直接地對着帝國主義。不但如此，這個鬪爭的力量及其勝利，又促進了全中國工人的大團結，強大了中國現代工人階級對於自己力量及其領導革命的信心。

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推動了中國各地工人罷工潮流的興起，工人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與加強起來了。當時工會組織較健全的是京漢鐵路工會和安源礦工工人俱樂部。接着香港海員罷工而來的，便是三月間上海紗廠工人的罷工，七月漢陽鋼鐵廠工人的罷工，八月間京漢路工人的罷工，九月間安源礦工的罷工，這些罷工大致都得到了相當的勝利。隨着工人鬪爭的興起與工會組織的發展，就使中國工人覺悟到全國工人團結一致的必要。於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工人二十萬，大會討論了工人參加民族民主革命，成立全國總工會等問題，這是全國工人團結與全國總工會誕生的先聲。

當時工會發展的過程中間，遇着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便是集會結社的自由問題。工會發生之初和罷工運動中，沒有一處地方未曾遇到過強權壓迫與武力恫嚇，如上海紡織工會、漢陽鋼鐵工會之被封禁，京漢及各地罷工中以及安源礦工中，都遭受到嚴重的武力壓迫。工人們知道要設法減輕以至解除這種壓迫，必須把自己團結起來，當作一個階級，要求制定一種國法，使勞動者「不能出賣的人權」取得一道由力的社會屏障。因此一九二二年八月會發生全國工人的勞動立法運動，要求國會通過勞動立法案。有個勞動立法案共十九條，第一條即是要求承認工人集會結社自由，第二條要求承認工人同盟罷工自由，第三條要求承認工人團體的契約締結權，同時又要求取消束縛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罷工刑律。工人們從自己痛苦中了解自由之可貴，要求自由之迫切，於那次佈滿全國的勞動立法運動中完全表現出來。自然，當時直系軍閥豢養之國會，絲毫不能給工人以自由權，不會通過有利於工人的勞動法案。不過那次運動是工人群眾爭取自由之必須的初步辦法，也是工人群眾進行政治運動之發端。及至十一月間，唐山五礦三萬餘礦工發生反抗外國資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罷工運動，罷工支持至

二十餘日，竟橫遭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楊以德的武力壓迫。唐山五礦工會、京奉路唐山工會及洋灰工會都被封禁，礦工受傷五十餘人，京奉路唐山工會書記彭禮和君被捕入獄。那次礦工罷工之受摧殘和工會之被封禁，北方鐵路工人異常憤激，愈覺得非爭得工人集會結社和罷工的自由不可。

正當唐山礦工失敗之際，全國各鐵路工會代表聚集北京，議決各鐵路一致罷工，要求恢復唐山鐵路工會、礦工會和洋灰工會，並承認礦工罷工條件，雖然因為時機已過，各路罷工運動沒有實際舉行，亦足見那時工人所感受的切膚之痛，便是壓迫工會的事件。那次會議最終決議有兩點：（一）籌備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次第統一各路的組織；（二）如某路遇到壓迫時，各路工會一致行動，以圖全體互相保障工會之存在。從此兩決議案看來，那末，我們便知道，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總工會成立大會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罷工，實非偶然。加以當時國際帝國主義已暫時鎮壓住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怒潮，重復向世界工人階級及東方被壓迫民族進攻；而當時直系軍閥又正抱着武力統一的野心，恰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統一全國鐵路工會的運動相抵觸，冤家路狹，分外眼明；何況還有漢口帝國主義者之教唆，沿京漢路各埠商人對於罷工工人的非難，於是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之流血慘劇乃起。

#### 第四節 京漢工人大罷工與「二七」流血

民國十年以來，京漢工人繼續組織工人俱樂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組織就緒，得十一個單位。四月九日在長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籌備組織總工會，以統一全路的組織。八月十日召集全路代表於鄭州開第二次會議，製定總工會章程，舉出總工會籌備委員，並決定總工會地址設在鄭州。緊接着第二

次會議以後，即同月二十四日，復由北段工人發起全路總同盟罷工，作第一次經濟的奮鬥，全路一致響應，支持二日，結果工人勝利，路局不得已承認工人九條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勝利自然又給與新的興奮，京漢總工會也就無形中得到權威了。總工會籌備了四個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復在鄭州開會，那時傳習所之百餘工人，亦悉數加入總工會，於是總工會的勢力益趨壯大，遂定於二月一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

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漢局長趙繼賢、南段段長馮雲忽致電吳佩孚，要求他禁止開會。吳佩孚乃下令靳雲鶚嚴禁開會，靳又指使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執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黃殿辰即到工會聲明禁止開會，工會與之理論三日，終無結果。至三十日，忽得吳佩孚致總工會電，召代表赴洛計議，工人於憤激之餘，遂派代表楊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煥章、凌楚藩等五人即日赴洛與吳交涉。三十一日見吳，吳一味敷衍恐嚇，仍聲明禁止開會，交涉遂無結果，代表即於當晚回鄭。是時京漢十六個分會，到鄭代表已六十五人，應召而到鄭之各工團亦有三十餘，計代表二百三十餘人。各地男女學生及新聞界到者亦有三十餘人。不但成立大會已準備好，並已由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通知各分會全體工友，於是日舉行慶祝大會，成立大會自然不能因吳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鄭後，即召集全體代表會議，報告與吳交涉情形，當時全體代表一致憤激，咸謂集會結社乃人民應享之自由，吳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猶再三計議，委曲求全，共同議決成立大會或可延遲一二日舉行，但各工團所送之牌匾，則須於二月一日迎送總工會會所。當以此意詳告黃殿辰，亦足見工人讓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鄭州全部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當各代表及鄭州全體工友整隊護送牌匾向工會進發時，中途竟被軍警包圍，舉槍威嚇，限止前進。於是群衆大憤

，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開會以雪此恥不可。全體鵲立衝心約二小時，代表與軍警長官再三理論，終無結果。乃奮勇拼死衝開陣線，擁入會場，首由主席宣布組織總工會宗旨，及此次強權無理壓迫之可怕，並鄭重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群眾亦遂大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與「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是時會場四周，已盡被武裝軍警包圍，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樂歡呼，聲震屋瓦。既而黃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嚇，強迫解散，但群眾仍照常開會。延至下午四時，始衝出重圍，宣布散會。是日下午，代表所住各旅館，即有重兵監守，不許囑語，總工會在酒館所定酒飯，亦不許開售。各代表一時完全喪失自由，飲食不得。各團體所贈的匾額禮物等，亦盡被毀棄道旁，不許饋送。總工會及鄭州分會會所均為軍警佔據，禁止工人出入，室內一切文件雜物，盡被搗毀。責問他們何以如此強暴？兵士都說，「是奉大帥命令」，當晚鄭州會所即被封閉。

各處代表目擊此種情勢，知毫無挽救之餘地和退縮之可能。即鄭重致函京漢總工會，其大要云：「京漢鐵路總工會能否健全，實全國工人共同問題。我們希望京漢總工會必能為爭自由而取得最後奮鬥之手段，各工團誓必為實力的後盾……」各團體代表於當日晚車及次日早車分別離鄭，各回原地準備實力奮鬥，臨時時無不慷慨激昂，大有破斧沉舟之概。各分會代表於忍無可忍之中，當即秘密會議，本着擁護總工會之天職，乃作緊急之決議：「我們為力爭自由起見，謹決於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漢路全體工人總同盟罷工，同時為事實上的便利起見，總工會決移江岸辦公，一切工作進行，於罷工期內，全視總工會命令而定，我們是為爭自由而戰，爭人權而戰，決無退後的」。這個決議案，便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具有價值的決議案之一，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罷工，便根據這個決議而爆發了。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時，果然全路一律罷工，所有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止。工人罷工後，即向

旅客散發傳單，說明罷工之原因。罷工工人之組織尚稱嚴密，因全路工人，自司機、升火以至小工，都是工會會員，各會員均聽命於各分會，各分會均聽命於總工會，秩序井然。維持秩序，則有糾察隊；刺探消息，則有罷工期內臨時組織的調查隊。但在組織上仍有缺點：第一，罷工後，車輛一概停止行動，總工會與各分會的信息來往，亦遂斷絕，可是敵人——曹錕、吳佩孚、蕭耀南、趙繼賢等，却能往返電商，調動軍隊，屠殺工人；而罷工工友反不能互通消息，以致敵人殺來，猶在夢中。這是因為鐵路上的電報生沒有加入工會，而且電報局工人沒有組織，所以鐵路工人未能與他們取得聯絡。第二，北段各站員司及站長等，居然私自開車，運輸軍隊，屠殺工人，而北段工人亦未曾阻止，這種缺點也就是『二七』鬭爭中很可寶貴的教訓。

四日罷工時，京漢路總工會即發表宣言，提出五條件，其原文如下：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雲，要求吳斬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

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匾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樂隊送還總工會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復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長官到會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並照發工資。

五、要求陰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總罷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蕭耀南派其參謀長張厚生至江岸，以強硬態度，要挾工會交出楊

德甫（後來成爲工賊）、朱蘭田、張濂光、羅海臣、林祥謙五人，工會答以「如有對於曹吳及交通部正當負責人來，總工會當然有全權代表與之正式接洽，否則，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報廠內已被大批軍隊佔領，大智門車站已開始賣票，張參謀長至工人家，拘去開車二人，用軍警壓迫，強逼開車，江岸二千餘工友聞訊，即全體衝破軍警防線，將該二工友搶回，張之陰謀歸於失敗。於是一變其陰謀破壞之手段，而爲威嚇強橫之暴行。首先捕去糾察隊工友三人，並連工會派往要求釋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項德隆（即項英）、羅海臣等四人，亦一併拘禁，百方威嚇，謂須槍斃斬首，他們毫不爲動，而二千餘工友又與軍警對壘相持，張氏無法，只得將項羅等七人釋放。

武漢各工團代表自鄭州歸來後，各以此次歷受壓迫情形，當衆發表，有痛哭者，有憤罵者，一種奮發激昂的態度，實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全體議決，願以死力與京漢鐵路工人一致奮鬥。遂於大罷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團各派代表數十百人，各持旗幟來江岸慰問，即在江岸舉行慰問大會，當時全江岸工友到者約萬餘人。首由京漢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長楊德甫報告招待慰問代表的盛意，並申述此次大罷工之意義及希望。繼由各工團代表及真報館記者數十人演說，無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漢總工會秘書李震瀛代表總工會向衆致詞，略謂：「我們此次大罷工，爲我們全勞動階級運命之一大關鍵，我們不只是爭工資爭時間，而且是爲爭自由爭人權……工友們！要曉得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染了！工友們！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火線上，應該我們去作先鋒，只有前進呵！勿退却……。」最後有人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萬歲！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呵！」凡三，群衆和之，聲如雷動。群衆乘茲憤怒之餘，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由江岸經過租界以抵華界，歷二小時許，沿途加入三千餘人，所過巡捕崗警無敢阻攔，

聲容之壯，實爲僅見。哪知同時卽有督軍代表與資本家在租界正大開會議，準備施行大屠殺呢！

二月七日，罷工開始已四晝夜。蕭耀南因屢次誘騙威嚇不成，乃變更方法。至七日下午二時，果有一警官來工會說：『刻奉蕭督軍命令，特來請求貴總工會派全權代表開會談判，如得同意，張參謀長卽可來貴會晤談，並擬穿便衣來，以示誠意，條件均可承認，惟請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示。』當時由總工會全權代表李震瀛、張灝光二人接見，在軍警包圍中，因窺見來人態度猝變緩和，頗有可疑，始終未以真姓名相見，來人乃約當日下午五時，參謀長准親自來工會談判，遂匆匆別去。至五點二十分頃，代表等正欲赴會中相候，半途槍聲大作，於是流血慘劇開幕。蓋他們乃用誘敵之計，以爲時機已到，工人領袖一定都在會所，遂由該參謀長張厚生戎裝指揮，率領武裝軍隊二營急馳而至，先將會所包圍，開槍環擊，計放槍在五排以上，當時有工友數百人在工會門前等候消息，一時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無從抵禦，當被亂槍和馬刀擊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殘傷者二百餘人。在工會慘殺之後，軍警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殺男女三口，分會長之弟亦被慘殺，總工會委員長之姪則被斬去其腿。於亂殺之頃，軍隊又大肆搶淫，計福建街一夜連洗三次，工人家中所有細小都被一掃精光，當時情態之慘暴，恐江水漢河亦爲之嗚咽不流！

當江岸分會被殘害時，尙有工友六十餘人被捕去，該分會正執行委員長林祥謙亦在內，縛於車站電桿上迫其下令復工，林君嚴厲拒絕說：『此事乃全路三萬人生死存亡所繫，我分會非得總工會命令決不開工。今既如此，頭可斷，工不可上！』如此問答者凡三次，張厚生卽呼喝下令斬首。同日長辛店亦有慘殺的事情發生，長辛店於四日上午十一點鐘罷工，六日軍隊開到，卽把工會包圍，至工人家內按戶搜索，捕去工友與工會學校教員史文彬、陳勵茂、吳雨銘等十一人，痛加拷打，綑縛地上，



預備送往保定，此時工人憤極，哀號痛哭之聲，漫漶天地！七日晨工人集合者三千餘，手持小旗，到軍隊住屋門前，要求釋放被捕工友，軍隊見群眾聲勢浩大，卽下令衝鋒，一時彈如雨下，刀劍飛揚，馬隊踐踏，工人中彈受傷者紛紛倒地，結果死四人，重傷者三十二人，越日死去者又不少，被捕三十多人，輕傷及逃亡者無數，事後軍隊強拉工人入廠工作，否則就地正法，因此喪命的竟至不可勝數。鄭州則於五日軍隊將工會職員三人捕去，加上鍊錘，視同盜賊，強迫三人下令上工，三人不爲動；六日又捕去工友二人，均上鍊錘，此五人被押至車站，意在威嚇工人，工人愈加憤激；九日有少數工賊被路局收買，破壞罷工，強拉一百多較落後的工人上工，其餘工人得漢口七日慘殺的消息，見大勢已去，不得已忍氣吞聲的上工，以釋放被捕工友爲條件。此次鄭州雖未死亡工人，但因罷工失業者前後凡三百餘人，所有工會職員無一能在鄭州立足，大半亡命各處。其他各小站分會如保定、高碑店、正定、彰德、信陽、新鄉、偃城亦備遭蹂躪。京漢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先生，以熱忱贊助工人之故，亦於二月十五日被害。這就是京漢工人「二七」大罷工及流血的經過。

至於各路及各地同情援助的情形，則二月四日京漢路罷工後，正太工會卽召集緊急會議，討論援助辦法，結果決定：（一）立時發出通電以作聲援；（二）準備實力援助，七日實行罷工；（三）派糾察隊往京漢正定分會石家莊部分，夜間幫同守望。七日正午，該路卽一致罷工，直至九日晚得到京漢工會通知，謂京漢工潮已被武力壓迫上工，請貴會明日開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證實後，正太方面才於十日一律忍痛復工。他們復工後，雖經武力恐嚇，但因工人團結堅固，故未受害；工會雖被封閉，然路局開除工會委員時，工人復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許他們復工。道清路工人數量不過千人，然於「二七」奮鬥時亦甚積極，該路工人與京漢路同日同時舉行罷工，支持九日之久，工會領袖王惟

儉等四人被捕入獄，黃業興、李培學、谷雪嶺、秦夢虎等均因此被開除，工會亦遭封閉。津浦路工會秘密約定於十三日上午五時，全路一致罷工，但南段浦鎮方面已先行發動，於十日上午實行罷工。嗣因京漢工友已遭武力壓迫上工之消息傳到，該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恢復工作，而全路罷工之計劃，亦只好中止。粵漢路自八日起罷工，隨後該路工人即被軍警用麻繩細綁上工，徐家棚工會亦被封禁。其餘如京奉路工會、京綏路工會均一致議決於八九日實行罷工，一切罷工手續，均已準備完善，不幸京漢大慘劇發生，罷工風潮亦漸平息，他們同情罷工的舉動也只好相機停止了。武漢各工團熱烈援助情形前面已提到一點，七日江岸慘變發生，同時武漢即宣布特別戒嚴，湖北工團聯合會及各重要工團均被封閉，然八日起執行湖北工團聯合會之議決案而實際舉行罷工者尚有：漢陽鋼鐵廠工人，漢冶萍輪駁工人，丹水池工人，揚子機器工人等。此外如上海、香港、湖南、廣州、北京等處，亦都有同情援助之表示，發表宣言，舉行示威，集款援助，不一而足。不但得到全國工人階級及一般被壓迫民衆的同情，而且震動全世界的耳目，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會爲此事發表宣言，海參崴工團總會和日本、朝鮮無產者同盟亦拍電聲援。

綜觀上述「二七」大罷工及流血之經過，可以想見當日工人之奮鬥精神，實不愧爲反抗帝國主義軍閥爭自由之先鋒。在這次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與犧牲的精神，當鄭州會議被壓迫解散，京漢路工會的總同盟罷工命令下時，各路工人幾如響斯應，雖各地軍閥走狗百般威迫利誘，然而全路工人始終服從總工會命令。至「二七」失敗，各路各處更是激昂慷慨，憤起而與軍閥抗爭。江岸工人處槍林彈雨之下，倒斃者已三十餘人，猶死守工會，無一逃避者，相持至數十分鐘，得工會退後之令始漸次退散。至於林祥謙烈士等從容就義的精神，更不禁使我們想起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工

人那種「爲勞動而生或爲戰鬥而死」的英勇往跡。雖然在「二七」鬪爭中也有不少缺點，例如進行工會運動中往往偏重於上層的號召，忽略了下層群眾的組織與訓練；而且在流血前不會看清帝國主義軍閥凶殘的實質，有些工人，甚至指導工人運動的領袖對於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沒有認識清楚，總以爲吳佩孚不至如此兇暴槍殺工人，因此也就沒有準備更殘酷的鬪爭，致使敵人高壓屠殺一來，工人措手不及。但是「二七」鬪爭畢竟是中國工人階級由日常鬪爭到政治鬪爭的空前偉大的運動，「二七」流血之後，工人階級很深刻的認識「工人階級的自由須由工人階級自己的血去換來」這個教訓的意義了。

### 第五節 中國工人階級與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工人運動在「二七」以前，只是初期的發生，「二七」流血證明了工人階級奮鬥的力量和決心，工會的需要從此普遍於中國工人的一般群眾中去。英美帝國主義者走狗吳佩孚等施行「二七」屠殺，大欲恐嚇工人群眾，撲滅他們的革命運動。可是實際上，正是「二七」之後，廣東、上海、山東、河南、湖北、湖南以至全中國的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紗廠工人等運動大天的發展起來，他們只能在極短的期間鎮壓住這個運動，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即「二七」流血的一週年紀念節，全國鐵路總會畢竟從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產生出來。「二七」之後不久，各地工人響應「二七」的鬪爭積極發展起來，他們都是繼續「二七」的精神，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的口號和要求，這種發展的結果，於是上海、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運動，才爆發而成偉大的五卅運動。

『二七』以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開始了很久，可是自五四以來，這一運動的極大部分還只在學生群衆中，一直到『二七』以前香港、唐山、京漢等處的大罷工，才深深的滲入工人群衆，使他們如潮水一般湧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二七』事變在中國無產階級前面鮮明指出：中國工人階級鬥爭的開始，便遇到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殘暴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首先經過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和推翻軍閥統治的道路才有可能。因此，『二七』事變更教訓了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參加民主革命。因爲驅逐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是有莫大利益的。而且在半殖民地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中國民族的利益正是一致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以解脫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統治下的壓迫與束縛，而取得政治上的自由，這樣去組織與鍛鍊無產階級自己。如果把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民主革命的利益對立起來，那就是大錯而特錯的。這正如列寧所說的：『凡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想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去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鍛鍊與組織自己的力量，爭取這一革命的澈底勝利，而轉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去。

## 第九章 國民黨改組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 第一節 國民黨改組前夜及改組中的中國情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帝國主義者即圖謀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掠奪，以補償其在大戰中的損失，和挽救其經濟的破壞凋敝。因為延長四年的大戰，使各帝國主義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不僅戰敗國內經濟極度破壞，同時負擔着大量可驚的賠款，伏在地下喘不過氣來；就是戰勝諸國，亦因久戰之後，元氣大傷，不論在工業方面，對外貿易方面，都陷於極度凋敝的狀態。各帝國主義者爲要補償在大戰中的損失，爲要恢復他本國的元氣，勢不能不加緊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掠奪。特別是大戰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除了俄國十月革命獲得了偉大勝利外，其餘的都因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叛賣政策而陷於失敗。帝國主義者這樣在鎮壓自己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後，便可大胆移其鋒刃再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施行掠奪了。這裡表現得最明顯的，便是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掠奪及其在掠奪中國問題上的爭執，而這問題也就成爲各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爭霸的問題。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會乘大戰正酣之際，從中國攫奪了許多巨大的權利，幾有造成對中國的獨佔而妨害其他帝國主義在華的既得權利之勢，這自然是爲英美諸國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大戰後已經雄踞在世界經濟霸主的寶座之上，太平洋的霸權是爲它所必爭的。因爲這不僅含有重大的經濟的意味，而且太平洋又是擴展美國海軍勢力的根據地。至於英帝國主義因爲在東方的殖民地甚爲不少，同時在東方的貿易亦最

大，自然亦非鞏固其在太平洋的勢力不可。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既已日益膨脹，在南洋亦有相當政治經濟的利益，當然亦不甘退後，這樣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爭霸戰遂由此展開了。然而此時英美日三國又都不能馬上訴諸武力，都希望暫時緩和內部衝突以便共同宰割中國。而當時美國則正想提高自國在軍事上的地位，削弱他國的軍備競爭，鞏固及擴大自國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利益，拆散英日同盟以打擊日本對華的獨佔政策，奪取對中國軍閥政府的策動權。於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美國總統哈定遂以討論限制軍備與協商遠東問題的名義，邀請關係各國開會議於華盛頓，到有英美法意日荷比葡與中國共計九國代表，正式會議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始舉行，這就是所謂華盛頓會議。會議結果，除了英美日法意五國海軍協定以外，都是直接和中國問題有關係的。當時中國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等提出之議案，先後共十餘起：（一）爲十大原則；（二）爲山東交還中國；（三）爲廢棄二十一條之中日協約；（四）爲撤銷領事裁判權；（五）爲關稅自主；（六）爲退還租借地

（註一）所謂十大原則，就是：（一）甲、各國尊重並遵守中國領土之完整與政府行政之獨立；乙、中國自願聲明，不以本國領土或沿海地方，無論何處，割讓或租借與任何國家。（二）中國極贊同門戶開放，即所謂有約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故自願承認並實行此主義於各地方，無有例外（這無異說，中國自願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永劫不復）！（三）爲維持並增進彼此間信任，及太平洋與遠東和平起見，各國倘不先期通知各國，俾有參加之機會，不得互訂直接有關中國或太平洋與遠東和平之條約或協約。（四）無論何國，在中國或對於中國，要求之特別權利，優越權，

；(七)爲取消勢力範圍；(八)爲撤退駐華軍警；(九)爲撤銷客郵；(十)爲撤廢無線電台；(十一)爲尊重中國之戰時中立；(十二)爲各國嗣後不得相互締結對華之約；(十三)爲解決有關中國成約之法律上的地位。但結果除了增加二、五附加稅，撤去客郵與日本放棄在山東省的特權以外，其餘即一無所得。雖在會議結果所訂九國公約中有所謂「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第一原則)之規定，然而，這不過是裝璜列強對中國掠奪的一種飾詞。如其列強真的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那就不應該束縛中國關稅的自主，不應堅持在中國領事裁判權與內河航行權，一切不平等條約亦應全盤取消了。如其列強真的尊重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那就更不應該有英國侵略西藏，法國侵略西南，日本掠奪滿蒙，並發動九一八以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了。所以九國公約的根本精神，明明是在加深中國的殖民地狀況，實質上並沒有尊重中國獨立的意思。至於所謂「予中國以發展機會並維持一鞏固有力的政府」(第二原則)，這也含有使中國發展其殖民地奴隸化狀態的意味，也

特免權，暨一切成約，不論其性質若何，契約根據若何，均當宣布。凡此等權利，未經宣布，概作無效。其現已知悉，或應行宣布之特別權利，優越權，特免權，暨一切成約，應予審查，以便確定其範圍與效力。其經審定有效者，亦應使之不相抵觸，並與本會議宣布之原則相合。(五)凡中國現受政治、行政、司法、行動自由之限制，應即時廢止，或按照情勢所許廢止之。(六)中國現時之成約，其無期限者概須附以確定之期限。(七)爲解釋讓與特別權利或優越權利之文據，應依照通行之解釋原則，以有利於讓與人嚴格解釋之。(八)將來倘有戰事，中國不加入戰

根本談不到增進中國民族的真正利益。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認識，就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和解放，祇有依靠我們自己的革命鬥爭，而不能幻想帝國主義的衝突或某一個帝國主義來賜予。

華盛頓會議結果，美國得到很大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這是無可否認的。但如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勢力即已大大削弱，不能再與英美競爭，那是很大的錯誤。事實上，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不但未放棄二十一條件，而且除了山東問題以外，它在中國境內的貿易、投資與各種政治經濟的特權，並未受到若何嚴重的損失。所以華盛頓會議一方面是表現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新協調，美國得到很多利益，並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某種限制；但另一方面，却又正是表現了列強侵略中國競爭的尖銳化，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且從此更加緊其獨佔中國的陰謀和冒險的侵略政策了。

這是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夜的中國國際環境的一方面，還有另一方面，那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團，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一切權利（九）應訂立和平解釋條文，以便解決太平洋與遠東之國際爭議。（十）應設立討論太平洋與遠東國際問題之會議，以便隨時召集，並為締約國決定共同政策之基礎。上述十項原則提出以後，各帝國主義者仍不同意，嗣由美國代表以中國所提原則太多為言，另外提出四項原則，經各國委員贊成通過。這四項原則的第一第二兩項，已見本章第一節正文。其第三第四兩項茲特附錄如次：（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和中國境內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乘中國現在狀況，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妨友邦安全之舉動。



及其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幫助。在世界大戰以前，帝俄對於中國之侵略，原不亞於英國與日本，這在本書第一卷中，已經有過敘述。就在一九一六年大戰期中，俄國還和日本締結了日俄密約，企圖對於中國全部爲協同之宰割，假使後來局面沒有變化，則中國命運，真不知如何危險。幸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帝俄統治完全推翻，蘇維埃政府代之而立。據新政府之宣言，其外交方針，一反乎帝俄侵略之故軀。凡以前帝俄政府與他國所締結之條約，有帶侵略性質者，一概廢棄之。此與大戰結束後，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要求自由平等之主張，正相吻合。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蘇俄政府並曾發表兩項對中國之宣言，聲稱蘇俄願意廢棄前此與中國締結之不公平條約，及與第三者所訂對於中國不利之協定、協約及一切條約，自動放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取消俄國在華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及前俄政府在中國所得一切特權，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與中國另訂新約，此項新約後果成於一九二四年。在訂新約前，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先生且曾與蘇俄全權代表越飛先生發表聯合宣言，這對於促進中蘇邦交，自然亦有很大作用。如果說前一種環境可以促進中國民族的覺醒，那末這後一種國際環境將更提高中國民族解放鬪爭的信心，並幫助中國找到有效的鬪爭方法。

至於國內的環境，那末當時中國情勢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中國民族經濟危機益趨嚴重。本來在歐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設廠的進展，也是很猛烈的；現在其他帝國主義者又重新加入投資設廠的競爭，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在這點上絕不讓人一步，更加猛進。在這樣情形之下，中國民族工業在歐戰時期發展的僥倖機會是喪失了。自一九二一年以後，外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即大行增加，而且入超意超過二萬萬兩以上，使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簡直有受挫折而陷於停滯的趨勢。第二，在各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新策動之下，中國軍閥內亂又繼續擴大了。一九二〇年的直皖之戰，算是中國軍閥內亂

繼續擴大的一個新開始，不久又發生奉直之戰。一切軍閥戰爭都是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反映；例如直系軍閥以英國帝國主義爲奧援，而皖系奉系則以日本帝國主義爲背境。此正如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分析：「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一九二三年奉直戰爭結果，直系得勝，發生了驅逐徐世昌的政變。接着曹錕實行賄選做大總統，暴露了舊統治者的極端醜惡，全國各地民衆因此進行了反賄選反曹吳的廣大運動，這次運動對於後來革命的開展，是給了很大的影響的。第三，與北方政局相關聯的南方政局此時亦發生了新變化。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先生因粵軍驅逐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軍閥的機會，自滬到粵。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被廣東非常國會舉爲非常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於廣州，曾有市民數十萬參加，爲空前熱烈的慶祝大會。中山先生就職後不久，即準備北伐。不料陳炯明早與吳佩孚相勾結，故北伐軍甫行出發，陳炯明即在廣州舉行叛變（陳炯明此時任廣州護法政府陸軍總長），圍攻總統府，炮轟觀音山，中山先生倉卒出走，北伐軍折回援助，復爲叛軍所敗。中山先生以護法政府已不能行使職權，乃由香港轉走上海，這次事變會給中山先生以極苦痛的印象，同時也表現了中山先生奮鬥的精神。他到上海之後，曾發表宣言，擬收束非常之局，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實行工兵計劃，但爲曹吳所拒絕，這就堅決了中山先生實行革命政策的決心。一九二三年間，孫中山先生因滇桂軍由廣西入粵趕走陳炯明的機會，於是再到廣州，被舉爲大元帥，這是造成後來革命根據地的開端，這時中山先生是充滿了革命的熱情的。第四，一九二

二年以後，工人的被剝削是加緊了，但是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團結力是加強了，這在上面第八章裡面已經敘述過了的。不但這樣，因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加重，軍閥內亂的頻仍擴大，各省苛捐雜稅是更層出不窮了；兵差、拉夫、人爲的天災，地租和高利貸的殘酷剝削，使民衆生活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是另一方面，農民運動也就用各種形式興起來了：南方已開始了農民協會的組織（如廣東東江），北方農民原始的自衛鬪爭（如紅槍會）是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了，資產者因工業的發展受到剝削，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反對軍閥戰爭，是有了新的覺悟了。

國民黨歷史的新階段，就是在這樣情勢之下產生的。

##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之史的發展及其改組經過

中國國民黨最初的前身是興中會，成立於一八九四年。主要的成份是旅居海外的華僑與知識分子（留學生），孫中山先生是其創始人。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之經過中說：「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這一組織產生的歷史背景主要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中國民族對外戰爭的屢次失敗，引起當時愛國志士的殷憂，想奮起圖強以振興中華，所以稱之爲興中會。一八九四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對於這點是表現得很明白的：「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窮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澁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

，幽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第二年香港興中會宣言，其內容也和上引一樣。但因當時興中會的主張僅僅是要求富國強兵，與列強並駕齊驅，並沒有依靠民衆力量，以革命手段去推翻滿清統治，所以不能有所作爲，而僅是一種小組織，進行一些宣傳方面的活動而已。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是中國國民黨發展的第二階段，因爲它已放棄了過去改良主義的企圖，而代之以推翻滿清政府的綱領，並在宣言中第一次提出「國民革命」的口號，樹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旗幟。其組織經過則據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之經過中的追述，其第一次會議是開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第二次會開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第三次會開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第四次會開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革命同盟會不僅包括興中會在內，同時光復會（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恒等）與華興會（黃興、宋教仁等）亦吸收在內。同盟會的四大綱領是：（一）驅逐韃虜（滿清），（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雖然它沒有將反帝國主義當作一個革命任務，不免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然而無疑問的，革命同盟會較之興中會已是大大的進了一步。這一進步是滿清統治的繼續腐敗刺激當時知識分子覺醒的表現，同時是戊戌變法的失敗，推動當時的革命黨人不能不從改良主義的道路轉向革命的方面來找尋出路了。同盟會在中山先生領導下，當時這是革命的聯盟，即包括當時市民層、小市民層、「會黨」以及反滿的士大夫之革命的聯盟。這是中國國民黨在遇到大的革命鬭爭時，把自己變爲革命民族聯盟的第一次。正因爲有這樣廣泛的革命民族聯盟的成立，才有辛亥革命的勝利。這正如毛澤東先生所說：「從同盟會組成到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爲了反對滿清建立民國之目的，聯合了一切反滿的革命黨派（從光復會到哥老會），在這個期間，它的黨員

充滿了英勇鬪爭的事蹟，再接再厲，富於朝氣，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可惜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二年同盟會即開始分裂，而不久同盟會也就改名爲國民黨。當時大部分上層黨人開始與舊勢力妥協，以爲革命從此勝利了；在宋教仁倡導下，將政黨的活動擺在議會鬪爭之上，而欲實行其政黨內閣的主張。於是乃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促進會四黨成爲一個國民黨，這樣國民黨便成爲一種龐大的政客集團。國民黨的綱領：第一，是促成政治統一；第二，發展地方自治；第三，實行種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維持國際和平。顯然的，誠如孫中山先生及其他國民黨人後來所公開聲稱的：這種綱領是已消失了革命意義的。民元國民黨實際上已完全喪失了革命的性質（當時同盟會中一部分革命分子會因此而痛哭，不願改名），已由同盟會時代的革命聯盟變成當時市民層與一部分較開明的地主、士大夫和經紀人之改良主義的聯盟。當時國民黨雖然在衆議院佔了多數的議席（共三九二席，其他黨派僅二二三席），但因爲當時中國是在北洋軍閥袁世凱的統治下，所謂政黨內閣的目的，不僅不能達到，而且袁世凱還組織了進步黨來與國民黨對抗。而國民黨本身也日漸分裂爲相友會、政友會、癸丑同志會、集益社、超然社等等小組織。就在袁世凱還沒有解散國民黨時，國民黨本身實際已經瓦解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至日本東京，於一九一四年三月「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以辛亥覆轍申做黨人」。（註二）中華革命黨在組織上較爲嚴密，加入者須立誓約，打指模。於民國三年六月開總理選舉會，到者八省，中山先生當選爲總理。同年七月八日，在日本

（註二）見中山全書·中國革命史。

筑地精養軒開成立會，中山先生即在成立會上就總理之職，當衆宣誓，公佈中華革命黨總章，並發表宣言，『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爲目的』。於整頓組織辦法，則『務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僞革命黨，以完成統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時代，異黨入據，以僞亂真』。（註三）自然，屏斥官僚與淘汰僞革命黨是應該的，但沒有注入新的血液，即沒有吸收革命群眾來參加，所以組織力量很薄弱，而且以爲滿清既倒，民族主義已成，不知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還有更嚴重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在誓約中只寫了民權民生兩主義。可見中華革命黨的政綱，同樣地也是帶了很濃厚的溫和色彩的。當時在國內的活動，大都用的還是國民黨的名義。民國六年，孫中山先生經日本歸國，進行護法戰爭。在這時期中，中華革命黨藉民友系名義在廣東國會中活動，而溫和色彩還是一般地佔優勢。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爲中國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爲政綱。其所以稱爲中國國民黨，是在示別於民元的『國民黨』。這可以說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正醞釀着向革命更生。這時候孫中山先生創辦建設雜誌，並著有建國方略。

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在粵就任非常大總統，並到廣西準備北伐時候，共產國際會派代表馬麟由粵轉桂與孫中山先生會晤，交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之意見。民國十二年蘇俄代表越飛來華，受北京民衆盛大歡迎。後越飛又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會晤，成立孫文越飛協定。據孫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一書所載：『自孫文與越飛會晤後，國民黨以容納共產黨員之條件與蘇俄攜手，兩方已有默契，至

（註三）見中華革命黨宣言。

去冬（卽一九二三年冬）鮑羅庭來廣東，乃決定改組方針，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遂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改組，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面目精神，俱爲之大變。」（註四）

在改組之前，孫中山先生曾在滬召集一些進步分子起草國民黨改組之計劃，並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確定了鬭爭的方針。主要的是：（一）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二）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四）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對私人所有土地，國家得就價稅或依報價收買之；（五）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六）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七）確認婦女與男子地位之平等，並扶助其均等的發展等，這一宣言顯然是國民黨改組的先聲。至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又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沉痛指出：「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爲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犖犖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然綜十餘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成，不得不自認爲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濶。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爲；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爲諱者也。欲起沉痾，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爲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並由「總理委任九人（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

（註四）見孫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三三七頁。

山、孫科、許崇智等），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黨章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互濟，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可見當時孫中山先生及其他國民黨領袖，對於國民黨改組，是很慎重其事的。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大會主要議程爲：（一）改組國民黨，通過新政綱、新黨章及宣言；（二）通過組織國民政府案；（三）准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問題。這次大會是中國國民黨走上正確革命道路的重要關鍵。大會通過了有名的宣言，宣言中對中國現狀有很正確的分析，批評了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及商人政府派的錯誤，而歸結於國民革命之奮鬥方針。大會對於國民黨之政綱，有很明確的規定，茲錄其重要者如下：

「（甲）對外政策：（一）一切不平等條約，皆當取消；（二）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中國人民不負責還之責任。

「（乙）對內政策：（一）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二）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三）確立縣爲自治單位，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四）實行普選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五）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六）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七）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釐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八）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九）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十）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



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十一）厲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十二）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國家對私人所有土地，得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十三）企業之有獨佔的性質者，及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爲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國民黨這次的改組，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一個不朽的偉業。推動這次改組的原因，第一是中國勞動者與小市民層革命運動的發展，第二是中國民族市民層辛亥以來失敗的教訓，第三是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俄國革命的影響以及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等。從此國民黨便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爲其鬪爭的指南，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爲其政策，使中國國民黨在革命的正確道路上向前邁進。

### 第三節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發展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東方偉大的民主主義的結晶，是革命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百年以來中國人民擲了無量數的頭顱，流了無量數的熱血，所要爭取的就是這個偉大民主運動的勝利，就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就是中國人民要在『國際地位上平等，政治地位上平等，經濟地位上平等』。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僅反映着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漲，而且有力地加強這個高漲。同時更由於國內民主運動廣泛和深刻的發展，由於國際社會革命運動的高漲，三民主義的內容也不斷地發展，而成爲不是單純的民主主義，而是革命的民主主義之高漲。

中山先生誕生於帝國主義侵略最早最深的廣東省，發動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起義的所在地。當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太平天國餘黨遺留於兩廣者當然不少。故中山先生十三歲（一八七八年），在鄉間讀書，聞其叔父及太平天國退伍老兵講洪秀全故事時，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因為那時國內還是異族——滿清的統治，腐敗的政治與不斷的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當然不能不使人民發生憤恨與要求自強的心理，此乃中山先生幼年時代民族主義思想之所由發生。第二年中山先生追隨他的德彰兄流入美國資本主義文明所拓殖的檀香山，使他離開古老中國的翠亨村，使他一時驚迷於資本主義的文明，也使他懷想與憤恨當時破舊腐爛的中國現狀。當他不堪忍受的時候，他只有與其他中國人一樣的熾燒着革命的熱情。當他回國（一八八二年）以後不久，又看到中法戰爭的失敗（一八八五年），這使他更加憤慨。他自己曾說：『予自乙酉（即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滿清創建民國之志。』（註五）以後又經過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使中山先生看到『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民族思想），與滿清政府『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民權思想），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難，災疫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民生思想），才逐漸形成三民主義。及至革命同盟會成立，中山先生乃將三民主義的內容歸納成爲四大口號，即：（一）驅逐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基於這四大口號的奮鬥，結果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

很明顯的，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理想，是從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矛盾所發展的三大問題（即民族問

（註五）見孫文學說有志竟成篇。

題、民權問題、土地問題)中所抽引出來的。我在本書第一卷中已經說過：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已不自覺地進行了解決這三大問題的嘗試，戊戌政變是對於當時擺在面前的這三大問題企圖進行自上而下的解決。然而明白提出這三大問題和三大原則的，乃是孫中山先生。這三大原則當時明白的提出和確定，正是中國各種矛盾的展開(對外對內的民族矛盾，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制度與生產力發展的矛盾)，以及中國人民自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進一步長成的反映。所以列寧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就這樣說過：「他(即指中山先生)這理想是深受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而產生的。」列寧又說：

「孫逸仙綱領底字裡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他絲毫沒有不問政治或者甚至於絲毫輕視政治自由的態度，甚至於完全沒有認為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及立憲改革等同時並存。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群眾鬭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信賴他們的正確與他們的力量。」

「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該民族不僅善於因自己長期的奴隸狀況而痛哭，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還善於去向長期壓迫中國的人作鬭爭。」(註六)

同時，列寧對於中山先生希望避免資本主義與預防資本主義的夢想，也會給以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的「社會主義者」底理論」。中山先生的偉大思想寶庫裡面所以會帶着這種

(註六) 見列寧所作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

錯誤理論，據列寧的研究，乃是由於「他的解放思想是從歐美學來的，而在歐美，目前的問題，已經是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問題，即社會主義了。因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必然產生他們的主觀的社會主義。孫逸仙的民粹主義，他的進步的鬪爭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土地改革綱領和他的似乎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實質就在這裡。」

不僅如此，中山先生當時的民族思想，顯然的，還只見到國內的韃虜統治，以為只要推翻滿清韃虜的統治，改建民國，實行民主政治即可以自強。在同盟會的綱領上，沒有提到反帝國主義的任務。所以一到滿清統治被推翻，即以為民族革命已完成，同盟會也解體了。再沒有料到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者，正在勾結中國的反動勢力，以圖消滅革命。甚至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於組織中華革命黨發表宣言時，也只說「國體與政體變更改後，即以鞏固共和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己任」，而對民族主義就一句不提了。因為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忽視，沒有找到實行三民主義的政策和方法，以致民國肇元以來，毫無成就。中山先生原以為推翻專制創建共和，即可從此纔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不料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軍閥之專制，因為中國陷於這樣的環境之中，使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不能不擴大到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

另一方面，五四運動也正是三民主義新生的轉機。由於革命失敗和妥協受挫的教訓，由於五四民族覺醒運動的興起，由於民衆力量的啓示，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並由世界革命運動的鼓舞，中山先生乃重整了三民主義的旗幟，而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便樹立了三民主義的新生命。在這時候，孫中山先生表現了很大的革命熱情。他在致蔣的信中，會稱：「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革命必須是「俄派之革命」

，而且主張不讓妥協分子加入，以免妨害革命之進行。這一時期三民主義新生命最大的特點，就是：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結合起來，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方法結合起來，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義的革命靈魂。第二，三民主義增加了新內容：民族主義由辛亥革命前的反滿明確地轉變到反帝，由大漢族主義轉變到中國國內民族的自由平等和自由聯合，此即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對於民族主義的確切解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義則進到主張『實行普選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的階級選舉』；宣言中更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又說：『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則不但在『平均地權』之外，加上『節制資本』；而且由『平均地權』進到主張『耕者有其田』。最後更進到確認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可以相容，中山先生不僅說過『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亦名共產主義』，而且還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呢！

我們應該承認：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唯心的哲學思想（雖然帶着許多新興的進步的因素），因此三民主義無論當作它是完整的思想體系來看，或是當作它是偉大的政治主張來看，在它自己更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中，終存在着許多不可避免的制限。然而正唯是這樣，我們對三民主義思想發展的如此其勇猛，如此其尖銳，應該特別表示尊敬。誠然，由於中國民族歷史的特點，中山先生三民主

義會被中國市民層和小市民層的根性所苦惱了的。市民層與小市民層有其根性的兩方面——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前者的兩方面是在反帝反封建問題上的革命性與妥協性，後者的兩方面是在對民主革命的革命性與民主革命之將來的消極性。市民層在進行革命的時候，需要依靠急進的社會力量，而提出急進的原則，使他們靠攏過來；但關於這急進原則的實現，是附以溫和的辦法的。同時，這急進原則事實上還只是市民層發展自己生產的要求，但小市民層却認為這即達到大同，而形成一種大同的烏託邦。這種市民層與小市民層的根性，苦惱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使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內容，在許多方面表現了複雜的交錯。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一些保守派和革命變節者，想利用這點，誇大溫和方面，誇大消極方面，來毀壞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革命的生命。但中山先生最忠實的革命信徒及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却應堅決爲中山先生的革命精華而奮鬥到底，求其貫徹。也即如列寧在辛亥革命後所預言過的：『把孫逸仙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抽引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

沒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能真正解脫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因而也就不能達到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而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進步和發展，正是啓發助長民衆底偉大精神與革命高漲的有力槓桿。

####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對於民族革命的主張和政策

隨着中國無產階級之產生，狀大與覺悟程度之提高，中國共產黨也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是由於：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開辦了許多企業，同時又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

的相當發展，產生了中國强有力的（雖然數量不大）無產階級；第二，中國無產階級在日常的鬥爭中，特別在參加五四運動的鬥爭中，不僅表現了中國工人力量的偉大，而且提高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而感覺到組織自己政黨的必要；第三，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與共產國際的創立，因而也推動着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在這些原因與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出現了。

在五四運動中，因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參加戰鬥，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一部分急進的知識分子已逐漸的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新青年一步一步地變成爲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雜誌，而在五四運動這一年（一九一九年）中國急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版每週評論，介紹社會主義學說，討論俄國十月革命；在浙江創辦了浙江評論；在湖南毛澤東則出版湘江評論。這些刊物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上的準備。不但如此，而且有些急進知識分子於五四運動後，已在上海工人中開始進行工作，建立起機器、印刷、紗廠等工會，爲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在同一時期，北方工人中亦有工人十人團的出現，並設立勞動補習學校，以進行教育與組織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在階級基礎上的準備工作。

一九二〇年春共產國際派衛琴斯基與揚明齋（華僑，山東人）兩人來華活動，首先找到了陳獨秀，於是開始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黨的小組，先後加入組織的著名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戴季陶、李漢俊、陳望道、李達、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等，並出版勞動者、勞動音等工人刊物。至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即在嘉興東湖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只有十三人，大會通過了章程，並討論了組織上統一的必要。

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又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杭州西湖，到會代表共二十人，代表黨員

約百人左右。討論的中心問題爲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與策略路線，通過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指出『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又說：『中國勞動運動是在第一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爲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日漸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至於『手工業者，小店主，小僱主也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這個大量的群眾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隊伍裡來。』

『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爲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共當時就主張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去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宣言中說：『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無產階級相信在今日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中共更具體提出了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鬭爭綱領：



「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爲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裡的奮鬥目標是：

- 一、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內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七、制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 (一) 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 (二) 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 (三) 廢除釐金及一切額外稅收，規定累進所得稅；
- (四) 規定限制佃租率的法律；
- (五) 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 (六) 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普及教育。」

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發表之後一月餘，中共發表了它的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具體的提出了聯合戰線的辦法：『中共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鬭爭；這種聯合鬭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鬭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鬭爭。』

在國民黨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的情形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一九二二——二四年終於形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中，要求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由於這共同的目標，在革命發展的某個階段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中國無產階級及農民的聯合成爲必要，這種聯合就在國共合作的形式下表現出來了。

馬克思主義者在相當條件之下和相當時期內，可以參加在一般的革命民主黨內或革命的民主政府內，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這在歷史上，本來是有先例的。馬克思自己及其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就曾參加過萊茵省資產階級民主同盟會。而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中更這樣說過：『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有一部分在開始，有一部分尙未成功，社會主義者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的無報酬的立刻解放殖民地，並且還應當最堅決的維持這些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革命分子，幫助他們以起義，或乘機做革命的鬭爭，以反對壓迫他們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因爲『在這些民族中，客觀上還有全民族的任務，即是民主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而『一切社會主義的政黨在現在時期和革命時期革命勝利時期，若是實際的行動不能證明在實際上是要求解放民族並與被壓迫者樹植自由聯盟的關係，則此等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背叛的行動。』因此，列寧在共產國際二次大會上所提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便這樣指出：『共產

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而且民族的因素不僅能影響勞動階級與農民的運動，並能影響其他階級的態度，在革命過程中，改變其形式；同時，民族的壓迫，必然要加速革命危機的成熟，加緊工農群眾的不滿，便利他們的動員，並且賦與革命群眾的起義以一種真正民族革命的基本力量和特質。因此，很明顯的，在打倒帝國主義軍閥，為建立民主共和國奮鬥時，在共同的目標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是馬列主義者所容許，而且是應該容許的。

何況，事實上，當時國共合作的具體條件也是存在的：

第一，在五卅運動後，國民黨已開始參加了新的成份，已加入了不少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而中共加入國民黨，可以更加吸收廣大的群眾參加國民革命，為國民革命而奮鬥。

第二，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廣東國民黨政府，當時並不禁止勞動運動，而且取消了治安警察條例與壓迫罷工刑律，表現對民主政治的擁護。

第三，國民黨同意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張，而且容許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外組織群眾，領導群眾鬭爭，再加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含有豐富的革命內容，可以經過中共來發揮其革命的主張。

所以共產國際執委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的特別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為依據。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居薄弱，因為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軍閥，尤其因為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變成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

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根據共產國際這一指示，中共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同年十一月，國民黨在廣州成立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已有共產黨員參加。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正式通過容許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於是國共合作就成爲實際的行動了。

### 第五節 國共合作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趨勢

國共兩黨的情況，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可以起決定的作用。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國共合作通過宣言時曾說：「這個宣言，係此次大會之精神生命，此宣言發表後，應大家同負責任。」又說：「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總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要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註七）事實上，中國國民黨這次改組，與國共兩黨合作之後，中國革命運動也確實有着突飛猛進的發展。首先在國民黨當政的區域廣東，工農運動與反帝鬥爭均有蓬勃的開展；在全中國則廣大民衆興起着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到處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剷除封建勢力，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在這種情形之

（註七）見中山先生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講詞：中國國民黨宣言的旨趣。

下，中共第二次對時局主張就提出：

『我們的主張是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

『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爲封建軍閥之傀儡，國民已否認其代表資格。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够制定憲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它能够否認各方面有假託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主權。由此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之力，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然後才不愧爲統一全國的人民政府，不是一個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個各派軍閥合作受列強卵翼的政府。同胞們！只有這條路是真能救濟我們中國人跳出外力軍閥二重壓迫的道路。』

但是在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和實行國共合作時候，曾有一部分國民黨溫和派，對於這問題有懷疑或不滿。在國共合作後，這種情形還是存在，有一部分不革命反革命的分子即藉口『反共』離開國民黨；而在國民黨內，仍有溫和派與急進派的鬭爭。

在中山先生及其他國民黨進步領袖固已確認要使『革命事業，得以早成』，必須實行國共合作，『同時又以中國現在大多數人民，皆陷於壓迫苦痛之中，則革命之基礎，自以聯合全民共同奮鬥，始能益顯其效力。故凡有革命勇決之心，及信仰三民主義者，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本黨無不推誠延納，許其加入，態度本極明顯』，（註八）可是溫和派却不以爲然，他們以爲：『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註八）見民國十三年七月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

；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重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指當時各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註九）這種見解，在後來證明完全是無根據的；因為反帝反軍閥的主張，不但不是要消滅國民黨，而且恰是幫助國民黨的革命新生及其力量的發展。對於這種現象，中國國民黨中央雖曾於民國十三年七月發表黨務宣言，加以糾正，並鄭重聲明：『本黨既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分子之必要。』可是溫和派的錯誤思想和行動，結果終於造成了各種不幸事件；如民國十三年九月上海南洋烟廠八千工人罷工，溫和派分子竟慫恿資本家壓制工人罷工；廣州印刷工人因要求加薪不遂而罷工，溫和派又幫助資本家壓制工人罷工；上海雙十節國民大會中，溫和派會利用流氓打死黃仁等。

這種鬭爭在當時竟一直發展到武裝衝突，這就是廣州的商團事件。廣州商團原是一種買辦資產階級地主的反動武裝，以匯豐銀行廣東分行買辦陳廉伯爲代表，久有和工人農民對抗的形勢及衝突；國民黨改組之後，因爲革命運動蓬勃開展，它們反革命的面目也就日益鮮明起來。恰在那時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無理壓迫中國民衆，工人群眾舉行罷工抗議（民國十三年七月），廣州市工人群起援助，香港海員亦表示同情，着實使英帝國主義受了一些打擊；尤其是國民黨改組之後，廣州政府之下左派勢力幫助工農組織及鬭爭的發展，與廣州政府本身親近蘇聯的事實，更使帝國主義憂惶不已。於是帝國主義一面大造『共產即在目前』的謠言，想藉以聳動國內資產階級及豪紳地主的觀聽；同時即嗾使陳廉伯等假商團名義，購械練兵，密謀推翻廣東革命政府。民國十三年八月十日陳廉伯自外

（註九）見當時張繼等護黨宣言、護黨特刊、民權旬刊。

國密運大宗軍械入口，爲廣東政府扣留；商團即以罷市相恫嚇，要求無條件發還槍械。並以「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的名義通電全省各縣商團，命令他們驅逐縣長，宣佈獨立。至雙十節革命民衆舉行示威運動，反對商團叛亂，要求政府採取緊急處置；商團即對徒手民衆，實行槍殺，死者二十餘人，傷者不計其數。屠殺之後，商團即在通衢張貼請「孫文下野」的佈告，並且明目張膽的請陳炯明回粵主政。孫中山先生這時表現了很大的革命毅力，藉群衆的幫助，以武力平定商團，將商團軍擊潰。在中山先生準備以武力平定商團時候，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會提出阻止的哀的美敦書，謂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命令，若政府對商團開火，駐紮廣州的英國海軍便將立即攻打政府。中山先生即向英國麥克唐納兩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電中最後聲明：「夫中國反革命黨既屢得英國歷來政府之外交的及經濟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實爲今日反革命黨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於深信此哀的美敦書之主旨，乃傾滅本政府，對於此種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之舉，余特提出嚴重抗議。」

國共合作後，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首先是馮玉祥之西北軍開始「赤化」：民國十三年十月發生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受着一個致命的打擊。馮玉祥入京後，不但迫退了曹錕，且強迫清帝出宮取消其皇帝稱號，沒收清帝一切財產。於是召集國民會議的呼聲又普遍中國。中共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又發出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爲：

「挽救此迫在目前危機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幾頭元老的善後會議，乃是本黨在去年在北京政變時所主張的及中國國民黨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爲它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

「我們希望國民黨領袖們努力號召全國人民的團體促成國民會議，並須努力使他們所主張之

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應極力反對軍閥們拿什麼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來代替此會，執行此會職權。此預備會之任務，不但是籌備國民會議，我們更應號召各階級的民衆及與各派帝國主義者尙無權實的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爲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

當時中共並更具體提出了這一臨時政府的綱領：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一重要是收回海關，改協定關稅制爲國定關稅制，因爲這是全民族對外的經濟解放之唯一關鍵。

「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無限制的自由權，因爲這是人民對內的政治解放之唯一關鍵。

「三、全國非戰時的常備軍，均以旅長爲最高級軍職，廢除巡閱使、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軍長、師長等軍職，因爲這是杜絕軍閥勢力集中盜國亂政之重要關鍵。

「四、軍閥之禍，罪在最少數高級軍官，失業入伍的兵士們所受壓迫與困苦，與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後旅團司令部，應採用委員制，軍餉公開；應改良現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須給以土地及農具或其他種確實可靠之生活。

「五、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取消田賦正額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規，謀農產品和其他種生活必需的工業品價格之均衡；促成職業的組織（農民協會）及武裝自衛的組織，這都是農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時工作制，年節星期日及各紀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資之規定，廢除包工制，工廠衛生改良，工人補習教育之設施，工人死傷保險法之規定，限制童工之年齡及工作時間，女工妊娠前後之優待，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設勞動平民之住屋。

「八、沒收此次戰爭禍首的財產，賠償東北東南戰地人民之損失及救濟北方水災。

「九、各城市鄉鎮之厘金牙稅及其他正雜捐稅，在國庫收入無多，而小本營商者則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律廢止。

「十、廢止鹽稅米稅，以裕民生計。

「十一、增加海關進口稅，整理國有企業之收入，徵收遺產稅，徵收城市土地稅。此等大宗稅收，不但足以補償廢此舊稅——厘金、牙稅、鹽稅、米稅、田賦、附加稅及其他各種正雜捐稅——之損失，並可用為補助退伍兵士、失業貧農及推廣教育之經濟。

「十二、為保障知識階級之失業及青年失業計，國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費移作別用，並應指定別種收入如收回庚子賠款等，為實行中小學免費、優待小學教員及推廣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地位上，均應與男子享平等權利。」

此時北方政局自曹錕倒後，在奉皖國民軍的三角聯合之下，擁出了皖系首領段祺瑞為臨時執政。臨時執政政府成立之後，宣佈於一個月內召集善後會議，並召開國民代表會議，這自然是段祺瑞企圖緩和革命勢力發展的一種詭計。而直系雖然失敗，仍思重振旗鼓，捲土重來，國內政局還在非常混沌

中。恰好此時北方國民軍諸將領（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及一般民衆都請中山先生北上，共謀解決國是。中山先生本與奉皖聯盟反直，至是認爲時機已至，乃實行北上，繞道日本赴天津。在北上宣言中有「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爲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和「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迹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此，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群衆之罪惡」之語，可見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已經逐漸找到正確的發展途徑。中山先生「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預備會議以下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爲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但是中山先生北上後，又感覺很大的失望。段祺瑞政府依然是帝國主義的御用政府，且宣言尊重

歷年與外國締訂之一切不平等條約，這與中山先生及全國民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剛剛相抵觸。同時段氏所召集的善後會議實際上是一切軍閥、官僚、政客的反動集團，中山先生乃堅決反對國民黨參加善後會議，而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而國民會議促成會亦於民國十四年三月一日在北京舉行，與善後會議相對抗。國民會議促成會期經過月餘，到會代表二百餘人。雖然因爲北京政府的壓迫阻撓，使國民會議促成會沒有什麼實際收穫，但是反對善後會議，傳播革命主張，引導群衆參加政治活動方面，則無疑有很大影響。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不幸竟病逝於北京。全國民衆皆以喪失導師爲大感，引起了全國舉行追悼會。「由無涯同情，而生無涯的興奮」。中山先生在其臨死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這樣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通力合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

况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中山先生這一遺書和他那『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偉大遺囑，將同垂不朽，成爲中國革命運動前進之指針。

當時英帝國主義不但喚使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破壞革命，更援助盤踞廣東各地的失意軍閥牽制革命勢力的進展。據有惠州的陳炯明就在英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時謀反攻。民國十四年二月陳炯明竟乘雲南唐繼堯入桂攻粵之時，響應滇軍。革命政府除派軍隊阻唐軍前進外，更擊破陳炯明的主力軍，克復惠州，陳炯明逃往香港，至是東江的反革命勢力遂被擊潰。

中山先生逝世後，在粵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又勾結北方段政府及雲南唐繼堯謀推翻革命政府。有圍攻廣州大元帥府之勢，這一反革命的『苦迭打』亦爲革命軍平復了。六月十三日黃埔軍及粵軍大破滇桂聯軍於廣州之河南，楊、劉逃滬。此後陳炯明殘部劉志陸在汕頭宣告獨立，與新至廣東的川軍總司令熊克武互通聲氣，又段祺瑞所任命的粵南八屬督辦鄧本殷進窺肇慶，都先後爲革命軍擊破。至此廣東全境的反動軍閥開始被剿滅，全粵統一於廣東革命政府統治之下。

## 第十章 掀起中國大革命高潮的五卅運動

### 第一節 「五卅」前夜中國經濟危機與革命運動的發展

在本書第一卷緒論中已經說到過：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這是國際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得到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的幫助，殘酷地把無產階級革命鎮壓下去，而得到資本主義相當穩定的開始；而半殖民地的中國，却正因為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加緊，而發展着經濟危機。這所謂危機，當然不是說中國民族經濟的完全停頓，而是工業化速度的停滯；在紡織業上，在煤鐵礦上，都同樣表現着生產速度的停滯、衰微與凋落。在中國，經濟危機與民族危機正表現了特殊的聯結。這種經濟危機的特殊形態，特別是表現於工業發展的停滯狀態，而於一九二五年初尤為嚴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建立的企業中，為獲得更高度的額外利潤，對於中國勞動者更肆行兇殘的剝削。它們利用中國底賤價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積極地在中國擴張自己底勢力。它們在中國設立工廠，既可以免納關稅，又可以節省運費，在中國製造商品賣給中國人，這是何等方便而有利的的事情。何況它們底背後有國家底力量作後盾，得國家底保護和獎勵，在中國又有領事裁判權作護符，有租界和租借地作根據，甚至有自己扶植的政治勢力幫助一切，所以日商紗廠迅速發展，決不是偶然的事。

「五四」以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實際上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展——實業發展的要求所表現出來的運動。從那時起，「提倡國貨，以杜漏卮」差不多成了一種口號。其實外貨的輸入，還是次一等的問

題，日本資本家在中國境內這樣發展紡織業，將來一切實業都照這樣下去，中國人雖欲排貨而有不得的日子。中國人要抵制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不但排貨運動沒有用，便是宣言提倡國貨也是沒有用——當時中國人自己辦的紗廠，已有許多被日本資本家併吞了去。要抵制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必定要勞動平民覺醒起來，必定要那「馴服的」勞動平民奮起鬪爭，爭得中國人民所應有的權利及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然而要這一鬪爭能得到勝利，最先的必要條件，便是中國勞動者的自由，中國勞動者一般的生活改善，確立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的經濟的權利。然而中國的資本家，在外國資本的高壓下，爲求維持其利潤的獲得，也從延長工人工作時間及減低工資上著想，弄得工人們生活異常惡化。農村方面，因軍閥的專橫和內亂的擴大與蔓延，農民所負擔的直接間接的租稅繼續加重，破產流離的繼續更加層出不窮。這種情形，正所謂「商埠表面，雖似趨於繁華，而其內幕，則不免受帝國主義及附庸者之支配。至於村落，則其困窮之象，每況愈下。蓋商業爲所操縱，新興工業爲所扼制，農業手工業爲所摧毀，農民工人之利益爲所吞蝕，更無待言。民窮財盡，悉由於此。加之各個軍閥間，或爲擴張地盤而戰，或爲保障地盤而戰，或迭相雄長，或以下征上，數年必戰，甚至數月必戰。有如前歲（民國十三年）秋間，江浙之戰，直奉之戰；去歲（民國十四年）冬間，江浙直魯及遼東之戰。所殺傷者，人民之生命；所蕩析者，人民之財產。蓋人民至是，已岌岌然不能保其生存，更無生活程度之可言矣。」（註一）

在民族新危機的前面，在經濟危機的發展中，另一方面，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也是在蓬勃的發展着

（註一）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共兩黨合作，在共同的鬭爭綱領上行動，集中與加強了對於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因而一九二五年初召集國民會議運動廣泛的開展着，反帝反軍閥的鬭爭也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掀動起來，特別是廣東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的勝利和工人運動更有長足的進步。

前面已經敘述過中國工人階級，經過「二七」鬭爭後，在鬭爭的經驗上，在組織力量上都加強了。在「二七」以前，鐵路工友的全國組織雖有計劃但無成就。「二七」以後的第一週年，全國鐵路總會正式產生，十餘路工人領袖開始作全國的秘密集會，雖遭曹吳軍閥數次的明顯壓迫，逮捕工人領袖至數十人之多，可是一年內艱苦工作，畢竟完成了全國組織的雛形，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日召集全國鐵路總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到了十二路的代表，共四十五人。會議中，除政治報告與會務報告外，更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組織、工人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等等決議，這次會議對於以後的鐵路工人的鬭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全國鐵路工人代表會後不久，一九二五年「五一」勞動紀念日又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這一會議是由當時的全國鐵路總會、漢冶萍總工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和廣東工人代表會議四大工會召集的。到會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五十四萬有餘，在會議中，決定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反對亞姆斯德丹黃色職工國際破壞國際職工運動之統一；並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了許多決議，特別指出工人階級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性，而且着重的指出工人階級應該成爲國民革命的指導的力量與運動的樞紐。會議開幕那天，全體代表參加廣州十萬人的盛大的遊行示威，並與農民代表、青年軍人代表舉行工農兵代表聯席會，顯示工農兵的大聯合。顯然的，這一代表會，對於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有極大的影響，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爭取指導作用的表現，是中國工人階級準備更劇烈更頑強

的革命鬪爭的表現。五十四萬餘有組織的工人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就成爲國民革命的中心的基本的力量，而五卅大風暴正是首先從工人階級的反帝鬪爭來開始的。

一九二五年初，首先揭起反帝罷工的義旗的，便是有名的小沙渡日本紗廠二萬多工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罷工運動。小沙渡的這些紗廠，屬於一個名叫「內外棉」的日本公司，這公司資本很雄厚，它在日本、青島、上海共有十五個廠，在上海小沙渡的共十一處。平時這些廠裡對於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聽話，非打即罵，慘無人道。工作時間是日夜輪班，每班十二小時，夜工並不加錢；工資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餘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資裡要扣除所謂「儲蓄金」，工人死傷疾病的時候却並不發還，只有每月另發很少的「儲蓄賞」；然而差不多個個工人每次領工資時都要被廠裡藉故剋扣，結果所謂「儲蓄賞」也仍舊扣去。再則，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壓更甚。成年男工總要比較強硬些，因此，廠裡更有一種極奸狡的陰謀——另外專養一批男女幼童，叫做「養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隸教育，等到長成之後，便一批一批的將他們替代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開除出來。這次罷工，便是因爲有一廠開除一批男工，將「養成工」去替代，並且拘捕工人代表。這種待遇和工作條件之下，中國工人簡直是日本資本家的牛馬，——他們住的房子，是三四家合居一間小屋，吃的是喂豬的食料。此等痛苦，難道是宣言抵制日貨的人所能感覺得到的？所幸這種工人已經團結，已經組織工會，二萬多人的群眾已經開始鬪爭了！

這一次罷工的醞釀，是發生於二月二日，是日內外棉第八工場的初紡部全體工人，無故被廠方開除；四日，被開除工人到廠中去領取工資，不料廠方不但不給工資，反將工人拘捕，工友們以廠方這樣殘狠，實在忍無可忍，遂一致罷工，提出：「不准打人，增加工資二成，被開除工人恢復工作，罷



工期內工資照發，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要求。當初領導罷工的是滬西工友俱樂部，但不久內外棉廠工會就成立了。條件提出後，廠方完全拒絕，於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二萬餘人的大罷工開始。同時曹家渡的各紗廠，都一致策應；楊樹浦方面的紗廠也起來響應。當時加入同盟罷工的計有日華紗廠、豐田紗廠、同興紗廠、大康紗廠、豐裕紗廠等，參加罷工工人共計七萬餘人。（註二）七萬餘人的共同要求是：（一）不准打人；（二）照章發給工資，不得延期，不得無故剋扣；（三）發還儲蓄金；（四）加工資十分之一；（五）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六）不得無故辭退工人；（七）釋放被捕工人。這一罷工，經過各方的調解，至三月一日始告結束，工人方面得到了相當勝利。

上海罷工結束後，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的大罷工又接踵而來。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和上海紗廠工人一樣痛苦，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給了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以一大刺激，適因青島日本資本家以野蠻手段制止工人組織工會，於是青島大康紗廠工人遂於四月十九日起，宣佈罷工。他們所提出的條件，都是當前最迫切的要求，如：日工每人每天一律加大洋一毛，包工按原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夜工飯錢一律加倍，取消押薪制度，因工受傷者工資照發（醫藥在外），一律免收房費，延長吃飯時間至一小時，此後日人不得打罵華工，應規定保護女工每月給生理假日二日，工資照發，減少童工工作時間每日不得過八小時，如工人違犯場規得由工會同意方可處分之，公司所罰工人之款應提交工會，作教育工人經費，此後公司待遇工人須一律平等。大康工人罷工後，日本資本家即日夜調動中國警察保安隊，欲向工人示威。延至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始由警察廳長提出調停條件，對於工人要求各條雖有少許

（註二）統計數字根據唐海君所著中國勞動問題一書。

承認，但均係不關重要的幾條。工友等因深知自己組織能力尚薄弱及所受之種種環境，當即將自己所提出之條件表示最大之讓步，僅就警廳之條件略加修改，更備函送至警廳表示接受警廳調停之誠意。此公函送去後延至二十四小時尚未見答覆，乃資本案更變本加厲，復於宿舍斷絕工人飲食。工人等憤激異常，除一面派代表見廠長交涉發放已屆期之工資外，一面又派代表通知警廳，說明資本案之惡劣手段，輕視警廳調停及欺侮工人等情。並聲明倘日本資本案不悟，工人收回昨日之修改條件，其責任不在工人。在大康附近之內外棉及隆興兩廠（同在四方）工人，因久受同樣之壓迫，聽到大康工人罷工，即已躍躍欲試。最初本希望俟大康得勝後，彼等可乘便獲得同樣要求，故另推出三四十代表議定發一宣言表示願作大康之後援，不料大康工人所提要求條件，久未得廠方之答覆，該廠廠主因見工人不安，更調遣海軍陸戰隊包圍工廠示威。壓迫愈甚，反抗亦愈甚，內外棉於二十三日下午實行罷工，隆興於二十四日中午停工，鈴木絲廠亦於二十五日早晨一致罷工，並聞滄口日本紗廠工人亦將追隨四方各廠之後，聞風而起。至四月二十九日參加罷工人數，已達一萬八千餘人。自大康罷工之後，各工廠均相繼成立工會，又特別組織罷工委員會及糾察隊，調查隊，宣傳隊，以進行工作。隆興自罷工後，日本廠主即雇用二百多保安隊壓迫工人，不准工人開會和自由出入宿舍等。但同時，青島工潮擴大後，上海各日本紗廠工會即派代表前往援助，全國鐵路總工會亦發佈宣言，號召各路工友實力幫助，膠濟路工友尤爲出力，青島學生界亦組織後援會表示援助。而且工人的團結力亦逐漸堅固起來，弄得資本案無法可施，支持了二十三天，結果竟被工人戰勝了。五月九日雙方簽字，由工會宣佈十號晚復工，十日下午三時開慶祝罷工勝利大會，到會的人數，約萬人左右，開會時群眾高呼「工會萬歲！工人團結萬歲！工人勝利萬歲！工人自由萬歲！」等口號。散會後結隊遊行，並舉行工會懸牌額典禮，

一時爆聲震天，歡聲雷動，頗極一時之盛。

五卅運動前，不僅工人的反帝鬪爭在猛烈的發展着，而且農民運動也開始表現活躍。不過這一時期，農民參加革命是很不平衡的，農民的作用當時還沒有很大的發展。大多數只是不自覺的無組織的參加，或者是大刀會、小刀會、或者是紅槍會式土匪式的反抗，只有廣東則有比較大的比較有組織的發展，當時在廣東政府範圍以內，已經有了農民協會組織者計有番禺、南海、順德、香山、東莞、寶安、增城、惠陽、海豐、陸豐、惠來、鶴山、廣寧、清遠、高要、新會、花縣、曲江、普寧、潮安等二十縣。其中已成立縣協會者有廣寧、花縣、海豐、陸豐四縣；其他各縣均已有了區農協會成立，農協會員人數已達十六萬人。在農村中，農民已經開始了反對苛捐雜稅的鬪爭，有的地方且與豪紳地主發生衝突。當時廣東農民運動的著名領袖是彭湃，他在農民群眾中有很大的影響。民國十三年，農民自衛軍會積極幫助廣州政府鎮壓商團叛亂；民國十四年，革命軍討伐陳炯明在東江的勝利，農民群眾的幫助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同時，北方河南、陝西一部分的農民也開始鬪爭。例如河南盧氏縣農民群眾因反對駐軍勒索苛稅，反對拉夫派款，曾發生三次圍城暴動，參加群眾動輒數萬；又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新聞報亦載有陝西農民暴動情形：「陝西東通、渭南、華陰、華縣各地駐軍十師及鎮嵩軍，年來想盡方法，敲剝百姓，去歲，該縣人民被迫無奈，相繼攜鋤持犁，赴縣交農器罷工，大起風潮」，亦可見當時農民鬪爭之一斑。民國十四年五月一日，廣東農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與中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同時在廣州開幕。到會代表一百二十餘人，廣東省農民協會亦於是成立。

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中國，由於當時廣大群眾反帝運動的發展，使其侵略受到極大的阻礙。對此

帝國主義就以屠殺鎮壓的政策來求解決，企圖以殘暴的血來洗除其侵略中國進程中的障礙，求得對中國進一步的統治與奴役，於是流血的慘案便不斷在各地發生了。帝國主義的屠殺首先在福州開始：一九二五年初，醞釀數日之福州英華書院學潮（反對帝國主義對華教育侵略的運動），一轉而為美國駐閩領事拘捕學生張秋仁事件，再轉而竟又發生四月八日學生被殺七人，受重傷數十人之大流血事件。當日福州學生聯合會曾有急電報告殘殺真相，茲將原電照錄如下：

「福州男女學生數千餘人，本日（四月八日）向省長請願，露宿公署，薩鎮冰命陸戰隊、警察隊並其他軍隊開槍轟擊，槍柄亂打，槍刀亂刺，死七人，重傷數十人，血流遍地，哀聲震天，現全城罷市，請一致援助！」

這個慘殺，直接是福建省長薩鎮冰指揮軍隊開槍，而間接發縱指使的，實際是美國帝國主義者！這一次『福州慘殺』有人比之於俄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林那殘殺』。因為這次『福州慘殺』是中國『五四』運動消沉六年後革命學生運動復活之開始，猶之乎『林那殘殺』是俄國工人運動受高壓消沉七年之後開始復活一樣。『福州慘殺』之後，又發生北京學生『五七』反帝國主義圍攻安福系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事件，則簡直是五卅運動的號聲了！

福州慘殺之後接着就是青島慘殺。前面曾說過青島工潮在五月九日雙方簽字十日復工，因為這次工潮工人方面得到相當勝利，所以日本資本家極不甘心，工人恢復工作後，廠方即故意三番四覆地不履行條件，向工人挑釁，藉此造作口實向中國官廳報告，說：『工人不安於工作，必須解散工會。』中國官廳對着這個太上政府，自然只有唯命是從，故得令後即召集工人代表，申言：『工會應該取消，因為日本人望着駭怕。』並拿出委任狀及金錢收買工人代表。不知工人經過二十餘日忍飢耐餓的奮

鬧，所得成果就是工會，差不多就是工人的生命一樣，哪肯取消！延遲至五月二十五日，資本家見工會仍活躍存在，更脅迫中國官廳，非解散工會不可。當地官廳因收買工人代表不成，即派大批武裝警察保安隊至四方欲實行以武力封閉工會，卒經工人群眾堅決反抗未果。日本帝國主義者見此情形，仇恨工人更甚，至二十八日夜深人靜時，中國官廳突調大批海軍陸戰隊協同原有武裝警察保安隊和陸軍秘密馳赴工廠附近駐紮，至夜半三時許，即以武力驅逐工人出廠，工人奮起肉搏，中外軍警一齊開槍，工人當場受傷斃命者八人，受重傷者十餘人，被捕者七十餘人。這次大慘殺，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事前準備計劃，中國軍閥官廳張宗昌、溫樹德即如法泡製。青島帝國主義軍閥這種殘暴行爲，與上海五卅流血中所表現的完全如出一轍，其手段之殘酷，唯有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皇屠殺彼得堡工人之行爲，差堪比擬。此亦正如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之嘗與工人階級以政治的客觀教訓，而終於引起全俄無產階級走上革命之大道。青島五月二十九日之慘殺乃喚起千百萬中國勞動群眾之覺悟，而此民族所潛蓄之强有力的革命勢力亦遂揮去其睡魔而進行動。

## 第二節 「五卅」大屠殺及上海民衆之反抗運動

到處都預示出大風雨之逼近，帝國主義與中國被壓迫民衆之流血的苦戰在「五卅」之前即已陸續開始，五卅之前各地罷工及各種革命運動的發展，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帝國主義強盜的殺機，尤其是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勢力之形成，更加使得帝國主義列強萬分的恐懼，更加使他感覺自己統治的不安，而更窮兇極惡的採用鐵血鎮壓的政策。自一九二五年開始以來，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因親日賣國派安福政府上台，越發在中國橫行無忌。二月間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已先中國各階級被壓迫民衆

發難反抗，舉行一次七萬多人的大罷工，接着青島日商紗廠工人也罷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工人階級這種反抗已斷然採取屠殺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紅並殺傷十多人，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學學生爲救濟死傷工人出發募捐，被巡捕房捕去施文定、謝玉樹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學學生赴顧正紅追悼會途中又捕去韓步先、趙振寰、朱義權、江錦維四人。被捕學生定於三十日在帝國主義會審公堂開審，這是上海各校學生出發講演之直接的動機。但同時，帝國主義當時還有一種壓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層階級，即所謂上海納稅外人會，要於六月二日通過工部局提出的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取締重工法案等四案，反對這四案，亦是各校學生出發講演之題目及宣傳的口號，且能引起一般市民群眾熱烈的同情。

五月三十日到了，上海各校學生二千餘人分頭出發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馬路散發「打倒帝國主義」的傳單，講演顧正紅被殺及學生被捕事件並反對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學生已被捕房捕去十餘人，旋即釋出；但到下午講演的學生愈聚愈衆，聽衆亦愈多，巡捕復開始捕人，至午後三時許，只南京路老閘捕房一處已拘留一百餘學生在內，當時未被捕的學生及聽講的市民，見此情形異常憤激，其時適值有一隊學生經過其處，聽見此事，遂參加要求立即釋出被捕者，至三時許，聚集捕房門首之群眾將近萬人，三時三十五分鐘，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槍，接着印捕即奉命平放一排槍，華捕亦向空放一排槍，群眾登時大亂四散。這一日計死十三人，重傷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學生繼續至各馬路散發傳單，講演。捕房復拘捕學生，老閘捕房宣佈戒嚴。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體罷市。自上午七時起，南京路上學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極多，發傳單者講演者到處都是。至十時許，所謂萬國商團和西捕印捕各臨陣備戰，先以自來水注射群眾，至十時五十

分鐘，遂開槍。這日死傷比前更多，狀況更慘。二次屠殺後，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於戰爭狀態。機關槍、鐵甲砲車、馬隊佔據各要害地區，這一戒備區域內，除電車外，其餘車輛及行人概不能經過。

二日，屠殺案到處不斷地發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嚴。上午小沙渡紗廠工人罷工，被廠方協同西捕槍殺四人，都沉屍蘇州河底。楊樹浦碼頭工人亦被英人雇打手打傷三人，拘捕數人。帝國主義會審公堂復於是日開審三十日被捕的示威群眾，公堂周圍外兵把守異常周密。至下午六時，遂又發生機關槍攻打新世界之事。原因據次日各報所載，係有一批「某國人」假裝中國學生（能假裝中國學生的某國人，自然是日本人無疑了！）在新世界門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騎，於是如狼似虎的帝國主義軍隊遂用機關槍步槍一齊向新世界射擊，砲如連珠，歷時約二十分鐘之久，死傷數目，無法調查，但被捕確在三百以上，且有二三十人立即下獄。在新開橋，又有西、印巡捕用機關槍向群眾示威，並開始拘捕罷工之電車工人。

三日，意美海軍陸戰隊登岸，把守電氣自來水等重要工廠，其他各艦亦陸續到來，或中途被召回滬。新世界下午被商團佔據去了！這日上午，楊樹浦又發生大屠殺，海軍陸戰隊上岸後，楊樹浦完全變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國主義軍隊遇見學生或工人裝束的迎頭便打。計三日一天之內楊樹浦死四人，重傷六人，輕傷者不計其數，是日並有一美兵武裝侵入華界尋釁。

四日，屠殺依然繼續下去。外艦開來上海日見增多，計至四日為止，各國兵艦共有十三艘：其中屬於英國的二艘，屬於美國的三艘，屬於法國的三艘，屬於日本的三艘，屬於其他國家的還有二艘。陸戰隊已經登岸的有五百五十人，尚有二千名正準備登岸。楊樹浦西捕開排槍轟擊罷工工人，幸未傷

命。美日陸戰隊有多人帶槍入華界搗亂。英國商團和印捕也有數人闖入華界。尤其難堪的，即四日上午陸戰隊包圍上海大學沒收一切文書，驅逐學生出校，強迫騰出爲陸戰隊駐紮。此種暴行到五日後復施行於大夏、同德、南方等校。還有滄洲、東亞、大東三旅社亦被檢查。

「五卅」大屠殺後之第二日，全上海即已開始罷工、罷課、罷市。截至六月四日爲止，公共租界完全罷市。特別是四日那一天，罷工尤其突然高漲，全上海各學校之罷課自無待言了。上海民衆八十年在外國強盜高壓之下過生活，其仇恨帝國主義自不必說，尤以下層階級爲甚。所以屠殺之後，全埠鼎沸，反帝國主義之潮流普遍於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尤其是工人階級，因爲此次屠殺發生的主因是爲援助被殺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犧牲生命務必達到各業罷工而後已。四日爲止，罷工總數已有二十萬人。三十一日各民衆團體在上海總商會開會時候，日商內外棉紗廠工會代表極激昂慷慨請求商人罷市，並且當場提出日商紗廠工人要求之七條件：（一）懲辦打死工人學生之兇手，並賠償損失；（二）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三）禁止毆打工人；（四）改良工廠衛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禁用外國巡捕；（七）反對印刷附律。六月一日即已有數萬工人實行罷工。自二日起大部分電車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罷工各廠，如同興、日華、內外棉第三、第四等廠都開始罷工，楊樹浦祥泰木行等廠工人及大阪碼頭工人亦相率罷工反抗。三日起電車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電話電燈工人亦罷工三分之二以上，祇剩少數人因被壓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二廠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則罷工者已達二十四廠，其中有四廠家係華商，餘均爲日本資本家所開。楊樹浦自當日慘案發生後，東方、怡和、德大、豫豐各紗廠工人遂全體罷工，其餘亦自動的停止工作。自六月三日起，不但各工廠工人罷工，即在西人機關或住宅服役之西傭，亦開始罷工表同情於被慘殺



的同胞。四日罷工風潮尤爲突進，計四日罷工者有康益、漢士兩洋行華人職員，日商絹絲廠工人，蘇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乾公司、柯達公司等華人職員，英美烟公司及日華紗廠工人；同茂公司、立興洋行、挪威商辦中國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銀行華人職員，日商伊藤烟公司、公大紗廠工人，美豐銀行、大英銀行、華比銀行華人職員，伊文思書局工人，上海總會侍者等。恆豐公司工人亦罷工。工部局鐵工廠工人，電氣處職員亦因工部局之殘暴，舉行罷工反抗。其他各洋行西惠亦多數罷工，碼頭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務、中華二大印刷廠已罷工外，其他亦多罷工，尤其是西報排字工人之罷工，使帝國主義機關難施其巧，西報工人並會開會遊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西報出版異常可憐，甚至文匯報竟用油印出版，可見外報之苦況了！四日上午上海總會召集各廠代表在西門少年宣講團開會，共到五十二個工會，二百餘代表，到會代表報告各廠罷工情形，無不慷慨激昂，誓願堅持到底。

學生群衆在此次運動中自然是熱烈參加的，首先起來援助工人的是學生，甚至於積極表示不怕犧牲反對四案的也是學生出頭。當時上海的學校，沒有一個不參加運動，便是向來不做社會活動的聖約翰大學此次也激起義憤，與校長衝突，脫離學校，投入此次之風潮，其他各校學生便可想而知了。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階級此次亦積極參加。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一日的被害者當中，有不少小商人和店員。『五卅』屠殺之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紛紛投函總聯合會，憤激地表示願意犧牲願意罷市爲學生後盾，總聯合會亦屢次派人和學生會接洽。三十一日各團體在上海總商會開會時候，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也站在工人和學生一邊，共同脅迫總商會非罷市不可，並且各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即已紛紛閉門停止營業。

上海的大商人階級此次亦被迫而參加運動。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首先答應工人和學生的罷市要求，但總商會則須工人和學生及小商人的三催四迫才勉強簽字答應罷市。五月三十一日午後各馬路商店多已閉門，到六月一日早晨七時南京路大商店還有開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後，才完全關門。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則不從總商會決議，於全市停業聲中，依舊開門營業，祇寫一封信給工部局輕輕抗議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議信不理，及字林西報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後，才於三日起勉強罷市。總商會雖然答應罷市，但同時即與帝國主義妥協，公然出來以調人自居了！

不過無論如何，革命群眾與帝國主義強盜的血戰却在不斷擴大。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兇暴壓迫依然不稍減輕，上海大學被封後，接着南方大學附中、大夏大學、同德醫校也走同樣的命運；各國海軍陸戰隊繼續登岸，大砲機關槍把守各要區，南京路的戒備日益加嚴，開槍威嚇群眾之事日必數十起，死傷時有所聞租界內的人民日夜生活於恐怖世界之中。六月五日晚十一時，萬國商團突然下令同時在南京路接連山東路、福建路、湖北路一帶檢查行人，所有過路的中國人千餘人，無論男女老幼，乘車或步行，登時失其自由，在手槍刺刀威迫之下，列成隊伍盡被驅入老閘捕房嚴行搜索，一千餘人鵠立露天細雨之下一二小時，結果西捕查無所得，始釋放而出。當時並有一汽車夫因行路稍緩，被商團刺傷，奄奄一息。八日搜查惠中旅舍無所獲，同日有河南來滬旅行之學生十五人在梁溪旅館被捕。六月五日爲止，英美日法意等國兵艦已增加至二十六艘，其中屬於美國的十三艘，屬於日本的五艘，屬於英國的四艘，屬於法國的三艘，屬於意國的一艘；各國軍隊已增至五千至六千名。自三日起，各國陸戰隊、商團及西捕越界肇禍者日必數起。五日西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並開槍轟擊中國保衛團。同日南洋大學學生在華界講演又被便衣西捕捕去，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華界拘捕啓賢學校學生，調來鐵甲

砲車二輛，英美水兵一二百人幾與保衛團接戰。其他外兵武裝侵入華界尋釁者極多，不可勝紀。截至六月十八日爲止，公共租界的戒備仍十分嚴密，恐怖空氣並未減輕。

另一方面，群眾的反抗亦繼續高漲。除公共租界外，法租界亦於五日罷市一天，南市亦加入罷市。罷工工人更日有增加。截至六月十八日止，罷工工人已增至二十幾萬人。新加入的罷工最重要的是海員工人，據十六日統計，已罷工之船共四十八隻，罷工之海員共有二千七百五十餘人。公共租界華捕罷崗亦過半數，這更可證明帝國主義之橫暴，甚至激起其所雇用之巡捕的反抗了！積極指導上海民衆做反抗運動而爲其代表者是工商學聯合會。風潮發生不久，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即組織起來，其所包含的團體是上海總工會，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全國學生總會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政府特派員蔡廷幹、會宗鑑及交涉員許沅到上海後，工商學聯合會特於六月十一日召集群眾大會，邀請蔡、許到會宣佈意見，那天到會者各工廠工人，各學校學生及各馬路商人，近二十萬人，政府特派員及交涉員俱堅邀不到，會場中群眾一致對外交官不滿；散會後並在華界遊行示威，革命情緒熱烈異常。先是六月七日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即已提出條件，計先決條件四，正式條件十三，現在分別轉錄如下：

(A) 先決條件：

- (一) 宣布取消戒嚴令；
- (二) 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
- (三) 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送回；
- (四) 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之各學校原狀。

(B) 正式條件：

視執行；

(一) 懲兇。從速交出主使開槍及開槍擊死工人學生市民之兇手論抵，並由中國政府派員監

(二) 賠償。因此次慘殺案所受直接間接之損失，如(甲)死傷者，(乙)罷工，(丙)罷市，(丁)學校之被損害者等項，須詳細查明酌定賠償額，應由租界當局按數賠償；

(三) 道歉。除上述二項外，應由英日兩國公使代表該國政府，向我國政府聲明道歉，並擔保嗣後不再有此等事情發生；

(四) 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五) 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

(六) 優待工人。外人所設各工廠，對於工作之華人，須由工部局會同納稅華人會訂定工人保護法，不得虐待，並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並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

(七) 分配高級巡捕。捕房應添設華捕頭，自捕頭以下各級巡捕，應分配華人充任，並須佔全額之半；

(八) 撤消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該三案歷經我國政府聲明否認，嗣後不得再提出納稅人特別會；

(九) 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十) 收回會審公廨；

(甲) 民事案；

(子)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丑) 洋人控告華人案，領事有觀審權，但不得干涉審判；

(乙) 刑事案：

(子) 洋人控告華人者，其有關係之領事，得到堂觀審，但不得干涉審判；

(丑)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寅) 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照(丑)項論，且原告名義用中華民國

，不得用工部局；

(丙) 檢查處一切職權，須完全移交華人治理；

(丁) 會審公廨法官，均須由華政府委任之；

(戊) 會審公廨之一切訴訟章程，完全由中國法官自定之；

(己) 對於會審公廨一切事權，除與上(甲)至(戊)五項無所抵觸外，均可根據條約

執行之；

(十一) 工部局投票權案。租界應遵守條約，滿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權，

應有下列兩項之規定：

(甲) 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華董及納稅人代表額數，以

納稅多寡比例爲定額，其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

(乙) 公共租界外人之納稅資格，須查明其產業爲已有的或代理的二層，已有的方有投

票權，代理的則係華人產業，不得有投票權，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

(十二) 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

(十三) 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

這些條件本來都已經是退還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在軍閥官僚買辦及資產階級看來却還是非常「過激」的，所以政府特派員和交涉員都不敢接受，加以當時民族統一戰線中已開始起階級分化，所以上海總商會就把這些最低限度的條件擅自修改了。當時總商會所提出的條件如下：

第一條 撤消非常戒備；

第二條 所有因此案被捕華人一律釋放，並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之各學校原狀；

第三條 懲兇先行停職，聽候嚴辦；

第四條 賠償。賠償傷亡及工商學因此案所受之損失；

第五條 道歉；

第六條 收回會審公廨，完全恢復條約上原狀，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須用中華民國名義爲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義；

第七條 洋務職工及海員工廠工人等，因悲憤罷業者，將來仍還原職，並不扣罷業期內薪資；

第八條 優待工人，工人工作與否，隨其自願，不得因此處罰；

第九條 工部局投票權案：(甲) 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之，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爲定額，其納稅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乙) 關於投票權須查明其產業爲已有的或代理的，已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享

有之；

第十條 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條 撤消『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

第十二條 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條 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由這兩種條件比較起來，很明顯看出：（一）總商會修改工商學聯合會『優待工人』的一條，換言之，即總商會不許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二）總商會獨不提出『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分配高級巡捕』和『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三條；（三）關於收回會審公堂一條，總商會祇要求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因會審公堂制度不是根據條約的，簡直是不願條約的無理霸佔！）而不想根本收回。這三點是最重要的，其餘各條減輕要求的還很多。由這比較，我們明白知道總商會妥協的傾向：在對外祇要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對內則抹煞工人利益以至限制工人力量的發展。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十七條件是代表革命勢力，為一般人民謀少許自由，總商會十三條件則代表少數上層階級利益。上海五卅運動開始時期這種十七條件與十三條件之爭，正是後來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聯合戰線破裂之先聲。不過這在五卅運動的初期還沒有發生怎樣大的影響，所以反帝運動還是如火如荼的前發展。

### 第三節 「五卅」事變後中國各地之同情援助

事變的進展是很迅速的，不消兩三個星期，上海南京路鎗聲已震動了全國各重要城市，直至最偏僻的村鎮。帝國主義的鐵蹄不但踐踏了上海，而且走遍全中國。全國各地援助上海工人學生的運動，帝國主義祇有報之以屠殺。同時，帝國主義的凶暴壓迫，亦祇有引起革命群眾更熱烈的反抗。由遠處的回聲打轉到上海來，我們看見各大城市的民衆都已崛起捲入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現在我們可以依次敘述一下緊接「五卅」上海事變後之各地屠殺及其反抗運動。

北京 北京爲當時中國政府與各國在華使館所在地。「五卅」慘案發生，中國政府因迫於民衆輿論的威力，曾於六月二日提一籠統而又軟弱之抗議於北京公使團，竟遭駁覆。六月三日北京學生爲援助滬案，舉行五萬餘人大示威，隊伍行至東交民巷時，被阻止不許通過。日兵及安南兵都嚴陣以待，使館界口預置水龍向群眾掃射，美國騎兵則向遊行隊伍亂衝，並擊槍以恐嚇群眾。三日以後，使館戒備益嚴。至十四日，復在使館界口佈設刺鐵絲網，這就可見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坐辦怎樣看待中國人民了！但群眾反抗運動亦繼續增高，六月十日反召集國民大會，到會群眾不下二十萬人，通過援助滬案反對英日議案二十起，並在大風雨中作示威遊行。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商會都發表了宣言，正式宣佈與英日經濟絕交；且倡議定六月二十五日爲全國大示威運動，籲請各地一律罷工罷市罷課半日，實行全國總抗議。

天津 自五卅慘殺消息傳到天津後，天津工人學生即異常活動，六月五日起，學生一致罷課，在南開大學操場集合，議決援助辦法，並出發遊行，沿途大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



取消外人在華一切特權」等口號。此後，他們便努力於群眾的宣傳組織以及募款接濟上海工人等。不久，海員罷工了，天津總工會成立了，帝國主義者嚇得屁滾尿流，於是便指使他們的走狗李景林出來干涉，封閉各界聯合會與海員工會。接着有日資關係之紗廠工人奮起罷工，李景林壓迫工人，更不遺餘力。六月十四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命軍閥包圍罷工工人，當場槍斃無數，並捕去學生聯合會職員多人，拷問會長辛璞田，逼令供出煽動罷工等「陰謀」的實情，辛璞田竟至昏暈三次，然而群眾反帝浪潮並未因此稍退。

武漢 「五卅」消息，六月一日傳到武漢，學生方面於二日即多數罷課，三日即總罷課，舉行大遊行兩次，平日半生不死的學生聯合會，至此亦生氣勃勃，演講隊竟不分早晚的在街上講演，傳單畫報，到處散發。工人方面，亦已開始活動，決定於六月十三日舉行大示威運動，十四日開始罷工，不幸十一日的慘劇發生，大罷工的事實，未能實現；中間雖有三五處舉行罷工，但隨即都被軍閥壓迫上工。商界方面，則代表大資產階級的漢口商會與華商總會，對於民族苦難漠然不關痛癢。只有武昌商會與漢口各團體聯合會，比較起來是代表中小商人的，所以他們對於這次愛國運動，還能表示同情，如武昌商會，在蕭耀南鐵蹄之下，居然也能組織五六千人的遊行示威。蕭耀南當愛國運動初起時，即採取壓迫政策，禁止學生上街講演，禁止工人集會。六月十一日因太古公司毒打碼頭工人，一般表同情於碼頭工人的車夫與棉花廠工人及一部分市民，集合到太古碼頭，預備示威抗議，因受軍警驅走，向大智門退去。其時英領已召水兵登陸，將租界要塞，概行把守，斷絕交通。大智門本是工人區，當時見太古碼頭群眾的被逐狼狽情形，憤激異常，群集大街者，約四五千，萬頭攢動，漸近租界，而租界以內的市民車夫等，亦聚集千餘人，英捕即用水龍沖射，群眾被迫退向華界，將鐵柵衝破，英水

兵復提槍追擊，華界工人見此慘狀，熱血沸騰，急上前營救，英水兵見群眾勢盛，即開機關槍射擊，一時彈如雨下，血肉橫飛，當場擊斃數十人，重傷三十餘人，輕傷者不計。肇禍後英兵將電燈滅息，將死者屍首用汽車移往他處，將重傷者送往醫院，重傷者相繼死十二人。慘殺之後，工人學生群眾與帝國主義爭鬪的態度更決絕，定十三日開國民大會，以謀反抗。可是軍閥蕭耀南爲效忠帝國主義，乃大施壓迫，立即捕殺革命戰士蕭英等四人，拘六人，解散學生聯合會，封閉揚子江通信社，禁止工人鳴語，捕小商人首領鄭慧吾，指學生代表爲過激派，嚴行逮捕，通緝參加此次反帝國主義援助滬案運動者八十餘人，解散漢口中學，並出佈告說，以後如有群眾示威運動，決就地正法，十三日的國民大會亦就因此流產了。

湖南 『六一』（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日艦水兵登陸槍殺中國民衆，激起罷工罷學罷市反日運動的紀念日）之夜，長沙民衆反日紀念的大示威後之夜，上海『五卅』慘劇之哀音已傳進長沙，六月二日上午已有學生講演隊在街上往來，大公報的號外亦飛滿街衢。傍晚六時，轟轟烈烈的兩萬人以上，的市民大會在省教育坪召集了，到會者以工人學生佔多數，通過即日成立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並高呼『對英日經濟絕交』『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撤退外人在華駐軍』『實行國民革命』等口號，散會後立即整隊遊行，情緒十分激昂。六月三日和四日，宣傳隊遍佈城鄉內外，各校學生會紛紛開會討論援助辦法。五日舉行空前的大示威運動，參加群眾約十萬人以上，須經過四小時始能通過一地。雪恥會在這一天並通電全省各縣一致發起同樣的組織和運動，但是政府的壓迫來了：三日示威運動以後，趙恒惕即在滿城張貼告示，說什麼『湘西戰事未靖，深恐土匪潛來省城，如有亂黨乘機煽動，定予就地正法』。六日晚間，因爲新河英人打傷華僕及上海新世界、楊樹浦之慘訊頻傳不

已，工人及男女學生又沿街呼號，並勸軍警一致對外，軍警多感泣不置，不過軍閥官廳之壓迫亦隨之加重，六月七日起，長沙全市戒嚴，各學校門口均派兵站守，不許學生出門，教育會四圍重兵禁止出入，重要街道五步一雙崗，「宣傳過激者斬，煽惑軍心者斬……」一類的告示，遍街小巷無處不貼，同時責令各校當局勒令學生上課，間有學生冒險上街講演者，旗幟都被撕毀，幾乎發生武裝衝突。當時長沙的運動大概如此，現在再來看看水口山的一幕。水口山是省有錫礦，工人三千餘人，一九二二年成立工人俱樂部。一九二三年被政府收買工賊資步程武裝解散，槍殺工人二名。工人俱樂部解散之後，虐待工人更甚，工資積欠半年不發，平日以土匪看待工人，監視極嚴。「五卅」慘案發生，該處工人激於義憤，將派代表到衡州學生聯合會探問情形，適有由省回衡之學生彭平之君見工人如此熱心，欣然願往，到山後工人開露天大會，請彭君講演，並議決停工示威，旋被軍警解散。六月十七日早晨停工示威，當工人正在集會之際，局長鄧壽荃下令軍警轟擊，結果工人傷者十餘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餘人，彭君亦在內。鄧並誣指工人反帝爲「土匪行爲」，請示趙恒惕，並捏稱工人劫槍劫餉，趙立覆電就地正法，幸被捕工人及彭君對於「土匪」二字雖嚴刑拷打，亦不承招，省方雪恥會又急電警告並派人交涉，鄧始殺心稍戢，然而中國軍閥官僚之效忠帝國主義，於此亦就暴露無遺了！

九江 九江亦有機關槍聲。六月十三日，日本浪人故意在九江台灣銀行廢址之內放火，藉以嫁禍「暴動的」中國人。軍警用救火車馳至時，日本浪人復制止救火，英日戰艦陸戰隊二大隊即登岸排設機關槍，並向空連放二響。事後各埠日文報紙都以頭號字登載九江「暴民」焚燬台灣銀行之消息，日本公使且以此事向北京政府抗議。然而帝國主義這種陰謀並不能阻止群眾的反抗；而且帝國主義所以

採用這種陰謀，足以反映江西民衆反抗帝國主義之熱烈，因爲帝國主義施行這種陰謀的時候，正是九江民衆援助上海五卅被殺民衆，群集於英日領事館前講演，因群情憤怒難遏，致與外國巡捕衝突，發生搗毀領事館窗戶事件的時候。

南京 南京民衆素來比較消沉，但是「五卅」大潮湧起，也就把消沉的南京民衆驚醒了。於是六月三日和四日兩天很熱烈的遊行示威；六月三日在城內，六月四日在下關。到下關的主要目的，在喚醒英廠和記洋行幾千工人起來共同做反帝運動。因爲在南京地方，只有他們才可殺進英國帝國主義勢力的營寨。遊行大隊到和記蛋廠的時候，剛剛是正午十二點鐘放工，大隊圍着和記工廠差不多成了一半圓形，大喊：「工人團結起來」、「罷工援助上海被殺同胞」、「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學生在烈日之下這樣憤激，工人就受了很深的感動。晚上又有熱烈的學生群衆跑到下關去接洽罷工的事情，果然，六月五日的一大早，和記工廠第一次大罷工居然實現了。罷工後，第二天即進城遊行，當遊行至東南大學（現在中央大學的前身）體育館集合時，口號呼聲震動天地，擲帽的，擲旗的，跑的，跳的，簡直成了瘋狂狀態。罷工之後工人即自動組織工會，同時學生講演募捐之事亦積極進行。罷工支持一月有餘，至七月十七日始以廠方承認十二條件復工。條件內容，工資自十六吊小錢加至九元一月，其餘對於待遇上亦略加改善，復工後工頭不像從前那樣橫暴，英監工也比從前客氣得多，工人方慶此次罷工爲有相當代價。廠方更調英杜班艦陸戰隊四十餘名，荷槍實彈，包圍工人，工人見勢不佳，爭相躲避，秩序大亂，英兵竟開槍轟擊，遂有南京慘案發生。是役當場死工人一人，輕傷二十六人，重傷一人，左腿竟成殘廢。慘案發生後，南京各界遂有下關慘案後援會之設，以指導工作。

廣東) 廣東在當時爲中國革命根據地，對於援助滬案反帝國主義運動，自然更不讓人後。所以「五卅」消息傳到，廣州學生聯合會立即聯合各團體在廣東大學操場開民眾大會，舉行遊行示威，並全場通過組織一個援助滬案的工農兵大同盟，進行各種工作。適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楊希閔、劉震寰等軍閥實行叛亂，時局嚴重，各界咸注全力於撲滅楊劉事件，對於援助上海五卅運動，不得不暫時停頓。然而對於外間的運動進行仍未稍懈，尤其注重在香港的活動，學生聯合會與新學生社都派代表到香港發動罷工罷課。中華全國總工會更專派代表蘇兆徵、鄧中夏等到港切實指導罷工。本來香港工人對於八十年來的奴隸待遇早已受够，即使沒有上海五卅事件，香港、沙面奴隸們也會有起來對不住英國皇家的一天，如今既有五卅屠殺，便再也忍不住了。一聲呼喊，大家拋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結隊的離開他們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這就是歷史上可資紀念的六月十九日。這次罷工最先發難的是海員、電車、印務工人，接着就是洋務、煤炭與碼頭工人。於是各種工人相繼踵起，機器船塢工人殿其後，前後約十五日，完全罷盡。罷工後，工人從火車輪船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奮起。罷工後，香港工人即發佈宣言，說明罷工之原因，宣言之後，附以要求，分爲兩大綱：第一部分，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部分，對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項。香港政府對於罷工非常氣憤，因此宣佈歐戰時所無的戒嚴令，及禁止糧食出口令與禁止金銀塊底紙幣出口令，一面以鐵血政策鎮壓香港，一面又欲以封鎖政策飢餓廣東。然而工人激於民族義憤，萬死不辭，蜂擁離港，沛然莫禦，素以兇殘著稱之軍官總督史塔士雖捕領袖數十，亦卒無濟於事。於是「東山崩裂，浴鐘響應」，沙面英領事捷米遜遂於六月二十三日對沙基遊行民衆施行大屠殺了。此時廣州時局已稍平定，乃定六月

二十三日舉行援助滬案第二次示威大遊行，是日到者不下六七萬人，行至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地方，被英兵發排槍及機關槍掃射，英法葡艦並開巨砲，轟擊達二十分鐘之久，當時擊斃中國民衆五十二人，受傷者一百七十餘人，是即轟動世界之沙基慘案。沙基屠殺之後，廣東民衆莫不悲憤填胸，厲行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工人方面更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以主其事。

除以上各大城市外，其他如開封、福州、廈門、濟南、鎮江、杭州、寧波等處，都有積極行動，而且普遍到窮鄉僻壤，陝西、山西、廣西、雲南、貴州等都有響應。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五千餘人竟乘車至北京參與遊行，河南、廣東數鄉農民亦開農民大會，對五卅流血有所表示。此外各地發起捐款救濟罷工工人尤指不勝屈。而且引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之同情與援助，首先是蘇聯，自得屠殺消息後，莫斯科即有盛大的示威遊行，向各帝國主義作嚴重之抗議，紛紛募捐救濟上海、香港等處罷工工人，共產國際，少共國際，赤色職工國際都特地發表宣言，援助中國各地被難戰士，並且要求各國共產黨與全世界勞動人民及一切正義人士，起來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國在外僑民亦都積極聯絡各國人民，舉行示威募捐，於是五卅事變變成國際的事件了！

#### 第四節 「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

在繼續敘述五卅運動以後各種詳細經過及探討五卅運動所開關的中國大革命的各種重要流變之前，我要在此先把「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給它一個確定的位置。

A·加蒂克斯氏說：「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發生了一個開了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史上的新時代的「突發事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這樣的事件，照例是被帝國主義的新聞這樣稱呼的

。」（註三）帝國主義者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它們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是向來抱着輕視態度的。它們向來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看為卑賤民族，只能受它們踐踏壓榨，而不能起來反抗以求解放。殊不知中國人民已經有過長期的奮鬥，五卅運動也決不是什麼『突發事件』。帝國主義僥倖渡過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一時期以後，正以更濃厚的強盜性來搶劫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想重新振興它們已經衰敗了的工業，補充已經洗空了的金庫，以富饒著稱的中國自然更逃不脫它們的虎牙鷹爪。它們拼命地從中國收買廉價的原料去製造商品，再運到中國來高價出售，拼命地移殖資本到中國來開辦工廠，利用中國賤價的工資和原料，同時又可以轉而操縱中國的市場；拼命地指使並利用中國軍閥互相廝殺，以攫取許多非分的利益。帝國主義對中國這樣拼命進攻侵略的結果，所以一九二四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政治發生嚴重的恐慌，促使中國革命運動不斷的前進。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更給中國革命運動以有力的推動和幫助。加以『二七』血戰之後，中國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一九二五年開始，職工運動復興發展，全國鐵路總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相繼成立，廣東、沙面罷工，上海紗廠的大罷工，青島紗廠、漢口烟廠等處罷工的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學生參加革命運動的奮發——北京學生之五七示威，太原學生之抗稅鬪爭，福州學生反日運動之流血等。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與鎮壓商團叛亂的勝利，促成國民會議運動普遍全國。一切這些事件，都表明五卅事變之前，各地民眾都已開始活躍，革命的火線已經各地爆發。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槍聲響了，於是潛伏在社會中許多革命的小潮至此匯聚一處，成一股大潮。帝國主義最初只以對待義和團暴徒的眼光和方法來對待『五卅』流血所引起的反抗，不知一九二五年已經不是義和團的時代了，帝國主義野蠻的屠殺竟如火

（註三）見加蒂克斯氏所著從廣東到上海日譯本一〇頁。

上加油，結果反而促成中國革命更劇烈的發展。由此可知，五卅運動絕不是什麼「突發事件」，而是帝國主義野蠻侵略中國之必然的產物。

「五卅」事變，這是中國革命群眾化的最大歷史關鍵，它展開了中國革命一個新的時期，它的發展速度也是可以驚人的，這正如五卅事變後蘇聯評論所說：

「這運動開始於很平常的經濟要求——中國的工人要求幼年工人每天做八小時的工作，成年工人每天做十小時的工作，星期日休息，這種要求是半世紀以前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早已提出來過的。

「這運動本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結果竟變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取得了世界的意義。

「從八小時工作的要求到撤退駐華外國軍隊的要求，這中間有個長距離；而這距離，中國工人祇在幾天之內就跳過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俄國的工人群眾經過長時間準備以後，也會用很快的步驟走過了同樣的路。英日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現在所給與中國工人的教訓，正像那被工人鮮血所噴濺的尼古拉斯羅曼諾夫皇朝反動軍隊所給與俄國工人群眾的教訓一樣。

「那時候俄國工人從痛苦的流血的經驗中悟到了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俄國工人的爭鬥一點一滴的變成了政治的爭鬥，而人民的喊聲：「推倒專制」也愈喊愈響了。中國工人現在也從痛苦的和流血的經驗中開始不僅悟到了經濟和政治的關係，而且也悟到了中國經濟和國際政治——喋血的帝國主義政治的關係。

「英日帝國主義者的軍隊打死了幾十個中國工人和幫助工人的學生，英國的警察監禁了上海電氣廠和自來水廠的工人。上海這些部分的工人是在手槍的壓迫底下做工，然而罷工却在開展着



成爲總同盟罷工，而運動的範圍却繼續不斷的擴大了！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一天一天的響起來，有力量起來；上海的工人一天一天的上前堅決的在這個大運動裡面做中國廣大群眾的領袖。英國、日本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正打急電給他們的軍艦，喊他們到這個活動的場面上來。我們不必是一個預言家就可以知道，幾百兆中國人民對於外國資本主義強盜的憤恨一定因此而更深，他們的要求：「勿侵中國」一定因此而更響」。

五卅運動不僅是上海無產階級的發動，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的發動。五卅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大規模反帝國主義鬭爭，工人階級並自己起來實行革命的獨裁——上海總工會領導極廣大群眾，這些群眾自動沒收日貨，省港罷工糾察隊用群眾力量來制裁賣國賊，在這種革命的獨裁之前，張學良、梁啓超等起初都不能不代表統治階級讓步。在五卅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客觀上已經在爭取革命領導權，無產階級的行動指明應用直接行動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五卅」事變後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外國廠家的壓迫要反對，中國廠家的壓迫也要反對。國民革命的發展與階級鬭爭聯繫起來，事實上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拿階級鬭爭去領導國民革命，沒有這種領導，中國革命運動是不能如此蓬勃發展的。

但是，無產階級若不同時去實行解放全民族，它自身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爲正如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如果不除去那集中地，現在它自己境遇上一切現代社會底非人生活條件，而要單靠消除自己的生活條件來達到解放自己，那是不可能的。」（註四）而五卅運動正是反帝統一戰線在群眾中的

（註四）見馬克思所著神聖之家族。

具體表現。在『五卅』中，帝國主義的殘酷的屠殺政策和毒辣的陰謀詭計——分裂政策，使廣大的中國群眾認識了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的死敵，掀起了深刻而廣泛的民族覺醒，而在各方面加強地團結了自己。自民國十三年國共合作後，雖然已經在政黨的形式上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建立；可是，真正的全中國的廣大群眾中與鬭爭中的民族反帝統一戰線的實現則以五卅運動為開始。在五卅運動中，差不多每一地方的愛國運動，不僅工人農民參加，學生以至民族資產者均捲入到反帝浪潮中來了——雖然民族資產者是動搖的與妥協的，而工商學聯合會則是群眾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五卅運動的時代特質在於它正是勃發於世界資本主義表現相對而暫時穩定的時期。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都在欣然色喜地慶祝他們的繁榮之恢復與鞏固，都在發狂似的向國內的勞苦群眾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緊『合理化』的掠奪戰；甚至許多『社會主義者』——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亦在謳歌『資本主義的組織化』，或是對世界革命表示絕望的情調。然而瘋狂的『資本攻勢』終於不能掩蓋資本主義自身的破裂，社會民主黨的謬言亦不能遮飾資本主義的內外矛盾。除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與法意，美日與英法及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不絕地暴露出無可調和的矛盾，和資本主義列強與蘇聯之間的對立日益強化以外，資本主義國內的勞動階級亦並未消滅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攻（如英國的鑛工、鐵路及運輸工人的總同盟罷工），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鬭爭更在日益高漲着，印度的反英運動之劇化以及五卅運動後中國革命高潮之掀起，都是以說明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只是建築在一座隆隆雷鳴的火山之旁。五卅運動所掀起的中國大革命，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由暫時穩定而走到新的更深刻的危機的一個重要信號。

## 第十一章 從五卅運動到北伐

### 第一節 帝國主義的新政策和愛國運動的新發展

『五卅』大屠殺，乃是帝國主義列強鎮壓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必然的現象，同時又是中國民衆形成廣大的革命聯合戰線，反抗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始。自上海南京路英帝國主義者施行排槍掃射，無數革命健兒以鮮血染紅了民族革命的旗幟，不轉瞬間怒潮般的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巨流即普遍激盪於全國。南京路屠殺之後，首先激起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大罷工，五萬餘學生的大罷課以及全滬極大部分商人的罷市。上海數十萬民衆合組之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解決慘案的十七條件，成爲全國民衆之共同一致的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權，收回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隊等口號成爲全國民衆一致奮鬥的政治目標。全國各城市，各鄉鎮之被壓迫民衆都一致崛起參加此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接着又迭有英日帝國主義者在漢口、廣州、南京、九江、青島等處之不斷的屠殺，更促進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熱情而鬪爭愈烈。不但各重要城市爲罷工、罷課、罷市、遊行示威種種反抗行動所籠罩，即在很小的縣鎮以至窮鄉僻壤，亦隨處都能聽到『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在此種遍及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怒潮中，給予帝國主義以最大打擊的是上海、廣州、香港、天津、青島各地工人的罷工和各地民衆努力進行的排斥仇貨運動。五卅運動實際上是開始中國從古未有的群衆革命運動，而且處處都是工人階級當先鋒，以最勇猛犧牲的革命精

神，以實際的群眾團結的力量，去爭取平民的權利，爭取自己階級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各地工人在鬪爭中都很努力團結自己的力量，五卅事變起後不久，河南、北京、天津等地，都和上海一樣，有總工會的成立。再則，當時廣州革命政府，亦於五卅運動爆發之後以斷然的手段驅逐楊劉，撲滅廣東內部的反革命勢力；進而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之抗英的罷工運動。全國學生總會並於六月下旬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於上海，在這次大會中，對於學生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有一種比較急進的決議，各地學生群眾因此次大會之成功，對於民族革命運動參加更爲熱烈。全國各重要城市都有工商學聯合會，各界雪恥會或者滬案後援會等類的組織，以指揮一切宣傳組織示威遊行募集捐款等工作。這時因爲民衆革命勢力的高漲，形成了國民革命比較鞏固的聯合戰線，因此使得帝國主義不得不在中國革命勢力之前表示低頭，公開申言：『既然不能以兵力征服中國，便祇有先讓些步』。而素以媚外懼外著稱的段祺瑞政府，亦於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以表示表示自己的『愛國』；張學良到上海來鎮壓民衆運動的時候，也不得不先捐給學生聯合會兩千塊『買路錢』，表示是來防禦外敵的。此外，在五卅運動發生後之兩個月中，各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機關教會學校，也爲革命的巨濤所衝盪而受了很大的損失。自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因反對當局的壓迫而全體退學，各地教會學校因反對當局干涉反帝國主義運動所起的退學風潮先後崛起，使教會學校受到很大的打擊。當時中國大多數的民衆都燃燒着誓死反抗帝國主義的烈火，一切妥協的傾向與反動的主張，一拿出來就遭群眾之鄙棄與吐罵。上海總商會之抹殺工人利益，擅自修改十七條件，引起民衆多方面之反感。一般高等華人，名流學者如梁啓超、胡適、丁文江等所提出之『縮小範圍』、『單獨對英』、『雙方友誼的協商』等主張，在在遭受群眾之嚴峻的攻擊。上海中新兩報因登載工部局污辱中國民族的『

「誠言」廣告，會遭受到革命群眾之嚴厲的懲創。可見在革命高漲的時候，當局者一點點的遲鈍行爲，都要激起群眾的憤怒；同時亦只有在革命勢力高漲的時候，才能迫得敵人或多或少的讓步。

帝國主義者在「五卅」施行大屠殺的根本用意，是在鎮壓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它們因爲有了鎮壓義和團暴動的經驗，以爲一場屠殺便可以使中國人低頭伏氣，承認帝國主義者有理，不料結果適得其反，二十六年以後的中國和義和團時代大大兩樣了！五卅事變之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不但不因帝國主義強盜在滬漢粵寧各地之再三再四的屠殺而消沉退守，反因此而激起更猛烈更廣大的革命浪潮。於此，帝國主義列強固然還不肯拋棄武力的壓迫，然而也就不使它發生一種新感覺：單純的槍彈砲火的政策已經沒有十分大效果而且對於自己，倒一天一天的變成危險的把戲了！它們既然感覺到這一點，便不得不想法保存自己對於中國的統治，不過另外要用一種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使表面上那種強橫殘暴的侵略不大顯露，而實際上能够仍舊繼續以前的狀態。於是，在中國人民反帝的浪潮下，在反帝統一戰線發展的前面，帝國主義者便開始從屠殺政策轉爲分裂政策了！

帝國主義者首先對中國資產者表示讓步，提出所謂「司法調查」與「關稅會議」，來引誘中國資產階級，使其脫離反帝統一戰線。彷彿中國資產階級如果可以和它妥協，它就可以和中國討論關稅自主問題，帝國主義者忽然把忘記了三年的華會決議重新記憶起來，這正可見它們覺得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一日千里。適其時北京政府財政困難，欲藉五卅慘案後之民氣，促開華盛頓會議條約中之中國關稅特別會議，以增收二五附加稅之款項，於是公使團便決定藉此關稅會議以移轉中國民衆的視聽，並收買中國資產階級對它妥協。雖然事後證明此項關稅會議並無結果可言，而只是一種延宕愚弄政策，可是當時對於中國上層社會，確會起了相當的迷惑作用。至於所謂司法調查，則更明顯是帝國主義想

用這種法律的手腕來延宕交涉，彷彿五卅屠殺中開槍的究竟是巡捕還是學生，殺人兇犯究竟是英國還是中國，還沒有知道，所以應該用司法來調查一下，而且經過六國委員的一度調查還不够，還要再來一個滬案重查。其實五卅屠殺事件不但在中國民衆方面早已瞭如指掌；五卅屠殺中，英日是主犯，美法意等帝國主義者是幫兇；早就看清了這是帝國主義統治壓迫中國的必然結果，並且早就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方法，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而且五卅之後一星期內連帝國主義者自己的法庭也就判決群衆無罪了。因此所謂司法調查與滬案重查等花樣，只是帝國主義者想用『法律』的手段判決『五卅』所殺的人是該殺，以後還可照樣狠狠的屠殺；和各帝國主義之間，要想安商出一個一致的態度，來共同壓迫宰割中國罷了！

帝國主義一面用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等詭計誘惑中國資產階級，但猶恐這種誘惑政策不能發生很大的實際效力，所以同時即在七月四日用停止供給馬達電力於中國工廠的毒計（上海租界的電氣處本是壟斷上海電氣業的），以威脅中國資產階級幫同壓迫工人階級。可惜在帝國主義分裂政策之下，上海資產者竟表現了不幸的動搖。他們被帝國主義者所挑弄。第一步擅自修改十七條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開市（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步壓迫日廠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與上海外僑商會妥協而暗示軍閥使之封閉上海總工會。於是軍閥官廳就更奮勇起來了，他們在七月間已經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不准啓封，同時宣佈戒嚴，以壓迫工人學生，不許活動。自七月下旬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等民衆團體先後被奉軍封閉後，天津、青島、濟南一帶工人學生的群衆，無一不受奉系軍閥之摧殘。一方面戴季陶、梁啓超、胡適等高等華人，竭力宣傳『縮小範圍』、『單獨對英』等妥協主張；另一方面工會學生會不斷遭軍閥之封禁，工人學生的領袖不斷遭軍閥之逮捕與槍斃

。在廣州則有帝國主義收買失意軍閥與官僚買辦先謀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與反革命派暗殺廖仲凱先生事件之發生（八月二十日）。上海數十萬工人的罷工苦鬥，支持至兩月以上，救濟金日益缺乏。上海總工會始則被工賊搗毀，旋又於九月底遭奉系軍閥之封閉。小資產階級因受軍閥資產階級的暗示與壓迫，亦有部分的退出革命戰線。於是乎帝國主義列強，便又乘機加緊進攻，滬案重查便公然實現。第一次六國委員的調查，還說得比較冠冕些；這次滬案重查之後，英美日三國便一致判決五卅以來所殺的中國人都是該殺的了！同時，上海總商會在總工會被封後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開始募集所謂愛國募金，名為接濟英廠工人，實則五卅以來總商會所經手發的罷工維持費，最大部分是各地捐來的，小部分是總商會辦事人墊出的，愛國募金的作用，不過是為這些辦事人彌補自己的「損失」而已。況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廠工人，已經因總工會的被封，失了革命行動的公開指導機關和自己的組織，因為總商會尅扣募金，不發維持費，又被壓迫，「調停」而上工了，資產階級的妥協當然再明顯也沒有！外交部與總商會在表面上儘管抗議滬案的司法重查，實際上他們每一步的行動都是成就帝國主義的滬案重查的；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退縮懼怯，當時也是資產階級策略的實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為他們這樣可以減殺革命派方面的勢力。於是蓬蓬勃勃的五卅運動受着帝國主義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這種多方面的摧殘，在「九七」屠殺之後，便暫時受到了挫折。

然而這種暫時的挫折却並不能完全壓伏革命，民衆方面的革命潮流並不因反動軍閥摧殘壓迫與資產階級之妥協出賣而消滅。五卅運動的過程裡，無產階級的勢力在政治覺悟上和組織上都是非常之膨脹的時候，國內軍閥與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祇有使無產階級得到更深刻的覺悟：「外國帝國主義自己開槍殺人，而且雇用中國軍閥來幫着屠殺，壓迫禁止我們的集會結社，尅扣我們的工資，保持殖民

地制度的，不僅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且還有中國的資產階級。況且中國勞動平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動機，本在於要求解除壓迫剝削以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與政治地位。所以五卅以後中國華商工廠裡的罷工，突然由對外示威的性質，變成切實要求經濟政治地位改善的罷工。八月中旬上海郵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罷工，便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壓迫之答覆；隨後全國電報局的罷工，天津、河南、山東的中國紗廠罷工，都是同樣的性質。各地學生亦因反對學校當局之干涉反帝運動而不斷發生學潮，十一月十一日湖南學生且有反對趙恒惕爭自由的全省總罷課事件。抵制英日仇貨的運動在上海受着買辦資產階級的怠工破壞，內地如太原、福州、寧波等處則反因此而引起學生會、國貨商和洋行商的武裝鬭爭。十月十七日湖南還有收回大金碼頭的運動。同時廣州政府因廖案之發生而決心肅清內部反革命分子——討伐楊劉，肅清東江，繼續又扣留熊克武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工農的勢力因此得着相當發展，省港罷工得以堅持。而且中國革命運動自從五卅屠殺之後，衝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萬里長城，深深的滲入到工人群眾農民群眾中去，所以上海日廠罷工結束，各地的罷工運動仍不斷爆發，如八月中北京英使館的罷工，南京工人的流血，唐山罷工的爆發等。

## 第二節 反奉戰爭、日本出兵與「三一八」慘案

當着革命高漲時，帝國主義間對於中國的侵略雖有劇烈的衝突，但在革命浪潮的威脅前面，能够取得暫時的妥協來一致鎮壓革命運動。中國的軍閥也是如此。雖是日英美帝國主義間有着深刻的衝突，但在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它們都是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特別是日英帝國主義。雖是奉系、直系和其他軍閥間有着衝突，但在革命發展的前面却一致鎮壓革命運動了。另一方面，在革命條件發生變



化的時候，在上海方面革命運動暫時受到部分打擊的時候，軍閥內部的衝突遂又劇烈起來；而這種衝突恰又是反映了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所以五卅運動暫時受着挫折之後，接踵而來的反奉戰爭就是這方面的明顯表現。

奉系軍閥自從民國十三年北京政變之後，一直便是北方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它們極力反對召集國民會議，步步進逼，擴充它們在關內的地盤，排斥國民軍，佔據天津、保定、山東以至江蘇上海。尤其是「五卅」事變之後，奉系軍閥從奉天、天津一直到上海，到處幫着帝國主義者壓迫摧殘革命運動，屠殺工人領袖，封閉民眾團體，剝奪人民的自由，橫征暴斂的搜括，非法的抽捐籌餉。當全國民眾在上海二十幾萬工人的先鋒隊之後，陸續繼起的反抗帝國主義，罷工罷課抵貨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威權，已經開始動搖，大部分是靠奉系軍閥來維持住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鬪爭的先鋒——上海總工會，是被奉系軍閥以武力解散的。五卅後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完全爲奉系軍閥的高壓政策所壓迫。所以在當時，奉系軍閥確實是帝國主義者最有力的武器，最馴良的走狗，因此一般民眾反奉的心理非常高漲。同時因爲帝國主義爲要緩和中國革命運動，適有關稅會議的召集，直系軍閥等爲防止關會後之大借款爲奉系軍閥所獨吞起見，遂於關稅會議開幕之始由孫傳芳起兵發動了反奉戰爭。當時孫傳芳爲浙江督辦，於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假秋操爲名，集合已系大兵，於十五日，自稱江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向淞滬進發，宣言討奉。同時吳佩孚亦乘機再起，自稱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委蕭耀南爲鄂軍總司令，陳嘉謨副之，協助五省聯軍攻擊直魯兩省之奉系軍隊。此次戰爭的主要內容自然仍舊是軍閥間的循環報復戰爭，和以前的直皖、直奉戰爭相類似。孫吳軍閥這次發動反奉戰爭的目的：第一是想搶奪帝國主義拋下的骨頭（關稅會議借款），第二是報復民國十二年戰

敗的舊恨。事實上直系和奉系同樣都是反動的軍閥，同樣是外國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二七」時吳佩孚、蕭耀南之暴行與五卅運動中奉系軍閥的暴行毫無二致。孫傳芳討奉通電中反對奉軍壓迫愛國運動：不過只是利用人民反奉的心理，達到它自己乘機取利的目的而已。所以當奉系軍閥退出上海之時，戒嚴令已經取消，而孫傳芳軍隊駐滬之後，重復宣佈戒嚴，禁止人民集會，不准啓封上海總會，它們一面討伐屢次假借肅清赤化名義摧殘民衆的奉系，一面却趕緊對帝國主義者聲明防止赤化，嚴拿共產黨、國民黨，以獻媚外國帝國主義，和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者面前爭寵。所以這次反奉戰爭的主要內容仍舊是軍閥戰爭，不過這次戰爭的性質要比過去幾次軍閥戰爭複雜些，民國十三年直奉戰爭，交戰者只是直系與奉系兩派軍閥，可是這次反奉戰爭的反奉營壘方面並不止直系，還有國民黨和一部分國民黨勢力。而且因爲廣大群衆在五卅運動中清楚認識了奉系軍閥是帝國主義鎮壓革命運動的工具，所以五卅運動之後，便發生廣大群衆反對奉系軍閥的運動。在反奉戰爭中，廣大民衆自然更要利用這一時機來開展革命運動，因而在反奉戰爭爆發後革命運動又重新高漲。在上海，奉系軍閥失敗後，曾舉行過廣大的民衆大會，在大會上還提出了反對關稅會議，反對滬案重查，要求關稅自主，要求啓封工會及各種民衆團體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權利。在北京，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曾舉行廣大的民衆示威運動，高舉『首都革命』的大旗，以打倒軍閥政府，建設民衆政府，驅逐段祺瑞，收回關稅自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爲其鬪爭的目標。此外，在武漢、長沙、開封等處也發生反對段祺瑞反對奉軍的運動，這些運動可說是五卅運動的繼續。但是無論如何，當時這種民衆力量，顯然還不足以改變戰爭的性質，因爲武力還沒有和國民相結合，更沒有成爲國民之武力。所以反奉戰爭得着勝利之時，並沒有能够使國民會議實現，反而釀成軍閥勢力重新結合以壓

迫革命運動的局面。這可以充分證明：當時中國共產黨所說「此次反奉戰爭雖攪和了一些軍閥勢力，在客觀上却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戰爭」，（註一）顯然是非常錯誤的估量，這種機會主義者的幻想，必然要受到歷史的嘲弄和譴責。

在反奉戰爭中，奉系軍閥因為受到當時民衆反奉運動的打擊，以及孫傳芳、吳佩孚等軍閥得到英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很快地在上海、在津浦線上都遭受失敗，聯軍長驅直入，不一月即佔領徐州。奉系軍閥張作霖大感恐慌，乃派張學良與郭松齡率軍入關助戰。但在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下，影響了一部分軍閥傾向於革命，而開始了郭松齡的倒戈。在郭松齡傾向革命以前，軍閥中的一部分比較與帝國主義關係不密切的，已經有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因為受到五卅運動之後革命民衆的影響，傾向國民革命的趨勢。此時國民一、二、三軍，以京漢路為發展地。郭松齡在倒戈之前，早與馮玉祥通聲氣。及見張作霖處境不利，即於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在灤州倒戈，通電請張作霖下野，扣留奉軍要人姜登選殺之，改稱東北國民軍，班師出關。屢破奉軍第九師汲金純部，不久即佔領錦州。時熱河都統闕朝璽，因馮部進逼多倫，退入奉境。馮即以宋哲元繼任，為郭軍聲援。郭松齡出關以後，幾乎攻無不利，戰無不克。錦州下後，張作霖已準備孤注一擲，迨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領新民府後，郭軍乘勝追擊，越巨流河，抵大名屯，搗破奉系軍閥的老巢已是指顧間事。但因郭松齡倒戈反奉，客觀上受了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中國民族革命潮流動盪的影響，很有些反日的色彩；因此，一向替奉張安福系保鏢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自己反動的利益，也就公然出兵援助張作霖來抵抗郭軍了。當時公開出發的

（註一）見中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兩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所發反奉宣言。

日軍已有二千五百人，而且繼續進兵，同時在奉天的日軍已佔領省城兵工廠及子藥庫。日本政府且公然宣稱：「據撲資茅斯條約，日本有權在南滿駐兵一萬五千。」日本強盜在這次郭張戰爭中，可謂竭盡扶持傀儡之能事。它一方面供給張作霖軍械子彈，爲張作霖運籌帷幄；同時即公然以日本兵喬裝助戰，當郭軍到白旗堡時，日本關東司令白川竟下令以八十多架飛機，向郭軍陣地濫施轟炸，使白旗堡周圍三十里，燬成焦土。此外，更以「南滿附屬地不得干犯」爲理由，阻止郭軍前進，並從郭軍左側面，以日本所喬扮之大軍壓之。故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郭軍即已失利，二十三日遂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二十四日郭松齡遂以被殺聞。郭敗之日，亦即李景林在天津潰走之時，李則由天津日領以巡洋艦送往青島，安抵濟南，兩相對照，更可看出日本帝國主義之陰謀。

日本進兵滿洲，撲滅郭松齡勢力之後，復見國民一、二軍佔領天津，遂走李景林，恐中國革命勢力因此伸張，乃進而號召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借張作霖、吳佩孚以巨款，並且供給張宗昌、李景林軍械子彈和軍事人材，以圖根本消滅當時所謂赤化之國民軍。同時，在此時期，正值反對日本進兵滿洲與反對奉直聯合，打倒張作霖、吳佩孚的呼聲和示威行動普遍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運動，亦相繼從事於恢復與整頓，督促廣東國民政府北伐以解決反動軍閥的呼聲，不斷從各地人民團體中發出。這使帝國主義與軍閥惶恐不置，急圖結成反革命戰線以便一致進攻革命。吳佩孚自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出結束反奉戰爭的世電之後，即遣寇英傑進攻河南，與靳雲鵬收夾擊之效。於是國民二軍失敗，國民一軍頻於危境，馮玉祥被迫下野，天津復爲李景林所有；奉軍再行入關，進逼灤州，復遣飛機在北京附近轟炸，意欲國民軍讓出北京。再則當時英日張吳聯合戰線の後顧之憂，便是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所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駐京英使通告北京政府，謂廣州政府煽動香港罷工，中國政府（指北

京政府）如無制止能力，英國決定自由行動，以武力糾正。並謂已預備每日百五十萬元充軍餉，將來由關餘扣償。二月二十一日廣州稅務司又藉口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截取未驗貨物，停止驗放船隻封鎖粵海關以威脅廣州國民政府。在北方，英日帝國主義更喚使直魯聯軍、榆關奉軍、山西閻軍、及靳雲鶚的軍隊，四面八方壓迫國民一軍。當國民一軍連勝直魯聯軍轉危爲安時，斜刺裡忽然伸出日本艦隊，爲張宗昌、李景林之奧援，勾引奉艦襲取天津，不成則用公使團的哀的美敦書以爲威嚇，於是時局急轉直下而有北京「三一八」的慘案發生。

自從國民軍失敗，反動的空氣更籠罩全國，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勢力，均急起利用此機會，全體動員與革命民衆宣戰。當時國民軍雖然在事實上還說不上是民衆的革命的武裝力量，而只是軍閥中傾向於革命的軍隊；然而，在國民軍的統治下，革命運動却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例如當時天津、唐山、鄭州的工人運動及河南、直隸某些區域的農民運動都很有發展，只在河南一省，就有將近二十萬人的農民協會會員和六萬多的農民自衛軍；而且當時國民軍將領鄧寶珊、李仲三等曾兩次通電主張推倒禍國殃民的段政府，贊成召集國民會議，這種表現雖然在他們主觀上不一定是爲解放中國，而在客觀上則很可幫助革命勢力的發展。相反地，國民軍的失敗，却勢必助長反動的氣焰。當時在北方，既有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靳雲鶚對國民一軍聯合進攻，又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辛丑條約團之最後通牒。在南方，英國帝國主義既藉稅務司利用中國海關封鎖廣州海口，香港增加警備隊，沙面又增加軍艦，加緊進攻國民政府。在上海方面，帝國主義既於十二月十七日指使孫傳芳秘密槍斃劉華（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帝國主義既在關稅會議之後，再用法權會議等把戲收買中國資產階級，並且還擬定了大規模進攻中國的計劃，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報曾將此項進攻計劃

透露如次：

### 英國進攻中國之計劃

「干涉中國，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戰爭計劃，已經過詳細考慮，其範圍尚未為外間所完全了解。外交界有兩種意見的爭執，一派相信協商，即會議許諾延宕，可以恢復英國在華的宰治；而另一派則唯信賴武力。依專家的計算，征服中國只須用十萬大軍隊，半可由印度（該處有八萬英兵）調遣。香港的警備亦已增強。此戰爭的計劃進攻中國，分南北二部，多數軍隊將配置於天津，上海之間。第一部分軍隊將在天津上岸，將力求早與馮玉祥決戰，且已獲得張作霖之默許。在漢口祇需數兵艦，即可征服。此外，英兵一團從沙面上岸，護以數月來從各地調集之軍艦巡洋艦，即可向廣州進攻。」

「依財政專家之計算，戰爭目的達到，戰爭停止之後，英國可以攫取中國的鐵路，英國人民的納稅可以減輕。假定此戰爭需時二年（亦即從前干涉俄國所需的時期）以克服中國，軍費每日十五萬鎊，此數可由將來全國鐵路抵押給英國時補償，但必須再投資五千萬鎊，加造鐵路，自今之七千英里，增加至一萬二千英里。屆時中國既已完全戰敗屈服，租界割讓均有增加，則各銀行得英國國家銀行之幫助，必樂投資。況今匯豐銀行行長，亦為英國國家銀行董事之一。」

因為郵電可施檢查，可以控制，大部分戰爭行動，可以在英國工人及別的激烈團體知道消息以前，迅速有效的實行。

目下英國國家銀行已寄款六十萬鎊，交匯豐銀行，以為在東方開始廣泛宣傳戰勝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蘇維埃宣傳的費用。」

英國帝國主義用十萬大軍進攻中國的計劃雖然不曾實現，然而它那六十萬鎊的宣傳費，在中國却真發生了效力，所以當時反赤運動和反赤團體盛極一時。除英帝國主義者自己在上海組織國際性的護憲會，以抵制過激主義以外，並指使中國反革命派組織國民制赤會、人權保障會、中和黨及對俄外交協會等，在「反赤」「反共」名義之下，進行各種反革命和賣國的活動。

上述事實，便是造成北京「三一八」慘殺的政治背景。沒有日本出兵滿洲，幫助奉張擊敗郭松齡，沒有英國以大批軍械幫助吳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軍械幫助李景林、張宗昌攻打直隸，沒有帝國主義號召組織反赤運動，英國封鎖廣州，日本砲擊大沽砲台，即不會造成「三一八」時英日段張聯合屠殺中國民衆的時局。據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報電訊：「賈閣上台，正與列強進行大借款，約有五千萬，須以防止赤化爲條件，衛兵開槍，可藉以表示反赤。」反赤的真實含義，就是屠殺人民，在這次事件中，可說已表現得清清楚楚。而以人民的鮮血，去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亦原是軍閥官僚政府的拿手本事。加以北京的工人學生市民群衆，過去一年來爲紀念「五七」紀念，爲反對關稅會議，爲實行首都革命，有三四次與軍警衝突流血，段祺瑞的統治因此日在動搖之中，使他更加恨入骨髓。適當時日寇與奉系海軍砲擊大沽口，國民軍爲防守計，以水雷封鎖港口。八國公使團，向執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謂爲「違反辛丑和約，限四十八小時，撤消封鎖」。各界人民認爲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無理干涉中國內政，都表示極大憤慨，乃於三月十八日開市民大會於天安門，都說：「辛丑和約，各國已默認無效。前次李景林在距津十里之北倉作戰，即是一證。今次之最後通牒，實無理由，四十八小時之期限，尤屬欺人太甚。」當即決議督促政府嚴重駁覆八國通牒，宣佈辛丑和約無效，驅逐八國公使，遂即遊行示威，齊集國務院請願。段祺瑞即按預定計劃，下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死者四十

七人，重傷者百三十二人，是爲「三一八」慘案。及四月九日，段氏左右謀應奉軍危害國民軍之陰謀敗露，鹿鍾麟遂起而倒段，解散府衛隊，而十三年十一月以來之執政府終歸覆沒。但因英日張吳合作，反動勢力高漲，國民軍亦終於退守南口，最後更被迫退至內蒙及西北一帶。

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各地民衆雖也震動起來，開會通電，遊行示威，表現國人同仇敵愾之心，但是因爲帝國主義進攻的總計劃已得着部分的實現，特別是收買高等華人，組織反赤運動，分裂中國政策，收得相當效果。所以五卅慘案發生，舉國人民差不多一致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均次第實行，給帝國主義以有力打擊，贏得帝國主義某種程度的讓步；而在這一次，慘案發生的第二天，輿論便大不相同，高等華人及一般輿論界不但反抗帝國主義者假手段祺瑞的兇暴慘殺，反而攻擊示威群眾的領袖，說他們不該以卵去碰石，輕輕替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脫罪！上海民衆反抗北京屠殺的時候，上海總商會公開宣佈「暫停辦公，絕不參加」。這一切種種的阻撓破壞，便使各地民衆對於北京屠殺除追悼抗議之外，不能更前進一步去奮鬥——這是五卅運動以來一個重要的階段。從五卅屠殺到北京屠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經過了極辛苦的過程。最初在五卅發生二月之內是中國民衆向帝國主義勇猛進攻，帝國主義者退守；以後是帝國主義者反攻，得到部分的勝利。自反奉戰爭爆發，直至郭松齡失敗，是中國民衆向帝國主義侵略者作第二次進攻，尤其威脅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存。以後日本進兵滿洲，英日張吳聯合，又是帝國主義者二次反攻，這次反攻竟得到不少的勝利。北京慘殺，便是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對革命民衆反攻之最露骨的表现。



### 第三節 反革命戰線的破裂與罷工及一般革命鬥爭的興起

上面已經說明帝國主義軍閥怎樣結成反革命聯合戰線，怎樣利用資產階級的自私與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妥協，來拆散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帝國主義這種精明的策略，實行起來又逐步的有些得手，北京屠殺之後，中國——尤其是北部的民衆運動，自然要受着一時的壓迫，而不能立刻有廣大的發展；但是帝國主義這着得意棋子，却並不能根本撲滅革命運動。相反的，北京屠殺之後，我們又看見了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戰線的開始破裂。

『三一八』屠殺之後，奉系軍閥帶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威勢迅速地攫取中共政權。其時議員政客，復乘機活動，而有所謂護法護憲之爭：（甲）參與賄選派之議員，在石駟馬大街，設有群治社之通信處。謀國會復活，樹幟護憲，使曹錕恢復總統之職；（乙）拒絕賄選之非常國會派，亦在南長街設立俱樂部；謀擁護約法，以恢復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政變以前之政治狀態。吳佩孚主張護憲，而張作霖則表示護法。及國民軍退守南口，護法護憲之爭，愈益顯著。這種張吳軍閥之間的矛盾，同時便是表現英日帝國主義間之裂痕。再則，帝國主義——軍閥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因暫時戰勝民衆而重新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強迫行使軍用票，弄得商人罷市，他們更用飛機拋擲炸彈，想焚燬北京，弄得市民團體群起抗議。河南方面，吳佩孚軍隊一到便勒索軍餉；山東更是久處於張宗昌鐵蹄之下。事情不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兩方面有一方必須讓步，否則一定要發生破裂。

在革命勢力方面，則北京屠殺之後，固然受着很大的打擊，但並不是表明革命潮流已經低落，而只是挫折之後的伏流昂進，又向高潮走。上海罷工最足以表明革命潮流的方向，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後

，罷工雖然暫時停頓，但到次年一月以後，上海罷工又逐漸發展起來茲將上海自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罷工統計轉錄如下：（註二）

產業別	罷工次數	參加人數	罷工期間
紗業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郵務	—	六〇〇	—
金銀業	—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印刷	—	四〇〇	四〇〇
麻袋	—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襪業	—	七〇〇	—
共計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自五卅週年紀念示威之後，上海罷工更不斷發展。五卅週年紀念示威時，上海就有七萬餘人的罷工；五卅週年紀念後，上海罷工潮流非常洶湧；五卅週年紀念後一月內，上海竟發生了一百多次的罷工，參加罷工工人不下七萬人，其統計如下：（註三）

同盟與單獨罷工之罷工次數  
罷工中參加之企業總數

三五  
一〇七

（註二）見第一百五十一期嚮導週報。

（註三）見第一百六十一期嚮導週報。

## 參加罷工之工人總數

六九、五五六

## 罷工時間統計（以鐘點計算）

三、三六四、六二二

## 罷工所提條件

一一七

## 勝利條件次數

四九

爲什麼五卅週年紀念之後上海會有這樣高漲的罷工潮呢？主要在於：（一）米價高漲，別種日用品亦日見昂貴，實際工資減少，直接使工人的生活陷入困難之境，所以各企業工人之罷工要求，以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爲最多；（二）資本家向工人的反攻，如日商內外棉紗廠任意開除工人，多方虐待工人；同時因爲民族經濟危機加重，民族資本家亦以加重剝削工人以求取償，各華商煙廠藉口銷路停滯而減少工人工資；（三）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影響，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在資本家方面固然忌恨工人的勢力，忌恨工人在五卅週年紀念中所表現的偉大力量，而在工人方面，却正由於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影響，深信自己的團結力量，又適逢帝國主義者的反攻，所以發生這樣蓬勃的罷工潮；（四）工人組織上的力量與團結運動，亦是促進罷工發展的重要原因，「有了組織，就要罷工」，正是中國工人的特性。當時上海有組織的工人方謀更堅固的團結，工會會員已達二十幾萬人，無組織的手工業工人亦紛紛起而作團結運動；但帝國主義資本家巡捕房及中國的軍閥官廳，都深深忌恨工人的團結而加壓迫，所以工人的鬭爭愈加猛烈了，甚至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都未能積極參加的閩北三十五家絲廠女工，在這時也發生同盟罷工，於此可見工會組織推進鬭爭作用之偉大。

當時直接組織並領導這樣蓬勃的罷工運動的總機關便是上海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在當時的威力實在不小，即中國官方北京社會調查部所出版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中也嘆爲「一時聲勢煥赫，爲我國

工界從來所未有」。〔註四〕所以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都把上海總工會看成眼中釘，因此當時上海警察廳長嚴春陽奉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提倡實業者」之命，就以「煽動罷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總工會封閉了。然而罷工運動還是繼續發展，而且罷工工人在各種的要求之外，都特別提出「啓封上海總工會」與「擁護上海總工會」的口號。

上海之外，廣東省港罷工還在繼續。英國帝國主義者雖然多方設法破壞，但是罷工委員會屹立不動。省港罷工使英國帝國主義者每日損失一百八十萬元，使繁華富麗的香港一變而為滿目蕭條的荒島，使倫敦郵報發出嘆聲，謂「一九二五年英國尊嚴之墮落，實為中英通商二百年來所未有」。同時省港罷工的堅持，也正使得廣東國民政府更加鞏固，威信更加提高起來。此時武漢礮口英國香烟廠女工也發生大罷工（五月十六日），勸因為反對添設裝烟機器以裁除工人。經過多次的全體大會和群眾示威運動的奮鬥，搖動漢口英國新舊兩烟廠男女工人三千餘人和社會上一般革命民衆，且還用了她們鬪爭的隊伍，參加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直至六月三日因取得相當勝利，罷工才告結束。同時同地（礮口）日商太安紗廠工人二千四百餘人因感生活壓迫與苛虐待遇，久欲反抗。六月二日新來日本工頭以請客爲名，招致該廠女工頭吃酒，恣情戲謔，待若娼妓，致動全廠工人公憤，六月三日全廠工人相約出廠，舉行罷工表示反抗。所提要求條件是一律增加工資二成，星期日工作要雙工錢，不得打罵及戲謔女工，因工受傷或疾病須照發工資並給醫藥費及罷工期間工資照發等七項條件。罷工相持一星期，始因廠方勾結中國官廳壓迫及工頭出賣工人利益而了結。

（註四）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第二編第一章之第九頁

在工人鬪爭的發展基礎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於廣州開幕，到會代表共五百餘人，代表有組織的一百二十四萬一千餘工人。這表現工人的組織比二次勞動大會時更加發展了，鬪爭經驗也比過去更加豐富了。自二次大會至三次大會，總計全國罷工運動在二百次以上，由南而北，參加罷工者過八十萬工人。大會所通過之重要決議案有下列各項：（一）職工運動之總策略，（二）組織問題及其運用方法，（三）經濟鬪爭之最近目標及其步驟，（四）罷工戰術，（五）工農關係，（六）勞動法大綱。同時這次勞動大會開幕，正是英國工人階級總罷工的時候，所以大會代表一致通電聲援，更增加這次大會的意義。

除上述事件之外，當時革命運動的發展，還有如下事實的表現。比如三月九日湖南的驅趙（恒惕）運動，在運動中曾經召集過三萬餘人的民衆大會，一致通過政治主張二十一條，並組織人民臨時委員會爲督促實現的機關，政治主張中最重要的是：打倒趙恒惕，反對聯省自治，討伐吳佩孚，擁護國民政府北伐，速開國民會議，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啓封一切工農團體，財政統一，廢除苛捐雜稅等。再則，五卅週年紀念運動前後，各地反對北京政府借款賣國，反對捲烟稅，反對宅地稅，反對增設烟酒厘卡，反對增加米捐，反對房捐帶徵保衛團經費等，都充滿了怨憤不平的呼聲。五月一日與第三次勞動大會同時開幕的還有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據當時的統計，有六十萬農民已經加入了農民協會。至於反對中外官廳包庇烟土，反對增加房捐，要求抑平米價，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運動。四月間在浦東塘橋鄉，竟因巡警強迫徵收門牌費，惹起了數千人的騷動。

最後，對於五卅週年紀念運動，還應在本節中稍加補述。對於這次運動，差不多在兩三個月以前

，帝國主義者即已開始防備。在『三一八』北京屠殺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及全體董事設宴款待上海紳商領袖虞洽卿等三四十人，算是帝國主義者公開地宣佈防備的第一次。在這個『盛大』的宴會中，工部局總董費信惇有一篇很長的演說。他開始即申述關於五卅事件華人歸咎於工部局之誤會，工部局尚特別謙讓，『爲與中國人士和協起見，決定接受總巡與最有關係之總長辭職，並正式表示喪失人命之歉意，由領袖領事轉交中國當局七萬五千元支票，撫卹死傷者家族，作同情之表示』；繼即表示還特別開恩將要給些好處與華人，如工部局加入華董，歸還會審公廨，工廠內中國勞工問題，碼頭捐及印刷附律問題，越界築路問題都可從長商量等。最後而又最實際的結論就是：

『但鄙人今晚欲與諸君言者，尚非過去之事，而以後來之事爲尤要。鄙人今晚欲與諸君一言者，本局之意，本埠前途尚非光明，政治上工業上皆有不良徵象，或且發生不良情形，若任其自趨，則必至此。以政治言，五卅事件不解決，有人則不能知其故，有人則不願知其故，此乃一重要之事。以工業言，情形之不穩定，未有如今日者；今後二月間之日期，亦甚爲有關，五月一日爲全世界勞工日，五月四日爲民八學生罷課紀念日，五九爲國恥日，五卅亦自具一種意義。目下已有擬議，欲使以上數日之一，作爲一種時會，有數種團體自是不輕放過機會，團體之背後，必有人留意於此。今已接有消息知近來紗廠罷工，尚屬後來大規模舉動之初步，我人（工部局）爲應付起見，自應籌擬相對辦法。鄙意諸君今晚到此者，爲一班有勇氣能代表他人之有勢力人士，此一班人向公衆聲明，以正道常識公平爲主張，能爲公衆之所信用，能爲有責任之中外輿論所擁護，最要者，當不論如何，必設法以阻事勢走於極端，致與公家權力復生衝突之不能避免。惟有如此，以鄙人觀之，方能防備以後數月內潛伏之危險，此他無他方法，其防範之力量能如此有效。

鄙人今向諸君以此爲請，此心認真，與向來談公事時之認真，一般無二。」（註五）

從這篇巧言令色的演說中，我們很明白地看出這個宴會的主要目的是爲防備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帝國主義者自己也知道：『五卅事件不解決……此乃一件重要之事』，中國民衆到五卅週年紀念時必定有激昂的表示。所以它教導虞洽卿等：爲消滅五卅週年紀念的運動，應該及早動手，免得臨時倉卒來不及應付——五卅以前之五一、五四、五九等運動就應該一個個地壓伏下去。『近來紗廠罷工，即是後來大規模舉動之初步，急應籌擬對付方法，諸君都是有聲望有勢力之人』，不但不應該同情於民衆運動，並且應當『以口舌筆墨和緩民衆之憤慨』，縱到帝國主義者再以殘暴手段對付工潮及中國民族運動時，你們『高等華人』，都應當竭力贊助。

帝國主義者自做了這個防範之後，還接着做了不少的工作：公家（工部局）私家（如聯華總會與孫傳芳、嚴春陽乃紳商學閥等）都做了不少筵席的酬酢及公文上的往還——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官廳及紳商學閥這樣表示親熱是從來未有的。帝國主義者這樣防範的結果，於是：（一）軍閥官廳方面，三令五申，嚴防赤化，禁止集會及散發傳單，『誠恐有宵小之徒乘機滋擾，妨害治安』；（二）上海總商會於三月十八日宴會之次日即發出一電致北京外交部，請其關於五卅案『速與使團妥商了結，伸久鬱之民氣，即以弭未來之隱憂。』這個很明白，就是要北京外交部與使團在五卅週年紀念前再弄點交涉的把戲，以緩和民氣。及至五卅週年將屆時，總商會會長及其會董虞洽卿等即『逃之夭夭』，跑到日本講『共存共榮』去了；（三）一部分反動校長教職員因費信惇暗示他們，將來英國庚子賠款退還

（註五）費信惇演說詞的全文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上海申報。

時，他們可以先分點賊，於是紛紛在各大學組織所謂各大學同志會及所謂各大學學生同志會，其目的無非是想有計劃地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如同濟大學校長強迫學生填寫不再參加愛國運動的誓約書，終至於借助軍警威迫學生離校，復且大學所附設之實驗中學也爲干涉學生運動，竟不惜將學校解散。

但是，就在這樣陰霾的空氣之下，革命民衆也不會因此就消沉退縮。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大部分學校即舉行罷課，學生組織講演隊到華界及各工人區域講演。下午二時，工學商各界一千餘團體代表計五千餘人，在聞北方家木橋烈士墓地舉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禮，極盡悲壯激昂之概，禮成後遊行，參加者甚衆，隊伍延長至兩里許，遍經閘北各街市，高呼口號並唱國民革命歌，全市精神爲之一振。三十日學生繼續罷課，工人罷工者有七萬餘人，商店亦大半罷市，門口均貼有『臥薪嘗膽，永矢勿忘』之白紙條。同日上午六時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因欲避免與工人學生接近，單獨在寧波旅滬同鄉會舉行五卅追悼會，到代表二百餘人。同日上午十時，工人學生及一般平民等乃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五卅週年紀念大會，到會者五萬餘人，以工人爲最多，並有日本、台灣、高麗等革命團體之代表參加。

民衆方面對此五卅慘案之重大紀念，當不以僅在華界開市民大會，遊行，演講散傳單爲滿足，必須闖入久經封鎖的租界中，直接向帝國主義者做一次大示威。故事前各團體即商定一面開市民大會，一面即組織演講隊，分途潛至租界，到一定時間，做大規模之演講。計是日到租界有組織之演講隊，工人、學生、婦女共約五百餘隊，人數約有三四千人。在一時半以前，因罷市及戒嚴的關係，清亮的馬路中，行人甚少，只西人的若干汽車及半空的電車往來巡梭，而沿馬路之兩旁駐紮演講隊宛如兩道大黑線，實是別有一番森嚴的氣象。英捕見人愈聚愈多，雖欲表示解散，但仍強顏相笑，不敢下手。至一時三刻時，突有郵務工會自行車十餘輛往來飛跑於清亮的馬路兩旁，皆手持小旗，高呼『打倒帝



國主義！」兩旁群眾陡然應聲而起，掌聲如雷，於是一般市民也蜂擁而至。約至二時，各馬路演講隊，一齊展開旗幟，放聲演講並大放傳單，觀者如堵，各馬路幾爲之塞，原來很冷靜的馬路，至是沸騰起來了！同時由西門公共體育場出發遊行之群眾亦開始衝入租界，二時十分，群眾已滿佈於南京路、漢口路、東新橋一帶，此時去年今日流血之南京路、浙江路交界處已聚集有二萬以上之群眾，電車、公共汽車、馬車及人力車均停駛，群眾即將車箱兩旁糊上「繼續五卅運動精神」等標語，一片呼聲及擊掌聲如雷響一般，自群眾中發出，更從數商店之樓頭飛下雪片似的傳單，全地面均籠罩在緊張的革命空氣之中。先有無數西捕及印捕向群眾和平勸阻，迫令散去，後來此等西捕被捲於人海之中，自己亦不能自主。二時三十分，突有鐵網囚車數輛從西面飛馳而至，車上架有機關槍，並有中捕、印捕各十數人，各巡捕下車後，即由西捕指揮，向群眾作射擊狀。示威群眾則在街巷中用磚頭瓦塊木棍等與巡捕搏戰，屢退屢進，直至帝國主義者放槍，放水沖射，都不肯退却。直至晚六時許，群眾才逐漸散去。在新世界門前，在東新橋等處，群眾與巡捕均有衝突。當日下午在租界被捕者工人學生及市民先後共十餘人，華人受傷者十三人，外人受傷者十九人，但均極輕微。租界電車玻璃窗被擊毀者計六十九輛，二時以後，公共租界電車及公共汽車均停駛。

在廣州，三十日正午東校場所舉行之五卅週年紀念大會，參加群眾竟達二十萬人，西關民衆且於三十日上午先開一紀念會，參加者五千餘人，會畢遊行，齊赴東校場參加紀念，西關此種大運動，爲五十年來所未有。其他如南京、杭州、寧波、廈門、安慶、蕪湖、九江、蘇州、嘉興、北京、漢口、開封、鄭州等處，雖不若上海、廣州之熱烈，但也都有各種紀念運動。

#### 第四節 廣東的統一與北伐的準備

五卅運動後，廣東革命政府的力量逐漸鞏固與發展，也就是革命力量的逐漸鞏固與發展。這種鞏固與發展，首先是從肅清反革命勢力的鬭爭中獲得的。孫中山先生北上及其死後，廣東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當時黃埔革命軍得到第一次東征的勝利。民國十四年六月間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與劉震寰勾結，企圖推翻革命政府。當時革命政府以迅速的手段肅清楊劉的叛亂；六月五日下午令免楊劉職，六日據河南與楊劉交戰，十二日將楊劉部肅清，革命政府遂得危而復安。但爲集中力量肅清楊劉，革命軍却迫不得已地退出了血戰而得的潮汕了。肅清楊劉後，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原稱大元帥府），並將各軍名目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的成立顯然是革命政府內部更爲鞏固的表現，同時國民政府的成立，又是五卅運動中，首先就是省港罷工中湧現出來的，它是當時中國唯一的革命政府。

在革命勢力的鞏固與發展中，帝國主義者也就更積極地採用各種陰謀詭計來破壞革命，因此又有廖案之發生。廖仲凱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爲當時國民黨左派著名的領袖，遭忌於反革命派。八月二十日廖氏被刺遇害，死於反革命派之手。「一時反動氣勢爲之驟張，然革命派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應此巨變。二十五日遂捕縛嫌疑犯人，並解散反側軍隊，張國楨之徒，悉斂手就擒；魏邦平之徒僅以身免，廣州革命根據地，反因此得一重之保障。及九月二十日，更進而解散東莞、增城、寶安一帶之反側軍隊，使鄭潤琦、莫雄第與楊坤如勾結爲患之陰謀，爲之破滅。十月三日在廣州捕獲熊克武等，以絕陳炯明之內應。由是東征軍無後顧之憂，長驅而前不踰，一月逆敵已殲除殆盡，惠潮梅諸屬以次底

定，南路諸軍所向克捷。十一年六月以來，久淪化外，之諸郡縣，始復歸版圖，廣東全省始告統一。蓋自八月以來，反革命派之謀我，可謂無所不至。外則結連帝國主義者，以封鎖我口岸，梗阻我交通。更結連北洋軍閥，運其艦隊，以侵擾我沿岸，窺視我門戶。內則煽動我反側分子，使失意軍人，無聊政客，有如蟻附，而土豪及盜賊更從而張其聲勢。然革命派對之，則以勇往直前之氣，成摧枯拉朽之功。『數月以來，雖以戰事頻繁，建設諸端，多有懷未逮。然國民革命之障礙既以逐漸清除，因之用人行政，不復如前之掣肘，對於各種事業則設調查委員會，或查辦委員會，以掃除積弊。對於財政，亦以積極整理之故，而預算得以成立。』（註六）而且自從東江南路收復以後，罷工糾察的海口封鎖線也擴張了，從前糾察隊封鎖海口僅限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圳，西迄前山；現在則東至於汕頭，西至於北海了。

在民衆革命運動發展的進程中，國民黨內革命勢力也跟着增長起來，於是國民黨中急進分子與溫和分子間的鬭爭又更其激烈化了。先是一些溫和分子於五卅後在北京召集西山會議，在北京組織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在上海則組織了辛亥同志俱樂部，在廣州則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當時帝國主義者就收買了一些反革命賣國分子如繆斌（北平失陷後，當日寇的偽宣撫部長）之流，利用這些組織，假借國民黨名義，假借孫文主義的名義，來破壞國共合作，製造謠言，挑撥國共之間的感情，分裂國民黨，以便由此來破壞當時如日方中的革命運動。不幸的，戴季陶在五卅之後，一共發表了幾個小冊子，如：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他所發揮的理論，主要的是從消極方面來

（註六）引自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了解孫文主義，懷疑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三大政策。這樣，這兩個小冊子就被帝國主義者及一般反革命派利用爲破壞革命統一戰線的工具。這種不幸現象之發生，正如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指陳：「不外黨員之中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種種分子，其平日列名黨籍，祇圖藉黨行私，初無意於爲黨服務，故對於反抗帝國主義，則慮以此賈禍不獲容身於租界。對於提倡農工運動，則慮以此取憎於富且貴者，不獲廁身於縉紳之林。對於軍隊與人民合作，則慮失其軍閥地位，不獲擁護自衛，以遂其無饜之欲。對於容納共產分子，則慮以努力工作之故，而相形見絀。對於嚴明紀律，則慮喪失其爲惡之自由，一旦將以制裁之故，而至於不能維持其藉黨行私之生活。積此種種，對於孫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略，搖撼之惟恐不力！遂使帝國主義者得踏瑕乘隙，以施其挑撥離間之伎倆。」

在國民黨溫和分子與急進分子間的激烈鬭爭中，國民黨於民國十五年一月四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五十餘人。由於革命勢力的增長，在大會上急進分子終於獲得了勝利，通過了許多革命的決議案及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宣言。宣言首先指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孰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國主義之方法，總理於遺囑中，亦已明白告曰：「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已能以其自力，打倒帝國主義，自致於平等，同時以平等待我者，如蘇俄是。有與我同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期相與努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如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是。此等民族，對於平等之觀念有二：（一）自求平等；（二）同時求他人之平等。合此二觀念，故民族運動，與國際運動，

實爲相須。而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爲一致。惟其如是，乃能與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國主義，作殊死戰。」『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民衆，尤爲必須。過去民族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者限於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於現在及將來，爲民族革命運動，必須以其意義普及於田間與工廠，且必須使之組織於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中。』又說：『在民族革命運動進行中，必須看破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及防止其一切包藏禍心的宣傳。此等宣傳，實含有挑撥離間之兩種作用。帝國主義，爲遮斷其本國內大多數人民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則倡黃禍之論，以爲恐嚇爲遮斷東方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間之聯合，則倡赤化共產之論，以爲恐嚇。此種恐嚇手段，能使革命的勢力，歸於離散。故凡從事民族，革命運動者，必當大聲疾呼，以揭破其陰謀。同時益以誠意與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人民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一致，向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者，猛烈進攻。』大會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與繼續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對於分裂分子給予了打擊，對其首要人物或開除黨籍，或給予警告。

但是也正是在這時候，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革命的活動更加厲害起來。帝國主義者在這時候，不但在北方進行了張吳的聯合，造成了『三一八』大慘案；而且在南方更進行了挑撥的陰謀，因而發生了廣州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事變的經過大致是這樣：三月十八日酉刻，當時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忽得假傳命令（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出於歐陽格、歐陽忠的設計陷害），令將所轄中山兵艦升火開往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候用，李之龍未加辨察，卽如令而行。當時蔣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爲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恐其有擾亂之舉，乃卽施行迅速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

，以防不測。」（註七）而更實際的背景則因「帝國主義者常希望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崩壞，如已往歷史所恒見，不由於外人軍隊砲艦之襲擊，而由自己內部之衝突與紛爭」，（註八）這就是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所慣用的「以華制華」政策。它們在事前即曾利用了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的弱點，經過反革命賣國分子如梁斌等，在國民革命軍中，在黃埔學校中，肆行造謠離間，說什麼共產黨將要陰謀異動，適巧李之龍在當時又是共產黨員，發生升火事件，於是當局者便真以為共產黨有什麼異動計劃，乃更小題大做，竟調動武裝力量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東山俄人住宅，宣佈緊急戒嚴，斷絕省內外交通，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等五十餘人。及共產黨表示一再讓步之後，事變才告結束。這一事變是帝國主義分裂政策的嚴重試驗，而且也明顯地表現了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在革命中爭取優越地位的企圖及其動搖的弱點。當時上海申報通訊中曾說：「此次之事件，係國民黨中之右派反赤運動」。時事新報通訊也說：「據可靠消息，政變係孫文主義學會主動，拘捕黨代表，包圍罷工會，皆該會軍人所為」。可見這一幕小小悲劇的演出，其舞台經緯亦頗不簡單。

此時，國民革命勢力仍舊向前發展；而帝國主義者分裂政策之進行亦復有加無已，因此，三月二十號事變之後，又有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全會之召集。開會之初，廣州城內即滿城風雨，反革命派四處散佈「共產」謠言，廣州中央銀行也發生擠兌，這又引動了那一部分當局者，即在會議中提出所

（註七）見蔣當時對軍事委員會的呈文。

（註八）引自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對於整理黨務案宣言。

謂「黨務整理案」，其重要之點即是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得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員不得當國民黨部中央各部部长，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他黨加入國民黨者須將其原存黨籍報告，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保存，及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訓令，須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等。在這時候，一面是帝國主義分裂陰謀繼續發生作用，一面是中共的繼續退却。在帝國主義分裂陰謀之下，當時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雖然繼續有不幸的錯誤舉動，但一般說來，他們還願意革命，而且當時如果沒有左翼革命勢力與廣大民衆力量及共產黨人的支持，則廣東國民政府的政權是不能堅固的，並且也不能進行北伐；而且當時北方黑暗勢力重新結合，三一八慘案對於全國的震動，及其最露骨地暴露了北方軍閥爲帝國主義工具的醜惡，使全國人心更趨向於革命統一戰線，得以暫時阻止了帝國主義分裂政策的進一步實現，所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沒有因此即陷於不幸的破裂。當時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知道中國正處在一個更大的革命浪潮之前夜，要求國民政府實行北伐已經成爲全國廣大民衆的呼聲，五卅運動之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從羣衆的反抗示威，抵貨罷工，正進一步要發展和轉變到更高的鬭爭形式——武裝的革命戰爭。這種更高的鬭爭形式，一方面固然表明工農羣衆已經要在參加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更加擴大自己的組織力與戰鬥力，使中國革命勇猛前進，向着與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決一死戰的時機方面去。但同時也就提醒代表市民層的中間派急需準備自己，竭力想爭取自己優越的地位和領導權，以圖控制革命，使它不要越出自己所劃定的範圍。三月二十號事變與五月會議，正是這一形勢之具體的表現。當時爲着避免革命的分裂，革命的讓步有時也實是不得已的必需。因爲馬列主義者並不根本排除妥協，「問題不在於否認利用妥協，有時候環境會懲罰我們走向妥協，或者環境會逼迫我們走向妥協。問題在於把無產階級的真實的革命目標明

確地保證在眼裡，而在任何情勢之下都能够依各種曲線運動與妥協方式去追逐這個目標。」（列寧）而且革命任務的實現，祇有在人們不限於一味的前進，而同時還想方法鞏固已經奪到的陣地，把自己底力量重新安排一下，使之適合於已經變更的環境，充實自己的後方，準備一些後備軍的時候。所以在當時環境之下，共產黨的任務，不在於假作頑強，而在於咬緊牙關，切實準備力量，以迎接革命戰爭之到來。但在當時機會主義者是沒有理解這種革命的原則的，結果在事實上就造成了許多錯誤，而其後進一步的發展，就影響到後來中共領導機關以後機會主義的路線之形成。



## 第十二章 北伐戰爭的勝利與收回漢口九江租界

### 第一節 北伐軍佔領長沙武漢的戰爭與民衆威力的表現

五卅運動後，中國政治形勢的特點，就是一方面革命運動日益擴大和發展，另一方面反革命派集中一切力量，鎮壓和破壞革命運動。在全中國各地都充滿着革命與反革命的劇烈鬭爭，然而鬭爭形式除了廣東以外，在最廣大的中國區域內還限於遊行、示威、罷工、罷課、抵制英日貨與軍警衝突等，還沒有走到直接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最高形式。這種鬭爭是沒有法子能够再長期的繼續下去，而必然向兩條道路發展：或者是反革命勢力把革命運動鎮壓下去，或者是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的統治。中國那時革命的發展便是走向以革命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工具——軍閥統治。廣東革命軍的北伐，便是這一轉變的明顯表現，所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實際就是在五卅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的結果。

武裝鬭爭的形式，在中國，和在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中國因爲是一個半殖民地 and 半封建的國度：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劃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軍閥的封建割據，就使得中國革命發展也不平衡，使中國革命武裝鬭爭形式可以在一省或一區域首先得到勝利，在這裡首先可能組織起革命的軍隊，以便和反革命的軍隊作戰，爭取革命在其他省區和全國的勝利。斯大林在北伐時，論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在五卅運動

後，中國革命首先在廣東得到初步勝利，建立起國民政府與黃埔軍官學校以及群眾運動的堡壘，成爲推進革命勢力擴大到其他省區和全國而取得革命勝利的張本。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就是將革命發展到全國去的一種行動，這種行動是以革命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

經過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以及五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央全會「黨務整理案」的調度，在北伐進軍之前，國民政府軍制和人物有了新變更：六月五日廣州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凡國民政府下之海陸航空各軍，悉歸其統轄；他如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廠等機關，均直屬於總司令部。自北伐動員令下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各部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此外如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國民黨中央軍人部，亦俱以總司令兼任主席或部長。這些調度，從歷史的實質看來，是和那留心於革命和北伐的果實，留心於革命的範圍等基本問題，息息相關的。「市民層」經過這些調度，目的在使革命和北伐的果實，完全落在它的手裡。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接着北伐軍即向北出動。當時全國民衆正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奉直軍閥反赤戰爭的鐵蹄踐踏與蹂躪，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都表示十分的渴望。因此在廣大的群眾的擁護之下，北伐軍節節勝利：七月十二日，國民革命軍第七第八兩軍破敵於永豐、衡山、湘鄉等處，乘勝追擊，遂於七月二十日佔領長沙。佔領長沙之後，首先便壯大了北伐軍的聲勢，給了吳佩孚一個嚴重的打擊，壓低了吳佩孚的氣焰，搖動了吳佩孚的軍心，於是北伐軍長驅直入，八月二十二日即繼續攻下岳陽，趙恒惕等部狼狽北竄。接着經過汀泗橋之血戰與賀勝橋一帶之肉搏，於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於是吳佩孚退出鄂境，武昌陷入重圍之中。然以陳嘉謨，劉玉

春之死守，集中火力，憑城掃射，革命軍犧牲極大，歷四十日之久，至十月十日始下，從此武漢三鎮完全入於國民革命軍手中，而幾年來侷促一隅之廣州國民政府的勢力便伸張到了長江，到了中國的中心區域。這在革命勢力的發展上，自然有它很重大的意義。因爲一則武漢據中國地理之中心，扼長江和京漢，粵漢兩路之樞紐，在經濟上除上海外，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區域；在軍事上，北可以佔京漢路直趨河南而取北京，東可以順長江直撲皖贛以臨江浙，西扼四川而南障湖南，並有全國最大之兵工廠；在政治上，坐守武漢可以控制西南而與北京對峙。二則武漢是辛亥革命的發難地，當時革命義旗自武漢一張而全國響應，竟成辛亥革命軍擁有長江以南之局面，可是自民二黎元洪投降袁世凱之後，武漢便從此落於北洋軍閥之手，北洋軍閥據此得以鎮壓南方革命勢力。北伐軍佔據武漢，實際上是搗毀了吳佩孚的巢穴，結果了英帝國主義一個最兇惡的工具。

在江西方面，革命軍第三、第六兩軍於九月二十日進佔南昌，旋因孫傳芳部的反攻又復退出。以後經過不斷的劇烈戰鬥，卒將孫部擊潰與消滅。至十一月四日，革命軍攻克九江，十一月八日北伐軍始入南昌。在福建方面，敵周蔭人部乘革命軍北伐之際，於九月下旬大舉向潮梅進攻，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所擊敗，並乘勝進佔永定，旋即於十一月佔漳州。十二月下旬革命軍入福州，不及三月，福建全入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在北方，國民軍日益傾向革命。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五日馮玉祥由蘇聯返國，十六日發表宣言，稱今後之國民軍爲民衆之武裝，十七日在五原宣誓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宣誓接受國民黨主張，率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民國十五年底國民軍奠定陝西全省。

北伐軍的進展所以能够這樣迅速，一方面因爲北洋軍閥的勢力之分裂崩潰，使北洋軍閥不能成一個完整的勢力來對付北伐軍。當時北洋軍閥內部的衝突如孫傳芳與張作霖、張宗昌的衝突，吳佩孚與張

作霖與孫傳芳的衝突，互相防備，互相牽制，不能大舉援鄂；而且吳佩孚的內部亦號令不一，故北伐軍得利用孫傳芳的暫時中立與吳佩孚軍隊的弱點，一鼓而下岳漢。另一方面又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互相競爭，削弱了國際帝國主義的陣勢；帝國主義本國勞動運動之發展，特別是英國在當時經過了一次空前的五百萬工人的大罷工，與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之興起，且因中國革命進展的影響而更劇烈，及蘇聯無產階級政治權之存在和鞏固，它在地理上又與中國很接近——這些條件都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的重大原因。最後還有一個重大原因，而且是最實際的原因，那就是全國革命民衆的鬪爭力量，這裡我們不妨追溯當時幾件重要的事實。

當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時，一切佚役都由民衆充當，而省港罷工工人還組織得有幾千人的運輸隊。北伐軍一入湖南，廣大工農學生群衆不但積極歡迎，而且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加作戰，株萍鐵路工人且在北伐軍攻克醴陵之前，即自動將敵軍驅走。平江之役亦然，農民大部分都實際參加作戰。故當時廣州民國日報（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也說：『此次北伐勝利奪得平江，其力量全在農民。』當時此種消息，會連篇累牘登載於報紙，不是說：『農民大舉幫助，冒彈衝鋒，勇敢登山，敵兵大亂』；即是說：『農民因猛攻太甚，陣亡者不計其數。』不是說：『北伐軍在湖南作戰時，涪口、梓江一帶農民亦紛紛殺敵』；即是說：『此次敵軍被民衆殺死者不下二千餘人。』其參戰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犧牲之重大，已可概見了。再看岳州之戰：『八月二十日晚，有岳平一帶農民協會土著農民，偵知岳州方面之敵軍，惶急萬分，軍心渙散，特向李軍長告密，請神速攻岳，並自願領導，由平江北鄉渡過微水黃芽山而撲岳州，敵軍不知有此小道，故未設防禦工事，比較容易得手。李軍長從之，遂於二十一日黎明，即取小道由農民領導，抄攻岳州。沿途路雖難行，幸未設防，二十一晚十時，李軍

長部隊即抄至距岳城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進攻。敵軍驚爲天降，紛向雲溪、路口鋪、五里牌、羊樓司一帶潰退。葉逆開鑿所部不願與北軍同退，反戈投誠者二千餘人（後葉開鑿本人亦投誠北伐軍——華崗註）。余逆蔭森全部，則被截斷，全行繳械。中路之李何兩部開耗，亦猛向岳州前進，上下夾攻，二十二日早晨，即收復岳州。」又：「據最近長沙方面調查，粵漢鐵路之工友，對於敵軍，曾作種種妨害其軍事行動之工作，如破壞路線，截斷電信等。且於長沙未攻下以前，曾提議總罷工，繼因經費問題未能實現，然其擁護革命之熱誠，已足以代表民衆一般之意志了。」（註一）

汀泗橋之役：「北伐軍連下衝鋒十二次，均爲葉部之機關槍隊掃回。彼此只隔一橋，聲問相通，卒無法越雷池一步。橋下積尸，不可勝計。直至接戰之第三日，已得咸寧之右翼軍李品仙師，會同七軍一部，藉農民爲間道，竟能從咸寧取道澧州司，越嶺以擊葉軍之背。初時葉部尙未知南軍已襲其後，以爲吳佩孚援兵開到，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隊馳至，逐漸迫近，殆如飛將軍從天而下，於是腹背受敵，大驚失色。此時前後夾攻，葉軍幾乎全軍覆沒，而葉氏亦幾於成擒。」（註二）同樣，鄂贛民衆也是對北伐軍盡量援助的：「當北伐軍於未克復漢陽之前，漢陽兵工廠全體工人，爲制吳佩孚之死命以援助北伐軍起見，竟於前月一日起，全廠工人舉行總罷工。及至北伐軍克復漢陽，始實行全體復工，爲革命軍製造槍炮。」（註三）北伐軍進攻南昌時，亦賴工人學生與守備隊聯絡內應，始克佔領。

（註一）見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及二十八日廣州民國日報通訊。

（註二）見民國十五年九月七日香港華僑日報。

（註三）見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與二十一兩日廣州民國日報通訊。

自然，當時北伐軍的勇敢作戰與指揮得力，亦是北伐取勝的重要原因。由於五卅運動以後革命潮流的激盪，驅使了大批革命青年投身革命軍隊，經過不斷的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部隊戰鬥能力的養成，主要是依靠政治工作來保證的。當時國民革命軍中的黨代表制度，對於堅強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和提高部隊的政治質量與戰鬥力量，確曾盡了相當重大的作用；雖然在北伐之前，經過不幸的中山艦事件，一部分優良的政治工作人員被迫退出了國民革命軍，但急進的革命影響在各軍之間，還是很大的；而這種影響的程度，正決定了各軍戰鬥力的強弱。凡是這種影響的程度特別強大的，則其戰績必特別出人頭地，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這是衆所週知有戰鬥力的鐵軍；第二軍、第六軍，在廣東時，本來是沒有赫赫之名的，但在後來北伐戰爭中，其戰績却有特別的記錄；又如轉向革命的第八軍，在後來北伐進行中，也特別表現了戰鬥力，這些都正因為急進的革命影響在那裡加強而獲得的。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與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正因大革命時代有了這種新精神的軍隊，其作戰方法也自然與其政治任務相配合，不是被動的呆板的機械的作戰，而是主動的活潑的富於攻擊精神的作戰，因此獲得了北伐的勝利。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一切戰爭，要是區別起來都可以分爲下述的兩類：一類是進步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而另一類，則是阻碍進步、違反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民國十五年的北伐戰爭屬於前者，而當時張吳軍閥反赤戰爭則屬於後者。北伐戰爭推倒北洋軍閥，是以革命戰爭去反對反革命戰爭；因此，北伐戰爭的利益，是與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它有適合於大多數人民要求的真理，所以它也就能够動員起絕大多數的人民，爲着正義的戰爭一齊努力，因而也就獲得北伐的勝利。而在北洋軍閥方面，即在支持反革命戰爭的方面，它就恰恰相反，它的戰爭的利益，只是爲了維護少數人的統

治，而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違背的，因此它也就要遭受大多數人民的反對，結果終於走向失敗。這也就更多一次證實了斯大林所指出的一個偉大真理：『戰爭的最後命運，不是由技術來決定，而是由正確的政策與廣大人民的擁護來決定。』現在我們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爲着我們全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的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它的正義性比北伐戰爭更加明顯，因此也就應當有更好的條件，動員廣大人民來參加抗戰。然而兩年半的抗戰事實證明，許多能够解決的困難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主要的就正因爲政治進步的不够，民衆動員還大大不够深廣。因此，着重指明北伐戰爭對於目前抗戰的經驗與基本教訓：要想澈底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要有真正的政治改革與全民動員，顯然還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 第二節 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的新浪潮

國共合作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不斷的向前發展。這種發展到五卅運動便開始了中國的大革命，而北伐則是將國民革命運動直接轉入大革命，所以從北伐開始就更直接的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大風暴。在本節中，且先敘述一下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的新浪潮。

省港罷工是中國工人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運動進展中有名的政治罷工，是五卅以後民族解放運動普遍全中國之堅持最久，使帝國主義受絕大打擊的民族鬭爭。省港罷工在積極方面幫助統一了廣東，幫助建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引起了英國國內的總同盟罷工；在消極方面，毀壞了『大英帝國』在東方的威權，使香港政府受了極大實際經濟的損失。根據海關貿易冊：一九二五年香港對華輸入比一九二四年輸入減少了六千五百餘萬兩（一九二五年輸入是一七二、七八九、〇〇〇兩，一九二四年

輸入却有二三八、三五五、〇〇〇兩），一九二五年的入超竟比一九二四年減少了七百餘萬兩（一九二五年的入超是五八、〇七四、〇〇〇兩，一九二四年的入超則爲六五、一九二、〇〇〇兩）。所以省港罷工開始不到兩個月工夫，香港政府便說省港罷工「實公然與英國作敵且立意破壞中英條約。」

省港罷工盡了許多任務，建立了許多偉大的功績，早已到了結束的時期了。故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間已願意犧牲一部分條件取得相當勝利便可解決罷工，但是，香港政府却寧可忍受經濟上的絕大損失——每天一百八十萬元，而千方百計想恢復「大英帝國」在中國已墮之威權，企圖用武力強迫復工，而不願意和國民政府交涉，更不願與省港罷工代表直接談判解決罷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前，當時的政府，尙知道省港罷工是爲中國民族利益而奮鬥的。故一面極力幫助省港罷工，一面想與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決罷工。農工商學各界尤一致擁護罷工勝利，一九二六年二月初間會熱烈的舉行過一次援助罷工週；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無理，願意私人湊足三百萬元以補助罷工工人，以便勝利的解決罷工。香港政府因懾於民衆擁護罷工之熱烈，不得不派人到廣州與國民政府談判解決罷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湊資補助罷工工人，這是當時解決罷工最有利的時期。

然而香港政府始終無誠意解決罷工，始終想維持大英帝國在東方的威權。恰巧在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發生，香港政府又得了一個破壞罷工的好機會，於是香港政府立刻撤回派往廣州談判解決罷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籌資補助罷工工人的行動，依然採取從前破壞罷工的手段，而且更加來得毒辣，這是省港罷工最危險的時期。

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之後，廣州國民政府另委陳友仁代理外交部長，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樣的政府全權代表談判解決罷工，這已是一個讓步。香港政府雖始終沒



有解決罷工的誠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務司，一是華民政務司，一是駐廣州沙面的英國領事。雙方正式代表於七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香港政府想利用國民政府正在出師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錢收買或商量借款，所以極力離開罷工本題，而單獨提出交涉排斥英貨問題，態度非常強硬。國民政府當時在罷工工人監視之下，雖然沒有接受香港政府的收買，但亦沒有堅決擁護罷工工人的利益，因此談判又歸於停頓。

七月中英談判停頓以後，廣東革命民衆擁護罷工仍舊非常熱烈，在八月底還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擁護罷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大示威，這樣自然更加引起香港帝國主義的仇恨。同時北伐軍攻下岳州，革命勢力向北發展，香港政府急欲乘機一面予廣州以打擊，爲吳佩孚與援；一面又擬製造一殺人機會，好壓迫罷工。於是迭派兵艦駛入省河西堤，向工人糾察隊蠻橫挑戰，因爲工人糾察隊不與衝突，所以尙未發生嚴重慘劇，不過排貨運動不免受些打擊。如此一直支持到十月的時候，省港罷工和抵制已經延長了十六個月，武裝的工人糾察隊能夠斷絕香港與廣州的聯絡，但是不能阻止香港帝國主義的強盜從別的地方招致新的工人。對於罷工抵制的同情，廣大地普遍到整個東方以至於世界，但是過去沒有，現在也還沒有強固的工人組織在南洋群衆中，能夠阻止無業群衆向香港投來。罷工能够破壞香港工業和商業，同時也就縮減了資本公司對於勞動力的需要；他們所必需的三四萬工人，是可以從外邊找到的。因此爲了要施展罷工工人一切革命的經驗及毅力到香港新的工人群衆中去，爲了要在香港內部建立起像在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那樣的革命砲壘，亦不得不終止罷工，於是省港罷工抵制便在十月間北伐軍佔領武漢聲中宣告結束了。

這次省港罷工抵制延長了十六個月，世界工人運動一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這樣持久這樣廣大的政

治罷工。省港罷工的根本特點，便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兩種鬭爭形式——無產階級之罷工與民族抵制之結合。這一罷工是直接聯繫於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間上海、沙面、青島屠殺後之中國民族革命鬭爭高潮的。香港十三萬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工會指導之下，拋棄了工廠、手工場和碼頭的工作，並離開香港而移住於廣州及廣東各地。罷工工人建立起罷工委員會，這個罷工委員會在十六個月中間指導罷工工人的英勇鬭爭，它自身也就成了廣東全省革命的堅強砲壘。罷工變成了抵制，罷工工人的前進分子武裝起來，並組成特殊形式的工人赤衛隊——罷工委員會的武裝隊伍。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廣東全省海岸佈置了一條很長的戰線，嚴密地封鎖廣州和香港中間的一切交通，不放進販私貨的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偵探到廣東來。香港這個英帝國主義在東方強有力的支柱，隨着有組織的工人意志而衰落了，中斷了其與廣州的聯絡——這種聯絡是香港在中國南部商業上佔優勢的原因。十六個月的長期罷工工人竟以自己的毅力和耐性消蝕了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威權。罷工雖然終止了，但是英帝國主義強盜將永遠不會忘記了它們從省港罷工與抵制中所得到的痛苦的教訓。

正當省港罷工談判和終止的時候，上海自五卅週年紀念運動開始的罷工運動却在如火如荼的向前發展。一月至六月間的罷工情形在前面已經有過記載，七月份的罷工運動比起六月份來，範圍更廣，人數更多，情形也更複雜。七月十一日上海總工會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出當時上海工人之總要求十一條，並發佈宣言，說明當時上海罷工的現象和原因，指出：（一）打罵工人，（二）開除工人，（三）濫罰工資，（四）侮辱女工，（五）虐待童工，（六）大小便不自由，（七）工廠設備疏忽，——乃一般的工人所受痛苦；還有集會、結社、言論之不自由，工會之受摧殘，工人領袖之遭逮捕甚至槍殺，更激起罷工鬭爭的重大原因。最後，上海總工會代表全上海工人，提出十一條最低的總要求：

- (一) 工資至少每月不得低於十五元；
  - (二) 工資當按照物價至少每年必須增加一次；
  - (三) 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
  - (四) 星期日休息，工資照給；
  - (五) 不許打罵工人與濫罰工資；
  - (六) 不許開除工人；
  - (七) 規定因工作而死傷之工人的撫卹金；
  - (八) 工人在疾病時廠方須負責爲之醫治，並須發給半數以上之工資；
  - (九) 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產前後應有一月之休息，工資照發；
  - (十) 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 (十一) 改良工廠設備，如增設門窗、天窻、廁所等。
- 以上這十一條，真可謂最低限度的要求了。但是中外資本家却連半條也不肯實行，它們不特根本拒絕工人米貼的要求，不理會改良待遇的呼籲，而且向工人作種種反攻，如開除歇業等。可是自上海總工會發表『上海工人的總要求』以後，在數十萬的工人群眾中却起了劇烈的作用，差不多個個工人都願爲此十一條要求而奮鬥，一般貧民對此要求也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罷工浪潮更不斷洶湧起來，茲舉七月份上海罷工統計如下：(註四)

(註四) 根據第一百六十七期嚮導週報施英(即趙世炎)所作統計。

表(一) 罷工概況

同盟與單獨罷工之罷工次數

參加罷工之企業總數

參加罷工之人數

罷工之時間(以鐘點計算)

罷工所提之條件

勝利的條件

五四

三業又一〇五廠

七〇、四九四

六、六一二、一九七

一八〇

六〇

表(二) 罷工企業類別與總數

手工業 三業又三五廠

印刷業 三七廠

紗廠 一八廠

絲廠 三廠

碼頭 四處

烟廠 三廠

表(三) 罷工原因分析

工資的 一九

待遇的 四

工會的 五

郵務 一家

染織 一廠

船業 一廠

鐵廠 二廠

總計 三業又一〇五廠

經濟的與時間的 二

經濟的與待遇的 九

經濟的與援助的 二

時間的  
援助的  
五  
七

表(四) 罷工勝利條件

工資的  
三四

時間的  
八

總計  
六〇

表(五) 罷工條件分析

工資的  
六二

待遇的  
四五

反對用人  
七

求開廠的  
一

表(六) 罷工時間分析

一月以上  
三

三天以上  
九

一天以下  
一一

總計  
五四

反對廠方用人的  
總計  
五四  
一

待遇的  
一七

反對用人  
一

時間的  
一八

工會的  
四五

援助的  
二

總計  
一八〇

七天以上  
一三

一天以上  
一四

一小時意工  
四

從上列六表，我們可以看出以下的重要現象：  
(一) 七月份上海罷工總人數又超過七萬；

(二) 七月份上海罷工企業仍爲百餘廠，但手工業的罷工，較六月份加多；

(三) 罷工的原因，屬於廣義的經濟意義的（即包括工資、時間、待遇諸條件）佔百分之八十；

(四) 罷工時間較長了，在一月以上者已有三個罷工，在一週以上者有十三個罷工，而三日以上、一日以下的罷工，亦有多數；

(五) 一百八十八個罷工條件中，工人結果得勝利者僅六十；六十二個工資要求條件中，工人罷工結果僅得三十四。

以上所述都是經濟罷工，這種經濟罷工正在繼續發展和擴大，到了八月下半月，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戰鬥場上來了！因爲日本資本家對於工人之積極進攻，同時又發生陳阿棠被殺案，於是從八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內外棉紗廠工人遂又爆發了反日同盟罷工。二十日上午六時，上海紗廠總工會發佈第一次罷工命令，原文如下：

『內外棉東西五、七、八、十二各廠工友們！東洋人橫暴無理，在萬里丸船上，竟秘密殺我同胞陳阿棠；在日華廠中，又敢用電網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廠四廠九廠的全體工友，又備受日人無理停廠之壓迫，飽嘗拘捕、毒打、開除之苦；最近九廠工友石萬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種種罪惡，擢髮難數！我工人爲爭國權，爲爭工人生命安全與利益，決以最後手段對付。聯絡各界一致抗爭。我東西五、七、八、十二廠全體工友，首先於即日起，實行同盟罷工，聽候工會命令！』

上海紗廠總工會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實行罷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廠，計一萬餘人。日本

內外棉廠在上海者共有十一廠，上述五廠先發動，接着其餘六廠亦加入同盟罷工。所提要求條件如下：

(一) 解決陳阿棠案，引渡兇手交中國法庭辦理，撫卹被難家屬，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發生，日本領事向中國道歉；

(二) 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裝巡捕流氓入廠毆打工人及濫罰工資與蔑視工人人格（如打脚模手印等）等；

(三) 增加工資十分之二；

(四) 釋放各廠被捕工人，恢復被開除工友工作，以後不得任意開除工人；

(五) 賠償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三、四、九廠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及此次罷工期內之工資，須一律照發。

可見在民族政治性的罷工中，其主要原素仍包含有經濟的鬭爭。工人階級之政治自由完全沒有，工廠的待遇又萬分苛虐，工會組織之百折不撓的奮鬥乃罷工的原素之一。二十日開始發動以後，罷工即日漸擴大，直至九月十八日始被迫上工，計共支持二十八天，參加人數共二萬二千六百餘人，所佔日廠共十二家。

以上是上海日廠工人反日同盟罷工之情形。其實在總的形勢上，上海罷工浪潮在八九兩月中之激盪，並不亞於六七兩月，當時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施英（即趙世炎），會根據其親身經驗，對罷工情勢按期加以總結，先後發表於嚮導週報，茲引其所作八月份上海罷工的統計表於次：（註五）

（註五）見一百七十二期嚮導週報。

工廠名稱	產業	罷工之時間(以鐘點計)	參加人數	要求條件			勝利	失敗	未決
				政治	經濟	待遇			
日華一二紗廠	紗業	六四八	四三二五	一	四	五		五	
老怡和紗廠	紗業	七四四	四〇〇〇	三	三	六			六
恒豐永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二〇	四	二	六	三	三	
大北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五〇	四	二	六	三	三	
北方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一一	四	二	六	三	三	
公義成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四〇	四	二	六	三	三	
義恒豐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三〇	四	二	六	三	三	
永和成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五	四	二	六	三	三	
海京地毯廠	手工業	二二六	二四〇	四	二	六	一	五	
辛昌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一	四	二	六	三	三	









## 總計

五、九五九三七、五三七一一五一三九 二九三 二八 四五一一〇

施英在他的罷工統計之後，並詳細說明統計之內容，總括有以下之結論：（一）產業的罷工大都含有政治性質，且能持久；（二）手工業的罷工特別加多，這證明在產業罷工已起之後，手工業工人因生活壓迫，亦表現其組織的新力量，增加經濟的鬭爭生活；（三）罷工的條件，屬於工資與待遇的佔百分之八十強，與六七月相同；（四）失敗的條件佔最多數，亦與六七月相同；（五）月底華商電車工人之罷工，證明經濟鬭爭推廣到市政交通工人，這是八月份上海罷工情形之概略。但按照統計內容以說明，那僅是一個結論，僅能知道一般的現象。至於罷工事件的本身——其經過情形與其教訓，却不是從統計可得而知的。在事實上，這些情形惟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其次，罷工的對方被反抗者（即資本案）僅知道片面；至於官廳則蠢如鹿豕而淫威十足。所以當時滬滬警察廳出了一張肉麻不通的禁止罷工佈告，其口氣大有『格殺勿論』之概，而其內容則處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這張佈告曾被日廠工人的罷工日刊反駁個痛快。例如佈告說工人罷工了便沒有飯吃，殊不知工人正因飯不夠吃才罷工；又如佈告公然說五卅運動中工人罷工乃受人利用之輕舉妄動，這樣的話與五卅時英帝國主義者所發侮辱華人的『誠言』是一樣論調。其餘荒謬言詞甚多，而日本資本案恰好利用此項佈告翻印數萬份，以二百元僱數十人到處散發，這個佈告對於罷工工人表示着充分的敵意，結果祇有引起工人做更堅決的鬭爭。

### 第三節 萬縣慘案與反英運動的開展

北伐戰爭的勝利，吳佩孚的敗竄，直接影響到英帝國主義在長江的統治勢力發生動搖。所以自北伐戰爭以至取得武漢的過程中，英帝國主義由恐慌、咒咀變到了最後的發狂，便不分地域的運用鐵甲戰艦向中國民衆施行武裝的暴行。在九月四日既有英艦駛入珠江，武裝威脅革命政府的嚴重事件；其後遠道的警耗傳來，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艦在四川萬縣又演砲轟萬縣民衆的空前慘酷的大燒殺。

根據當時萬縣代表劉宗沛君之報告及國聞社與上海各報之重慶通訊調查結果，萬縣慘案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英輪因有內河航行之不平等待權，又恃該本國政府之後盾，故在川江航行並不遵守航行公約，每於開抵各碼頭時任意疾駛，以致迭次撞沉民船。如滇光輪船，於六月十三在萬縣箱子壩地方撞沉木船一隻，淹斃中國人民何興泰、劉吉五、張轟、王素雲、傅雲生等十餘人；又萬流輪船於七月八日在鄭都立石鎮地方，撞沉划子一隻，淹斃川軍第六師營長田雨亭及勤務兵商務人員張復初、田雲等二十三人；又嘉禾輪於八月二日在涪灘地方撞沉木船數隻，淹斃公差人民張海淑、覃邦良、崔英偉、崔英瑞、秦大志等數十人，並沉沒公款六千八百餘元。川政府曾向英領事提出抗議，均置不理不復。詎知英輪萬流號於八月二十九日復在雲陽地方，故意肇禍，特開快輪，以致撞沉木船十數隻，溺死人民數十人及官兵五六十人，並損失槍枝五十六枝，子彈五千餘發，公款八萬五千餘元。此次損失較前數次尤巨，而且損害到四川軍閥楊森身上，於是不能不派兵將該肇禍英輪扣留，以便辦理交涉；但是蠻橫的帝國主義者根本沒有理性可講，遂由兵艦派兵多名到該輪，將楊部扣船兵槍子彈強行一併提去，並傷

亡軍士數人，威迫將萬流輪放行，並同時架置鉅砲，直向萬城南津街等處，勢欲轟擊作敵對行動。居民惶駭，莫知所措。八月三十日，適英輪萬通、萬渝兩輪過萬，楊軍遂將兩輪扣留，以待交涉，於是空前大慘案遂以此開演。

當楊軍扣留萬通、萬渝兩輪的時候，重慶英領事即疾駛來萬，極力恐嚇楊森。同時英國兵船柯克捷夫號（Cocktater）即卸衣實彈，架置十二生的（12cal）之大砲數尊，對準萬城威迫，作敵對行爲；又立即由渝開來威警（Widgea）英艦，脅同示威，意欲作戰。九月五日午後五時半，又由宜昌開來裝甲英輪嘉禾，架置巨砲數尊，機關槍百餘桿，硫磺彈無數，滿載英兵，甫抵萬城，哨聲未絕，即逼近被扣之輪船。於五點四十五分，英兵突然衝過萬渝輪上，用機關槍及大砲轟擊扣輪軍士，無一倖免。同時逼近被扣兩輪之英艦柯克捷夫號，於五點四十八分，一面開快槍，向萬通輪射擊，一面用大砲向萬縣城兩岸亂轟；而威警號英兵艦亦於五點五十分開排槍，向兩輪及反抗之民衆進攻，並用巨砲對準萬縣城兩岸及南津街商場，萬縣中學等地掃射。同時嘉禾輪裝來之巨砲，亦向上列各地亂轟。據法艦之統計，三英艦共發大砲三百餘響，而嘉禾輪上更濫用其慘無人道、國際禁用之硫磺炸彈，對準南津街商場地方，放射百餘發，以致萬城繁華興盛之商場，崇偉廣大之民房，遂成烽火冲天，鬼哭神號，愁雲慘霧瀰漫全市之災區！事後調查，計被硫磺彈炸燬之商店，確有二百餘家之多；而民房之被焚於火者，至少亦以數百計；中國民衆兵士被殺數千人，財產損失則在數千萬以上。

英國帝國主義這次在萬縣既利用不平等條約，任意航行內河，不按航規，橫衝直撞，致撞沉民船數次，沉斃人民數十。地方官提出抗議，一味橫蠻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之大砲、野戰砲、硫磺彈盡量施行轟擊，傷斃中國人民至五千之衆，焚燬房屋至數千間，損失財產至千餘萬，整個的萬縣城差不多

成了腥血塗染的斷瓦殘垣。這不僅比五卅時的屠殺情形更兇惡慘酷十倍，簡直是近百年世界史上罕有之慘案奇聞。這種野蠻毒辣的行爲，在帝國主義對於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遞施，今英國帝國主義竟一再施之於中國，它簡直視中國爲屠場，視中國人爲非人類，不過是它任意屠殺的對象罷了！

這次屠殺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輪撞沉中國官船，與楊森衝突的結果；其實英國帝國主義早就在準備一個大屠殺，故屢次挑釁乘機待發。據當時（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所載：「由日人方面的調查，截至八月十五日止，英國兵艦在天津、芝罘、青島、上海、福州、汕頭、廣州、香港、漢口、長沙等處淀泊的已達四十八艘之多。」當北伐戰爭興師之初，英兵便在梧州上岸捕人，這是挑釁的第一次；當北伐軍進到武漢，英艦公然援助吳佩孚，炮擊北伐軍，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在廣州英艦派兵上岸，佔領碼頭，逮捕工人糾察隊，截獲民船，強行駕駛貨船進口，這是第三次；在萬縣屠殺便是第四次。因爲英帝國主義在五卅時雖然屠殺了數百個中國民衆，却引起了全中國民衆空前的反帝運動，英帝國主義在各方面都受了嚴重的打擊；尤其在廣東，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幾成了荒島，如今北伐軍又攻下漢口，英帝國主義在長江的統治勢力發生動搖。因此，它便不顧一切，橫行無忌盡量地使用它的炮艦政策來施行大屠殺了。

中國所有的軍閥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萬縣慘案的直接導火線發生於英輪撞沉官船直接損害到楊森身上，但是他們並不敢與帝國主義抗爭；而且恰巧相反，當時革命軍已攻下漢口，武昌危在旦夕，吳佩孚欲令楊森援鄂，使與英人謀妥協。楊遂遣渝關監督季宗孟到宜昌，與英當局開談判，其結果如下：

(一)英副提督及駐宜英領，保證交出被扣火輪後，與非英國之居間人，迅速調查處理關於未

了之一切浪沉民船事件；

(二) 英艦日後如上行時，由副提督及英領，負責保證決無對敵意思之行動；

(三) 所有關於萬縣一切應有賠償，雙方聲明保留，以便將來另案交涉。

由是「撞」沉變爲「浪」沉，被屠殺者一概白死，人民損失，百無一償。這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反英運動又如怒潮而起。萬縣屠殺開始的時候，英國帝國主義者很有一種想頭，它以爲英國與中國軍閥的衝突，不易於引起民衆的反感，因爲中國民衆敵視吳佩孚及其同系的軍閥（如楊森等），是英國人所熟知的。衝突的地點離開大都會及工人中心很遠，這也足以隱蔽事實，使萬縣事件不易於被幾個「鼓動家」利用去做反英的宣傳，如上海五卅屠殺一樣。英國砲擊萬縣，焚燬全城，一下子便擊斃了五六千以上的無辜人民，這樣便是給予中國民衆以絕大的恐嚇，使之戰慄於英國帝國主義砲艦政策之前，拜伏於地不敢動彈。英國資產階級對殖民地政策及其在殖民地劫掠，積貯了三百年的經驗，其手腕自是巧妙不過，這次萬縣慘殺的舉動，更可說是十二分巧妙的。然而五卅運動以後的中國民衆，其政治認識之提高，已非尋常可比。在萬縣事件中，中國民衆都懂得：這並非是英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之間的根本衝突問題，而是英國帝國主義武裝進攻中國民衆的狡猾政策，在事件中死傷的都是無辜的中國人民和兵士。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只能嚇退高等華人和軍閥官僚，却不能嚇退工農革命群衆。而且紙不能包火，英國帝國主義者不能始終隱蔽萬縣事件之真相。廣大民衆的反英運動，終於像洪濤一樣普遍於全國。萬縣事件發生的時候，英國帝國主義的喉舌——京津太晤士報曾經說：「大家都知道，中國民衆厭惡本國軍事權力，比厭惡英國軍艦還要厲害，四川的外僑絕不怕民衆對他們有何敵視。」可是，不過數日之後，僑居四川的一切英國人，都迫得離開四川的重要城市，以避免中



國民衆對他們之日加一日的敵視了。

事變的發展，竟出於英國資產階級意料之外。這番英國帝國主義對於萬縣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引起了全國被壓迫民衆轟轟烈烈的反抗。事變起後，萬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立刻罷工反抗，萬縣商人亦宣言不買英貨。重慶首先聽見屠殺消息，馬上即有熱烈的反抗運動，學生到處演講發傳單；數日後復有三萬餘人之示威大遊行，『解除英國軍艦武裝』，『廢除不平等條約』，『擁護北伐』的呼聲震動天地，並派代表劉宗沛到長江下游各地報告真相。長江上游領港工人因此屠殺亦對英輪罷工反抗。漢口、上海、廈門等地都有群眾大會及示威遊行，一時反英宣言通電遍載報章。此外，倫敦、柏林等地亦均有熱烈之示威運動。

#### 第四節 「一三」慘案與漢口九江租界之收回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日高漲擴大似一日，工人農民的廣大群眾起來爲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而爭鬪，在許多大城市中罷工運動如潮而起。許多省的農民也起來成立他們的爭鬪組織，和反動勢力的地主豪紳爭鬪。這種革命勢力之興起，無人能止之。工人群眾漸漸組織到戰鬪的工會之內，衝破了以前地方的行業的界限，成了强有力的統一力量，以領導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的爭鬪。由於工人農民奮勇爭鬪，由於北伐戰爭的勝利，並且由於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帝國主義之加緊進攻，多數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手工業工人都一天天革命化了，這些現象都使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勢力見之發抖！

於是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看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乃用和平方法，在中國民族

革命勢力中，找尋它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線。並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見，於是那些迄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月底）還站在民族革命鬭爭之外，或甚至仇視革命的某部分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帝國主義者主謀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並進而破壞革命。」（註六）當時帝國主義這種陰謀的明顯表現，就是英國駐華公使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向北京使團所提出的對華新提案，這個新提案據英國帝國主義自己說是「本政府通盤局勢慎加熟計後的物產」，其內容錄之如次：

英國對華政策，五年以前，即以促進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並減少其侵犯主權與束縛爲目的。故對於中國之稅權與法權，深願依華盛頓會議之決議解決之。然今日中國之現狀，已大異於華盛頓會議之時期，即有一強盛之民族運動相伴而起，其目的在謀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此而不予同情及了解者，實與列強對於中國之眞實志願相抵觸。故英國政府，深願華盛頓會議各協約國，皆發佈宣言，一方要求中國尊重條約之神聖，一方承認解放中國之正義。尤有進者，關稅會議未能履行五年前各國所許中國增加之附稅，以致惡感殊深；故英國政府，以爲各國應立時一致無條件承認中國在華盛頓會議所許得之附加稅。至其用途，提供於整理外債之條件，英國始終反對之，以爲在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之下，而擴張外人關稅保管權，實滋疑惑，且欲行之於一九二一年者，在今日已成不可能之事。故關於附加稅之存儲與支配問題，應由中國自行解決之。」

（註六）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月底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議決案。

在高等華人視之，或以爲大英帝國將對華大開恩網，因爲一向屠殺壓迫中國的英帝國主義者，現在忽然要『承認解放中國之正義』，甚至主張無條件承認華盛頓會議的附加稅，豈非『恩承厚澤！』而其實，自關稅會議停開後，中國完全失敗，北京政府，莫可如何；反之，廣州政府，則自動的照會各國領事，凡國民政府所轄之區，一切外貨進口，普通品征二·五附加稅，奢侈品征五厘附加稅，各國雖以違反條約爲辭，共同抗議，然國民政府堅持執行，毫不之顧。及後佔領長江流域，亦復照此辦理，外商莫敢不遵。英人深恐國民政府將不平等條約一概推翻，故有上項之提議，意在約請各國出面，一方共同迫令中國遵守條約之神聖，而一方無條件承認華盛頓會議的附加稅，以示糾正國民政府自由加稅之行爲。不僅如此，帝國主義一方面固然要用『和平方法』來破壞中國革命，但同時仍舊不能放棄它們一貫的砲艦政策。所以接着萬縣慘案之後，而且僅僅離開英帝國主義宣佈它的新提案後兩星期工夫，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國帝國主義駐華軍隊，便在漢口野蠻干涉中國演講隊，刺殺中國和平民衆了。

關於這次漢口「一三」慘案，帝國主義說是「中國暴民侵犯外人生命財產」，中國一般高等華人也說是「群眾胡幹」，現在我們可以借用素以溫和著稱的上海時事新報當時對於「一三」慘案的一段通訊，看看當時事變的真相究竟怎樣。該報一月十一日有一篇漢口事件之原原本本的漢口通訊，很詳細的記載「一三」事件，現在我節錄它一段肇禍之真相如下：

「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爲武漢名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之期，黨部及中央政治學校宣傳員，爲使各界明瞭慶祝意義，特組織演講隊到各重要地方演講。三日下午三時，有宣傳員數人在一碼頭江漢關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場演講，聽衆頗多，宣傳隊派

有專人照顧，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當局認此爲挑釁機會，急調大批武裝水兵登陸，挖掘戰壕，架機關槍十餘架，儼然向赤手空拳之聽講民衆，取作戰之形勢。聽講民衆，訓練有素，不爲所動，英兵乃蜂擁上前，實行驅逐。群衆知其有意挑釁，乃向華界退却，英兵復大隊衝入華界，將刺刀向人叢中亂戳，當將海員工會會員某腹部洞穿，立即斃命；又有碼頭工會會員李大生腹部被刺，大腸隨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漢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險；其餘商工各界聽衆被刺刀槍托殺傷打傷手足及面部者，總計在三十人以上。群衆睹此慘狀，異常憤激，無不願以赤手空拳與英水兵決一死戰，其時幸經國民政府代表徐謙、蔣作賓，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李國暄、宛希儼，漢口市公安局長張篤倫等趕到，向民衆宣示對付辦法，力勸民衆暫忍一時之氣，免受重大犧牲，群衆深爲諒解，漸次散去，一幕慘劇，始告終局云。』

慘案發生之後，武漢各界民衆，悲憤異常，當晚即各分途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付辦法。同時即於四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民衆團體緊急代表大會，一致決議：

(一) 要求政府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限英領事於七十二小時以內答覆下列條件：(1) 英政府須負責賠償此次同胞死傷之損失，(2) 英政府須立將肇禍兇手交中國政府依法懲辦，(3) 英政府須立即撤退駐漢英艦及英界之沙包電網等作戰物，(4) 英政府須向國民政府道歉，(5) 英租界內華人須有集會、結社、遊行、演講之絕對自由，(6) 英租界巡捕及義勇隊須一律解除武裝，(7) 英租界須國民政府派軍警管理；

(二) 同時要求政府自動辦理下列各項：(1) 立即收回英租界，(2) 立即收回海關，(3) 立即取消英輪在中國之內河航行權，(4) 立即撤消英人在華領事裁判權；

(三) 如英領事對於國民政府所提之條件不能接受時，民衆決自動封鎖英租界，實行對英總罷工；

(四) 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總商會通告，嚴禁買賣英貨；

(五) 五日下午二時在濟生三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會，追悼死難同胞，討論對英辦法。

國民政府即根據民衆要求，一面向英領抗議，要求在本案未解決以前，肇事英艦不得移動，否則遇有變故，不負任何責任，一面即預備接收租界。此時英租界工部局人員因恐中國民衆報復，已逃匿一空，英領事無法辦理，亦即自願撤退水兵，請國民政府派軍警入駐租界維持秩序。國民政府乃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實行主持租界一切公共市政事宜。同時九江民衆聽到漢口慘耗，即於一月六日遊行示威，當地英租界水兵，亦向群衆開槍射擊，死傷數人，比由當地軍警開入租界，維持秩序，一如漢口辦法，於是英人在長江上游的商務，大部歸於停頓。

自上項事件發生之後，駐在北京的英國公使便派參贊阿馬利赴漢口，以全權代表名義，與國民政府正式交涉。計自一月十二日起，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正式磋商。阿馬利要求將租界交還英國，爲陳友仁斷然拒絕。後來議定由中國收回，改設特別區，即照中國收回德俄兩國租界之例辦理。英參贊在中國革命勢力威脅之前，亦祇得表示同意，協定本可簽字，忽因英國派大軍赴上海，陳友仁認爲有壓迫性質，聲明軍隊不撤回則決不簽字。其時英國工黨，反對本國政府對華出兵，要求撤回，並直接電請陳友仁繼續談判，而英總理張伯倫亦特出席國會，聲明英國出兵，全爲保護僑民，並無其他目的，且令地中海艦隊，開駐香港而止。於是關於漢口與九江之英租界協定，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正式簽字。茲將該項協定，分別錄之如左：

### 漢口英租界協定

「英國當局，按土地章程，召集納稅人年會，於三月十五日開會，屆時英國市政機關，即行解散，而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由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接收辦理；

「在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於三月十五日接收前，租界內之警察、工務及衛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國當局辦理；英國工部局一經解散，國民政府即當依據現有特別區市政辦理，組織一特別中國市政機關，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區域；此項章程，將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通知英國公使，在漢口五租界合併一區域之辦法未經磋商定以前，此項章程繼續有效。」

### 九江英租界協定

「關於漢口租界所訂之協定，即時同樣適用於九江租界；

「在最近九江之騷擾中，英國僑民若受有直接損失，凡係出自國民政府官吏之行動，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國民政府擔負賠償。」

自是漢口、九江之英國租界，由國民政府正式收回。而關於九江之賠償，由陳友仁交付四萬元於阿馬利了案。當時革命的民衆一面打倒北洋軍閥，肅清長江上游；一面即以戰勝之勢，方新之機，向英國強制收回漢口、九江各租界，絕不遲疑，絕不妥協，允為中國歷年失敗之外交，取得了一次空前的勝利。

## 第十三章 上海起義與「四一二」慘變

### 第一節 第一、第二兩次起義的流產

自北伐軍克復武漢，進攻江西，與孫傳芳軍隊正式開戰後，上海局勢即入於搖動的狀態中。在這搖動的局勢之下，就產生了一種自治運動。此種自治運動，首先發生於上海市，遠在齊盧戰爭以後，由上海市自治運動，擴大到環太湖區域。上海閘北的自治運動和孫傳芳爭持甚烈，其初發動於閘北自治公所幾個董事，漸漸擴大到環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鎮的紳商團體；然而這種和平式的而又多少帶着一些反軍閥精神的自治運動，終於被孫傳芳用租界帝國主義的援助和丁文江『大上海』的欺騙政策壓伏下去，上海市終於被孫傳芳統治了，這就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政治生活中做軍閥反對派的投機的初次樣本！其後因孫傳芳在江西軍事失利之消息頻頻傳來，又因浙江夏超之宣佈獨立，上海自治運動又重新起來，且因此而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第一次起義的嘗試。

這所謂上海第一次起義，雖然名之爲『起義』，可是若在起義的實質的真正意義上來看，是不能稱作起義的，實際只能算是一種軍事投機。因爲武裝起義乃是一種政治鬭爭的特別形式——最劇烈最堅決的鬭爭形式，它是一種藝術，『要武裝起義取得勝利：第一，不應該依靠在陰謀上或政黨上。而應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上；第二，應該依靠民衆革命潮流之高漲；第三，起義必須依靠革命進行之歷史的緊急關頭，即當民衆先鋒隊伍的積極性最大時，即當敵人的營壘中和軟弱的不澈底的不堅決的

同情革命隊伍中發生動搖最劇時。」（列寧）但十月二十三日前的上海起義的計劃是受這樣的情形決定的：一方面孫傳芳在江西的戰事屢次失利，主力軍已喪失大半。至十月十日左右孫傳芳的軍事情勢更加險惡，南昌受困，已在岌岌不可終日之中。湖北方面十月十日武昌陷落後，吳佩孚失去了最後的壁壘，北伐軍又逼近武穴。福建方面，周蔭人又節節失利，陳調元、周鳳岐都有不戰而退的趨勢；最後更有浙江夏超之宣佈獨立——據此情形，孫傳芳的勢力實已在分崩離析，瀕於危急之時。另一方面受了北伐勝利的激盪，上海工人群眾在孫傳芳的高壓之下，久困思逞；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民衆苦於戰爭的延長，非常憤激；資產階級亦想乘機催促孫傳芳的崩潰，奪取上海的政權。

但因領導的薄弱，上述形勢並沒有轉變成爲廣大民衆的直接革命鬥爭，因爲領導機關只憑藉着少數的黨員和少數的武裝隊伍——只組織了一百多個的武裝工人及比較多的沒有武裝的戰鬥隊，就想實行起義。同時共產黨並沒有把起義的領導握在自己手裡，反而交給了一個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加以起義的時機也不適當，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浙江宣佈獨立，正式宣佈投誠國民政府，而且派兵進攻上海（十七日），這時候孫傳芳的軍隊尚未調集，上海的防守很是空虛，恰是上海起義最有利的時機，可是這時候起義的準備還非常差，不能舉行。到十月二十日武裝工人與資產階級所組織的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多多少少地準備着起義時，但是，這時候夏超的情形已經很壞了；反之，孫傳芳却比較從容的從南京調集許多軍隊。到十月二十三日，起義機關得到一個不確實的消息，說孫傳芳的軍隊已被夏超打敗了，就貿然發出於二十四日早晨五時實行起義的命令，其實事實上乃是夏超已被孫傳芳擊敗了。因爲共產黨當時根本沒有準備起義的群眾基礎，根本沒有計劃並組織上海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所組織的戰鬥力量，比當時共產黨的估量要少幾十倍。而且根本沒有統一起義的計劃，



也沒有統一起義的指揮人。結果起義沒有方法實現，僅有少數人與警察發生衝突。所以不但沒有廣大群眾的實際行動，而且僅在軍事投機上說，也只不過架了一個勢子，何況又失了時機，自然很容易的就被孫傳芳撲滅了。

但是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事件的失敗，並沒有使起義的進行中止，因為敵人的統治並未鞏固，民衆的勢力也未遭到大損失，所以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的消息傳來而上海自治運動又復高漲，而且運動的範圍比前次擴大，已由上海自治運動，擴大到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在上海產生了一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雖然這個聯合會的分子很複雜，其中包含着許多反動投機分子，他們本來是想利用這個三省聯合會，以自治的名義拒絕北伐軍入境，實際上是爲孫傳芳保全三省的地盤，以便他們得以參加政權；嗣因會中激進分子反對，加以十一月十七日孫傳芳北遁，魯軍張宗昌實行動員南下，三省聯合會乃被迫表示其脫離孫傳芳拒絕奉魯軍南下之主張，加以張宗昌準備帶軍用票一千萬元南下，蘇浙皖商民間之失色相告，於是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不能不表現出它的相當革命性了。同時群眾運動也確已比前發展，十一月下旬，每天都有大批宣傳隊出發，一星期之中，散去傳單竟達八十餘萬張。十一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會召集兩次廣大的群眾大會，反對孫傳芳反對奉魯軍的空氣非常高漲。

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旬，北伐軍經過相當休息，開始進一步的行動，二月十七日北伐軍佔領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軍且已進佔嘉興，孫傳芳受了更嚴重的打擊。此時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正增派駐華軍隊，外軍在上海各馬路列隊遊行示威，如入無人之境；孫傳芳因在浙江兵敗，猶擬在上海勾結英國作困獸之鬪，摧殘工會，大捕工人，壓迫輿論，濫捕新聞記者與市民，因此民衆更加切齒憤怒。於是從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階級開始了更偉大的鬪爭，掀起了廣大群眾革命的怒潮，爆發出

自二月十九日起的總同盟罷工。

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群眾之領導者——上海總工會，經代表大會議決之後，發佈總同盟罷工令。十九日晨六時起，奉到總工會命令而罷工者：在楊樹浦方面，有瑞鎔、錦鎔、鐵廠，黃浦碼頭及製盒廠，東方、老怡和、緯通、恒豐等紗廠，及電車公司車務、機務兩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人。引翔港方面，有電汽新廠，蘭格木廠，及申新、振華、永安、厚生等紗廠全體工人。南市有華商電車，求新、遠大鐵廠等全體工人。小沙渡方面，有同興、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廠及福新內外廠，日華、喜和等十四廠。浦東方面，有日華、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人。英界各郵政局，公共租界電車及南京路四大公司全體工人。法界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全體工人。以各產業計，罷工者紗廠全體工人。市政工人有郵電工人全體。店員方面有商務職工會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麗華公司等。手工業方面有金銀業、茶箱、洋服、篷業、香業、製茶、線毯、豬鬃等全體工人。金屬業與機器工人，罷工者有十餘家。各輪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廣西、山西、順天、甘州、寧波五隻；日清公司盧山丸、大吉丸，尙陽丸三隻；寧紹公司寧興一隻；舟山公司舟山一隻。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務、彩印、美華、華商、墨色、石印等全體工人。以上總計罷工人數，約在十五萬人以上。

罷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罷工人數激增至二十七萬五千餘人。其中多因受資本家之壓制，或因未奉到罷工命令者，計如：閘北絲廠六萬人，水木作四萬人；南貨業、醬園、米業、估衣業、藥業、洋布業共計十萬餘人。公共汽車工人全體五百餘人。小沙渡紗廠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萬五千餘人。黃浦及十六鋪等碼頭合計一萬人。

罷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罷工人數復增加至三十五萬，其增加者，計如：（一）碼頭工人，招商局中棧，北棧，日本郵船會社，黃浦碼頭，大阪碼頭，太古碼頭，匯山碼頭，均已罷工，共計有三萬餘人；（二）水木作工人增加一萬五千餘人；（三）徐家匯百代公司全體；（四）印刷工人有中華書局全體工人；（五）手工業方面各小廠業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六）紗廠方面原來參加者不計外，又增加二十六廠；（七）金屬業工人增加二千人；（八）楊樹浦又增加天章紙廠，中華寶興錫箔廠，亨司達及英美烟廠，共三千餘人；（九）海員新北京船一百人。

罷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罷工人數復增萬餘人，其中計：（一）江西路自來水工人全體；（二）虹口鐵廠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三）張羅鐵廠一百五十人；（四）機器鐵廠公所所屬工人全體參加；（五）手工業各工會增加一萬二千人；（六）店員增加一千人；（七）茶館工會增加六百，公共汽車一部分繼續罷工。

總計以上罷工人數，足足在三十六萬以上，不僅是上海歷來未有的大罷工，亦是全國歷來未有的大罷工。上海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之進步，與組織發展的迅速，從這一次的行動裡表現出來。這次總同盟罷工的發動，主要的原為援助北伐軍的政治行動，當時北伐軍前線已進至嘉興，原定在北伐軍繼續前進時，上海即舉行武裝起義，幫助北伐軍，驅逐奉魯軍閥，在上海建立市民政府。但到二十日傳出消息，謂北伐軍為等待後援，暫行停止進攻。孫傳芳計算到這一着，便開始對於罷工工人採取殘酷的恐怖手段。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便立刻聯合租界帝國主義的工部局，開始施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罷工實現後，僅僅在六小時以內，繁華富麗的上海，頓變為死氣沉沉的區域；全市電車停駛，輪船不開，郵局閉門，繁華的百貨公司停止貿易，一切大的製造廠停止工作，工場與作坊的汽笛回聲

，喚不進一個工人入廠，只令馬路上的巡捕與軍警打起寒噤來。使統治階級由恐慌而變爲憤怒，於是屠殺的政策開始。受屠殺之第一線的戰士，即係散發傳單的工人學生，與表同情於工人持傳單閱讀於道旁的平民。第一次犧牲者，乃南市金屬業機器工人蔡建勳、史阿榮，因發傳單而被捕遭斬決。罷工第二日，電車賣票十九號工人，因發傳單被槍斃於西門；學生在曹家渡講演被捕，立遭斬決者三人。老西門有市民持傳單閱讀，被大刀隊斬決，懸首於電桿者一人，暴屍於地者二人。上海大學留校學生五十餘人全體被捕。其他各區被捕被殺不可勝計，總計此次死傷遭捕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當罷工之第一日，李寶章即公然佈告「格殺勿論」。華租兩界，軍警密佈，任意搜查行人，尤以華界爲甚；隨處均可見整排軍隊，背負大刀，手捧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頓呈恐怖氣象，南市、閘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之而停市。李寶章軍隊開始搶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殺。南市與浦東居民，過軍隊前，不敢正目而視。浦東小販口呼「賣大餅」，而軍隊誣之爲呼「打敗兵」，即執而痛毆，以刺刀亂刺，行人不敢側目。入夜七時華界即斷絕交通，此時外國軍隊已可佈防於租界之外，中國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革命群眾。帝國主義者與中國軍閥官廳，完全合作，以實現此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屠殺，越更激動起上海革命工人學生與市民，因此而發生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群眾奪取武裝的鬭爭。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區域即開始與軍警的局部戰鬥。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乃共產黨決定爆發起義的時間，到時各區域大隊工人群眾向軍警防線與步哨襲擊，亦會奪得少量槍械，且回擊警察巡長致死。海軍兵士因反對軍閥屠殺，表同情於工人，自動開砲轟擊高昌廟兵工廠，使敵人紛向租界逃避。直至二十三日晚，閘北、南市猶有數處發生巷戰。不過，上海二次起義到這時亦終於被孫傳芳用野蠻殘酷的手段鎮壓下去了。到二十四日起義已顯然失敗，上海總工會乃以「非因退讓而

復工，乃爲準備更大的爭鬭而復工』的理由，發佈宣言號召罷工工人全體復工。

二次起義顯然與第一次起義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上海廣大的工人群眾積極參加了這次起義，這是一；第二，上海的群眾鬭爭比第一次起義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第三，孫傳芳的反動勢力動搖崩潰更其厲害。然而這次的起義還是失敗了，這是因爲武裝起義沒有能够與北伐軍的行動配合起來，也沒有發動城郊的廣大游擊戰爭來與起義相配合。同時，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還很差，動員其他中間階層的群眾來參加的工作和瓦解反革命軍隊的工作，還作得很不够；特別重要的，就是沒有事先在反革命的軍隊中去動搖其軍心，爭取其士兵甚至下層軍官到起義方面來，沒有好好去組織反革命軍隊的叛變到革命方面來，因此，起義發動之後，除了一部分海軍兵士參加之外，還不能最大限度地去孤立反革命者。二次起義雖然失敗，但却教訓上海工人取得了三次起義的勝利。

### 第二節 第三次起義的成功

上海工人人民衆雖然在以前的兩次起義中遭受了殘酷的壓迫，雖然受軍閥之空前的白色恐怖，但仍然是繼續着勇敢的有系統的準備新起義。先進的政黨在職工會中，在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群眾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並在事前組織了各階級民衆之代表會議，『三月十二日，上海各民衆團體在北軍的控制下，進行市民代表會，開臨時會議，舉定丁曉先等三十一人爲臨時執行委員，宣告受國民政府節制，建設民選政府。』（註一）這一點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因爲它是新革命政權的萌芽，不管它

（註一）引自北平文化學社所出版的中華民國政治史。

本身有任何樣的缺陷，但是它在那當時確曾團集了起義的力量。黨在鐵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還在起義前十天，鐵路工人已經開始罷工，這使張宗昌運兵幫助孫傳芳之舉，發生非常的困難。黨同樣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組織工人糾察隊計有五千人左右，他們是上海無產階級之武裝力量。最後黨又堅決的決定了這一次起義中之指導力量應當完全屬於自己。因為它在勞動群眾中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能够做出這樣的結論。

共產黨決定當着杭州方面的北伐軍到了松江，南京方面的北伐軍到了常州的時候，便號召上海無產階級起來實行總同盟罷工與武裝起義。三月二十夕，國民革命軍佔領逼近上海之龍華。但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令避免與上海租界帝國主義武裝之衝突。故佔領龍華後革命軍的策略，尚欲納降擁有雄厚兵力的畢庶澄率領下之直魯聯軍。但畢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為革命軍軍長之一。屬於軍閥之一的畢庶澄，降與不降皆民衆之敵。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則預有準備，要奪取軍閥的武裝，而推翻其在上海的統治。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第二次總同盟罷工令，由上海總工會頒佈，依令而罷工者，達八十萬人，空前的大革命運動如潮湧起。同日同時，上海工人勝利的第三次起義開始。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全上海各工廠、各作坊、各機關、各大小商店、各手工業工場及車站、輪埠、碼頭等全體工人罷工，擁到街市的中心來，紛紛向預定的集合處集合，少數的武裝糾察隊，立刻按照目的地，對各警署、各兵營、各軍隊駐在所開始行動。巷戰開始了，陸續不斷的槍砲聲，與群眾口號的呼喊聲，立刻震動於遍城市中各地。鐵路截斷了，電話局被佔領，電燈線斷，自來水斷，肅靜的空氣籠罩了全城市，只有斷絕不已的槍聲與群眾的革命呼聲。徒手無武裝的群眾，逐漸奪得武

裝到手中來，革命的武裝力量增加了。敵人在包圍中，或在逃散中，從敵人的隊伍蛇動躡行中發現以竹竿繫手巾的白旗，這是敵人投降了！素習兇惡壓迫人民的警察，自剝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門前，推出了槍械，並懸白旗，這是警察投降了！在頑強抵抗的敵人營壘之四圍街市中，住戶市民，借出木板、磚頭、布袋，建築起障碍物。小飯店大餅店的店夥緊急工作起來，趕做饅首食物等，由袖帶紅巾的輸送隊，往來輸送與前線的戰士充飢作戰。袖帶紅十字的男女濟難隊員，往來於戰線後方，死者與傷者，扛抬過市巷。歷時不久，各取得指揮的中心地，各區域自己的作戰指揮集中起來，巷戰局勢於以成立。

但因為敵人所在地的勢力，強弱不盡同，廣大的淞滬區域，有帝國主義的租界橫貫於中央，故當時巷戰形勢，劃分為下列七個區域，即：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與閘北。七個區域中的行動，前後開始於一小時以內，惟解決與成功之遲速不同；尤以閘北一區，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後六時止，前後兩日一夜始行解決，統計激戰至三十小時。

南市是包括上海縣城的滬南區域。起義未發前，南市全城的群眾，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區的群眾，陸續齊集於街市。一時半武裝起義動作開始時，先進攻警察廳，二時許即完全佔領警察廳，同時佔領電話局。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佔領。從警察廳與各分署中，徒手的群眾奪得了槍械。沿途的遊巡隊，在最短時間中，經群眾繳械降服。大隊由警廳進攻兵工廠，無激戰而降服，四時完全佔領兵工廠。此時南火車站已無敵踪，被群眾佔領，鐵路工人奪得火車頭往來運輸。五時到華商電車公司集合，廣大的南市區域，在四小時內便全部解決。

虹口在租界區域夾間之中，三面接壤於租界，一面近市郊，無駐兵，只有警署。在時間上說，虹

口是首先被佔領的。虹口電汽廠與絲廠及金屬業工人群眾，最先發難，佔領警署，奪得槍械。逃散的警察，嗾使流氓與工人爲敵，時來襲擊工會，襲擊已被工人佔領之警署。因此工人糾察隊戰勝警察之後，復經應付流氓之擾亂，始完全佔領虹口區域。

浦東在黃浦江東岸。黃浦江西岸之起義發動，浦東所有各廠的工人群眾，均起而響應，立即實行罷工，先撲攻爛泥渡第三區警察署，圍降警察百五十人，全體繳械。素來壓迫民衆，殘害工人的第三區警察署，首先被群眾佔領。群眾奪得武裝後，即進而掃除孫傳芳時代所設置的遊巡隊，沿途繳械。群眾復繼續佔領三區一分所及三區二分所。當時有由前線潰退的魯軍，包圍保衛團，被群眾圍攻而繳械。保衛團對工人糾察隊樹白旗，糾察隊長遂召集糾察隊與全體保衛團，暨參加戰鬥之數萬群眾，合開群眾大會，宣佈成立臨時保安局，武裝佈防。自此以後，工人糾察隊與商人保衛團，合同管理浦東全區。浦東區各業人民會，立時成立。後有反動派之投機分子，攜帶武裝，偽造旗幟、徽章，委任狀來接收公共機關者，盡被糾察隊拒絕和撲滅。

吳淞是砲台防守地。原有駐軍，自前線潰敗後，畢庶澄的軍隊之一部，復乘車逃吳淞，欲經水路，奪得水路，逃離淞滬。但吳淞的工人，與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時間內，舉行罷工起義。鐵路工人、鐵工廠工人與紗廠工人，立時圍攻駐軍，奪取其槍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車欲回上海，往滬寧線逃脫，至閘北江灣路附近，鐵軌已斷，遂據守天通庵車站作戰。吳淞工人勝利後，保衛團亦出而與工人合作。經過群眾大會後，吳淞的區民代表會宣佈成立。吳淞各工會聯合會領導近十萬的工人群眾，實際管理臨時區政權。

滬東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罷工開始後，群眾即圍攻虹鎮警察署，繳警察槍械而佔



領之。一時許，楊樹浦與引翔港兩地工人群眾，分頭在鞘朋路底之馬玉山路，召集群眾大會，各處到會者逾五萬人，會後整隊出租界，齊赴閘北。武裝糾察隊至胡家木橋及虹鎮兩處，打碎警察崗亭，佔領五區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武裝，奪得槍械甚多。香烟橋警署縱火向群眾圍攻，群眾奮勇撲滅火勢而解決之。總計前後，擊斃警官一人，警察三人，餘則僅解除其武裝。大隊群眾與武裝工人糾察隊向江灣路進發，欲至閘北，達天通庵車站附近時，適由吳淞開來兵車一列，群眾折斷路軌，兵車出軌倒地，以排槍及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甚衆。糾察隊猛勇抵抗，群眾高呼革命口號助威。自此以後，即與閘北糾察隊夾擊倒車之潰兵，直至翌日始解決。

滬西亦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華界即浜北，連接於閘北。群眾罷工行動後，先圍攻曹家渡第六區警署，繳警器械，並佔領之。武裝糾察隊護衛群眾渡河往閘北，並與小沙渡糾察隊會合，圍攻四區警署，經激戰而佔領。率領糾察隊衝鋒之總指揮死難，警察亦有傷亡，同時，兩處糾察隊分隊圍攻警署第二分所及遊巡隊署，俱獲佔領。

以上各區域的行動，都比較的順利。最後的激戰，乃集中於閘北境域內。工人武裝會聚於閘北者，乃滬東滬西兩部及閘北境內之一部，其餘以租界隔絕，均不能來援。故各區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決，而閘北獨相持激戰至兩日一夜。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至龍華請北伐軍進兵，遲疑不肯；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時，起義工人已完全佔領華界，魯軍潰退時，國民革命軍始進兵上海。前後兩日一夜中，閘北境內激戰經過如下：

在閘北境內除警崗不計外，敵人盤據的勢力，多至二十餘處。起義之後，群眾的主要目標在下列六處：（一）北火車站，（二）湖州會館，（三）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四）警察五區總署，（五）

廣東街分署，(六)中華新路警署分所。嗣因敵人自吳淞開回兵車，在天通庵車站雖被滬東群眾襲擊，但因敵方人數甚多，武裝甚強，於是六個主要目標之外，又增加一處勁敵。開北的巷戰，遂遍於全境。自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起，罷工工人群眾到街市中者，逾十餘萬。槍聲突然四起，北站魯軍的大砲，對向市鎮襲擊；魯軍中白俄兵，且以鐵甲車開砲射擊。在砲擊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乘機開砲射擊，幫助魯軍對民衆作戰。至下午四時，群眾已奪得各警署與湖州會館。全境內各處警崗，悉被驅散。居民紛紛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示慶祝，不及備者，或以手巾被單作白旗懸掛。自此以後，工人群眾的武裝，除佈防保護居民，免潰兵搶劫外，進攻目標，乃集中於：(一)北火車站，(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三)天通庵火車站。三處俱在一直線上，工人糾察隊夾於三處之間：對北火車站取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車站取進攻勢。

巷戰逐漸激烈了！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所駐敵軍雖係少數，但擁有多量機關槍與多量炸彈，不斷的向群眾襲擊，十分頑強。二十一日午後四時，糾察隊以紙作書，口呼停戰，投書入勸降，並負責保護其生命。魯軍亦就紙之背面回書，請求停止攻擊，但不肯降。嗣後糾察隊即取包圍戰略，防守終宵。天通庵車站敵軍，因鐵路軌斷車倒而驚惶不已，伏兩旁溝中，亦防守終宵，以軍械力弱，糾察隊進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敵人於晚間縱火圍攻，火勢漸熾，燒民房數百間。難民紛紛向工人糾察隊防線中逃來，糾察隊分隊護送往青雲路空地。火勢盛時，糾察隊乃棄防線而救火，以水龍皮管，開自來水管猛勇撲救，卒至撲滅火勢。附近居民，對魯軍憤怒填膺，對工人糾察隊則感激至於流涕。居民壯丁，以義憤所激，自願加入作戰。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磚石布袋，爲工人糾察隊佈置防線，建築障碍物。火勢熄後，敵人不敢進攻，惟時以排槍射擊；白俄人的鐵甲車，則時以大砲轟擊；英國帝國

主義的鐵甲汽車，亦時時偷襲向工人射擊。此時的工人糾察隊，爲克敵制勝，對魯軍作戰，亦須對帝國主義者防線作戰。

通宵的激戰轟動於淞滬全境，各處皆知閘北的戰事，尤贊嘆工人糾察隊的豐功偉績。至二十二日晨曦，敵人已覺困乏，糾察隊仍從各方面勇猛進攻。當時居民咸傳說革命軍已至，實則革命軍尙未自龍華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車站敵軍解決稱降，俘虜三百餘人，餘人逃散至廣東街者，被糾察隊繳械；至北四川路者則被日本水兵繳械。下午四時半，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敵軍，易便衣欲逃，被生擒，餘人願降，苦戰一晝夜之地至是解決。糾察隊總指揮處遂由五區總署移至俱樂部中。自此以後，全部武裝集中攻北站。自上午起，北站敵人復用第二次火攻，延燒房屋無數，是時自來水管已斷，無從施救。糾察隊防線退至五次，但敵人亦不敢前進。最後各方隊伍集中後，猛攻一小時餘，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魯軍亦潰退，六時許北站遂得克復佔領。因避免與租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之故，糾察隊乃退至車站之後佈防。潰兵大隊逃散時，適國民革命軍第一師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是時車站地雷爆發，但已無敵蹤。鐵路工會下令修復淞滬與滬甯鐵路，鐵路工人首先復工，依工會令組織交通隊三百人修路，恢復交通。寶山路、寶興路、中興路一帶，居民燃鞭炮慶祝起義成功，並歡迎國民革命軍安然開入上海。

第三次起義勝利了，上海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人驚人的勇敢與犧牲，表現了中華民族之活潑的生命，這勝利馬上震動了全世界。領導起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如羅亦農，如趙世炎，後來雖則慘死在清黨的苦迭打中，然而他們的名字，和上海起義，和中華民族，是歷萬古而不朽的。

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在當時以上海工人底三次武裝起義爲最高峯。上海工人爲協助北伐軍的進

展，爲消滅上海的軍閥統治，曾在短短的六個月中（自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進行過三次武裝起義。在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上海工人經過兩天的英勇戰鬥，終於擊潰了反動統治，創造了光榮的奇蹟。

第三次起義之所以能够得到勝利，是由於當時上海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了最高的頂點，廣大的無產階級已經具有拚性命爲着起義的決心，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參加了起義；同時，反動統治也極度動搖。雖則在起義前未曾發動廣大游擊戰爭在上海四周，但國民革命軍已迫近上海，祇離上海數十里路；雖則國民革命軍沒有立即進軍以配合起義，但仍然對於起義是很大的幫助。而且在客觀上，還是一種武裝起義與革命軍進兵的結合，這是當時最便利於起義的時機，因此也就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不僅如此，比起前兩次起義來，這一次起義在事前也有着更好的準備：曾經組織各階級民衆的代表會，在群衆中進行廣大的動員，起義前鐵路工人早日罷工，使敵人無法集中軍隊來鎮壓起義；其次，會大量組織工人武裝力量，有了基本的五千人的糾察隊；最後，起義時間選擇得極其適當，總同盟罷工後即開始起義，起義開始後即採取了堅決進攻的戰鬥。我們知道馬列主義對於起義問題的著名原理是：『無論何時都不要把起義當兒戲，而既然要開始起義時，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要絕對轉爲進攻。防守就是武裝起義底死路。應當努力抓得良好時機，應當趁着敵人的軍隊還是一盤散沙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祇是一個城市底起義，就可以說是每一小時）都要取得至少是小小的勝利，無論如何都要保持精神上的優勢。』『對待起義必須如同對待藝術一樣，必須奪取第一個勝利，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不停地向敵人進攻，利用敵人的紊亂等』。（註11）

（註11）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論馬克思主義與起義一文。

這一個著名的原理，在上海三次起義的實際鬭爭中，也如同在一九一七年之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起義中一樣，很適當的而又很天才的應用了。然而關於爭取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工作，從反革命軍隊內部去動搖和瓦解反革命軍隊的工作，還是沒有及時很快地去做，這仍是三次起義最大的缺憾。假如這方面有很好的工作，則起義將有更強大的力量，而且會有更大的勝利，並影響到起義後的變化。

起義後，由共產黨的發動召集了上海市民代表大會，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但是機會主義者在進行這事業中，沒有能在上海市內及其四郊，發動最廣大的民衆選舉運動以從事於真正革命民衆政權的樹立；而市民政府則既因事先沒有能發動最廣大的市民（甚至最落後的市民）起來參加，沒有最大限度地進行自上而下的武裝勞動者，沒有宣佈明確的革命政綱，因而沒有立即引起最廣大的市民群眾的密切關心，使他們團結在這市民政府的周圍，結成最堅固的革命長城。機會主義的領導者當時忙着拉攏資產者的代表來參加市民政府，怕市民政府中沒有資產者的代表便不能進行工作。而資產者的代表却因爲當時上海的實際權力操在上海武裝勞動者的手裡，不願意積極參加市民政府的工作，他們忙的是要尋找一種武裝力量，來首先解除上海勞動者的武裝。機會主義的領導者，沒有找到資產者的有力代表，所以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的成立了，而沒有切實進行革命工作，上海市民政府在它存在的兩個星期中，對於上海廣大勞苦民衆的許多緊急實際問題（工資、工時、改良待遇、住宅、稅捐、政治自由等），一個也沒有解決；並且放棄了爭取當時對革命有好感的有力軍隊到革命方面來，以便孤立帝國主義者反革命派資產者的陰謀。但資產者却藉了機會主義者之助，去進行取得勞動者起義的果實，達到自己的目的，造成了革命的大不幸，消滅了上海工人以鮮血和性命所換來的事業。

但不論怎樣，上海的三次起義充分表現出了中國無產者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英勇的領導作用，在

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頁，而革命到這裡已經到了一個緊急關頭，革命是發展到了階級的新結合的階段了。

###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新陰謀與南京屠殺

在北伐的勝利過程中，在中國大革命如火如荼的發展前面，帝國主義者用盡了一切方法來破壞革命。首先，帝國主義積極組織北方軍閥抵抗北伐軍的進攻。英日帝國主義者都積極指使與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軍閥來反對革命。可是在大革命的前面，這些軍閥都不能夠阻止革命向全中國的發展，吳佩孚在革命的鋒芒下迅速瓦解崩潰了，孫傳芳也遭受慘敗，奉系軍閥同樣不能擋住革命的洪流，帝國主義的這一策略顯然是失敗了。

同時，帝國主義會企圖直接出兵干涉中國革命。英帝國主義會聲稱出兵十萬征服中國，企圖以自己的武裝力量來抵抗北伐軍的進攻，可是這種企圖終於沒有實現。這是由於：第一，帝國主義相互間存在着劇烈的衝突，英帝國主義的出兵將遭受到其他帝國主義的反對；第二，當時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雖然進入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但以巨額的軍費的支出來征服中國，仍然感到困難；第三，英國工人階級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出兵進攻中國的反對和牽制，如英國工人的總罷工等。這些原因就使英帝國主義大規模出兵進攻中國的企圖不能夠完全實現，不過，在上海，帝國主義却是集中了相當的兵力的。

帝國主義破壞中國革命最毒辣最陰險的策略，便是破壞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政策，這種政策是帝國主義一貫的伎倆，也是時常可以收到成效的。帝國主義的這種政策在它自己口中也說得非

常明白，我們試讀當時代表英帝國主義者這種態度的一篇重要論文，這是在收回漢口英租界後發表的：  
 (註二)

「雖吾人不願在未得詳細報告之前有所評論，然目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注意。暴動或許是偶發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群衆發狂，然而此等暴動能創造歷史，並且常常是建立一個新政府的機會。國民黨有溫和派（他們主張維持秩序）與極端派（他們主張擾亂秩序），是公開的事。極端派甚恨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他們對於英國公使與國民政府開諒解之可能，極爲怨恨。他們深怕他們的活動將因藍浦生與陳友仁間之談判而縮短，他們尤其恐怕的，是英國對華的友誼的提案（即指新提案）已博得華人（這裡華人兩字是指高等華人——華崗註）之好感。因而使他們的反英宣傳失敗。極端派因此將利用一切機會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國，實彼等以此爲政治活動之手段。國民黨中究將何派佔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在不小。」

「今漢口事件實爲試驗國民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的機會。一個政府而能保護生命財產商業，則爲正當之政府。現在國民政府擔任保護漢口英租界生命財產之責任，直到事態能使英國自行負責之時爲止。中國之將來命運，全視今日國民政府之能否保護秩序，保護外人商業與生命，以爲決定；因在華及在本國之願與國民政府爲好友之英人，皆樂觀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而引以爲榮，若國民政府不克負此責任，則吾人甚覺慚愧（意謂看錯了人，故自慚

(註三) 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上海字林西報社論。

）。即反對國民政府者，見了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亦將轉而與國民政府爲友。非然者，彼等反對國民政府之意見將愈堅決。承認國民政府問題之最後決定，將於此後數日內國民政府處理漢口事件之態度而覘見之。如果群眾是壓靜了，如果沒有罷工與抵制，如果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如果外人無生命之憂，則國民政府是證明了權力；非然者，國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觀。

「今全世界咸注目於漢口事件，大英是能忍耐的，華人至終將認識究竟誰是他們的朋友。大英能靜待公平解決，但若群眾洶洶不休，而國民政府袖手旁觀，則英人的忍耐將至終點。似乎國民政府已擔任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了，吾人當觀其究竟辦到如何樣的圓滿。當一群極端的暴徒發狂的時候，政府辦事是極棘手的；可是亦惟有此等事件方能試驗政府是否有價值。中國今日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等。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應該能够做出來給全世界看，證明他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有權力的，有決斷的，如此則他們的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換言之，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則保護生命財產與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現在是無可躲閃的時機，不論是英人方面或國民政府方面」。

字林西報這一篇社論，可以算得是一篇最巧妙而且最陰險的煽動文，這是英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真正態度，值得中國每個革命者來研究研究。這篇社論表明出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願望是：指出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有溫和派和極端派；溫和派是主張維持帝國主義的秩序的，極端派是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而且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英國帝國主義不能與極端派合作，因爲漢口的以至全中國的反英運動都是極端派作出來的。英國帝國主義當時唯一的願望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能以



武力制止反英運動，『壓靜』群眾，『擔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保證英國『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並以此當作承認國民政府的條件。自然，『當一群極端的暴徒發狂的時候，政府辦事是極辣手的』；可是祇要『你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有決斷和負責任』（自然是負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與維持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責任）！則我們『大英帝國一定極力幫助你們』，如果你們自己沒有辦法，祇要得到我們大英帝國的幫助，『則保護生命財產與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可是當時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正在向前廣闊的發展，『大英帝國』的願望不能不暫時落空，於是『英人之忍耐』又至其『終點』，而公開暴露其猙獰面目了！

當革命軍入據上海之時，奉魯軍已決定放棄南京，集中蚌埠，南京爲革命軍佔領，帝國主義愈加惶恐起來，戒備極其嚴峻。南京一部分狂烈的民衆與士兵十分憤怒，爰在各國領事館前舉行大示威。英美日法意等國領事藉口僑民及領事館『受暴民侵害』，卽下令停船下關江面各國軍艦於三月二十四日夜開砲向南京城內轟擊，毀屋甚多，中國軍民死傷千餘人。事後五國領事反聯合向武漢國民政府提出抗議，作種種無理要求，而置中國千餘死傷軍民於不問。當時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曾予駁覆。此案直至民國十七年四月四日，始由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屈辱解決，其與美法英日意各國所訂協定，均聲明：『此案之發生，實由於共產黨之煽動，但中國政府仍負其責，肇事人業已懲辦。對於美國政府代表有不敬之處，及領館僑民之損失，深表歉意。並擔負繼續切實保護之責，依照國際公法通行原則，擔負賠償損失。』同時各國認軍艦開砲爲不得已採取之自衛手段，『深爲抱歉！』此種屈辱外交，乃民國十六年秋中國政局變動以後必然之結果，且係後話，這裡不能詳說。當時一方面中國革命正向前廣闊的發展，他方面帝國主義在南京的襲擊，不能不把民族資產階級拋入反革命的營壘中去。

；同樣，國民革命軍進攻上海與上海工人的罷工起義，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壓迫中國革命。這樣的事也就發生了！在這一點上說，南京屠殺就是中國鬪爭力量新分化的信號。帝國主義者所以實行南京屠殺及最後通牒，爲的是要表明：它們正在找尋民族資產階級的幫助，來共同反對革命。××所以屠殺工人民衆，強迫解除工人武裝及舉行政變，爲的是要回答帝國主義的號召，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與帝國主義妥協，與地主豪紳及民族資產階級一道反對工農民衆革命。

原來，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在第一次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日益接近揚子江流域，節節勝利，而工農運動，還沒有廣泛發展起來。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說買辦資產階級）還是與革命同道前進的，這是全民聯合戰線的革命。但是，這並不是說在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中間沒有衝突；這只是說，幫助革命或參加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企圖利用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使革命走向那種以奪取外部地盤爲主要目標的方向，而限制革命的發展。在這個時期中，國民黨內左派與右派間的鬪爭，就是這種衝突的反映。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想把共產黨員逐出國民黨以外的企圖，就是民族資產階級想消滅革命的第一次最嚴重的企圖，這在前面第十一章中，是已經闡述過的。自此以後，大革命的發展，使千千萬萬落後的民衆，日益捲進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尤其是農村中農民運動的逐漸興起，城市中罷工浪潮的高漲，職工會之成立，革命軍向在帝國主義海陸軍包圍中的上海勝利的前進。這在中國正是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與保障民族解放的澈底的途徑，然而帝國主義者却因此而大感恐慌，於是它們以全力來反攻，它們派大軍鎮壓上海，以武力干涉相恫嚇，以經濟封鎖來鉗制，砲擊南京，封鎖長江，千方百計的來勾引民族資產階級，使其脫離革命，並和它們共同來反對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則亦因看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超過了它的控制，客觀上不免危

害它的階級利益，認爲『如芒在背』，便不顧民族命運，而與帝國主義相妥協，轉而反對並屠殺它昨天的同盟者，因此發生了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殺的事件，及九江、安慶、蕪湖一帶類似的慘案，並由此急轉直下地而演成了中國革命史上最殘酷的不幸事件，這就是上海『四一二』與廣州『四一五』慘變。

#### 第四節 「四一二」政變的教訓

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一致認爲：武裝的上海，是對於反革命陰謀的嚴重障礙，所以上海工人非被解除武裝不可。『此時上海已到外兵二萬餘人，尙陸續開來；租界繼續關閉，鐵網各口僅留一二口以通華界，並發佈更嚴厲之戒嚴令，夜間十時後，不准平民在路上行走。』（註四）他們一面造成緊張空氣，使一般市民惶惶然不可終日；一面唆使上海一些流氓頭子組織所謂中華共進會來搗亂並破壞工人的組織。四月十一日晚，資產階級軍事代表者於取得帝國主義的協助之後，即已調集軍隊，準備大規模的屠殺。他們在各方面佈置相當得手之後，即於該晚派大批流氓偽裝工人向工人糾察隊襲擊，工人糾察隊加以防禦抵抗，資產階級的軍事代表者乃乘機藉口工人內訌，竟極盡野蠻殘暴的手段，強迫將工人糾察隊繳械。當日（十二日）全滬工人聞耗大憤，紛紛奔集開北開群眾大會，並整隊往司令部請願，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殺密令，且事前早有佈置，請願群眾正前進至寶山路時，大隊軍警即迎面開槍，後因群眾愈聚愈多，更用機關槍向徒手群眾掃射，一時屍橫滿街，堆積如山，適大雨

（註四）引自中山先生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五六四頁。

如注，於是滿街竟成血河，死傷工人民衆不計其數。據目擊者言，事後屍首係用搬場汽車搬出葬埋，所裝竟有七八卡車之多，這就是上海的「四一二」大慘殺。屠殺之後，他們即雇用大批流氓打手，盤據上海總工會會所，強迫改名爲「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並到處協同帝國主義者破壞總工會所屬各工會，拘捕工人領袖，摧殘一切革命組織。當時上海一些知識界的名流如葉聖陶先生等，目擊這個慘殺，會聯名發表宣言，認爲主義可以不講，但不能不顧及人道，對於這個慘殺，表示了重大的抗議。

「四一二」慘變起後，上海屠殺還在繼續，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等處慘劇接連發生，四月十五日廣東亦發生同樣慘變，死傷均以數千百計。

自從「四一二」起，國民黨開始了所謂清黨工作，實際上是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意志，不去把刀鋒向着萬惡的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却向着自己的朋友，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敵人，現在變成了朋友；過去的朋友，現在變成了敵人。無數的中國共產黨員與革命民衆，無數中華民族的精英，就在這樣殘酷的政策之下犧牲了。而親日派黃郛等就在這樣慘酷的苦迭打中，彈冠相慶，得了上海市長等職務，抗戰後充當南京偽政府內政部長的著名漢奸陳群等，在當時即充當滿身血穢的劊子手；時人把他和當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名字並稱，稱之爲「狼虎成群」，而當時中國革命英雄如陳延年、趙世炎、宣中華、侯紹裘、郭伯和、張應春等，就先後被這班「虎群」吞沒了！

「四一二」慘變是表明：民族資產階級退出了革命，右派與帝國主義互相妥協來反對中國革命。從此，革命兩條道路之間的鬭爭，即擁護革命向前發展的人們和主張撲滅革命的人們中間的鬭爭，也就一天一天更加劇烈起來，中國大革命便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

對於「四一二」苦迭打，當時托洛斯基主義者主張上海工人要採取決死的戰鬪。「但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不能很快地發展，其一部分原因，是因爲目前國際環境比一九一七年要不順利些（在各帝國主義者間沒有戰爭）。他們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後備軍還沒有準備妥當，是不能夠採取決死的戰鬪的；正如一九一七年四月或六月間，布爾塞維克不採取決死的戰鬪一樣。反對派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要是不可避免（要是可以避免的時候）決死的戰鬪，這就等於幫助革命的敵人」（斯大林）

從三次起義不屈不撓的鬪爭看來，上海工人階級曾表現了自己有極大的革命毅力的，然而革命事業是應該正確地利用這種革命毅力，而不應該隨便浪費這毅力的。如果革命在苦迭打的陰謀面前，能事先進行警戒，更堅決地發展群眾運動，使當時上海市民政府真正變成民衆革命政權機關，並努力爭取當時對革命有好感的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師站到革命方面來，則即使不能防止苦迭打的發生，也將給苦迭打以有效力的抵抗，對革命全局且將有重大的影響，但機會主義者却完全解除了這種警戒，這是很大的錯誤。到了事後，情勢已發生了另一種變化，在這時候，革命形勢已不允許去進行決死的戰鬪，而是應該去準備力量，準備將來真正決死的戰鬪；如不去做這種準備，如不爲這樣準備去避免可以避免的決死的戰鬪，結果就將造成自己更大的失敗和不幸，而這也恰是革命敵人所願望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事先既完全解除了革命的警戒，事後又完全解除了真正的革命準備，這就是他們錯誤的繼續。而當時托洛斯基主義者要求在慘變時舉行決死的戰鬪，這就是受敵人強迫而去作冒險的迎戰，對於革命顯然是一種不利的戰鬪，結果祇有把寶貴的革命精華送到敵人打擊之下，事實上正是機會主義罪惡的另一面，客觀上等於幫助了革命的敵人。

托洛斯基主義者藉口『四一二』苦迭打，當時曾大吹特吹，非難國共合作，非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托洛斯基主義者看不見中國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否認被壓迫民族革命中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看不見像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正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環境中產生的，這種民族壓迫的環境把國內一切革命分子都聯合到一個組織內。托洛斯基主義者看不見國民黨在其作反對帝國主義時候的意義上，『比較那克倫斯基、蔡爾特這一類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是要高出三丈的。即使那用各種方法來陷害國民黨急進分子和共產黨人的民族資產階級者的代表人，在其變節以前，都要比克倫斯基和蔡爾特高出一些，因為克蔡兩人都進行戰爭，來爭取和壓迫土耳其、波斯、米索不達美亞和加利亞等等，以鞏固帝國主義，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却進行過戰爭——無論好壞——反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這樣就減弱了帝國主義。』（註五）『反對派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不適宜的，因此，反對派認為退出國民黨是很合宜的，但是，在現在（『四一二慘變後』）當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極力要求把共產黨員趕出國民黨的時候，他們（指反對派）却要求退出國民黨，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放棄自己的戰壘，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以取得革命敵人之歡心。這就是削弱共產黨，將國民黨旗幟交給右派，這正是現在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國民黨右派所要求的。因此，反對派在目前（一九二七年四月）要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他們自己便成了中國革命敵人手中的工具。』（註六）

（註五）參考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中第二個問題。

（註六）見斯大林所著中國革命問題，引自論反對派第二六五頁。

在北伐過程中，正表現了國共合作的「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偉大真理。經過國共合作，才成就孫中山先生生平多年關於進出長江的企圖，國民黨力量才大大發展起來，國民黨聲望才大大提高起來，成爲國民黨空前所未有的盛事；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幫助了擴大革命的領土，同時也變爲群眾黨，取得公開組織工人群眾的可能，以及開拓接近農民的道路。國共合作是互利的，歷史正是這樣做了的；而這種互利的，正是有利於中國革命，有利於中國民族。反之，帝國主義和革命派正是反對國共合作，而又反對國共互利的。帝國主義者所陰謀的，不僅在加害於共產黨，而也正是在加害於國民黨，同時也就是在加害於中國民族，這道理是極明白的。在那裡國共分裂的地方，那裡國民黨左派中的名譽聲威就一落千丈，正如許多國民黨人所公開承認了的，一切腐化墮落的分子，官僚政客，就因此得鑽進國民黨內，去作惡爲非，而且不管其願意不願意，都迫得要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低頭。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所以反對國共合作，破壞國共合作，除了說明它們是爲帝國主義者效忠而外，不能有其他

的說明，這道理也是極明白的。

## 第十四章 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

### 第一節 兩個營壘與兩個中心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繼而又取得江西與福建。在同時，武漢發生了從來未有的猛烈的罷工運動。這一事件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世界一樣。這一事件，在帝國主義的英國議院裡引起了討論，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機關報裡，提出了對國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國北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營壘裡，激起了生產協會的組織；在中國的中部及長江下游，資產階級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高呼國民政府『赤色』。當時武漢罷工運動所以如此蓬勃的發展，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北伐戰爭勝利的推動，但同時也由於武漢工人生活的困苦。在北伐軍尚未佔領武漢以前，武漢工人的罷工鬪爭雖然沒有像上海罷工這樣發展，但在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間，漢口烟草及紗廠工人即已開始爲改善生活的經濟罷工。至十月間北伐軍佔領武漢之後，自然更加幫助推動武漢罷工運動的發展。北伐軍到達武漢不到兩月，組織在武漢總工會之下的工會會員已擴大至三十萬人，工會擴大至二百左右；在一九二六年冬季及一九二七年春初，武漢自郵務、印刷、紗廠、香烟廠、銀行職員直至店員、手工業工人，無不捲入罷工浪潮。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止，湖南工會組織亦由五縣增至四十縣，工會會員由六萬增至十五萬人。

同時，農民運動亦迅速發展。至民國十五年底，湖南一省有五十四縣已有農民協會組織，農協會



員共計有一百零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十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四縣，有五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六縣，有一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十二縣，有五千人以上的組織計十二縣，有一千人以上的組織計十八縣，不滿一千人的計二縣。（註一）當時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是瀏陽、衡陽、湘澧、平江、耒陽、湘鄉、長沙、宜章、寧鄉等縣。北伐中湖南農民參戰最勇敢，北伐取得初步勝利，農民鬪爭也跟着擴大起來。此時農民最普遍的要求是：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要求武裝，打倒土豪劣紳等。這種鬪爭最激烈的地方是衡陽、安化、湘陰、瀏陽、醴陵、宜章等處；十月間衡陽減租減稅鬪爭參加農民群眾已達七萬以上。至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湘南全省農民協會組織已擴大至二百萬人，農民鬪爭更加急風暴雨般的發展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並且已經開始自動沒收地主土地。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止，湖北亦已有二十餘縣成立農民協會的組織，全省農民協會會員亦已達二十萬人左右，農民鬪爭雖不若湖南之激烈，但亦開始掃蕩農村封建勢力了。

民族資產階級看見群眾革命運動發展，看見了革命工農群眾的要求與口號，必然要恐懼起來而與帝國主義軍閥相勾結，不願革命繼續進展——它也真這樣做了。這樣一來，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革命聯合戰線，跳到反革命的營壘中去，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但是走進了更高的階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合破裂了，開始轉變到無產階級、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而且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由廣東遷到武漢。先是在民國十五年冬天，由於帝國主義的挑撥政策，南昌與武昌之間，曾發生了關於國民政府遷都地點的爭論；爭論的結果，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執委的意見

（註一）統計數字根據第一百八十一期嚮導週報長沙通訊。

，同意遷都武漢，因為當時兩湖工農大眾革命運動的發展，武漢已成爲革命中心，革命就應當依靠這中心，來發展全國革命的運動和領導全國的革命戰爭。這個爭論雖則後來是那樣決定了，但毫無疑義的，帝國主義者却設法利用了這爭論的罅隙，來擴大南昌與武漢之間的分歧。革命軍的繼續向東南發展，本來是一種正確的方向；但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的陰謀家（黃郛等），却正是利用這點來促成當時軍事首領與武漢的分裂，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陰謀家計劃着要在東南建立反對革命的根據地以便與武漢對立。革命軍在向東南的行動中，反革命的陰謀家更鼓唆沿途屠殺工農羣衆的領袖，壓制羣衆運動的發展。

民國十六年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於武漢，這次會議的中心口號是提高黨權，決定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集中於黨。全會通過的議案中，改選常務委員九人，另舉軍人部長與組織部長，重新選舉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五人，改用主席團制，通過了軍事委員會大綱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決定出征動員令須由軍事委員會議決，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交總司令執行之。這些本來是國民黨內自己一種民主的決定，但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的陰謀家，却利用武漢這種決定，就更加緊地挑撥離間，去促進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去促進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及至上海「四一二」慘變發生，武漢政府乃以屠殺民衆、摧殘黨部爲理由，免去×××總司令本兼各職，而以唐生智代之。×氏亦遂於四月十八日另組國民政府於南京，而以「反共」相號召，於是有南京武漢兩個國民政府的對峙。自此以後，在中國南方便出現了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即武漢革命的中心及南京反革命的中心。武漢與南京之間在對內對外的政策，均表現了分歧，同時也正是表現了不同的統治。

自四月十八日，南京成立政府，與武漢政府對峙。於是孫傳芳以爲機不可失，與張作霖、張宗昌

商酌反攻計劃。計劃既定，奉軍即出京漢線，謀壓武漢；魯軍出津浦線，進迫浦口；孫軍復佔揚州。北方軍閥，有復振之勢。於是發生了兩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南京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漢政府的北伐。五月上旬，南京的軍隊渡江北上，武漢政府的軍隊則由唐生智率領，向河南進攻，配合國民軍擊潰奉系，佔領鄭州，開封等地。當武漢政府舉行北伐之前，曾發生過先北伐抑先東征的爭議。結果決計先行北伐，這至少有下面兩個原因：第一，奉軍企圖奪取武漢，並企圖消滅武漢政府，因此進攻奉軍是一個完全不可遲緩的防禦戰爭；第二，武漢政府希望與馮軍聯合，以擴大革命的基礎，這在當時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因為東征就不可免的要和帝國主義強盜爭奪上海，而上海是世界各帝國主義集團最大利益的焦點，它們絕對不會輕輕地放棄上海，和帝國主義爭奪上海的戰爭必然是一場嚴重的惡戰，而當時武漢政府還沒有這種力量，所以應當首先同馮軍聯絡，充分地作軍事上的準備，盡量發展土地革命，努力破壞×××的前線和後方，然後再大舉進攻上海。雖然後來局勢的變化，根本破壞了這一政策的執行，然而在當時的決定還是正確的。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那已告終的階段的特徵，在於兩個營壘對峙：一方面是外國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與買辦階級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的營壘；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的營壘。這個階段有由兩個營壘對峙變為三個營壘鼎立之趨勢，削去資產階級，使之與無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之左派聯合相對抗。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為其特徵。×××屠殺工農，但仍反對北方軍閥。』（註二）但是一般說來，這三個營壘的劃分，在當時實是有限的，而全國的革命與

（註二）見國際八次執委全體會議決議案。

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劃分，則是無條件的；而且事實上，三個營壘這種情況是不能長期繼續下去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個營壘，必然日益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相妥協，而跳到革命的營壘中去；事情也真這樣發生了，於是戰鬪的全般邏輯，不久即變三派爲兩派，變成鮮明的兩個營壘。這是最生動的歷史辯證法，不理解這種辯證法，就不能指導革命的前進。

## 第二節 土地革命的興起與馬夜事變

「革命運動不能看做一直上升的運動。對於革命的這種觀點是書本的，非實際的。革命行程，總是曲折的，在這些區域裡向舊制度進攻，而在其他區域裡也許受局部的失敗，也許退守。」因此「四一二」慘變祇是中國革命局部的失敗，而決不是整個中國革命的失敗；它是中國革命進程中轉折之一，當時上海與南方的革命雖然受到嚴重的打擊，而中部工農鬪爭却急劇發展起來，走進了更高的發展階段，轉到了土地革命階段。中國革命的力量和偉大，就在這個地方。因此「四一二」慘變之後，一方面產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革命已發展到了第二階段，已經開始由全民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到廣大工農群眾的土地革命了，這種土地革命是要加緊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反封建地主，及反對資產階級反革命集團的鬪爭。因爲「中國革命中巨大的困難，尤其是因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的武裝干涉或他種干涉，以及中國國內動搖的社會成分叛變革命投降敵方所生的困難，造成了目前鬪爭的條件；爲戰勝這種困難計，必須廣大勞動群眾加入鬪爭始可。要想引導群眾加入鬪爭，只有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在城市中滿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才有可能。要堅決取消繳納富豪之佃租，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盤

剝之債務，大減賦稅，課稅攤派於富豪之家等等，——這些要求必須在全國，首先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實現出來；必須拿這些口號去發動群眾，使之反對地主及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反對北洋軍閥。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現時主要的就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使幾千百萬農民群眾起來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指導這一運動，並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中實行這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己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時的政府，變成工農運動的政治組織之中心，變成工農革命專政的機關。』（註三）至於土地革命問題所以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中心問題，那是因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又轉而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勢力的掃除，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根本掃除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中國軍閥的勢力，不僅依靠外國帝國主義的幫助，而且也依靠本地地主階級的奧援。軍閥的統治，建築在奴隸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軍閥官僚的政府機關，地主、劣紳、商業重利資本等的壓迫和剝削幾萬萬農民。發生這種制度的原因，是由於那些無土地或缺少土地的農民，他們們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盤剝商人等的奴隸待遇，及爲城市和軍閥，供給幾百萬苦力和兵士。推翻帝

（註三）見國際八次執委全體會議決議案。

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解放中國民族，國內社會關係之革命的改革，這些事都相互聯接着，成爲中國革命的整個的責任。要完全推倒軍閥，人口大部分之農民的經濟與政治鬭爭，必須使之發展，成爲反帝國主義鬭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是，當時中國革命情況，還正處於過渡期中。這就是說，當時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它能够轉變成這種專政，如果土地革命能盡量發展，則武漢政府定會變成民主專政；可是武漢政府現在還不是這種專政機關。怎樣才能使武漢政府變成工農民主專政機關呢？這裡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使武漢政府變成中國農民土地革命的政府，盡量擁護這個革命的政府；第二必須從工農當中吸收土地革命的新領袖加入國民黨上層領導中來，再擴充國民黨的下層組織，將農工會以及鄉村和城市中之其他一切革命組織，統統吸收進來。現時中國國民黨祇有五十萬黨員，這個太少，在中國這種國家內，着實太少。應該使國民黨的組織內有幾百萬革命工農，以便將國民黨轉變成無數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組織。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國民黨才能够產生出一個革命政府，產生一個能够變成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註四）很明顯的，當時武漢政府既然是一個革命政府，既然有可能轉變成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則革命民衆與革命政黨的責任就應該擁護並幫助這個政府，而不應該過早地組織工農蘇維埃政權。因爲在當時情況之下組織工農蘇維埃，就等於組織兩重政權，組織暴動機關，來反對武漢政府。「反對派要求立刻在中國組織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現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組織蘇維埃，這是什麼意思呢？第一，不能在任何的時候組織蘇維埃，組織蘇維埃只是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候；

（註四）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這一談話會編入斯氏所著論反對派中，見該書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第二，組織蘇維埃並不是一場空話，他成立首先就是反對現存政權的機關，是爲奪取政權而鬭爭的機關。一九〇五年是這，樣一九一七年也是這樣。現在在武漢政府區域內組織蘇維埃，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提出組織新的政權機關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因爲現在這些區域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政權而外，沒有其他的政權。這就是說，把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農群眾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工委員會、職工總會、工廠委員會等等的任務，與成立新的國家政權形式（蘇維埃制度），來代替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任務，混淆起來了。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所處的階段。這就是說，給中國民衆的敵人以新的武器來反對革命，來散佈謠言，說中國並不是在進行民族革命，而是要把「莫斯科蘇維埃化」機械地搬到中國去。因此，反對派提出在目前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他們自己便成了中國革命敵人的玩具。」（註五）事實上，在寧漢分裂之後，在武漢政府區域內，工農革命運動正以飛速的程度在發展。爲着鞏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資本家的怠工，而且爲着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人已部分地武裝起來，甚至勞動童子團也半武裝起來。工會的組織更形擴大，把手工業以至大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而總工會則在工人群眾中樹立了無上的威信。農民鬭爭也大大的開展起來了，農村中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稅的鬭爭如火如荼的發展起來；特別在湖南，有的地方已經沒收了中世紀剝削者的土地，農民自己動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則「插標」預備分配土地。農民都說：「現在的世界是我們的，今年減租不成問題，連田地都應歸我們插標號」。不僅如此，而且農民組織了自衛軍，有的地方拘捕豪紳地主戴高帽子遊街；因此，甚至

（註五）見論反對派二六四頁。

一些做農民運動的人也竟發生這樣的感想：「不得了，打頭不得他們醒來，不料一醒來就不肯睡覺」，這就顯示出了當時農民鬭爭劇烈發展的一幅圖畫。

這種工農運動的猛烈發展，本來是推進革命往前發展的優良條件。但是，很可惜的，當時革命政府却沒有和這種蓬勃發展的工農運動取得親密的聯合，有時甚至背道而馳；於是，本來有可能轉變成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武漢政府，結果竟墮落同化於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專政的機門。這固然由於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地主、資產者等多方面的向武漢革命勢力進攻，動搖了武漢政府內部的力量。有的奸商罷業，停止貿易，造成許多工人失業，紙幣跌價，日常需用品漸形減少，一般平民生活艱難困苦的景象，一些小資產階級，處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於是便動搖起來。然而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却也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因為共產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首要任務，原應把政府中的活動和群眾中的活動聯結在一起；同時對於自己盟友的任何動搖，應及時加以批評，並預先警戒他們的出賣，準備群眾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時能夠戰勝叛賣而拯救革命。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一九二七年五月），對於這一點是指示得很明白的：「革命政府與民衆間的親密聯合，在目前實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這種親密的聯合，只有堅決的打出一條走向群眾的路線，才能永久加強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為革命的組織中心。爲武漢政府劃定這條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實現此項任務，不擴大群眾運動，沒有農民革命，不堅決改善工人階級地位，不變國民黨成爲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偉大的組織，不繼續加強職工會，擴大共產黨，不造成武漢政府與群眾間之最密切的聯絡，則勝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可惜當時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



却正犯了這樣的錯誤。當時共產黨沒有利用自己所擔任的勞工部與農政部，去開展群眾運動，去加強政府與民衆的聯繫；反而跟在反革命派之後，高喊「工農運動過火」，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結果共產黨參加政府也只扮演了領袖結合政客勾結的戲劇，並無補於革命的前進。

當時武漢所形成的革命中心，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形成，應當在劇烈鬥爭的過程之中去提高並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漢內部的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勢力，而力爭工農民主專政的實現；但是由於上述的原因，這一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還只在可能性向現實性推移中便夭折了。當時武漢內部的鬭爭，和武漢與南京的鬭爭，有同樣的社會內容，就是工農的澈底的民權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相同。武漢內部的分化，在武漢政府尚未完全成功的時候，便已經開始。小資產階級大言不慚，而在行動上却懦弱無能，且怯於冒險犧牲，他們的商業交易和他們的金錢出納之小規模性質，特別容易影響到他們的精神，使其缺乏堅定性與進取心，當然類此的性質也反映在他的政治事業上。武漢領袖在當時，真是「所能見到的，只是責難太多了。他們的朋友，他們在企業界的親戚，以及據有土地的豪紳，都對他們警告，這使懦弱的他們發生恐懼。」（註六）特別是土地革命的進展，使他們真正遇到了試金石。雖然武漢政府土地委員會所擬草案，只在原則上定出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決；然而「國民黨的地方黨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與湖南省民會議及國共聯席會議決定之精神認真實行起來了。「你們當真嗎？」「當真！」「果然嗎？」「果然！」「唉！你們這些小子，真正拿着雞毛當令箭，——我們是說說玩的，你們怎麼當真起來，該殺

（註六）引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號所出版的美國Nation週報。

該殺！這類事說說玩是可以的，對我們有好處時，也許是必須的。但這類事是當真做得嗎？你們這些昏蛋！」——武漢國民黨中央就這樣教訓下級黨部了，爲共產黨所霸佔的黨部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許多民衆團體，當時是將國民黨的黨權實行起來；而這種黨權一實行，當然要變成民衆政權——民權。湖南許多縣黨部參加並領導工農團體實行公團聯席會議的政權，一般的，各級黨部，只要真是與民衆團體一致革命的都實行起地方「黨政府」的權力。這使動搖畏縮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不能再容忍，他們要想用「黨權」來和共產黨爭領導了。國民黨中央的黨權，要來控制地方黨權，因爲地方黨權在共產黨手裡變成民權了。軍權與黨權之爭，換一形式，變成黨權與民權之爭。如果軍權與黨權之爭的社會內容，是對於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式的南方軍閥妥協與否之爭，那末，黨權與民權之爭的社會內容，便是對於土地革命問題與真正民權問題澈底與否之爭。」（註七）

這一情形說明當時武漢政府是處於一個緊急的關頭，一面是內部與外部的敵人積極向革命進攻，一面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已經在極端的動搖中。顯然，在這緊急關頭的前面，武漢政府和國民黨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廣大地發展農民革命，切實改善工人的地位，繼續開展廣泛深入的群衆運動，廣泛的武裝工農群衆，首先武裝那已經有組織的覺悟的部分，使工農群衆成爲武漢國民政府真正的柱石；同時大大發展國民黨的組織，驅逐國民黨中的反革命分裂分子，使國民黨掌握在真正革命派手裡，使國民黨成爲廣大的群衆組織，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澈底改組政府，把一切無望的分子驅逐出武漢國民政府，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造舊有的軍隊，把國民政府放在選舉制的基礎上，成爲強有力的

（註七）引自瞿秋白所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五五至五六頁。

民族革命的政府，使革命政府與民衆間親密聯結起來，這是一條革命的道路。另外一條道路，那就是在困難面前，繼續動搖，繼續懼怕與遏止工農運動的發展，反對土地革命，屈服於民族資產階級，跟隨它們變節，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這是一條反革命的道路。在上述兩條道路互相鬭爭，在武漢的困難緊急情形之下，武漢政府上層的領導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及其他還留在武漢內部的軍閥、豪紳、地主的代表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便從動搖走向變節，引導着武漢政府向那與革命相反的道路走。本來，這些上層分子有的就是反革命派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好細，反革命派經過他們來動搖武漢的革命勢力。在南京與武漢、武漢與北方的鬭爭中，帝國主義與豪紳地主及民族資產階級盡量運用威嚇利誘方法來動搖武漢政府中的上層分子，帝國主義用炮艦政策，用經濟封鎖來威嚇武漢政府，另外更用種種辦法來收買留在武漢政府中的軍閥，推動他們起來反對革命。同時兩湖工農革命鬭爭的發展和深入，又直接威脅到這些反革命派的階級利益。這種動搖與變節的開始表演，就是夏斗寅的進攻武漢與馬夜事變。

夏斗寅原任鄂軍第一師長，後改任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本人及其將領均係地主和資產階級出身，他們暫時與革命相伴，不過是借此升官發財，洶湧的工農革命浪潮，必然將他們重覆拋入反革命營壘，夏部本是當時武漢政府用以防止四川軍閥部隊侵入武漢的部隊，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乘武漢革命軍入豫之際，即接受反革命指示，率部叛變武漢政府，聯合劉佐龍部（十五軍）與四川軍楊森（二十軍）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藉反共名義，企圖推翻武漢國民政府，後來幸而經過武漢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動員力量去反對夏斗寅的進攻，經過葉挺部隊的英勇戰鬥，將夏斗寅部擊退，武漢國民政府才轉危爲安。但是被工農革命浪潮所撼動的軍人爲數甚多，並不止夏斗寅、楊森、劉佐龍少數人，故夏斗

寅舉兵進攻武漢政府的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一日，何鍵與許克祥也就在長沙實行屠殺工農民衆。先是臨湘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團防局長詹仙俠所殺，凌遲處死，割心剖腹，備極殘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陽農協委員長廖貫一來省報告，而何鍵部下已於前一日將益陽縣工會、農協佔據，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均被繳械。於是空氣更緊張更險惡，許克祥乃於五月二十一夜十時許，正式圍攻省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大加屠殺數小時之久，死傷不可勝計，時人稱之爲「馬夜事變」。接着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發出艷電，謂：「湘省黨務悉爲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操縱，……三湘七澤，已成群魔亂舞之場；旅市鄉村，盡陷雞犬不寧之際。」無疑的，這只是一種反革命的藉口。馬夜事變之後，群衆憤激萬分，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湖南數萬工農軍猛攻長沙之壯舉，因受到嚴重的壓迫與機會主義者的斷送，結果沒有成功。馬夜事變和唐生智的態度，使動搖者更陷於動搖，而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手忙腳亂，可恥的制止對於反革命的抵抗，任令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蠻殺戮，更幫助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由動搖走向變節。

### 第三節 國共兩黨關係的演變及分裂

馬夜事變及唐生智發表艷電之後，國共兩黨關係即日趨惡劣。本來，自中國大革命進入第二階段之後，革命兩條道路之間的鬭爭，即在擁護革命向前發展的人們和主張撲滅革命的人們中間的鬭爭，便一天一天更劇烈起來，而國共兩黨關係的新階段正放在這種形勢之前。此時，「左派與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親密合作這個政策，在目前階段上（即指中國大革命第二階段）含有特殊的作用與特殊的意義；這種合作也就是反映那種在國民黨黨外工農的聯合，沒有這種合作，則革命就不能得到勝利。因

此，革命國民黨力量的根本來源，就是更向前發展農工的革命運動，鞏固農工農群衆組織，如：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工人職工會，及其他群衆。革命群衆的這些組織，乃是將來蘇維埃的種子。廣大勞苦群衆革命積極性之發展，是革命勝利主要的保障；而武裝農工，又是反對反革命的主要武器。同時，共產黨在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在一個隊伍中鬭爭的時候，必須比任何時候都更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是保障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克西的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需的條件。」（註八）同時，在下面所引的著名文件中，對於國共兩黨的關係，亦有這樣賢明的指示：（註九）

「中國共產黨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激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

「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共產黨不許融解於別個政治組織之內，他必須成爲獨立的力量，他是一個特殊階級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的組織，是全國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的組織。因此，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政見時，在自己的旗幟下動員群衆時，不能爲外力所阻，對於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動搖不定，尤不能放棄批評的權利。恰恰相反，須知只有這種批評才可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鬭爭中，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可解作是與無產階級勞動群衆，尤其是與農民斷絕關係。從這一點出發，國際執委最堅決的反對那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因爲在目前的瞬間，無產階級的政黨

（註八）見論反對派二六三頁。

（註九）一九二七年五月國際執委第八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

恰要在國民黨，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固有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合作的黨。

「在目前情形之下，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作用，則無產階級便不能在全國取得領導作用。

「國際執委會認為，如果看輕國民黨這個革命運動的特殊組織形式，實際上便是助成右派攔得國民黨的旗幟，正因為國民黨的旗幟是國內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所以×××引着資產階級領袖們，千方百計，要打起國民黨的大旗前進。共產黨的策略，萬不可爲×××的機變作保障（退出國民黨的路線，便不能免去這種結果），而要揭破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賊，是國民黨的叛賊，是中山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叛賊，是投奔帝國主義者的降將。

「國際執委會認為，說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告終」，另一革命即工農階級革命已經「開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便是廣大的群眾也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繼續進展。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能把國民黨的旗幟，不能把民族自由鬥爭的旗幟讓給民族自由鬥爭的叛賊。

「國民黨爲完成其自身任務，須使其組織形式能相當適應。趕快改組，儘量接近群眾，實爲必要。其次，要在工農手工業者中間徵黨員，容納工農兵士手工業者之整個組織入黨（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行會、軍隊組織、農民游擊隊如紅槍會以及工人自衛隊等等，惟須肅清其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機關屬行選舉等。而中國共產黨既要大膽的堅決的擴大群眾運動，也必要一般大膽的堅決的努力變國民黨爲真正的群眾組織，使

他包納城鄉勞動民衆才行。

「只有把定這個堅決的路線：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廣大的群衆的革命民主的組織，指導機關真正由選舉產生，才能爲中國民主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發展，造下先決條件。只有把定這個路線，才能爲防止那國民黨左派某些動搖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廣州的事實），爲防止那某個動搖軍官及其他軍事領袖之叛變，造成制裁手段。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或帝國主義之動搖趨向，並在宣傳煽動上採用具體辦法，或竟用組織上的制裁手段，這是共產黨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除維持且擴大自己黨的組織外，尤須極力影響國民黨的行動。要想實現這種任務，必須先完全了解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澈底把定向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線，加強鞏固自己的組織，使工人同志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在工農群衆中加強黨的影響和黨的威信。

「國際執委會認爲，在中國共產黨中，恰恰對於這點有無數動搖存在；黨在批評國民黨的領導者，不能常常表現充分的堅決，而且在黨內對於發展群衆運動表現相當的畏怯，尤其是在農民運動中，關於沒收土地，驅逐豪紳地主等問題上，可以看出。這些動搖，在目前階段中，特別有害於革命。在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同志，並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路線。因此，國際執委會認爲，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同志內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便加高了。」

然而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與國際決議案上所明明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國際決議再三指出：中國共產黨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然而實際上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

竟完全放棄自己獨立的政治面目之任務，而且儘可能的做到了與國民黨右派指導完全同化的工作。差不多與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相近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曾在武漢公開環境中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討論之後，大會雖曾指出：在這一時期之內，黨的領導機關，因誤解民族統一戰線之故，犯了不少錯誤，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態度，有了偏向的見解，在北伐時期，黨「並未充分注意到，在革命領土擴大時，必須加強革命底社會基礎，」所以也就不能鞏固農工的聯盟以及鞏固工人階級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然而五次大會後，黨的實際領導依然在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手中，所以國際的正確指示，實際上並沒有被採納施行。當時中共領袖也有這樣說的：一方面自然共產黨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別一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獨立。在他們的心目中，聯合戰線與獨立性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因此，對於同盟者的動搖與各種不澈底的騎牆政策，也就不敢有什麼批評。當時中共領導者的另一錯誤，就是不見國民黨群眾，始終沒有打算過和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遇着重要的政治問題，總是想着應當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群眾對此的態度如何。往往爲要想使某某領袖中立而減低自己的主張。譬如爲要使李濟躡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省黨部的口號取消爲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四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爲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堅決的去取締湖南的叛徒；爲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當他驅逐共產黨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旬），亦不提出反對他們的口號；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都由國民黨「左派」領袖之願望來確定。而當時所謂左派領袖汪精衛等，早已被工農革命浪潮所嚇倒，一步一步跟着軍閥與資產階級走。他們已開始準備種種「輿論」，如說工農運動過火等，來做他叛變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的藉口。自然我們不能否認，當時群眾運動中部分的「左」傾幼稚



病是存在的。而且在事實上，任何一個政治主張的實行，都可能附帶發生某些過火行動，一個革命政策的實行，自然也不能例外，一個誠懇的革命者自然也應該和這種過火行動作鬭爭，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就責罵革命底本身嗎？這顯然是不能夠的。然而帝國主義者以及反革命派一方面懼怕革命的真正深入與革命動員的廣大，另一方面却正要找尋「左」傾幼稚病；誇大左傾幼稚病，利用左傾幼稚病；並故意冒牌做出種種左傾幼稚病以及一些過火的行動，以嫁罪於革命黨人。在武漢政府當時矛盾複雜的情況下，一切所謂左傾或過火的噪聲，其根源與作用也不外乎此。他們甚至製造各種荒唐無稽的謠言，如所謂武漢「婦女裸體遊行」等，以加誣革命黨人，並挑撥革命陣營中的互相猜忌，埋怨，惡感和分裂，以及破壞國民對於革命的同情和信仰。不幸的，武漢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居然也藉此作為叛背革命的護身符了。尤其不幸的，就是當時中共的領導者不但不能揭穿這一切反革命的陰謀，反而對於這些反革命的噪聲加以隨聲附和，限制甚至破壞了革命的發展。列寧說：「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搖」，而那時中共領導者的格言却是：「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結果，不是運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去革命，乃是爲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所束縛而阻碍革命。那時共產黨中央不但自己確信，並且還要使全黨及革命群眾也要確信下列的理論：「共產黨及跟它革命的工人農民已經走得大遠，現在必須退讓以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當土地革命剛剛開始發展，當工農群眾剛剛走上革命大道，並且群眾自己想到武裝自衛的組織，正需要共產黨的積極參加和領導，使革命發展並鞏固與國民黨群眾之實際聯合，築下堅固的革命基礎的時期，而共產黨的指導者却說：「要退讓，要退讓」以爲這樣就可以營救自己在國民黨的狀況，創造了整個退讓的理論。不僅如此，當時中共領導者不僅有這樣一個可恥的理論，而且還要步步實現於中國共產黨的日常工作中，拒絕土地革命，爲着所謂

「過火」，贊成或批的解散工農的組織，以同樣的理論去解散勞動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胆怯政策與最後所幹的自動解除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所有這些，都是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間武漢時期共產黨中央整個的退讓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然而當時共產黨中央這種無原則的退讓，實際上却並不能挽救它在國民黨的狀況；而武漢上層分子從動搖到變節，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那時在武漢執政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等，已經藉口發現所謂第三國際「破壞」國民黨之陰謀，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以「制裁違反本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而所謂第三國際「破壞」國民黨之陰謀，即指國際第七、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及臨時訓令，而且也祇是當時國際代表羅易親自交與汪精衛看過之後才「發現」的。其主要內容不外：第一，實行土地革命，從下而上及從上而下的來沒收與分配土地；第二，取消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的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第三，改造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群眾的組織。如果當時第三國際真的有這樣主張，也不過是完全爲着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爲着革命的需要，爲着國民黨的鞏固與發展，這是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的希望和主張，並無所謂陰謀。可是已經決心叛變革命的汪精衛輩却以此爲口實，來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圖。於是六月五日武漢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庭之顧問合同，武漢政府的走向不幸道路，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在北方，爲反革命所動搖的西北軍領袖，自負着寧漢的調解。六月十日馮玉祥發起召集鄭州會議，武漢方面之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譚延闓等均到會。會議結果是：第一，唐生智暫全部由河南回師武漢，鎮壓工農革命運動；第二，河南的軍事，完全由西北軍擔任。可是當時陳獨秀、張國燾機會主義者對於這會議尙在夢中，還舉行過盛大的會議去歡迎反革命的陰謀者。鄭州會議後，六月

十九日南京要人與馮玉祥又舉行鄭州會議。會後，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黨領袖，推動他們走上不幸的道路。

接着六月二十九日何鍵（三十五軍軍長）發出反共訓令，明令部隊與共產黨分離，拘捕與慘殺共產黨員。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舉行分共會議，正式決定與共產黨分裂，而中國共產黨亦發出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並痛斥反革命之罪惡。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後，武漢上層分子公開封閉工農組織，壓迫群眾運動，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大規模慘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且有「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之豪語。武漢當時的慘殺，並不亞於上海「四一二」的慘殺，革命的武漢從此變爲反革命的堡壘了。

#### 第四節 南昌起義與八七會議

「四一二」苦迭打後中國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武漢苦迭打後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的失敗。以前曾經參加民族革命戰線的資產者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分子，都投到和革命相反的方面去了；剩下的只有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革命力量，繼續爲完成中國革命而鬪爭。七月三十一日武漢上層分子公開屠殺黃包車夫，漢口工人遂於八月三日宣佈同盟罷工，反抗這種反革命的殺戮。在農村中農民革命鬪爭還繼續的深入湘東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等縣，都會短期被農軍所佔領；鄂南蒲圻、咸寧、嘉魚、通城、通山、崇陽等地，亦有農民武裝之騷動，且會截斷武長路達半月之久。同時便有葉賀革命軍之南征，八月一日國民革命軍葉賀軍（賀龍之獨立十五師，葉挺之十一軍二十四師，共約兩萬餘人）在南昌起義，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周恩來、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鄒代英、賀龍

朱德、吳玉章、郭沫若、鄧演達等二十五人爲委員。因爲力量的不敵與指導的錯誤，八月五日葉賀軍退出南昌向廣東進發，經撫州、宜黃、廣昌至石城、瑞金，在玉田市擊潰錢大鈞部，退出至會昌又與黃紹竑部激戰一晝夜，卒將黃紹竑部擊潰，旋即折回福建長汀，經上杭、武平、三河壩，直下潮汕，九月十三日，賀葉軍遂佔領潮汕。賀葉軍佔領潮汕後於湯坑、潮州、三河壩等處與廣東李濟、徐景唐、錢大鈞等部激戰數日，終於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分衝至海陸豐與當地農軍配合，一部分以朱德爲領導，由三河壩退至福建，復至尋鄔入北江，這部分隊伍便是以後紅軍第四軍的基礎，也就是一軍團的骨幹。南昌起義是以武裝力量反對革命變節者的屠殺保持革命勝利和挽救革命失敗的嘗試。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在主觀上是指導者還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第一，是沒有明顯的政綱；第二，對於發動農民革命不堅決；第三，起義後，曾得到許多武器，沒有把這些武器適當武裝民衆，退出南昌時，有許多是白丟掉了；第四，沒有自下而上地在民衆各種組織的基礎上，發動群衆的選舉制，建立起真正平民的政權；第五，當時廣州是各派勢力爭奪的中心——當時南方各派系均欲奪廣東爲己有；因此，也成爲革命勢力所可進攻的弱點，賀葉進軍是應向廣州進發，並應聯合張發奎第四軍部隊中的中下級急進革命分子，但結果葉賀軍却是向了潮汕，這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然而南昌起義是企圖以武裝鬪爭反對反革命的苦迭打，挽回革命的勝利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嘗試，這一行動是對的，而且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榮的一頁。

武漢時期中國共產黨是處於負責的緊急的關頭，當時中國共產黨擔任着中國革命緊急關頭的艱巨任務；中國共產黨路線的正確與否，關係着整個中國革命，對於當時形勢有着決定的作用。中共黨人，中共無數的中下級幹部，在大革命中繼續發揮自己對於革命的勇敢與犧牲的精神，爲革命冒萬死而

不辭。如果中共中央當時能够堅決執行革命路線和國際的指示，中國革命當可戰勝部分的失敗，戰勝革命武漢的困難，戰勝動搖者，推動革命繼續前進，最低限度亦能使中國革命免除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而減輕中國革命失敗的程度。然而歷史的不幸，也就在這負責與緊急的關頭前面，中國共產黨中央竟因陳獨秀、張國燾的領導，犯了最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種嚴重錯誤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其在事實上的主要表現，可以綜合如下：

第一，『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裡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因此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以及對於同盟者的關係，都失去了正確的態度。其實，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前途，國際七次擴大會議就已經有很清楚的指示：『中國革命發展之現在階段，從歷史上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得到革命的領導權，則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造成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而將成爲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民衆的民主專政，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決定要用全力去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革命前途。否則資產階級倘若勝過無產階級，則中國實際統治又將落於帝國主義之手。』

『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就是革命政府，應當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礦山，銀行，企業等。因此以爲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僅限於：（一）推翻帝國主義，（二）消滅封建勢力，這是錯誤的。中國革命若不超出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之外，決不能推倒帝國主義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一根本問題是不了解的。中共所了解而且成爲正式

意見的，實際上就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遠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二次大會時候的意見就是如此，二次大會宣言中說：『我們無產階級另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根據這種孟塞維克的觀點，無產階級對於民主主義革命便只好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用不着熱烈去參加，更用不着積極去領導；而只須等待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的時候，無產階級才可『因此』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機會主義者永遠不會懂得下面的真理：資產階級因其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他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則因自身階級的地位，逼使他不得不爲澈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的頭是往背後看去的，他們害怕民主主義的進化，因爲這個進化有使無產階級強大起來的危險。無產階級却除了失落套在頸上的鎖鏈而外即別無所失，而得民主主義之助，反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義的改革方面愈澈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將愈縮小，而在另一方面却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利益。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目前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爲無產階級目前的直接需要及爭取革命領導權，使革命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奮鬥。

由於不了解上述這一淺近的客觀真理，所以到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會還依然繼續自己孟塞維克的錯誤，而且擴大這種錯誤。在對中央政治報告決議案中說：『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看出有兩條道路：一是由工業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達到民族

資本主義的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並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我們（中國共產黨——恕我加了這樣一個失當的註釋！）的責任，就在努力擴大農群衆的力量，拿住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始終能够鞏固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則中國民族運動便有由第一條道路之可能。」（註十）共產黨領導農群衆參加民族革命的責任，是爲「達到資本主義的建設」，這在現在看起來，好像過於荒謬，不知道正是中共領導者的政治路線。

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既然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也就不能懂得各種社會動力之作用及其根本歸趨。依據一九二六年七月間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的估計，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又說：「中小商人受帝國主義經濟之壓迫，苛捐雜稅之剝削，只有感覺革命之必要，無反對革命之必要。」決議案中雖然也曾指出過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革命到底」，但同時却肯定說中國資產階級要得到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等，「方可與帝國主義妥協」。換過話說，便是資產階級如果沒有得到這些東西，便不會與帝國主義妥協，這是何等機會主義的觀點！

反之，國際却能辯證的指出：「中國革命中階級力量的發展，是在非常落後的中國經濟背景裡。其原因則爲工業資本主義低度之發展，農業經濟停留於原始技術，大多數中國人民生活程度異常的低微以及許多半封建制度的殘留等。現時中國經濟情形的主要特點，就是中國經濟的成份，可比雜色的

（註十）見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第十三頁。

荷包，從財政資本以至於宗法祠族制度的經濟關係之餘跡，都同時存在，其中佔優勢的乃是各種形式的商業資本及城市鄉村的小手工業和小工業。這就使中國民衆之階級分化不明顯，並使國民革命中之社會政治力量的組織程度不甚高。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之連續的階段，可以各種社會力量的改變結合以證之。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爲主要動力之一，他們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隊伍中找助手。第二階段，社會力量轉變到另一方面結合形勢。爭鬪的方式，亦發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階級在中國鬪爭場上出現，成爲主要的政治原素。現在（一九二六年底），革命運動已到第三階段之門，正是階級的新結合之前夜。在這個階段裡，發展運動的主動力，將是更有革命性的結合——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而離開一大部分的大資產階級。可是在這階段中，革命運動的領袖權，將日益落在無產階級身上。在此時期，是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資產階級看見反帝國主義戰鬪，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超過了他的控制，客觀上不免危害他的階級利益，於是大資產階級拼命搶奪領導權，以達破壞革命之目的。反革命力量之形成與革命力量之結合是同時並進的。這個反革命團結之進程與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猶之乎中國革命勢力之發展，是與世界革命（蘇聯及西方無產階級）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一樣。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離開革命的各種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如利用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一樣，但是決不要忘記無產階級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敵人的各種衝突之時，使戰術上的應付和策略上的步驟都能一貫的奔赴這些目的。（註十一）

（註十一）見國際七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事實的進程也確實像國際所預先指出的一樣，但是中共領導者的路線與戰術却沒有能够奔赴到自應有的目的。正因爲陳獨秀機會主義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社會動力都沒有正確的估計，所以對於同盟者的關係，不是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不是批評他們在具體問題上或緊急關頭的動搖，不是準備防範同盟者走上不幸的道路，準備孤立變節者，而是隨同盟者的尾巴，機會主義者沒有獨立的政策，而是依據同盟者的喜怒爲轉移。陳獨秀、張國燾機會主義者對於國民黨，不想幫助它去擴大和延長其革命的生命，幫助國民黨變成真正平民的政黨；而却是隨波逐流，幫助一切腐化分子、動搖分子、變節分子，去支配國民黨，腐化國民黨，冒牌國民黨而作惡爲非。陳獨秀、張國燾機會主義的實質，不是別的，而正是資產階級代理人在無產階級營壘內散佈的政治影響。這種資產階級代理人企圖在共產黨內，腐化共產黨，限制中國革命的發展，模糊無產階級的政治面目，斷送中國革命。

第二，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政權與軍隊的問題，抱着極錯誤的觀念。列寧說：『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而政權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武裝。這些始終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了解的。武漢政府時代，國際反對托洛斯基主義者提出蘇維埃，因爲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是革命政府，當時提出這口號，就是推翻武漢革命政府，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是直接幫助反革命。但國際同時指出：『要用國民黨收容廣大民衆，使群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這些在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群衆和革命的國家政權間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的前階段。因爲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種色色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委員會政權等等）。共產黨人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勞動群衆，領導千百萬工農群衆參加組織和工作。』毫無疑問的，只有這

樣做，才能強化武漢國民政府，去戰勝一切困難和動搖；而革命的國民黨政權，本來就應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可是當時中共領導者不但在「四一二」以前，不關心這問題，即在「四一二」以後，也完全拒絕了革命實際的苦痛教訓，不敢實際去處理這個問題。本來，中共決定參加國民政府工作，爲的是要加強國民政府革命的權力，自上而下地推翻革命的發展，堅決地去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主張勞動者與農民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我們中國是與民族利益相一致的，但當時在陳獨秀機會主義者領導之下，正像後來中共八七告同志書所指出的：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令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就職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的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的狀況」，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土豪紳的「妄動」，違反則「嚴罰」。

「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此數月內他們沒有公佈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與鄉村中剝削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勞動法案、減租、農村自治法等），有些並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共產黨員部長的工作，照國際的指示，應該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來與群眾聯繫，來維持群眾運動；但實際上却成了最腐爛的資產階級官僚統治，只是在群眾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我們沒有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 policy，簡直沒有別的適合名稱。土地問題應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農政部發到各省

的調查表，竟沒有一個關於土地關係的問題。譚平山上任第一件事實，就要打算鎮壓湖南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务；這一次出征已經成行，而走到了目的地，而長沙已發生反革命的叛變。

「當譚平山結束他那不光榮的部長之地位時，還是藉口長期請假的退出，去迎合反革命者和準備變節者的希望；而且，請了長假還不够，還要說：「因政局困難，不能納農運於正軌」。共產黨部長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脫逃還不够，而且重新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個人都應當問一問，從這幾句話裡得到的什麼結論？即：一，農民運動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糾正它，因為共產黨員的部長，有了共產黨與群眾組織的完全威權，尙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是對的，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們的代表進攻革命。共產黨員的部長在政府內做了這些玩意，還不是共產黨的最大恥辱？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的聲明，不僅沒有處罰，並且沒有發表一句話。本來中央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政策。」

在武裝問題上，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更做了極不可寬恕的錯誤。自三月二十號事件之後，中共指導者一直不願並且實行阻止在軍隊中去加強革命的幹部和力量，結果是削弱了許多革命軍隊的戰鬥力，削弱了軍隊的革命化。當時中共指導者只注意了上層的外交，而完全忽視爲了中國革命，對於當時隸屬個人的僱傭軍隊，有加強革命力量的必要，有改造的必要。武漢政府時期，國際曾指出過：「改編軍隊的問題，編制絕對委身革命的隊伍，軍隊與工農組織的聯絡，建立軍隊中的堅強幹部，改編傭兵爲革命之常備軍，在目前特別需要」。國際接着又指出：「應把武漢革命的勞動者與農民編成絕對可

靠的隊伍，在軍隊內建立忠心不拔的革命影響和幹部」。然而這些都被當時中共指導者陳獨秀、張國燾等束之高閣，絲毫不會實行。不但如此，陳獨秀、張國燾等在最緊急的關頭，不僅不想依靠革命的武裝，擴大革命的武裝，去監視動搖者，去監視那些對於革命準備變節的人，去準備對於不幸事件的抵抗；而且自動地把武漢革命的支柱之一的勞動者武裝——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械，以適合反革命者和變節者順利地屠殺革命叛賣革命的願望，幫助了反革命陰謀的實現。

第三，陳獨秀、張國燾機會主義具體的表現，便是在於把國民革命與工農利益機械地分裂起來。歷史上證明；工農是中國國民革命最主要的力量，中國國民革命沒有廣大工農群眾的參加，則反帝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在國民黨第一次與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上及政綱上，都是明白承認了的。但陳獨秀、張國燾等却昧於這最粗淺的道理，爲着適合資產階級的願望，總以牽制工農革命運動爲能事。機會主義者不願盡力去要求增進勞動群眾的物質生活，不願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確立勞動者應享的民主權利。在下層群眾中，會不免有些過左的現象，但要糾正過左的現象，不是要追隨動搖者的尾巴空叫「過火」，而是要有堅決的政策，而當時中共中央却沒有一種堅決的政策。「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說不應佔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閉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註十二）但却不設法究竟如何對付反革命者的任意破壞經濟生活，如何在經濟生活上，組織革命的秩序，來制止枉法不軌的投機反革命分子，或則對於那怠工和故意關廠的工廠，在某種程度上採取工人監督生產的政

（註十二）見八七會議告同志書。

策。中共中央又說『不該自由逮捕』，但却不知道應該進行何種方式去組織革命法庭，以對付反革命的混蛋惡棍，來維持革命的秩序。機會主義者事實上不能糾正『過火』的現象，而且藉口『過火』來麻痺革命，並且正因為他們沒有堅決的革命政策，正更幫助了下一層一些自發『過火』的現象。

在農民運動中，機會主義者也除了空喊『過火』以外，不能有所作為。如果有所作為，那就是在阻止革命對於反革命的抵抗，助長反革命的威風。馬夜事變時，許克祥慘無人道屠殺工農及其他革命分子，當時『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機關的懦弱之猶豫的阻滯，那末，一個長沙城被十幾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來。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湖南黨部的指導者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却，只有兩大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居然衝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因衆寡不敵而退却。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月全省的大反動。中央在農民起義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鬪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史上的一個污點。』（註十三）

機會主義者始終不了解：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可以進一步地激發絕大多數的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可以造成極大量極堅強的民族革命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雖則不可以混為一談，但却是互相

關聯的。而且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中（如在當時的武漢），爲着推動民族革命洪流的開展，還應不怕把土地革命放在民族解放運動政綱上的主位。在當時土地革命運動中，下層會有些自發的過火行爲，而且有些反革命奸細及土豪劣紳，故意製造一些過火現象，以破壞國民革命軍人及農民之間的感情。當然，如果不懂得善於運用革命的政策，無條件的同時向各方作戰，這是愚笨的辦法。事實上，爲着打擊和孤立農村中主要的敵人——大地主，我們對於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小地主的土地政策，是應該靈活運用，應該做必要的讓步，應該警戒過火的行爲。但機會主義者的問題，却不是爲着警戒這種過火的行爲，以求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而是藉口反對這種「過火」行爲，以反對土地革命。

正是因爲機會主義者分裂國民革命與工農利益，所以他們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革命的軍事組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沒有提及一般革命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是無產階級政黨第一等重要的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集聚那零碎散亂的工農武裝隊，使後者一有組織的堅固力量時，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去取得武器以武裝工農，機會主義者那時認爲武裝工農是難以實現的，甚至於以爲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合的。後來經過相當久的時候，機會主義者忽然「積極」起來，不過恰好是相反的積極，決定叫武漢工人糾察隊，「爲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造成革命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武漢上層分子變節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機會主義的領導，於八月七日召集了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這一會議是中共在歷史上轉變的關鍵。在這一會議上，嚴厲的批評了以陳獨秀爲首的中央的機

會主義的錯誤，指出中央過去執行的路線在客觀上等於叛變革命的行動，粉碎了國民革命戰線中機會主義的錯誤，改造了黨的領導機關。八七會議並發表告同志書，揭發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出以後黨的總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的中心口號。但八七會議亦有其缺點，因為它還不能圓滿地展開在兩條戰線上的鬭爭，所以，對於一些政策問題，還不能恰當地處理，而這却是和後來盲動主義傾向的發展有關係的。然而無論如何，八七會議在政治上組織上都給了黨與革命以新的生命，因為正如列寧所說：「一個政黨對於他的錯誤的態度，是對於黨的嚴肅性與在他的階級及勞動群眾前實際執行他的義務之最要最有保證的標準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發他的根源，分析錯誤之所以發生的情形，以及注意討論克服錯誤的方法，這是一個嚴肅的政黨底標幟，這是他的義務底執行，這是階級以及群眾底教育與指導。」八七會議以後，中國革命所以能够找到新的出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 第十五章 廣州起義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

### 新旗幟

#### 第一節 武漢反動後中國民族力量的新結合

武漢政府由革命轉入反革命，主要乃是中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之反映。因為封建殘餘及依靠封建殘餘而存在且為各帝國主義者所拼命擁護底上層建築物是中國實際生活中根本的力量。中國在那時正發展着反對封建殘餘，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及內容，「四一二」慘變後，武漢會經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和堡壘。然而，會幾何時，武漢政府亦終於從動搖而轉入反革命。接着就有賀龍、葉挺革命軍的南征與南昌起義，這是革命方面企圖以武裝鬭爭反對反革命的苦迭打，挽回革命的勝利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嘗試，由於敵人力量的強大與指導的錯誤，南昌起義卒歸失敗，這一失敗結束了中國革命第二個時期——左派國民黨時期。於是中國社會階級力量又重新結合：本來民族資產階級自「四一二」後，就已一步一步地投入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懷抱，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反革命的聯盟。後來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變節，也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所以七月十五分共之後，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下，封建地主，買辦階級，資產階級和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重新結合，築成一道反對革命的陣線；同時，這些反對革命的營壘內



部却依然存在著劇烈的衝突。背叛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及其軍事代表，自從和工農民衆破裂之後，絕對沒有能力去建立他們自己經濟政治的穩定，當時國內各種經濟——工業、商業、農業、財政、國際貿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事實上證明他們並沒有能力實現他們內部的統一，更不用說實現中國資本主義的集權了。寧漢妥協之後，曾不斷的發生彼此的爭執，並且這種爭執，一直發展到爆發戰爭，首先是寧漢戰爭與粵桂戰爭，這種戰爭同時也就反映着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利益的衝突。

別一方面，無產階級和農民及一般城市貧民在極艱難的條件之下，忍受着無數的犧牲，共同進於革命之更高的階段——從與民族資產階級結合之聯合戰線，進於工農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線。這時正當國共分裂之後，由於反革命的進攻，廣大群眾在大革命時代所獲得的利益都喪失了。一切民主權利都取消了，苛捐雜稅重新恢復並增加了。資本家重新向工人進攻，地主又回頭來鎮壓農民了，工會、農會及一切革命組織遭受封閉解散，革命的群眾和領袖與共產黨員繼續遭到最殘酷的虐殺；帝國主義在一度恐慌之後，又重新猖狂起來了。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是受到了嚴重的失敗。

可是，當時廣大的工人農民却不斷地以武裝起義的方法來回答反革命的進攻，以武裝鬪爭的形式來反對革命的叛變者。企圖經過這種鬪爭來保持革命已得利益，挽回革命不利的形勢，推動革命繼續前進。因而在南昌起義之後，接着又有兩湖的秋收起義與廣東海陸豐的農民起義。湖南秋收起義的情形大概如下：『由九月八日至十二日——起義的開始幾天——我們是得着勝利。我們軍隊（農軍）的槍數增加一倍以上，萍鄉的有七百到一千二百枝，安源的有二千一百枝；刀矛、梭鏢武器的農民

成千的加入隊伍，佔據了湘東所有重要的縣份——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株州是到南方的鐵路主要地方，在進攻長沙上有重要的意義，只被有六十枝槍的農民所佔據，在株州城內有一營兵都逃走了，十三日長沙起恐慌。』（註一）當時，湖南是直接由馬變之後，農民協會的政權時期，還活躍於群眾的迴憶之中。湖北農民運動雖然沒有像湖南那樣發展，但據一九二七年五六兩月的統計，湖北全省農民協會會員亦有二百八十四萬二千餘人。七月武漢反動，八月中鄂南蒲圻、咸寧、嘉魚、通城、通山、崇陽等地即有農民武裝之騷動。自此農民游擊戰爭屢起屢仆，直到截斷武長路半月之久，通山等處且有短時期被起義農民所佔領。廣東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於十月三十日，有葉賀殘部很少的軍力參加，十一月一日農軍即佔領海豐，接着陸豐、碣石、捷城亦入農民之手。這次起義極有活動力量，中國革命之中，這是第一次由幾萬幾十萬農民群眾自己動手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第一次組織成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一切田界（廣東所稱爲田學）——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剝削農民佃戶的田契、租約、借券等等，完全當衆消燬；一切田地都歸鄉村蘇維埃收歸公有，分配給農民耕種；一切當舖的財物完全沒收，無價發還典質的貧民。縣城的蘇維埃，如海豐、陸豐、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後來的普寧等處，都由手工工人、農民、苦力等共同組織。海豐十一月七日開蘇維埃大會，到工農代表三百人，參加群眾一萬人，選舉蘇維埃政權，管理東江的各縣，其主席爲有名的農民領袖彭湃。到十一月中旬，起義已擴大有五十萬居民的區域，新組織的工農革命軍已達一萬人以上。

（註一）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訊第六期湖南報告。

此外，廣東瓊崖也有農民鬪爭發生，江西鄱陽、星子等處隨着也有農民鬪爭的爆發。這一秋收農民起義的浪潮傳播到十月中直隸的玉田起義，以至山東的陽穀起義，大半都是群眾自發性質。十一月初江蘇的宜興、無錫、江陰以至崇明的農民鬪爭和起義，十一月一日宜興的農民起義且曾佔領縣城兩天；河南四方山等處也有農民的起義。這些起義大半是共產黨參加領導，也有許多零星的自發的。秋收起義大半都遭到失敗，但在許多地方也相當擴大了共產黨在農民群眾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到農民群眾的意識之中去。後來繼續發展的農民鬪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的創立，大致亦由秋收起義的影響。不過當時秋收起義政策之機械的應用，亦就有些地方發生玩弄起義和軍事冒險的行動。

在這一時期，工人鬪爭亦還時有爆發，例如十月間廣東海員的罷工，上海英美烟廠工人的罷工，蘇州鐵機工人的罷工潮等。此時革命方面最大的弱點，便是革命正在進於更高的階段，而中國共產黨很幼稚，經驗很不充足，又受着極嚴厲的壓迫和摧殘，他在政治上組織上指導革命運動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對於國民黨「左派」還存着種種幻想，由此而發生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尤其是在土地問題及軍事問題上。同時，三種革命力量之間沒有親密的堅固的聯絡，也不能不說是革命的缺憾。南昌起義的舉行，沒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發動工人和農民；而起義的農民又沒有得着城市工人的贊助（如湖南秋收起義時長沙簡直沒有工人運動）；城市工人也沒有會吸引兵士群眾到自己方面來。所有這些弱點和缺憾，就使當時這些挽救革命的企圖，都沒有得到成功。但這並不能就得出那樣的結論，即認為：「武漢的失敗，已經是中國革命最後的失敗，已經是歷史的轉變時期，就是武漢失敗以後，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勝利，已經開始了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期

黨應當取消一切革命的口號而準備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合法運動。」取消主義者不能了解：民族資產階級與上層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陣線之後，雖然還不肯完全放棄他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但是這一政綱的本身只是一種帶血腥氣的，而且是經常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實際不能不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屈服於帝國主義之下；「出賣了同盟者，同時也就出賣了自己。」帝國主義指揮了，幫助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暫時打退了中國工農革命，但是却不能幫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去進行什麼經濟的建設與政權的穩定呢！事實上，寧漢妥協之後，資產階級軍閥和各派各系互相競爭的現象正非常厲害，甚至於已經發展到公開的武裝衝突，如寧漢戰爭與粵桂戰爭等。何況當時革命潮流雖已表現有向下低落的趨勢，但是革命形勢尚未完全消失，而廣大工農革命民衆亦決不願不戰而降；反之，却想用盡一切方法企圖保持革命既得的勝利和向前推進革命的事業。所以在一九二七年的秋末冬初，已自發地組織了蘇維埃政權的萌芽形式和工農紅軍的最初隊伍，廣州公社則更是革命退兵時最大一次的武裝發動。

## 第二節 廣州起義的決定和準備

隨着上海「四一二」的苦迭打，「四一五」後，廣東革命黨人和工農群眾即不斷橫遭殺戮。七月武漢分共，汪精衛等叛變革命之後，張發奎軍隊回師廣東，十一月十七日以「護黨運動」的名義推翻了李濟琛、黃紹竑的統治，發生了粵桂戰爭。這一戰爭的爆發，造成廣州混亂的局面，大部分軍隊調至前線作戰，廣州市內軍隊日益減少。在軍閥混戰之中，廣州市民遭着空前的掠奪，在所謂正稅之外，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想盡了方法搜括民脂民膏，甚至於公開的盜用庫藏。如此之戰爭，財政恐

慌，鈔票跌價，物價高漲，都使經濟生活的崩潰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再加上屠殺搜捕的種種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時候，已經岌岌乎陷於破產的狀態。同時群眾在新政客軍人的統治下，仍受到了極大的壓迫剝削，他們封閉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取消了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壓迫罷工工人出公共宿舍，逮捕及慘殺罷工工人，並令反對革命的『改組委員』佔領工會會所，更用一切方法剝削民衆，因此廣大群眾表示極大的憤恨。當局所派的『改組委員』到處被工人所驅逐，工人自己選舉工會的委員。十月十四日爆發海員罷工，這一罷工引起各業工人的援助，並舉行二萬工人的大示威運動，廣大工人不顧警察的壓迫和拘捕，在群眾大會上，公開的擁護自己的革命工會和共產黨，抗議反革命分子把本來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用爲屠殺革命分子的恐怖旗幟。接着有印刷工人的罷工，這一罷工雖受到白色恐怖的壓迫，但並不能消滅工人的罷工運動，並且更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恨。十一月初，工人群眾開始反對白色恐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舉行了廣大的群眾紀念大會。至十二月初，群眾鬪爭更加高漲：海員、郵務、印刷、汽車等工人都起來鬪爭。工人群眾堅決要求武裝起義，並且自動的武裝起來準備起義。

農民方面，自『四一五』後，曾發生過幾次的起義。賀葉軍至廣東時，農民舉行秋收抗租的鬪爭。十月以後，各縣農民又重新起義。特別是如上面已敘述過的，海陸豐的農民起義得到偉大的勝利，而且樹立起了蘇維埃政權。十一月七日在海陸豐舉行蘇維埃大會，並派人向廣州工人群眾請求援助，其餘在北江、瓊崖等地也發生了農民的起義。士兵群眾方面，同樣動搖得非常厲害，表現對軍閥統治不滿，而同情於革命，並組織士兵委員會，要求改良士兵生活，特別是大革命時代第四軍的士兵，因爲大革命的影響和革命的傳統比較深入，更同情工農的革命鬪爭。十二月初，在許多士兵的秘密會議

上，特別是教導團裡面，差不多整連整營的士兵都擁護中共的主張，要求起義。一般城市貧民及一部分知識分子中，也開始不滿意反動政治的表現，厭惡政治上的混亂和不能容忍的經濟困難，他們對於欺騙民衆的汪精衛、陳公博等，開始失望和怨恨。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衆方面，雖然只有找不着出路的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然而小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已經決定的站到工農方面來。

在廣大群衆熱烈要求起義的情勢下，中共廣東省委遂在張太雷領導下，討論了起義的問題，並決定舉行武裝起義，進行下面的準備工作：（一）確定起義的總政綱；（二）起義之軍事上的準備；（三）廣州蘇維埃之組織；（四）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群衆；（五）士兵中急進的工作；（六）農民中的準備與聯絡。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東省委公開號召群衆起義，並提出下面的政綱與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汪精衛、陳公博及一切反革命派，打倒一切軍閥，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義，勞動民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肅清一切工賊走狗，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反革命者的房屋給勞動民衆住，撥出大資產者的財產救濟貧民，土地歸農民，消滅土豪劣紳地主，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餉至二十元大洋，組織革命士兵委員會，反對軍閥戰爭，士兵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制裁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萬歲，中國民衆和蘇聯聯合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同時並明確的提出幾個最主要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這些口號得到了廣大群衆的擁護。

在軍事上的準備，則組織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爲起義總指導機關，組織參謀部擔負軍事上指揮任務

。組織兩千工人赤衛隊，兩連敢死隊（省港罷工糾察隊一連，海員及手車工人一連）；準備運輸工人、汽車夫等，以及一切運輸用具和武器，以備起義時之用。兵士中的工作首先在廣州駐軍之中發生影響，可是沒有能夠和駐在外縣及市外的兵士，發生密切的關係。市內所駐各種軍隊之中，大半都有革命的細胞。教導團大部分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下，警衛團的士兵大多數也同情革命。在準備起義過程中，共產黨的口號，在兵士的會議中得到了熱烈擁護。

群眾的宣傳曾經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報：工農小報、紅旗及許多傳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起義的前一天便會同印刷工會商定，印佈蘇維埃政府的命令和傳單，這些命令和傳單及日報等計印出七百萬份。

因為秘密狀態異常嚴重，所以蘇維埃只能在決定起義時候才宣佈成立。但蘇維埃代表則在起義前夜即已進行選舉，計：工人代表會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十人，革命兵士的會議選出三人，市郊農民協會上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三人（可是結果三人之中只有一人參加了蘇維埃的工作）。廣州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便由這十六個委員組織，此外還有共產黨的代表參加。蘇維埃的執行委員之中，工人佔三分之一。舉行起義的最終決定，便在這蘇維埃會議上通過。

### 第三節 廣州起義的經過和失敗

至十二月初，廣州形勢更形混亂，東西北三江及南路，幾乎都捲入了戰爭漩渦，李濟、黃紹竑正在積極準備反攻，陳濟棠則在東江獨立，宣佈反對張黃，張黃在此情形之下，乃不得不派軍開往西北江禦戰，如此，廣州非常空虛，祇剩保安隊千人、教導團一團、警衛團一團而已。同時汪精衛對於

廣州教導團兵士傾向革命的事情已經得到報告，正派其妻陳璽君赴港轉粵，密令張黃準備解決廣州駐軍中革命兵士的武裝。而群眾革命情緒確在活躍之中，要求起義的呼聲日益高漲，於是中共廣東省委爲先發制人起見，乃正式決定十二月十一日即行發動。

十二月十一日到了，起義即在當天早上開始。據楊殷在他那篇鬭爭中的迴憶（註二）中所說，那天教導團先將營內的反動長官解決，便與工人所組織的赤衛隊分途向敵人隊伍軍警機關襲擊。砲兵團爲敵人重要部隊，當赤衛隊向它進攻時，人數不滿百人，奮勇向前，該團兵士即表示服從與工人聯合，將槍炮交出。警衛團於工人隊伍到達時，經某連長一呼，並無反抗，便即解決。此時各士兵與工人赤衛隊會合，一路由沙河經東山過廣九站而進攻八旗會館，一路由惠愛東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隊進攻，其餘則分向各警區進攻。當工人襲擊八旗會館時，士兵尙未到目的地，只由一個僅僅十八歲的青年工人同志，帶領七十餘人，武器則只有炸彈三顆，盒子炮一支，手槍一支，先將炸彈拋擲未炸，而反動的軍隊已群起反抗，故由正門無法攻進。於是工人分向各圍牆爬進，徒手奪取軍械一部分，覺悟兵士起而響應，始得解決。於是沿長堤收繳海軍練營、新編二師等部，皆從夢中驚醒，絕無抵抗。轉而向肇慶會館二十五師部，該部頑抗，並用手提機關槍等利器向起義隊伍射擊，工友傷十餘人，都奮不顧身，抵死相持。

（註二）楊殷爲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肅反委員，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因參加革命運動，與彭湃同時被官廳捕殺，他這篇鬭爭中的迴憶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所出的紅旗報第三期。



進攻公安局係分兩路進兵，當時保安隊死力抵抗，總隊長李某親自指揮，卒因工友猛勇進攻，將隊長李某擊斃，於是所駐的大隊保安隊，不敢再抗，都被繳械。其時各路工友已分向城內各區將其攻下，其餘製彈廠、電話局、政治分會、財政廳，及市府各機關，亦相繼佔領。西關七九十等區，亦於同日下午一時佔領。所餘者惟文德路四軍軍部、太平沙貯藏軍械處、潮州會館二十六師部數地。鬪爭最激烈的，亦爲以上數處，而尤以四軍部爲烈。相持至十二日，經過大小數十次衝鋒，炮聲隆隆，徹夜不絕，雖傷亡甚大，但因工友亦死力相持，敵軍卒不敢出衙門一步。至鐵路工人將三路車站克復，廣三路工友更聯合農民向沿路之敵追擊。十二日午，市郊農民更派大隊來會，共同作戰。十二日午後一時，忽來敵軍約一團，由觀晉山下沿第一公園馬路分兩路向我總指揮部猛攻。此時在省長公署（即赤衛隊總部）的工友有槍者約百餘人，便即分兩路迎戰，並約車夫工人五十餘人來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及士兵亦洶湧殺來，敵始退去，起義隊伍復奪得觀晉山。十二日午後九時，教導團全部因保全武裝計，乃集中沙河向花縣進擊，黃埔一部武裝戰士亦於十三日早晨趕到，協同向沙河進發。此時廣州只存三千餘武裝工友，然工友仍不稍却，誓死殺敵。

十三日早八時，敵人已從四面向起義隊伍包圍，因爲敵人並沒有酣眠，它也準備着作堅決的鬪爭。東路由中流砥柱過河向東關廣九車站等地進攻，石龍方面敵軍約一團，沿廣九路石牌站向東門進攻；北路約兩團，一路由觀晉山向第一公園進攻，一路奪黃沙站向西關進攻，另由河南分隊過海，一路由白鵝潭帝國主義兵艦掩護渡海，入黃沙與北路敵軍會合，一路由反動海軍掩護在石公祠登岸，一路由東關登岸與東路會合。此時革命方面已漸處不利，然起義工友和兵士仍分途應戰，東路只有武裝工友二百餘人，與敵人一團對抗，傷亡在一百以上，然猶死力支持。車夫工友某已傷足部，猶指揮前進，

敵人卒不得不退去。西路武裝工友在太平南路祇剩一百餘人，仍將敵軍六百擊退。追殺至大新公司樓，因石公祠敵人用機關槍向後掃射，工友已傷亡五六百人，仍死守太平南路。奈太平南路一帶屋內反革命分子，由窻口向下射擊，工友已傷亡五六百人，此時祇存二十餘人，猶在西瓜園死戰。其餘如維新路、觀音山、廣九車站、東堤等處均仍支持，而且帶着特別堅持與殘酷的性質，敵人至午一時仍不能進展。下午三時後，工人因子彈告盡，敵人又愈聚愈衆，漸漸迫進，然在公安局前，猶作一很劇烈鬭爭，敵人亦死亡不少，工人雖已離公安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而敵人四面用機關槍包圍，至五時尚不敢進去。在這裡集中了最堅決的工人戰鬥隊，可是因受四面鐵桶一般包圍，且彈盡援絕，終於被敵人刀槍所鎮壓下去，它被化爲血泊，它被炮彈燃起的大火所燃燒，廣州起義，是破鎮壓下去了！

當起義開始時，廣州公社即宣告成立，以蘇兆徵爲主席，其各部組織及負責人如下：

總司令——葉挺

總指揮——張太雷

參謀長——徐光英

秘書長——惲代英

肅反委員——楊殷

勞動委員——周文雍

土地委員——彭湃

經濟委員——何來

司法委員——陳郁

廣州公社成立之後，立刻發生許多重要的任務：（一）組織和擁護公社政權；（二）實行公社的政策；（三）向反革命進攻；（四）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並即正式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工農革命軍，設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更公佈了公社政策，主要的內容是：對於工人階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恢復並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對於農民，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完全歸農民耕種，消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消滅田界；各村各區即日成立工農政權；對於貧民，沒收資產者的房屋給貧民住，沒收他們的財產救濟貧民，取消一切捐稅、債務和房租，全市房屋收歸公有，沒收一切當舖，貧民的質物無價發還；對於兵士，國有的土地分給士兵失業人民自由耕種，組織兵士委員會。這些任務和政策，因為公社政權只存在三天，所以並沒有能夠完全實現。同時，就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革命任務看來，有些部分也有過左過早的，然而能夠實行的政策也有不少已經實行了。

在起義中，工人階級異常堅決勇敢與反對者作戰，自動前來領槍作戰者約五六萬人。滿馬路都是工友，有槍的固去應戰，即無槍者亦各做運輸偵察等種種工作，罷工工友、人力車夫、打石棚廠及其他各工友，均勇敢殺敵而犧牲甚多。教導團兵士固忠實於革命，而被繳械的警衛炮兵團及保安隊兵士，亦舉派代表要求發槍，表示擁護公社，願意參加戰鬥。即素來不過問政治的廣東水兵，當在西瓜園開群眾大會時，亦自動的派出代表參加，以示團結一致。而反革命派則驚惶失措，狼狽萬狀；沙面帝國主義者更駭怕異常，爭相下艦去港。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聯合一致反對起義和公社，極盡殘暴的來屠殺起義人民，甚至遷怒並槍決蘇聯在廣州領事館之館員。汪精衛、陳公博等事後曾自稱，在廣州起義失敗後三天之內，屠殺廣州工人民眾至五千七百餘人，即可見其殘暴之一斑了！

#### 第四節 廣州起義的意義及教訓

在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過程中，中國無產階級曾給反革命以最有力的回答，洗刷了機會主義者所給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恥辱，這便是廣州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這一起義的失敗，結束了中國的大革命，成爲革命形勢低落過程中「退兵的一戰」，同時展開了中國革命新的旗幟——中國蘇維埃的旗幟。

雖然廣州公社實行直接的革命政策，雖然得着廣大群眾的贊助，雖然起義人民極勇敢的保衛革命的勝利，然而在三夜三天的英勇鬪爭之後，廣州公社終究被敵人所摧殘了，廣州起義終於失敗了。具體的說來，廣州起義所以不免失敗的客觀原因約有以下幾點：

(一) 由於反革命的武器佔有極大的優勢，起義一開始，反革命便調動三師軍隊向廣州進攻。開始炮擊廣州的海軍軍艦，於是河南的反革命軍隊得以渡河，而且調動武裝很整齊的民團加入攻戰。各派軍閥在工人起義之後，立刻聯合起來，拚死命的用一切方法來撲滅他們所痛恨的公社政權，這就使反革命的武裝佔有極大的優勢；

(二) 起義的工人武裝隊伍，沒有軍事經驗，這些隊伍都是在兩三天中編制與訓練出來的，有的還不能使用武器，所以只有一部分機關槍能够使用；因爲沒有相當數量的砲兵，所以奪來的二十五尊砲，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則，工人沒有知道巷戰的架架障礙物的必要，雖然在作戰中工人赤衛隊拼死應戰；

(三) 帝國主義的列強（英日美）極力幫助廣州起義的對手方，它們調來許多軍艦直接攻擊廣州

公社：日本水兵在長堤登岸，開槍射擊起義者，因此長堤的反革命軍隊更難肅清，使起義隊伍費了一天的工夫，沒有能把全力去抵禦別方面進攻的白軍；英國的軍艦和商船救出許多的反動派和豪紳資本家，運他們到河南或香港，使他們能够從容集中力量來對付起義和公社；英國軍艦 *Moran* 號及美國軍艦 *Sacramento* 號也派陸戰隊登岸；中國的反革命軍艦，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軍的掩護，而能運送白軍來轟擊廣州公社，英國海軍且直接動手包圍革命的海員加以逮捕；英國商船公開的運載白軍，於是反革命的隊伍在大英帝國的國旗之下得以渡河來鎮壓起義和公社。

除了這些客觀的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導機關主觀上也有很大的缺點與錯誤：

(一) 雖然廣大的群眾參加了這次的起義，但是群眾中的工作還不够充分，群眾的組織和團結還沒有十分廣泛和鞏固，軍隊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在起義前沒有在工人階級中發動同盟罷工。同時對於黃色工會群眾的態度不對，以致廣州黃色工會（機器工會等）的領袖還能够騙取少數黃色工會的會員來反對起義；近郊的農民運動也非常不够，所以起義爆發之後，廣州附近的農民群眾未能發動游擊戰爭，來與工人起義相配合。對於反動軍隊中的兵士工作也是如此，起義方面雖然已經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贊助參加，但是李福林的兵士並未動搖，加以英日帝國主義者積極的組織反動勢力，直接幫助他們來反攻廣州的起義，於是廣州起義便失敗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二) 指導起義錯誤之中的另一個主要點，便是起義一開始的時候，不能一直取得進攻的形勢。起義主力軍所攻擊的地方，並非敵人的要樞，又未曾即刻佔領軍械局和兵工廠，以致不能擴大起義者的武裝。在軍事的觀點上看來，革命軍事委員會費了太多的時間於肅清長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內反動派的機關，而沒有迅速舉行對市外反革命軍事中心的進攻，就是沒有很快的進攻河南、黃埔以及石龍

，以便與農民起義區域相聯絡（海陸豐離廣州有五六天路程，經過石龍可以相聯絡），於是經過一些時候，李福林的軍隊由河南渡江，起義隊伍便陷於反攻爲守的形勢，我們知道：「防守就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因此廣州起義也就無法逃出這一不幸的結局；

(三) 指揮上的不統一，工農行動聯繫的缺乏，起義時又沒有得着各地工人有力的應援。嚴格的說來，廣州起義中的指揮是有很大的缺陷的。起義中未曾建立健全的集中的軍事指揮機關，而且缺乏健全的領導幹部，周文雍是赤衛隊總指揮，在赤衛軍中並無普遍足夠的威信，總參謀徐光英更是力不勝任，總司令葉挺則因斷言這個起義是「一九〇五」（即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失敗的莫斯科起義），並且「始終未能確定的相信這個起義能够支持很久，最後能够得到勝利」（葉挺在他的報告中親自這樣說的），又加之他於起義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對於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難以指揮。所以自張太雷犧牲之後，起義隊伍便失去了統一的實際的領導和指揮。此時戰爭最烈者爲觀音山、長堤及西關，雖然有些赤衛隊從新編配，並派軍事的人才當隊長及指揮，但因工人對於軍事知識的缺乏，同時因語言不通的關係，作戰時亦各自爲戰，一部分且因被隔絕而陷於孤立。此外，當形勢不利時，又沒有及時善於組織退却，保存力量（當時將起義隊伍靈活地在某種程度上退到海陸豐去是有可能的），以致在起義失敗時遭受極大的犧牲。再則，廣州起義是爆發在中國大革命開始低落的時候，廣州工人兵士英勇的企圖以武裝起義來保持革命的勝利，但是當時武漢、上海工人人民衆經過嚴重打擊之後，還沒有能恢復自己的氣力，未能給廣州起義以有力的應援，甚至咫尺的汕頭、香港的工人也沒有鮮明的應援的表示，所以廣州公社終究是失敗了。

可是，雖然如此，廣州公社雖然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它所舉起的蘇維埃的旗幟，確成了中國千

百萬勞動人民奮鬥的旗幟。所以國際六次大會說：「大會認爲將廣州起義認做盲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起義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Arrière Fight*），雖然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不僅如此，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還有如下的政治結果及其歷史意義是不能磨滅的：

（一）廣州公社的出現，開展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旗幟，這不但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有着重大的意義，而且在東方殖民地革命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意義。它以自己的實例告訴東方被壓迫民族：蘇維埃不但在世界上先進的國度中可以建立起來，而且在較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中也可以建立起來。「蘇維埃是群眾革命鬪爭，群眾政治發動，群眾起義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政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千百萬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大眾，依靠它可以爭取得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二）廣州起義中，充分表現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能力，說明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能够領導中國革命貫徹到底，解放中國民族並進而解放廣大勞苦群眾。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够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零散的和落後的階層」，廣州起義就更多一次地證實了列寧這一真理的指示；

（三）廣州起義充分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的革命聯合。過去廣大農民希望着城市工人的起義與領導，而廣州起義已給予了回答，廣州公社提出了土地農民問題，使工農運動更密切的聯絡起來；

（四）廣州起義中，清楚的揭露了那些平日說漂亮話的革命騙子的真面目，汪精衛、陳公博等自

稱在廣州起義失敗後三天之內，屠殺起義工人人民衆至五千七百餘人；這些叛國漢奸在那時就已經是工農運動的死敵，而一切工農運動的死敵，其結果都必然要成爲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這也是廣州公社所預示出的明白教訓。

廣州起義的失敗說明用武裝起義來保持革命既得利益，推動革命繼續前進的嘗試是失敗了。但是，廣州公社的旗幟始終是中國革命的光榮旗幟，下面我可以引洛甫先生的一段話，來做本章的結論：「在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叛變革命之後，中國大革命是遭受到了嚴重的失敗，革命高潮是向下低落了。工農群衆們挽回革命局勢的英勇鬪爭大部遭受到了失敗，無數優秀的工人農民兵士與他們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員遭受到了空前的慘殺。然而，他們，特別是廣州公社的烈士們，已經指出了中華民族經由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新的道路，在他們的紅旗上寫着的正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主幸福的蘇維埃新中國！正是他們，繼承了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傳統，繼續了中國大革命所未竟的事業。」



## 第十六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總結

### 第一節 中國大革命的根源和性質

已往社會發展的事實，說明了革命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上所發生的突變，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不能爲原有生產關係所容納，舊的生產關係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而成爲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時候就只有摧毀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始能繼續向前發展；這也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說明革命的客觀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了。

生產力是人力與物力的結合，生產關係也是人與人的關係，因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就表現爲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表現爲階級與階級之間的衝突和鬭爭。被壓迫階級代表着新興的生產力，要求打破舊的生產關係，要求生產力的繼續向前發展；壓迫階級則代表着舊的生產關係，極力維持原有的生產關係，阻碍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因此，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時，就必然爆發不斷的階級鬭爭。

因爲被壓迫階級總是代表新興的生產力，所以被壓迫階級的鬭爭，不僅限於反對壓迫階級，而且也反對整個的經濟制度；不僅要推翻統治階級，同時也要摧毀那個阻礙生產力與社會向前發展的整個舊制度，建立更進步的新社會。所以被壓迫階級的鬭爭，不僅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而且也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階級鬭爭不但不會違反全社會全民族的利益，相反的，却正是爲着全社會全民族的利益和

解放。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愈尖銳，就反映階級鬥爭的愈劇烈。革命運動更進一步的高漲，革命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被統治階級就起來奪取政權，以暴力推翻舊的統治，建立新的政權，把舊的生產關係摧毀，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制度，以適應於生產力向前發展，這就是革命。在中國，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使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的向前發展，這就是中國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受到生產關係的限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革命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因而中國需要革命，需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在階級鬥爭上的反映，在中國說來，就是廣大要求生產力向前發展的革命階級，首先是工人農民不斷的進行鬥爭，企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肅清封建殘餘。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軍閥等舊的生產關係的擁護者，則極力維持其反動的統治，嚴厲的鎮壓革命運動。這兩種勢力的鬥爭到民國十三年以後，一方面由於民族經濟停滯的反撥，另一方面由於國共兩黨合作的推動，便更趨於劇烈，於是中國便捲入大革命的風暴中。中國的革命階級，首先是工人農民積極參加領導革命鬥爭，顯然不僅是代表本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是爲着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因爲中國革命的任務就在於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與封建半封建的蹂躪下解放出來。這一革命，這種要求，不僅爲中國工人農民所需要就是整個中華民族也需要。因爲只有這種革命鬥爭，才能把中國推上獨立解放自由幸福的道路。

爲什麼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會發生這樣的革命要求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雖然促使中國資本主義得到相當的發展；可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却又統治了中國的經濟，不

僅在政治上獲得了統治中國經濟的保障，而且根本操縱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因而帝國主義同時又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的發展，造成中國資本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性，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又因爲帝國主義對於封建勢力的扶助與支持，造成封建勢力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這就決定着中國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前途，規定着中國民族工業的「非民族化」與破產殘落的途徑。

同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使中國農業生產依靠於世界農業市場的監督，但帝國主義並不提高中國農村經濟的生產力，並不改變農村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却正相反，帝國主義維持農村中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經過中國的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變本加厲的進行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使中國農村經濟走上了整個崩潰的道路。「殖民地的農業，極堪注意的部分是爲輸出品而工作；但是農民經濟，却並不因此從資本主義前期形式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一般是，農民經濟受迅速發展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壓迫，以及捐稅的增加等，而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法，反因之增強。因爲財政資本的需要，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法成爲隸屬，因之農民經濟轉變爲「自由」的商品經濟，農民的剝削增加了，而農民的生產方法却沒有進步」，（註一）這一估計完全符合中國社會的客觀事實。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因爲中國在形式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經濟上却依附於帝國主義，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同時中國經濟已經不是純粹的封建經濟，資本主義已經得到相當發展，雖然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却仍然存在。這裡絕不能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

和封建勢力的存在，而認為中國經濟是殖民地經濟或封建經濟。因為中國國家政府還是半獨立性的，對於中國經濟還有半獨立半自主的權力，這與純粹的殖民地經濟是不相同的。另外中國自然經濟已經破產，商品經濟得到發展，特別是中國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雖然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不僅存在，而且更其加緊；顯然的，也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經濟還是封建經濟。在另外一方面，同樣不能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相當發展或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確認中國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因為這種觀點實際是完全否認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及其作用，否認了中國經濟性質中封建的半封建的關係。上述的簡略分析與活生生的一切事實，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同時也有力的擊破了托洛斯基派認為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謬論。

托洛斯基派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已取得統治地位，封建勢力已經消滅，或者像陳獨秀所說已經是「殘餘的殘餘」，因而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荒謬的估計是根據於托派的下列觀點：

(一) 托派認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絕對對立的，帝國主義是絕對破壞封建勢力的，因而帝國主義的侵入已經掃除了中國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幫助中國工業化，使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了；

(二) 托派又認為商品經濟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三) 托派更認為農村土地的集中，貨幣地租的出現，就是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

(四) 最後托派認為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因而不應「強分賓主」，而

應「一視同仁」。托派的這種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第一，托派只是機械的一般的去了解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所處的對立地位。而根本不去或不願去了解在特殊條件下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互相勾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雖然在表面上破壞了中國封建的藩籬；可是爲着統治中國，壓榨中國民衆，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却又與中國封建勢力互相勾結，並狼狽爲奸。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經濟，極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在於獲得超額的利潤，在於奴役中國民衆與殖民地化中國，如果中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顯然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給以致命的打擊。托派認爲帝國主義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的作用，在於是贊揚帝國主義的侵略爲進步作用，以模糊中國民衆的反帝意識與反帝鬭爭，放棄反帝運動，實際上是幫助帝國主義，成爲帝國主義的護士。

第二，托派認爲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是錯誤的。雖然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事實，但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不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品經濟可以在各種社會形態下存在，它不能代表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不向資本主義道路前進，而只是加強了中國剝削階級對於農民的剝削。對外貿易的發展也不能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只能說明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中國農村生產的商品化，農民放棄糧食生產而生產工業原料的結果。

托派對於中國商業資本的特性也是不了解的，中國商業資本的特性在於它是在帝國主義羽翼下發展起來的，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業的仲介人。它不能幫助組織生產，只能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中國

商業資本又帶着濃厚的半封建性，一面軍閥官僚地主的資本佔主要地位，一面却又進行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斯大林在反對托派的時候，會很尖銳的提到這一點：『中國鄉村中，有沒有商業資本存在呢？有的，牠不僅存在，而且在榨取農民膏血這一點上，商業資本並不讓於一切封建代表。可是這種原始積累形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與封建統治及地主統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的方法。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反對派的錯誤，就是沒有了解這種特別形式，沒有了解：中國鄉村中商人資本與封建殘餘統治間的這種結合，同時保留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註二）

第三，以土地的集中與貨幣地租的出現，便認定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已經佔統治地位一樣是荒謬錯誤。中國農村中土地的集中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農民的無限的壓榨，使農民貧窮化，使農民破產失地的結果；因而土地的集中並不是農村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而是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加強的反映。土地所有權雖然大批集中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資本家、軍閥官僚的手中，但他們並不把這些土地拿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把它劃成小塊租給農民耕種，這即是說土地的使用權依然是分散而不集中，這些地主經過這種土地的出租來剝削農民，這種剝削依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不論地租的形式是自然生產產品或是所謂『現代化』的貨幣。

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生產，大規模經營的農場除江浙有少數外，簡直絕無僅有。至於一些墾殖

（註二）見斯大林所著論反對派第二六八頁。

公司也並非是大的土地經營，而是把大田切爲小田租與經紀人，經紀人又把小田切爲更小的田租與佃戶，繼續進行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中階級分化的過程，也造成了農村中富農的資本主義的成份，但是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尤爲困難與半途而廢的。由於帝國主義妨礙中國工業的發展，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失却都市工業發展的依靠。中國農業對於世界市場的依靠，中國農業在帝國主義打擊下的破產，就使各方面積累起來的資本（工業積累起來的資本也在內）不用來提高農村生產技術，不投到工業中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貸方面，用封建的形式來加重的剝削農民。因此，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一方面實行僱用工人（僱農），別方面依舊要出租土地，而且還要經營商業和高利貸，造成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很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鄉村中也購買土地，利用封建式的剝削去剝削農民。至於中國的軍閥，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中國豪紳、地主、商人、高利貸者這個封建集團的上層建築，他們本身大都就是封建地主，雖然他們自己往往還兼做工業企業的主人，但這並不能改變事實的本質，他們依然還是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代表。

至於地租在這個字的現代意義上（即資本主義的地租），即是農業利潤超出平均利潤的一種剩餘。但是在中國農村中，還沒有什麼平均利潤，中國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不但得不到他所投「資本」的平均利潤，而且就是佃農生產工具的「利潤」改良，佃農及其家屬的工資的大部分，也送給地主做地租去了，這種地租當然同資本主義的地租不相同。這種地租是封建時代的地租，這種租佃關係，當然還是封建時代的關係。中國的貨幣地租，實際不過是生產品地租的一個簡單的轉變，這種轉變是跟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地主避免農產品價格低落的損失而來的，貨幣地租並不就是資本主義地租，而且

在中國生產品地租還是佔著優勢。

第四，托派對於外國資本與民族資本的一視同仁也是錯誤的，因為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發展與民族資本的發展是代表着不同的社會意義。外國資本在中國勾結封建殘餘，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資本發展的目的只是在於獲得超額利潤，並不是促進中國的工業化，因而外國資本僅只限於輕工業方面的發展，外國資本所獲取的超額利潤不是用來發展中國的工業，而是運回帝國主義國家中去；所以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發展與加強，只能使中國經濟進一步的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進一步的殖民地化中國。「兩者之間的排擠傾軋」並不是「很類似於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關係」，而是中國民族資本要求解脫或限制帝國主義羈絆的表示，而是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殖民地化中國。它們中間存在着這種矛盾，正是民族資產階級會幾次參加中國革命的原因。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分別外國資本與民族資本，應該而且必須去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這不是「只曉得替資產階級寫財產清單」，這更不是「多事的」「資產階級應聲虫」的行爲，而正是忠實於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事業的光明正大的行爲。只有托派的這種「一視同仁」，才是帝國主義的應聲虫。

托派對於中國經濟的錯誤的荒謬的估計，對於中國革命當然要得出錯誤的結論。托派認爲中國革命性質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革命任務是消滅資本主義；講到民族問題，那末托派也只認爲中國民族革命的根本原因只是海關不獨立；所以中國不但不需要土地革命，而且也不需要嚴重的反帝鬥爭，只要收回海關就算事。顯然的，這種結論就等於放棄了反對帝國主義與肅清封建殘餘的基本任務，其實質就是幫助了帝國主義，幫助了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必然的成爲要求中國獨立解放的中國廣大人民的死敵，成爲中華民族解放的障礙。



我們從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認識上，得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正確估計。中國經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中國社會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要求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求中國的獨立解放，就必須執行嚴重的反帝國爭與土地革命，根本掃除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肅清封建殘餘，因而中國革命的兩方面的不可分離的任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與肅清封建殘餘，因而中國大革命的性質顯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

不過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主要事實，除了「(一)中國半殖民地地位及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而加深；(三)無數百萬工農群眾反封建官僚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漲」之外，還有「(四)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薄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畏懼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及其在廣大勞苦群眾中間的威信日益增漲；(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相鄰近」的重要因素；因此，又規定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並不和十九世紀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相同，因為中國革命發展在特殊的環境中，除了中國是處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這一個顯著的特點之外，還有另一個特點，即中國革命是發生於世界革命已經開始的時期，而為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革命運動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在沒有進到世界革命時期以前的民族解放運動，僅是整個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的一部分，而到現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已經進到世界革命的時期，民族解放運動便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列寧)於此，我們說到中國大革命性質的時候，還可以歸結到下面的一個結論，即：

「中國革命發展之現時階段，從歷史上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但是如果無產階級

握到革命的領導權，則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造成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而將成爲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革命民主專政，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註三）。

##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中各種社會動力的作用及演變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它可以迅速地深刻地教訓人們。革命又是歷史的舞台，它可以清楚地表演各階級的特性和作用及其全部面目。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就是這樣教訓過人們和這樣表演的。

中國大革命是從工人階級的反帝鬪爭開始的（五卅和省港大罷工就是明顯的事實），而工人階級以廣州起義的『退兵時的一戰』收束了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中國工人階級成爲中國大革命的先鋒隊，成爲大革命的骨幹。大革命中充分的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說明了無產者是革命最堅決和最勇敢的領導者。爲什麼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呢？這裡我們首先應該從中國各個階級的實際狀況來考察。

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軍閥，都是中國革命的敵人。因爲中國買辦資產階級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產生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大體上是相符合的，因而反對帝國主義也就損害到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就決定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是其政治組織的基礎。中國因爲處在半殖民地的特殊地位，所以此種階級結構，比別國更爲複雜。

（註三）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

封建制度在別的國家，差不多早被摧毀了，但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直到現在依然保存着。地主豪紳正是這種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它們是最喜歡握着統治權和剝削權。沒有『暴民』造反，而『平平安安』過日子的，大革命鬪爭的深入就將要掃除封建殘餘，因而它們是堅決反對革命的。軍閥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產物，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上層政治建築；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而加深，因此軍閥也就成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雖然在某一情形之下：一部分買辦地主和軍閥也有可能轉向到革命營壘中來，可是它們鑽進革命陣線的目的，不是爲着革命，只是在革命外衣的掩護下，企圖保持它們的利益，使革命不致損害到它們的利益。另外，則企圖在革命陣線的內部進行分裂，來腐爛革命內部，以破壞革命運動。『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見，於是那些迄今（一九二六年底）還站在民族革命鬪爭之外，或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這些反革命舉動的主謀者，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這種估計，完全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形。當革命成爲不可爭辯的力量時，甚至反對革命的人們，也開始『承認革命』。正是由於革命的力量使得軍閥無法抵抗，同時影響到其內部的動搖，於是有的就爲着保持它們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爲着利用革命來擴大其勢力地盤，或者在帝國主義者的政策陰謀下，就轉到革命營壘中來了。它們企圖在革命內部來分裂革命並破壞革命，但是一到革命形勢不利時，他們便將其原來面目暴露無遺了。

至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在限制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殘餘的束縛，要求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前提下也需要革命並參加革命，可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有密切的關係，它在革命運

動中始終是動搖的，妥協的。在帝國主義的某種讓步下，在群眾革命運動進一步開展的威脅下就要叛變革命，出賣革命；因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僅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到澈底的勝利，而且也不能成爲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大革命最清楚暴露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因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它們需要革命，它們可以參加革命；可是當革命運動的發展超過了資產階級所能控制的範圍，在帝國主義威脅利誘下，它又離開革命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回頭來反對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首先是大革命的過程，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曾經領導過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曾經參加大革命，如在五卅運動中與北伐過程中。但它參加革命的目的，固然一方面是希望在某種程度上解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而另一方面却在控制這一革命，奪取革命的領導權，以限制革命的發展。因而，在大革命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上海三次起義後，它們就離開革命，而與革命爲敵了。

因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緩慢的關係，所以小資產階級便十分衆多。這一階級如小商人、手工業者、學生及一般知識分子，由於民族的恥辱地位與他們自己經濟狀況的關係，都很需要革命，他們曾經積極參加過革命，而且有些還曾被革命春潮擁到威權山頂上去過，因爲他們『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性』。在中國這種社會情形之下，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革命的橋樑，對革命的開始起推動的作用。可是因爲經濟背景的限制，在革命運動中，特別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小資產階級必然又走向動搖，以至於脫退革命。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最容易走入屈服、灰心、空想之迷途』，所以小資產階級不能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但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的態度，大部分是由於革命階級運動的力量來決定的。工人階級及

其政黨的鬭爭愈堅決愈劇烈，農民反對地主的鬭爭愈深入，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向左傾，愈能站到革命戰線上來；反之，如革命的階級及共產黨自己也表現動搖、不澈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傾向有產階級的營壘，反革命的營壘。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除自己的堅定與果決外，沒有更真實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列寧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必先自己開始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我們應當記着，社會之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鬭爭，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自己獨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無產階級同道。無產階級應當明瞭小資產階級之動搖是不可避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它自己應當有堅決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目前的問題。」（註四）

在武漢時期，橫在革命面前，是有無數的困難需要克服的；同時一部分較富裕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者對於革命的展開，也感到懼怕。這上層小資產階級者就極厲害的動搖起來了。而當時陳獨秀、張國燾機會主義者那種「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在上層面前呻吟，在下層面前戰慄，被革命風暴嚇得心寒膽裂，到處沒有毅力，到處沒有主動性」的動搖，就幫助了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如汪精衛之流由動搖走到變節。

中國廣大農民群衆，一方面受外國帝國主義之經濟政治的進攻，大批的破產失業，發生極強度的貧窮化過程。另一方面受着封建地主之殘酷的剝奪，農民對於地主的租額一般都非常之高，全國各處都沒有少於百分之五十的，有的地方居然到了百分之七十，遇着災荒往往全部收穫還不够交租，加以

（註四）中共八七會議告同志書。

軍閥混戰兵匪災荒的連年侵擾，苛捐雜稅的重壓，使一部分還沒有破產的小農亦急劇的趨於破產。中國農民群衆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都是無地的農民和地少的農民，他們是歷史上地主兼併土地的結果。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上的特點，尤其是地主階級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個人兼做地主和商業資本家及高利貸資本家，一個地主，他一方面壓榨佃農的地租，別方面便是債主，拼命的用高利貸盤剝農民，結果地主簡直將自己的佃戶和債戶，變成了債務上的奴隸和像牛馬似的對待他們。中國數千百萬受剝削受壓榨的農民群衆，不但他們辛勤困苦所生產的大部分都飽了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私囊，而且自己的一些土地也大多被地主豪紳所掠奪所兼併，所以極大多數的農民群衆，不但遇着天災戰禍或者歉收的時候，不免活活的餓死，就是在一般狀態之下，亦大都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很自然的中國的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堅決擁護者，是無產階級在革命現階段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在北伐戰爭中，農民積極的協助北伐軍擊潰了反動軍閥；在大革命遭受失敗時，農民積極爲保持革命已得利益而鬭爭，這種鬭爭實際上也是表示農民要力爭自己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及維持生活的來源——土地，而土地革命乃是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這就說明了爲什麼民族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的理由。可是農民又是一個私有主義者，農民是保守的，落後的，散漫的，無組織的；它不能成爲革命的領導者，而只能成爲中國革命的堅決的徹底的執行者。

因而能够居於中國革命領導地位的，就只有無產階級了。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到徹底的勝利，因爲：第一，無產階級是最受壓迫最受剝削的階級，因而也就是最徹底革命的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只有好處，無產階級在革命鬭爭中失掉的只有鎖鏈，獲得的却是全世界；第二，無產階級在工廠的集體生活中，鍛鍊了自己，使自己成爲一支有紀律的、有組織的、有團結性的軍

隊，它不僅能够破壞而且也能够建設，不僅能够破壞舊的制度，而且能够創造與建設新的社會，因為它有科學的馬列主義作指導。

中國無產階級處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資本家數重壓迫之下，它的鬭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一開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二階級的階級鬭爭而且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先鋒。從一九二一年工人運動發生以來，工會的組織運動，罷工運動，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階級的經濟鬭爭；實際上呢，這些運動緊跟着五四以來的排日民族運動而來，足見當那商人學生的鬭爭疲弱下去的時候，獨有工人階級繼續着革命的鬭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資本家：海員罷工，唐山罷工，京漢罷工，先後繼起，的確給了國內外的反動勢力以重大的打擊。這一時期，差不多可以說中國民族運動之中只有工人階級的階級鬭爭。因為工人階級鬭爭的猛進，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便漸漸有興起的勢頭。同時軍閥和帝國主義也很知道：如果能够摧殘了這一支生力軍——職工運動，其餘的什麼商會，什麼民意都不足懼了。因此，京漢總工會被封時的大罷工，受了二七屠殺的大打擊而失敗之後，不但北部鐵路工人的工會完全受摧殘，不但全國的職工運動都受着鎮壓而趨於消沉，而且不過半年，直系軍閥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一天天高壓下來：曹黨驅黎，賄選成功，全國各階級都屈服在軍閥淫威之下；而且接着便暗助陳炯明以全力圖粵，以謀摧殘當時民族革命的根據地——廣州政府。總之，這一時期，因為工人運動受軍閥的鎮壓而消沉其餘一切進步的解放的爭自由爭民權的運動，都連帶着被鎮壓下去，這是二七以後兩年來的事實。

二七之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職工運動雖然表面上有一時期的沉寂，然而實際上各地的工人運動仍舊不斷的向前進行。客觀上的狀況稍稍鬆動，工人階級便開始反守為攻的鬭爭。湖南水口山鑛工的罷

工，北方鐵路工人的全國鐵路總工會運動前仆後繼的發展，江浙手工業工人，上海紗業、烟業工人，也是屢起屢仆的和中外資本家奮鬥，雖然結果大半失敗，然而二七以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却在增高，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力日益增進。加以陳炯明猛攻廣州的時候，南方勞動階級都積極的贊助革命勢力反抗這一帝國主義的工具；陳炯明失敗之後，廣東方面的工人運動便得着些公開的可能——工人代表會組織成功，工人反帝國主義的行動日趨激昂。南方民族革命運動因有工人階級的這種積極參加，力量便一天天增長起來，南方的職工運動本身又在向前發展，這兩方面的潮勢自然也影響到北方。一九二四年以後，北方職工運動雖然沒有得着急進發展的機會，然而職工運動反守爲攻的趨勢和民族運動的興起，大致有同時並進的形勢，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節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的舉行，則已經是五卅運動的前夜了。

五卅反帝國主義怒潮是工人階級首先發難的，全上海二十餘萬工人宣佈總同盟罷工，甚至於英日各廠之外，各國的工廠企業以至於華商工廠的工人，都以同情罷工加入，這次罷工的性質，便從內外棉一廠內的經濟鬥爭演變成爲政治罷工。廣州、香港的罷工，首先是爲響應上海的極大規模的反抗帝國主義的雄偉鬥爭，經過英法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屠殺之後，工人民衆的堅決勇敢的鬥爭，一直支持一年半之久；一方面省港罷工與民族抵制竟使香港變成荒島，另一方面廣州國民政府便在罷工工人力量之上建立並相當鞏固起來。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使他與帝國主義接觸而引起最堅決的衝突，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足以掘斷帝國主義力量之根源。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聞所未聞，這種情形，保證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了最高的利潤，開展工人運動，不但不會像機會主義者所說破壞國民革命，而且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所依據的支柱。懷疑者，我們可以請他再讀一讀



下面一段話。

「幾十萬工人罷工，使外國工廠停止工作，使上海、香港這樣的碼頭寂然無人起貨，這個對全運動有何等重要的經濟政治上的意義！帝國主義者所引以為憂愁恐怖和危險的，正是工人的罷工。倫敦、東京、紐約的政府，爲着這個，十分小心並異常驚怕來處理中國發生的事件；北京外交團，爲着這個，引起了分裂；帝國主義者及其報紙，爲着這個，坐臥不寧，驚惶失措，恐嚇也不好，甚至假意恭維也不好。我們設想，假使工人罷工一旦停止了，那末，單是學生和商人運動的影響，必定及不到現在上海、香港工人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千分之一。」

「中國無產階級，在近年民族運動史上，早已做過幾樁光榮的事業。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的罷工及一九二四年夏天沙面罷工這兩件事便可證明。可是五卅罷工與省港罷工中，中國工人表現出來的團結力、持久力，特別是奮鬥毅力，更非前幾次的運動所能望其項背。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的工人，大大地向前進步，這是無論朋友或仇敵，誰都看見的，誰都感覺到的。因此，上海總工會便成了我們敵人暴力仇恨攻擊的中心，同時也便得着中國民衆中革命分子之擁護推戴。」

「實在說來，上海總工會的作用確是很偉大的。在風潮當中，上海總工會正站在敵人的砲火之下；當萬國商團在上海街上「獵人」，鐵甲砲車橫行全市，陸戰隊不斷發岸之際，總工會出來創立自己的組織，成立新的工會，擴大舊的工會，吸引廣大工人群衆於這些工會裡頭，其中有許多群衆乃是從未參加過工人運動並完全沒有鬪爭經驗的。所以能够做到這樣，自然是有一番廣大的宣傳鼓動及教育工作。普通需要幾年才能做到的工作，上海工人從自己的經驗學習並受總工會

指導，居然能在幾個星期之中便做完。」（註五）

緊接五卅運動以後不久，中國無產階級還表現出了他更大的作用，這些重要的事變便是十六年漢口、九江工人民衆收回英租界與上海三次起義及廣州起義。當然，中國無產階級也有其弱點，如農民意識、流氓意識的殘留。這些弱點雖然有時也反映到中共的領導上，而形成不少的錯誤，可是這種錯誤是可以糾正的。同樣，中國無產階級數量雖然很少，年齡雖然很幼稚，然而他不比資產階級，他是唯一能够領導農民起來解決土地問題的力量。中國大革命中充分的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說明了無產階級是革命最堅決和貫徹的領導者。

### 第三節 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意義

中國大革命雖然發展到很大的規模，而且在其初期也確實得到過不少的勝利，但就其整個結果來說，却終於受到了失敗。中國革命在這一歷史階段裡，沒有充分的力量戰勝當前的許多困難，這些客觀的困難和原因之中，應當說到：

『（一）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外國帝國主義是一切反動力量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帝國主義利用自己經濟上政治上的威力，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做些小小的讓步，威逼利誘的分裂民族的聯合戰線，用賄買軍閥的舊方法，用武力的砲艦政策壓迫革命，實行經濟封

（註五）引自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一百二十三期嚮導週報上中國工人及其工會在此  
次運動中的作用一文。

鎖，利用自己強大的威力（銀行、公司、軍艦、軍隊等等）——造成阻礙中國革命發展和勝利的最嚴重的困難之一；

「(二) 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聯合戰線。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是參加革命的，這一事實早已伏下他必然退出革命戰線的叛變。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暫時削弱了革命的勢力而加強了反革命的聯盟；

「(三) 中國軍隊是雇傭軍隊，這是中國軍閥的特點。因此，反動派有着數量上佔很優勢的武力，許多地方這種武力是足以決定勝負的。革命曾經利用這種軍隊，可是這些軍隊的軍官都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的兵士群眾大都是久已脫離了生產的群眾，和工農的聯繫比較很弱。事實上這種軍隊，還是豪紳封建地主及資產階級馴服的工具；

「(四) 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無產階級實行嚴重鬭爭的時候，農民運動才開始發展（例如五卅及上海三次起義時）。中國工人階級本來組織很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並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鬭爭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動統治的歷次打擊，沒有得着農民方面及時的贊助。中國工人階級沒有能等到農民運動發展到群眾的廣大的規模，就受着打擊而失敗。再則，地域上革命的發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廣東及中部的湖南、湖北，農民已開始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開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時農民剛剛才開始鬭爭，還只在開始農民運動的嘗試。這種情形，當然使資產階級封建豪紳地主的反動，更加容易實行自己的任務；

「(五) 中國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極大部分是和半封建土地關係有密切聯繫，並且和外國

資本有相當關聯。所以當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土地革命急劇進展之中，這些小資產階級日益動搖，而終於投降到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中去。這種小資產階級分子動搖而背叛革命，也就是中國

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之一。」（註六）

然而這些客觀上的困難，並沒有完全決定中國大革命必然要失敗的力量。根據科學的歷史觀來看，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的先鋒——中共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當大革命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馬列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客觀上簡直是背叛正在鬪爭的勞動群眾的利益。

「機會主義是傳播資產階級影響於工人階級，並傳播社會民主黨傾向於共產主義運動之一種間諜」。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最先便是由於當時中共中央違反國際馬列主義的指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聯合戰線的任務有正確的觀念，不能保持共產黨自己的獨立性，對於革命同盟者不能實行階級的批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以求戰勝自己的暫時的同盟者之反動的企圖，有時候反而阻止群眾運動的發展，以遷就自己對於聯合戰線的不正確的觀點。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去發展土地革命和工人群眾的階級鬪爭，却只做上層勾結工夫，蒙蔽階級的矛盾，不去爭取軍隊，不去武裝工農，不去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為群眾謀利益。」再則，「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瞭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從一個政治和策略到另一政治和策略的轉變，所以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不能事先準備反攻的力量，俾能在一個過渡的階段上取得勝利，而反被敵人包圍，常常受到敵人「出其不意」的攻擊。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不但沒有堅決的爭取革命領導權，反而自己斷送無產階級領導

（註六）見中共六次大會決議案。

「權——尤其是馬夜事變的政策是最可恥的機會主義的表現。」（註七）中國共產黨當時指導機關這種機會主義政策，就使中國革命受着不可避免的失敗。

中國大革命誠然是失敗了，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由於大革命的失敗，中國民族和土地的解放是沒有完成。雖則如此，然而中國廣大的革命民衆和一切革命戰士並不因此而悲觀而哭泣。因爲任何一次革命的勝利成功，不會不經過任何挫折與失敗而獲得的。革命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有其轉彎抹角的時候，革命的發展是曲線的前進，是螺旋式的向上發展，可是總的方面終會達到勝利的目的，如果革命政黨與革命民衆能够不怕困難而繼續奮鬥。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失敗了，可是「失敗爲成功之母」，它留給了我們以寶貴的教訓；這種教訓是付了很大的代價換來的，這種教訓是中國一切革命戰士貴重的財產，一切中國革命戰士都應該從大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中去學習，爲着中國革命的澈底勝利。

中國大革命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佔着最重要的一頁，而且在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大革命推動了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大革命也說明了中國革命是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革命也就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因爲中國革命的反對帝國主義，就直接搖動了帝國主義的統治，當時中國大革命顯然給世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以沉重的打擊。正如國際六次大會決議所說：「中國大革命，直接說來，是把數千萬人民捲入自己的漩渦，而間接說來，則把數萬萬人民捲入自己的漩渦，這些人山人海的羣衆，第一遭地以如此偉大的力量起來與帝國主義鬭爭。中國與安南、印

（註七）見中共六次大會決議案。

度鄰近交界，這更加大大提高中國革命的意義。最後，中國革命的進程本身，它的民權性質，及其轉變成爲無產者革命的必然性，整個在國際無產者面前，完全表明出中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所以中國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絕不是空空過去了的，它給予我們的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正是以後革命勝利的政治財產。』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便沒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一九二五年至二十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應該成爲以後勝利的中國革命的總演習。

#### 第四節 中國大革命的歷史教訓

一九二五至二十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國共兩黨合作底下創造起來的。如果當時國共兩黨能够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意志合作到底，那我們相信當時的中國大革命是能够勝利的，中華民族澈底解放也能够實現的。一九二五至二十七年的中國大革命雖是曾經創造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使各國帝國主義在中華民族英勇鬥爭前面發抖，然而結果還是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是國共兩黨的分裂。這正如毛澤東先生所說：『中國大革命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着決定的作用。由於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領導了一九二五至二十七年的勝利的大革命，使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民族民權民生革命的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設與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然而由於一部分人對於革命主義之未能堅持，正當革命走到將近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招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自此以後，政權屬於一階級一黨派，不但在國共兩黨之間，而且在政府與人民之間，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外患乃得乘機而入，演成了極端慘痛的屈辱史，這是兩黨破裂了統一戰線

的結果。」（註八）

這一嚴重的歷史教訓，不但爲中國共產黨人所拳拳記取而且爲國民黨人及一切愛國志士所公開承認。例如蘆溝橋事變之後，蔣委員長對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的談話中劈頭就指明這一點：『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會說明三民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爲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宋慶齡先生是中國大革命重要人物之一，所以也能以她切身的經驗來體會這一嚴重的歷史教訓。她在國共兩黨重新攜手感言中會這樣說：『孫中山先生生前主張着：只有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喚醒民衆，組織民衆，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才能救中國於危亡。但是要實現三民主義，只有對外聯合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對內聯合革命的政黨，共同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孫中山先生這個主張，一直到臨終的時候，並沒有絲毫改變。孫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因爲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衆利益的黨，沒有廣大的工農羣衆的擁護和積極參加，中國國民黨所擔任的國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孫中山先生雖然於一九二五年離開我們長逝了，但是他遺留給我們的中國國民黨依然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根據孫中山先生手定的三民主義政綱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因此便有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的大勝利。假如孫中山先生聯共合作的主張，以及聯俄、容共、工農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繼續到底，則中國國內封建勢力早已剷除淨盡，帝國主義也早被驅逐出去，而中國已成爲獨立自由的中

（註八）見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第二七頁。

國了。但是不幸得很，十年以來，國共兩黨分裂，國民黨放棄總理三大政策，共產黨提出推翻國民政府的口號，以至兩黨互相殘殺，犧牲無數有爲的青年，損失無數寶貴的實力，以從事內爭，致令國家民族的真正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乘隙而入。『當今強敵壓境，抗戰國策正需堅持貫徹，而第二次國共合作暗雲時起，煮豆與燃箕之痛，閱牆當禦侮之時，對於這一段大革命失敗的悲慘歷史，尤應牢牢记取。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國國民革命要戰勝自己強大的敵人——民族的敵人，必須善於最廣大地集中民族的力量和最廣大地動員民族的力量。中國大革命中的國共合作和工農生活的改善運動，就是這種集中力量和動員力量的途徑。國共的合作，造成了大革命勝利的發展；而國共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這都是不可爭辯的鐵的事實。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決不祇是中共與工農群眾的失敗，而是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失敗，也就是整個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失敗。國共分裂以後，共產黨及社會中最純潔最精明能幹，敢作敢爲的分子，固然遭受非常不幸，然而這不能看爲一黨一派的不幸，而同樣地是全民族的不幸。因爲那許多在革命中的死者及受難者，都是民族的精華，民族靈魂的寄託者，是費了無量數民族力量，才培養出來的。何況，分裂以後，受害的也決不只是共產黨，同樣地是國民黨。國民黨是由於國共合作壯大起來的，因爲經過十三年以後的國共合作，國民黨力量才大大發展起來，國民黨在國內國外的威信才大大增長起來，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自十六年分裂以後，國民黨雖則是處於統治地位的政黨，但我們可以說：國民黨組織的發展不但趕不上大革命國共合作的時代，而且反而要減少得多，這正是因爲國民黨因國共分裂而和民衆失掉了聯繫，失掉了革命的朝氣；因而一切腐化分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甚至有些賣國賊，都乘機加入



國民黨，借國民黨名義以營私誤國和賣國，進行剝奪國民黨的革命生命，甚至許多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竟連國民黨的組織都沒有，或者簡直不許有國民黨的組織，這都是在國共分裂以後才有的離奇現象。

革命需要領導，而這種領導的必要，是爲了能够保障革命的勝利和發展。那一個政黨能在政治上進行這樣的保障的，就可以保障其在革命中的領導。可惜的，這一客觀真理沒有被當年缺乏政治遠見的人們所認識。當年關於領導權的爭取，事實上，就是關於國民革命前途的爭取；或則使革命中止下來，半途而廢，使國民革命的事業，遭受失敗；或則使革命繼續擴大和深入，使國民革命的事業澈底勝利。這種爭取，當然是不能免的；在革命利益說，毋寧說是必要的。但是這種爭取，在革命統一戰線的營壘中，應當採取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應當歸之於民衆的政治的公決；而一切合作的政黨要珍重自己的革命生命，珍重民族的前途，就要尊重民意的公決，而不應對於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武力的分裂，更絕不應反戈來屠殺革命黨員和工農大衆。但是不幸的，當時當權政黨的一些人物，竟實行這種武力分裂的政策，使民族鑄成大錯。

當時中共領導機關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却又是相反地對於這問題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錯誤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當追隨資產者的尾巴，放棄自己政治上組織上應有的獨立性；當資產者表現其動搖與變節的時候，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不能拿定立場去防備它這種變節，不能把工農利益的發展與國民革命的發展結合起來，不能發展革命的力量來保衛革命的力量；反之，却事事遷就資產者變節的企圖，分裂國民革命與發展工農利益的關聯；而在革命最緊急的關頭，竟解除自己的武裝，表現完全沒有辦法，臨陣脫逃。可以說，當時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正是幫助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這對於革命，對於

民族，同樣是不可饒恕的罪惡。

大革命時，國共合作雖然規定了合作的鬭爭綱領（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等），但却缺乏爲綱領鬭爭的堅持性，沒有根據綱領來更進而互相勸勉，互相督促，以求實行，來批評同盟者的動搖妥協的傾向與行爲，特別在武漢時期，中共上層領導機關甚至將國共合作變爲私人的勾結，喪失無產階級獨立的政治面目。這一歷史錯誤教訓我們：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合，也就是統一戰線的建立，應在一定綱領上形成起來，絕不應成爲私人間的外交和勾結。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將這一綱領在民衆中作深入的廣泛的宣傳，並動員民衆爲實現綱領而鬭爭，而共產黨就必須成爲執行這一綱領的模範和先鋒，幫助同盟者對於綱領的實施。如果同盟者對於這一綱領有違背行爲或動搖的傾向，就應給以善意的規勸，並在群衆中給予善意的批評，以民衆的力量來求得綱領的澈底實現。

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的任务，首先是打倒帝國主義。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中就這樣說過：『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鬭爭，必然要帶着深刻的民族性質，和鮮明的革命性質；它的發展必然一步加深一步，定會同帝國主義作拼命的鬭爭，並動搖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註九）正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最堅決的反對中國革命，它使用着破壞中國革命的一切可能手段，如直接出兵干涉，屠殺政策，威脅利誘，組織與援助中國軍閥，來抵抗革命的進攻，組織反革命力量，來破壞革命等，而當時一切手段特別是注意於陰謀分裂民族統一戰線。帝國主義成爲中國所有反革命的靠山，成爲反對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然而帝國主義內部仍有衝突，雖則反對

（註九）引自論反對派第二七九頁。

中國革命是一致的。大革命時，主要的是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可是當着革命的刀鋒集中到英帝國主義時，日本帝國主義便暫避革命的鋒芒。這裡，很明顯的，大革命會利用過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而首先打擊了英帝國主義。但無疑問的，革命的發展，正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却是中國民族最兇惡的敵人。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今日殘酷地進行滅亡我民族的日寇。正是當年最積極地陰謀分裂國共合作的罪魁。這裡，我可以引一段日寇特務機關的自供：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有席捲長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中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爲尤甚。因此，當時的日本陸相宇垣焦急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奎兩大佐作破壞中國革命的企圖。後永見不幸被捕，幾處死，以津日當局營救得釋。昨爲永見被捕十週年紀念，他縱談往事，頗引以自傲。』(註十)

有趣的是，當時帝國主義與一切反革命派陰謀破壞革命聯合戰線的中心法寶也是『反共』。正如當時蔣介石先生在追悼廖仲凱先生時所說的：『現在我們的環境非常險惡，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最厲害的是帝國主義用反共的口號，來離間我們同志，中傷我們同志』。稍後，蔣介石先生在廣州軍事委員會會議演說時，對於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詭計，還有一段痛切的演說：『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好似毒蛇身體美女頭面的一樣怪物，苟有人和他一會流睽顧盼，其結果必至喪身亡國。我革命黨人應該澈底知道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縱橫捭闔，其用心之險惡，總是令我們中國人自相殘

(註十) 見一九三七年二月北平京津日日新聞所載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對日記者發表的生平最大難忘事件一篇談話。

殺，他好實收漁人之利。」最不幸的，就是在大革命過程中，帝國主義者這種陰謀詭計，竟造成了國共合作的分裂，並造成了國共的自相殘殺。「爲仇者所快，而爲親厚者所痛」，而結果最陰險狠毒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起而實收漁人之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需要兩黨當局與全國人民深思警戒的。中國大革命的另一教訓，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殘餘與反帝國主義兩大巨潮的匯合。這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僅是反對封建殘餘，同時也是反對帝國主義。「因爲帝國主義及其所有財政和軍事力量之在中國，就是擁護且推動那些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使它歐化，又使它成爲守舊的力量，所以要在中國消滅封建殘餘，非同時在中國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鬭爭不可。所以說要在中國消滅封建殘餘，也就應當起來反對在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集團。所以不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鬭爭，是不能澈底打倒和消滅中國的封建殘餘的。尤其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同時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註十一）

爲什麼我們要估計中國革命的這一特點呢？首先因爲中國人民解放鬭爭的這兩個任務，在客觀上都是帶有全民族和全民的性質，但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範圍，就比土地革命的範圍更廣泛些。因此在決定中國革命的政策時應該盡可能的吸收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中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參加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鬭爭，使中國革命盡可能的得到更多的力量和發展到更廣泛的範圍內去。民族統一戰線就是恰好爲的要將中國革命兩大巨流配合起來，以便使得最廣大的人民到

（註十一）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演說，引文見論反對派第二九〇頁。

解放鬪爭中來。其次是要把中國革命兩大巨流的匯合，給以正確的了解。要正確的知道這兩個巨流中間的相互關係，才能用正確的政策把這兩個巨流的任務之解決配合起來。

這兩個任務彼此間有密切的聯繫，但是無論從任務方面看，無論從動力方面看，都不能把它們混爲一談。這兩個任務的相互關係是這樣：反帝革命推動千百萬農民去進行解放鬪爭，同時農民是反帝革命的基本動力之一；如果沒有農民的積極參加，那末，任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都不能得到真正勝利的結果。但是反帝革命運動的本身並不能解決土地革命運動的任務。同樣，土地革命歸根到底喚起農民去實行反帝運動，而且土地革命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經濟基礎，但是土地革命的本身也並不能直接解決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因爲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基本任務，在於驅逐外國帝國主義者出中國，使中國全體人民得到民族解放。而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務，却在於剷除封建殘餘，首先在於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這兩個任務的解決，也並不是一次同時的得到解決，而是依靠當時具體情形來解決的。有可能反帝革命在一次革命沒有完全解決，而移交於下一個階段去求得解決；同樣有可能土地革命在一次革命中沒有完全解決，而移交於革命的另一個階段去完全解決。斯大林曾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聯共中央全會上講到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

「如果第一個階段的特點，在於革命的鋒芒主要的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個階段的特點，却是這麼一個事實，就是革命用自己的鋒芒主要的去反對國內的敵人，首先就是反對封建主，反對封建制度。第一個階段是否解決了推翻外國帝國主義這個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他把這個任務移交於中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去實行，他對於革命群眾只給了第一次推動力，推動他

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以便結束自己的運動，並把這件事業移交於將來。應當設想：就是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的任務，他對於中國廣大工農群眾給予更進一步的推動力，推動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它進行這件事業，爲的是要把這件事業底完成移交於中國革命以下的一個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難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們的革命歷史上，雖然在另一種環境裡，在另一種條件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實嗎？難道大家不知道，我們革命底第一階段沒有完全解決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把這個任務移交於革命底下一個階段、移交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完全地解決了剷除封建殘餘的任務。因此，如果在中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上不能完完全全地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推動千萬農民群眾，喚起他們反對封建殘餘，而終於把這件事業的完成移交於革命底下一個階段，移交於蘇維埃的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對於將來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

這段生動的描寫，表現了這位世界革命的導師如何天才地把握了革命過程每個具體的環節，而且表現了他極深刻的天才之歷史預見。這種預見是和中國實際的鬭爭結合起來，雖則這種實際鬭爭是極曲折，極變化萬端的。一個歷史週期過去了，歷史還沒有做到完成，民族情勢的突變使得人們要更換題目來工作。列寧說得好：「經驗告訴我們，革命所要解決的許多任務中，恐怕沒有一個任務不要求我們作再度的解決的。一度失敗之後，第二次來解決這個任務，把所有一切重新改作一番，正確地判斷用什麼方法才可以解決這個任務。」（註十二）我們現在轉到另一個歷史新週期。簡單重複的歷史

是沒有的，然而歷史或會叫人根據新的題目，新的經驗，在不同的時間下，在不同的方式下，在不同的規模下，把舊的歷史經驗靈活地溫習一遍，而這對於中國民族只有好處。

最後，一九二五至二十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也向我們指出：正確的政策，需要我們對於環境有正確的估計，而領導每一革命必須要善於根據形勢的變化來改變自己政策和鬭爭方式。因為一般的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正像列寧所嘗指出過的一樣，比最先進階級底最好政黨，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內容總是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最好的先鋒隊，也只是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實現革命的（在人們的一切能力特別興奮和緊張的時候），却是最激烈的階級鬭爭所鞭策的幾千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領會和使用一切社會活動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階級須時時準備，以便必要時能够極迅速地、突然間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別一種形式。